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

周连宽 著



中华书局

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

周 连 宽 著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

周连宽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 $10\,{}^{3}/_{8}$ 印张 · 1插页 · 242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统一书号：11018 · 1212　　定价：1.20元

自　　序

唐释玄奘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僧人和旅行家。他早年熟读佛教经典。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佉沙国时，曾指出其僧徒万余人中，许多都诵通三藏及《毗婆沙》，但“不究其理，多讽其文”，可见他的学习方法不仅诵读经典文句，而且深究其中奥义，务得其解。正是由于玄奘这种严格治学的精神，促使他在深究经典义理之中，发现许多隐蔽难明之处，未得解决，乃决心违犯李唐王朝的越境禁令，冒险西行求法。他历尽艰难险阻，屡次几于丧生，亦在所不顾。这种不屈不挠、追求义理的精神，千古而后，犹使人肃然起敬。

玄奘在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苦学了五年，为寺中解经论五十部的十人中之一，大为戒贤法师所赏识，受优渥待遇。戒贤特为玄奘开讲《瑜伽论》，其余正理、显扬、对法、因明、集量及《中》、《百》二论，无不谘禀精研，兼学梵书，洞达其词，能与彼方人士谈论清典妙理。至此，玄奘的学业，已告成熟。他后应戒日王之请，参加曲女城大会。这是一次大规模宣扬大乘，驳斥邪说的辩论大会，与会者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大小乘僧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僧众千余人，盛况空前。会中以玄奘为论主，悬其论点于会场门外，声明有能指出一字无理可破者，请斩首相谢，其信心如是之勇敢坚定，实属罕闻。经过十八日，竟无一人能发异论者。于是玄奘的声誉，传遍了五印度。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归国后所写的记述旅行所经国家和城邑

的见闻情况，范围广泛，材料丰富，除大量关于佛教圣迹和神话传说之外，并包括当地的历史、政治、地理、物产、民族、风尚等记载，为后世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所引据。正如印度史学家辛哈和班纳吉所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不利用中国的历史资料，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印度通史》1973年北京商务版第一册31页）其实中亚各国古代史的撰作，亦少不了玄奘提供的资料。东西学者对此书的研究和诠释，早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惟独我国学者对此作深入探讨者，反而不多。由于有关玄奘的事迹和行程方面，在古籍的记载中往往有不少差异甚至互相牴牾的地方，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讨，故不揣谫陋，提出自己的一些肤浅见解，草成此稿。工余之后，时间有限，手头所能获得的参考书和资料，又极感贫乏，谬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冀学者专家，不弃愚庸，进而教之，则幸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周连宽

目　次

附:

地图:

玄奘西游的起程年代及其年岁问题

(一)

玄奘在其所撰《大唐西域记》一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从长安起程西游的年代，但书前有唐著作佐郎敬播所作的序文，序里说:“以贞观三年(公元629)杖锡遵路。”宋以后刻本均无此序，杨守敬据高丽藏经本著录于《日本访书志》，其后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傅氏双鉴楼藏宋刻藏经本时始补入此序。按此序作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在玄奘撰成《西域记》奏进之后不久，为此书最早的序文。书后有唐释辩机所撰《记赞》，此赞内容有拼凑成文之迹，余别有所说，但仍不失为宋以前的作品，文中也说:“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除《西域记》本身之外，尚有唐释道宣所撰四种书:一是《续高僧传》，其卷四《玄奘传》云:“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径往姑臧，渐至燉煌”;二是《释迦方志》，其卷四《游履篇》五云:“以贞观三年，从京邑西达沙州”;三是《大唐内典录》，其卷五记玄奘事迹云:“以贞观三年，出观释化，五天竺八河，各经历览”;四是《广弘明集》，其卷二二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云:“沙门玄奘言，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按道宣为当时参与弘福寺译经缀文大德九人之一，其四种著作中言玄奘以贞观三年起程者占三种，只有一种作贞观元年。又有唐释慧立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此为记述玄奘生平事迹最早而又最详尽的传记，其卷一云:“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涂，又求祥瑞，乃夜梦见大海中有苏迷卢山，……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卷五载玄奘还至于阗上表云:“遂以贞

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卷十慧立论云：“以贞观三年秋八月，立誓束装，拂衣而去。”按慧立也是参与弘福寺译经缀文大德九人之一，原稿分五卷，立死后散失，门人搜求多年，才获其全。唐释彦悰为之编次，并加笺语，析为十卷，即今所传之本。立原稿成于高宗总章二年(公元 669)以后，彦悰是玄奘弟子之一，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其卷三八《感通篇·述意部》述玄奘事迹云：“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按此书成于高宗总章元年(公元 668)，但该书又云，“至今龙朔三年(公元 663)，翻经论未似奘法师游国博闻，翻经最多”，则龙朔三年已开始写作矣。其成书当早于《慈恩传》。唐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其卷八述玄奘事迹，文同《续高僧传》，按此书撰于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 730）。唐释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云：“贞观三年将欲首涂，……遂即行矣，时年二十九也。”唐刘轲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云：“贞观三年忽梦海中苏迷卢山，……觉而自占曰：我西行决矣。”唐释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其卷十一述玄奘事迹，文同《续高僧传》。

以上所举有关玄奘首途年代的著作凡十二种，其中言贞观三年者占十一种，言贞观元年者只有一种，而且是道宣四种著作之一，其余三种都作贞观三年。这样比较来说，贞观元年之说，似难成立。可是，梁任公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主张玄奘起程在贞观元年，(见该书 1925 年版 118—121 页)后来在《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见《东方杂志》21 卷 7 号)一文中重申其说，盖支那内学院校刻《慈恩传》，其校注即主玄奘起程在贞观元年。此后作者，如冯承钧（见《西突厥史料》95 页注二)，刘汝霖(见《唐玄奘法师年谱》，《女师大学术季刊》1 卷 3 期；《唐玄奘法师生年及西游年代考》，《南开大学周刊》81 期)；曾了若（见《玄奘法师年谱》，《中山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月刊》3 卷 1

期)均沿其说。惟陈援庵断然谓“三年之说必不可推翻，元年说必不能成立也。”(见《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东方杂志》21卷19号)此后陈思据《续高僧传》和辩机《记赞》之文，亦定贞观三年为玄奘起程之年(见《玄奘法师年谱》,《东北丛镌》卷17、18)。故此问题，迄今尚无定论。究其原因，实由于《慈恩传》本身的记载之间以及此传与其他有关著作的记载之间，均有矛盾之故。

例如《慈恩传》说:“法师年满二十，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又说:“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涂，……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若依武德五年(公元622)为二十岁计算，则至贞观三年(公元629),应为二十七岁。或谓原文“年满二十”,乃指足岁而言，应如《续高僧传》作二十一岁，若然，则至贞观三年为二十八岁矣。又说显庆五年(公元660)始翻《大般若经》时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从此上推六十五年，即玄奘出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依中国传统计岁法，是年即为一岁，从此往下推算，二十岁为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而非武德五年，二十六岁为武德四年(公元621),而非贞观三年。又玄奘对诸僧说“今年六十有五”,据《续高僧传》所载，是麟德元年(公元664)告大众语，而非指显庆五年始翻《大般若经》之时。又依《慈恩传》，贞观三年玄奘年二十六，从此推算，至麟德元年玄奘卒时;应享年六十一岁，但《续高僧传》云:“行年六十五矣”,《行状》云:“吾行年六十有三”,《塔铭》云:“时年六十九矣。”正如陈氏所谓“以此传与他传校，牴牾恒有，以此传前后互校，矛盾亦复不免。”盖彦悰编次拼凑，已非慧立当时之旧，而道宣、道世、智升、冥祥、刘轲之徒，各记见闻，亦难免有互相出入之处。此外，唐代刻版印书，尚未普遍，辗转传钞，亦易致误。所有这些，都给从事于《大唐西域记》研究者及玄奘年谱编纂工作者，以很大的困难。

(二)

在《慈恩传》全书中，同时记述玄奘事迹发生的年代和岁数的只有四处：一言玄奘于武德五年在成都受具，年满二十；二言玄奘于贞观三年秋八月首途，时年二十六；三言玄奘于显庆二年(公元657)秋九月二十日《请入少林寺翻经表》曰："六十之年，飒焉已至。"(卷九)四言玄奘于显庆五年(公元660)正月始翻《大般若经》时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卷十)从上述四种记载推算，其年代及岁数都不一致。要肯定任何一项，就不得不否定其他三项。西行求法，是玄奘一生的转折点，所以首途的年代及其岁数，特别重要。玄奘起程西游，是在贞观元年，抑在贞观三年？这个问题牵涉到玄奘事迹的整个过程，因而成为学者辩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自从梁氏提出元年说作为他研究历史方法的一个创见以后，曾获得一部分学者的赞同，他所持理由有三：一是玄奘回到于阗时上表云："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如果作为十七个足年，首途应在贞观元年，而非三年；二是《续高僧传》谓贞观三年遭霜害，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查新旧《唐书》只有贞观元年霜害饥荒的记载，贞观三年没有，是《慈恩传》所谓贞观三年为贞观元年之讹；三是据《新唐书·薛延陀传》，西突厥叶护可汗被弑于贞观二年，如果玄奘于贞观三年起程，到达西突厥可汗牙帐所在地时，已不及见叶护。陈援庵则坚持贞观三年之说，他认为梁氏第一个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唐太宗御制《圣教序》及诸书有关玄奘西游十七载，是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时推算，而不是从于阗上表时推算，如果依后者推算，则从于阗回到长安，前后几相差一载，就非遍改《圣教序》及诸书所记的十七载不可。第二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新唐书·五行志》云："北边霜杀稼。"魏征《十渐疏》曰："贞观之初，频年霜

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册府元龟》卷一四四载贞观三年六月求言诏，有关辅之地，连年不稔等语。第三个理由也不能成立，陈氏提出几个论点，但主要因为《新唐书》所载贞观四年俟毗可汗请婚不确及玄奘所遇见之叶护为肆叶护，而非统叶护。

其后刘泽民（汝霖）对陈氏之说，又提出驳难，为贞观元年说辩护。他的理由有五：一、据《新唐书·太宗纪》，贞观三年不载霜灾之事，惟《五行志》有“贞观三年北边霜害稼”之言，所指为北边，与关中、陇右无涉，且不见于《本纪》，则为害必不大，必不致有灾民四出之事。反之，《新唐书·太宗纪》及《五行志》谓元年河南、陇州、关中均有霜灾饥荒。按此点已经陈氏驳正，他举出魏征《十渐疏》为证，《疏》中明说：“贞观之初，频年霜旱”，所谓“频年”，其必指连年霜旱也明甚。而且说“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其不仅限于北边也明甚，又安得指为与关中、陇右无涉？据《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三年六月“以旱亲录囚徒，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又《册府元龟》卷一四四：“（贞观）三年四月丙午，以旱甚避正殿”，六月诏曰：“……而关辅之地，连年不稔”，更足以证实魏征之言为不虚，可见刘氏元年说的主要论点已站不住脚了。二、《慈恩传》谓玄奘出游时年二十六，贞观元年适为二十六岁。按此说是从玄奘卒年六十三的基点推算而得，六十三岁是否为不易之论，下文将有所评议。三、据《广弘明集》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有“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之语。按上文已经指出记载玄奘首途年代的十二种唐代文献中，只有《广弘明集》一种说贞观元年，其余十一种都说贞观三年，而且同为道宣所撰四种著作中，也只有这一种作贞观元年。元年说最大的弱点还在于西突厥肆叶护的问题，下文将有所论及。四、据《慈恩传》，玄奘还至于阗，时在贞观十八年，上表云：

“历览周游，一十七载”，《请御制圣教序》则云：“以贞观十八年，方还京邑。”从贞观十八年上推十七年，正当贞观元年。按此说陈氏已有驳正，如果承认十八年还至长安之说，即须否定太宗御制《三藏圣教序》所谓“周游西宇，十有七载”，及高宗《述圣记》所谓“问道往还，十有七载”，然而二者均制于玄奘回至长安以后，十七载乃明指从首途起至还到京邑的整个时期而言，焉能否认？至谓《请御制圣教序表》文乃玄奘自述，比较可靠，则《慈恩传》所载玄奘于阗上表云：“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也是自述，为什么又认为不可靠而改为贞观元年？五、玄奘以贞观十四年见戒日王，此证诸史事，无可变易者也。因此年之上半年，与十一年之下半年，在钵伐多罗国，若从元年之说，则贞观四年至那烂陀寺，居此五年之久，至贞观九年，又至伊烂那国，居一年。自伊烂那至钵伐多罗国，中间相隔一载有余，正为南游印度之时。若从三年之说，则至伊烂那之岁，当下移二年，是与至钵伐多罗国之年相接，而此间万里之路程，安可以一飞而至？按刘氏在这里有故意放长时间以强合己说之嫌。据《慈恩传》，玄奘在钵伐多罗国就二三大德学习二年，依刘氏计算，从贞观十一年下半年，至十四年上半年，足计达两年半，而不是二年。又他的出发点在于贞观十四年玄奘会见戒日王，他认为是无可变易的史事，但未说明所据是何种记载。就余所知，各书没有明确记载玄奘会见戒日王事在何年，只有记载贞观十五年戒日王遣使来唐。如《通典》卷一九三天竺国传：“贞观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咥，名尸罗逸多，或云姓刹利氏，遣使奉表。”《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后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两书所载，仅述

贞观十五年两国使臣来往事。至宋仁宗朝，欧阳修、宋祁等修《新唐书》，始将《慈恩传》有关玄奘在摩伽陀国往见戒日王的对话情况，加入《天竺传》中，并置于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遣使朝贡之前。刘氏所谓无可变易的史事，当即以此为依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国传》云："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会浮图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人。'玄奘略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新唐书》的修撰人可能据此就认为戒日王遣使至唐，是由于听了玄奘盛称唐天子声威之后，所以把玄奘会见戒日王置于贞观十五年之前，而刘氏又据此以定贞观十四年为玄奘会见戒日王之年。依《慈恩传》记述戒日王与玄奘对话时所说："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那时戒日王还不知道太宗已经登位，并且不知道秦王是何等人，如果已经遣使，而且使人已回国奏报，必不至于如此。但玄奘之会见戒日王，不一定要在贞观十四年，也可以在十五年，即与第一次遣使同在一年。据《法苑珠林》卷三九引《王玄策传》，贞观十七年三月唐使李义表、王玄策从长安出发，至同年十二月到达摩伽陀国，则途中需要九个月，摩伽陀国使来唐，当亦需要同样时间。假定其使人在长安停留一个月，则往返需要十九个月。《新唐书》记载戒日王遣使，不言何月起程，假定在十五年一月，计其往返全程，也要在十六年八月才能回到本国。据《慈恩传》，玄奘往曲女城会见戒日王约在十月间，则十五年十月间第

一次所遣使人尚在唐都长安，戒日王依然不可能从使人那里听到有关唐太宗登位后的情况。所以说，玄奘之会见戒日王不一定要在十四年，也可以在十五年。可见刘氏第五个理由，也有可议之处。

玄奘先于贞观十五年八月间会见鸠摩罗王，经月余，才泝殑伽河往羯朱嗢祇罗国，至十月到达该国，并会见戒日王，再共王逆殑伽河而进，至十二月方抵曲女城大会场。我们这样把玄奘会见戒日王置于贞观十五年十月，不采用刘氏十四年之说，是否就会使玄奘没有时间南游，从伊烂拏国至钵伐多罗国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整个年谱的安排。在如何看待《慈恩传》所谓满若干岁，停若干年，首末几年等记载问题上，我同意梁氏的说法，不宜依足年足岁计，只能作为几个年头看。（理由见梁氏《玄奘简谱》）玄奘于贞观三年春三月（理由见下文）从长安起程，经过三个年头，大约于五年冬天到达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在那里学习了五个年头，于十年春至伊烂拏国，停住一年，十年冬开始南游，十一年底还至北印度钵伐多罗国。在此停住二年，于十三年秋还至摩伽陀国，又往寺西就般若跋陀罗咨决所疑，然后往杖林山就胜军论师学《唯识抉择论》等，停住二年。于十五年正月与胜军往菩提寺看舍利后，还那烂陀寺，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并与狮子光辩论，著《会宗论》三千颂，又驳倒顺世外道，著《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是年八月应鸠摩罗王之请，赴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十月至羯朱嗢祇罗国，会见戒日王，十二月参加曲女城大会。这样，从伊烂拏国至钵伐多罗国间，有一年多的时间，那里会象刘氏所说必须“一飞而至”？

关于玄奘首途应在贞观三年，已如上述。但起程应在那一个月，记载亦不一致。《慈恩传》先谓秋八月首途，但后来为抵于阗所上之表又云：“遂以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又据《法苑珠

林》卷三十八《感通篇》述意部记玄奘事迹云："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从《慈恩传》所记玄奘经高昌国时曾参与夏坐来看，依《法苑珠林》的记载，即玄奘首途在贞观三年季春三月，似较合适。

（三）

关于玄奘卒时的岁数问题，各书记载，也很不一致。《慈恩传》只记玄奘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五日，而不言岁数。《续高僧传》作行年六十五。《行状》作行年六十三。唐释靖迈《古今译经图纪》作春秋六十九，《塔铭》亦作年六十九（梁氏即采此说），《旧唐书·玄奘传》作年五十六，为六十五之误。刘氏采《行状》六十三之说，他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据《慈恩传》，武德五年（公元622）玄奘于成都受具，年满二十，即二十一岁，与六十三岁之说合。按此点尚可说通，因为《续高僧传》及《行状》即作二十一。二、《慈恩传》谓玄奘出游时年二十六，贞观元年（公元627）出游，依卒年六十三推算，适为二十六岁。按此说要以贞观元年出游为前题，但《慈恩传》明载玄奘首途在贞观三年，而非元年，元年说的缺点已见上文。三、据《塔铭》，玄奘年十三出家于洛，《慈恩传》载玄奘受度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奇之，依《隋书》考之，炀帝大业十年（公元614）善果方在东都，是时玄奘十三岁，则正与六十三岁之说合。按郑善果是否至大业十年方在东都，颇成问题。据《旧唐书》卷六二《善果传》："善果年九岁，以父死王事，诏令袭其官爵。……隋开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业中，累转鲁郡太守。……及朝京师，炀帝以其居官俭约，莅政严明，与武威太守樊子盖为天下第一，各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再迁大理卿。后突厥围炀帝于雁门，以守御功，拜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又据《隋书》卷六三《樊子盖传》："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善，乃下诏曰……。于是进位

金紫光禄大夫，赐物千段，太守如故。”炀帝褒美郑樊两太守为天下第一，赐物千段，乃在同一时间，则善果之受赐，亦当在大业三年，其再迁大理卿，如果不在三年，至迟也在四年。又据《通鉴》卷一八一，大业十一年八月，炀帝巡北塞，为突厥所围。然则善果从大业三、四年至十一年的六、七年间，继续任大理卿，都有可能至东都，又从何证明其必在大业十年方在东都？四、据《慈恩传》，玄奘在高昌上启有云：“负笈从师，年将二纪”，刘氏谓“负笈从师”，当指出游前而为时最近者，即北上从慧休、道深学事也。若依六十三岁说推之，则此时正在二十二三岁，与“年将二纪”之言合。按玄奘文中此语乃追述早年学佛的经历，所以在“负笈从师”句之前云：“玄奘宿因有庆，早预缁门”，我们没有理由把“负笈从师，年将二纪”理解为指出游前而为时最近者。其实“负笈从师”句应指玄奘于洛阳出家后，开始听景法师讲《涅槃经》之时，《塔铭》作年十三，似应据《续高僧传》作年十一，因为在听景法师讲经之后，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其后为众所推，升座覆述，须经一段较长的时间，据《慈恩传》，这时玄奘已年十三。玄奘年十一相当于何时？若依《续高僧传》，麟德元年玄奘卒时年六十五，从此向上推算，则玄奘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至十一岁时，应为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考玄奘与商人结侣，瞒着兄长，从四川沿江至荆州，约当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在天皇寺讲摄论毗昙，自夏及冬，各得三遍，其北游从慧休、道深二法师学，已是六年底或七年初之事。如果依刘氏贞观元年首途之说，高昌上启时至早也要在贞观二年春天，试问从贞观二年上推至武德六年底或七年初，只有五、六年，那里有二十二三年？若依贞观三年首途之说，而“负笈从师”乃指大业六年，则玄奘高昌上启，当在贞观三年，由三年上推至大业六年，约共相隔二十年。按古代所谓一纪，从计数来说，《国语·周语》“数之纪也”，《注》：“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更，故曰纪。”但从

计年或计岁来说，《书·毕命》："既历三纪。"《传》："十二年曰纪。"玄奘之言，应从后说。那么，玄奘从"负笈从师"起至高昌上启，就可以说"年将二纪"了。

《古今译经图纪》和《塔铭》均载玄奘卒年六十九。梁氏采用此说，并举出两个理由：一、据《慈恩传》：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玄奘上表云："岁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然已至"，从卒年六十九推算，是年为六十二岁，可以应"六十之年，飒然已至"句。二、据同传，显庆五年云："法师翻此经时，汲汲然恒虑无常，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依卒年六十九推算，是年正六十五岁。梁氏这两个理由，都比较可取。但梁氏的主张中也有缺点，例如从六十九推算，至武德五年玄奘在成都受具时为二十七岁，与《慈恩传》，所载年满二十相差太远。至贞观元年（梁氏主张玄奘出游始于此年）为三十二岁，至贞观三年（《慈恩传》原载玄奘出游始于此年）为三十四岁，与《慈恩传》所载年二十六，也相差太远。《续高僧传》作行年六十五，而《旧唐书·玄奘传》作卒时年五十六，一般认为是六十五之讹，若然，则刘昫亦取六十五之说。但《续高僧传》载武德五年玄奘年二十有一，若从麟德元年六十五岁推算至武德五年为二十三。该传又谓玄奘于贞观三年首途，时年二十九，但试推算，则为三十，是该传本身的记载，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

（四）

玄奘在素叶城所遇见的西突厥叶护，为统叶护，抑为肆叶护？此一问题与统叶护之死有关。《通典》卷一九九隶其事于贞观元年之下，《册府元龟》卷九七四直书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为伯父所杀，但《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和《新唐书》卷二一七《薛延陀传》均载贞观二年叶护死，《通鉴》亦沿其说。陈氏主前说，而刘氏则主后说。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卷则记其事于贞观元年之末，并

加按语云:“统叶护之死,或谓贞观元年,或谓贞观二年,尚无定论,故以此节附本年之末。”陈氏谓两《唐书》所载夷男之附颉利可汗,乃因叶护之死,《旧唐书·突厥传》载贞观元年薛延陀已叛颉利,安得二年始附颉利乎?故叶护之死,应在贞观元年。刘氏则据《旧唐书·铁勒传》谓铁勒诸部分二大派,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山者,东属于始毕,乙失钵所部在金山者,西臣于突厥(叶护),夷男为乙失钵之孙,故应属叶护。元年薛延陀之叛颉利,乃东派之事,与西派无与;二年夷男之附颉利,乃西派之事,与东派无与,故两《唐书》记夷男附颉利于贞观二年,原无错误,《通鉴》把两派混同起来,才是错误。

按刘氏说的最大弱点,不在于贞观二年叶护死及夷男附颉利的问题,而在于肆叶护之死于何年的问题。若依刘氏元年首途之说,二年玄奘行抵素叶城所见者为统叶护,而又以统叶护死在二年,即玄奘离开素叶城以后不久。那么,当是年夏秋之间,玄奘离开素叶城,经行锡尔河和阿姆河间诸国,以达活国,依《慈恩传》所记里程,约共行了五千里,在飒秣建国停留多日,其余各国亦须停一两天休息,估计全程约需半年。如果夏秋之间从素叶城起行,至快也要在贞观三年初才能到达活国。此国的君长是统叶护的长子呾度设,即高昌王麹文泰的妹婿。玄奘在此停留月余,然后随僧徒往缚喝国(《慈恩传》作缚喝罗国)。《西域记》言玄奘往谒城外西南之纳缚僧伽蓝,在那里闻说,近突厥叶护可汗子肆叶护率兵来侵,劫夺伽蓝宝物,未回到牙帐,即已丧命。据此,则肆叶护之死,如果不在贞观二年底,即在三年初。可是,《新唐书·突厥传》明载贞观四年俟毗可汗为泥孰所杀,奉肆叶护为大可汗。又《册府元龟》卷九六四明载贞观六年八月遣鸿胪卿刘善因立西突厥莫贺设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而此莫贺设即肆叶护死后,国人从焉耆迎立为可汗之泥孰。《旧唐书·突厥传》及《新唐书·沙陀传》均载贞观七年太

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陆可汗，但证之玄奘行程，应以六年为是。肆叶护之死，应在玄奘到达活国之前不久，假定死在五年初，死讯传至唐朝，应在六年上半年，至八月太宗才遣刘善因前往册立。如果依刘氏贞观元年玄奘首途之说，则二年至素叶城，即使遇见者为统叶护，此叶护应死于下半年，继之者先为俟毗可汗，国人不服，乃迎立肆叶护为可汗，两可汗相争不已，计其时当在贞观三年，此时玄奘应已抵达活国，闻叶护已死。如是则《新唐书》所谓贞观四年俟毗为泥孰所杀，而奉肆叶护为大可汗，又将作何解释？也就是说，贞观二年玄奘在碎叶城见统叶护，夏秋之间，离开碎叶，三年初抵达活国，约在半年时间内，要经历统叶护之死，立俟毗可汗，国人不服，迎立肆叶护为可汗，两可汗相争不已。俟毗可汗死，国人奉肆叶护为大可汗，其部帅叛，肆叶护逃康国死等等一系列事件，实不可能。贞观元年首途说的最大弱点，就在于此。刘氏指出《册府元龟》外臣部所载贞观二十三年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安国王并献方物一条的错误，确有道理，"肆"字可能是衍文，但此书所收史料，往往可以补充其他史书的缺略，似不能执一端以否认全书的价值。

结束语

自从梁氏提出贞观元年玄奘首途说以来，不少学者沿用其说，其中尤以刘汝霖从多方面找寻理由，为之辩护，然试细加分析，仍不能视为足以攻破三年说的有力论据。陈氏的论点虽则有时不免流于片面，例如关于玄奘是否及见凉州都督李大亮及统叶护之死和夷男之附颉利等问题，但他主张玄奘于贞观三年出游，四年夏至素叶，所遇见者为肆叶护，而非统叶护，基本上是正确的。刘氏据《行状》谓玄奘卒年六十三，但他提出的理由中，只有一个是说得通的，即武德五年玄奘于成都受具时年二十一，从麟德元年卒时六十三岁推算，正相符合。梁氏则相信《塔铭》六十九岁之说，他所举的

两点论证，似更有力。我认为与其采刘说，不如采梁说，因为梁氏所举的“六十三年……”等句，是很自然地夹入词藻之中，不易讹误。而显庆五年，玄奘自言是年六十有五，也难于否认。故于玄奘从长安起行的年代，我宁取贞观三年之说，于玄奘卒时的岁数，则我宁取六十九岁之说。

从沙州至阿耆尼国的一段行程

《西域记》叙事从阿耆尼国(焉耆)开始，而玄奘自瓠𬍡河(今疏勒河)经高昌至焉耆的行程，相当艰险，且高昌在当时不失为西域一个重要的国家，对玄奘后来的行程有很大的影响，故特据唐释慧立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其他材料略为补述。

唐初严禁百姓出蕃，玄奘求法心切，不顾险阻，冒禁西行。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秋天从长安出发，是年冬天到达瓜州[1]。离瓜州后向北行五十余里至瓠𬍡河，其上有玉门关[2]。为了避开关吏的耳目，玄奘于河上流约十里处渡过。停息时，随行胡人后悔，怕途险不能复返，乃拔刀相向，欲加迫害。玄奘知其意，送给他一匹马，劳谢而别。玄奘孑然独行，在沙碛中摸索前进。行了八十多里，才见第一烽(今白墩子)，潜至烽下取水，被守卒发现，飞箭几中其膝，幸得校尉王祥的帮助，才得续行。玄奘按照王祥的指示，别走捷径，避开第二(今红柳园)、第三(今大泉)两烽，径向第四烽(今马莲井子)，故能于当天夜间到达。斯坦因在《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一文(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谓《慈恩传》从第一烽至第四烽，只要一天，与前文五烽各相去百里之文不合，玄奘从疏勒河起，实走了四程，才到第四烽，《传》中定有缺文。按《慈恩传》明说王祥送至十余里云:“师从此路径向第四烽”，而唐冥详《玄奘法师行状》则更谓王祥对玄奘云:“师勿过余烽”，足证斯坦因之妄。玄奘恐为烽上戍吏留难，仍潜至烽下取水，又为飞箭所阻。因有王祥的介绍，校尉王伯龙亦热情款待，并劝玄奘不向第五烽(今星星峡)，别出他路约百里处，有野马泉可取水[3]。玄奘进

入莫贺延碛后行百余里，迷失道路，找不到野马泉。又不幸盛水袋倾泻，四夜五天无滴水入口，遂昏卧沙中，几乎气绝。至第五夜半，忽被凉风吹醒，马亦能起，稍得入睡。梦中惊起，强行约十里，马忽转向别路，数里得青草甘泉，人马俱苏。停息一天，再行两日才出流沙，到达伊吾。斯坦因谓现在如果从安西来，想避开星星峡，最好在马莲井子离开大道，转向西北西，走过北山。从现在的地图看，若从西北走，必须经过苦水附近的斜坡、烟墩的洼地，而到黄土地带的东南界，略有水草的所在。按《清一统志舆图》，在马莲井子离开大道，向西北行，经过察齐尔图，有一条路，从塔拉乌苏北来，至察齐尔图，然后向北经苦水西南的纳沁河。此处可能是玄奘迷路后获得青草甘泉的地方，过此向西北行，即经斯坦因所谓苦水附近的斜坡及烟墩的洼地，以达伊吾。

玄奘受伊吾王接待，停住十余日，原欲绕行北道，过可汗浮图，避开高昌，径至焉耆④。因高昌王遣使至伊吾，殷勤邀请，推辞不得，遂取道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⑤。所谓南碛，就是莫贺延碛。玄奘这次取道莫贺延碛，依今代里程，从哈密西行，六十里头堡（苏木哈喇灰），二十里二堡（阿斯塔纳），六十里三堡（托和齐）。从三堡起分南北两路，北路经沙枣园、鸭子泉、瞭望墩、一碗泉、东盐池、西盐池、七克塔木、特库斯、辟展、汉墩、连木齐、森尼木、胜金口等站，南路则十五里四堡（拉布楚喀）、十五里五堡（哈喇都伯）、七十里察罕和罗海、七十里内勒滚、六十里阿萨尔图、六十里伊里克库木、六十里察克玛克塔什、五十里额什墨、一百五十里洪（鬼谷口）、二十里楚辉（《图志》谓即《魏书》的白棘城，《慈恩传》的白力城）、五十里鲁克察克（鲁克沁）、七十里哈喇和卓（高昌国王城）。这一路从察罕和罗海至额什墨都是风戈壁，南临莫贺延碛，地少水草，行涉艰难，故商旅多取北路（或称小南路），但北路靠近天山南麓，崎岖坎坷，马行迟缓。南路则南临大碛，地较平旷，马行较便，

且里程亦较短（北路全程共九百五十里，南路共八百三十里）。故隋以前多取此路，亦即唐突骑支请求复开的大碛路。高昌国王因急于见玄奘，特简骏马迎接，故亦取此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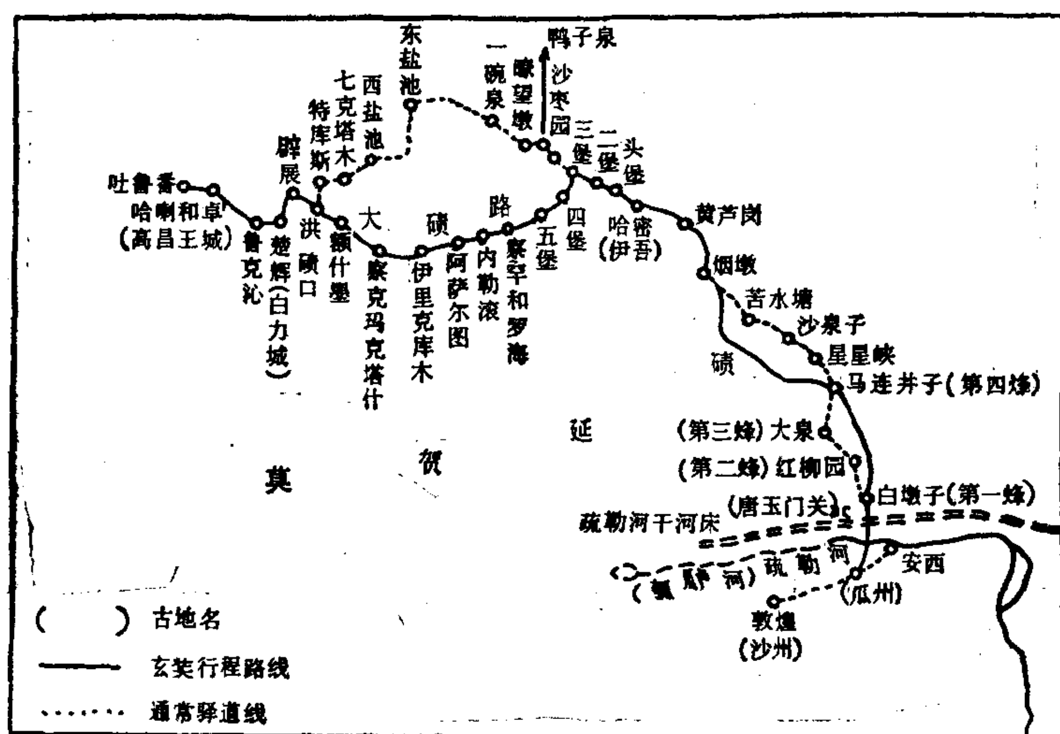
高昌在汉代是车师前部国，汉戊己校尉屯驻其地，始于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亦称高昌壁，或简称昌垒。后汉时戊己校尉屡撤屡复，魏晋仍以高昌为戊己校尉治所，东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前凉张骏平高昌，改置郡县，高昌壁变为高昌郡。历西凉后凉仍为高昌郡。自北凉沮渠无讳承平元年（公元 443 年）起，自立为高昌国，其王姓屡易，沮渠氏（无讳、安周）凡二王，历十八年（公元 442—460 年）而灭于蠕蠕；阚氏（伯周、义成、首归）三王，历三十一年（公元 460—491 年）而灭于高车；张氏（孟明）立五年（公元 491—496 年）为国人所杀，马氏（儒）立三年（公元 496—499 年）亦为国人所杀。麴嘉立，是为麴氏王朝，享国最久，年号重光（公元 500—523 年）；嘉死，光立，年号未详（公元 524—530 年）；光死，坚立，年号章和（公元 531—548 年）；坚死，玄喜立，年号永平（公元 549—550 年）；玄喜死，继王缺名，年号和平（公元 551—554 年）；王死，宝茂立，年号建昌（公元 555—560 年）；宝茂死，乾固立，年号延昌（公元 561—601 年）；乾固死，伯雅立，年号延和（公元 602—613 年）、义和（公元 614—623 年）；伯雅死，文泰立，年号延寿（公元 624—640 年）；文泰死，智盛立，未及改元而国亡。麴氏凡十王，传一百四十一年。（据黄文弼《高昌麴氏年表》）

玄奘于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抵高昌，其时正当麴文泰在位之第七年，高昌介于唐朝与西突厥两大势力之间，文泰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归顺于唐，而实际上则与西突厥结成姻亲，往来至密。文泰欲强留玄奘，长期供养，玄奘不允，住十余日，仍坚请不已，玄奘以绝食相拒，终议定再留一月，讲《般若经》。临别遗赠甚厚，衣物金银，足供玄奘往返二十年之资，又作书二十四封，给沿途国家，

优予接待。这时文泰的背唐态度，还未显著，故同年十二月文泰尚入朝于唐。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侯君集讨高昌，军至碛口，文泰惶骇发病而死，子智盛嗣立，君集进兵围其都城，智盛穷蹙出降，唐以其地为西州。

玄奘从高昌起程西行，过无半城、笃进城，入焉耆国界。无半城疑即托克逊东北六十里之布干，笃进城即吐鲁蕃西南一百二十里之托克逊。《慈恩传》又云："从此西行至阿耆尼国阿父师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数丈，水自半而出。"阿父师泉即今托克逊县治西南之阿格尔布拉克 (Arghai-bulak)，明陈诚《西域行程记》作奚者儿不剌，清徐松《西域水道记》作阿哈尔布拉克，均一地之异称 (见《西域地名》)。玄奘在泉住宿一夜，次日续行，经银山，遇群贼，众给物乃去。银山即《唐书》所谓银山碛，《西域图志》称库木什阿克玛塔克，回语库木什，银也，阿克玛，积而不散之谓。唐郭孝恪进讨焉耆，兵出银山道，亦即此地⑥。依今代从哈喇和卓至四十里城子

图 1　从沙州至阿耆尼国的行程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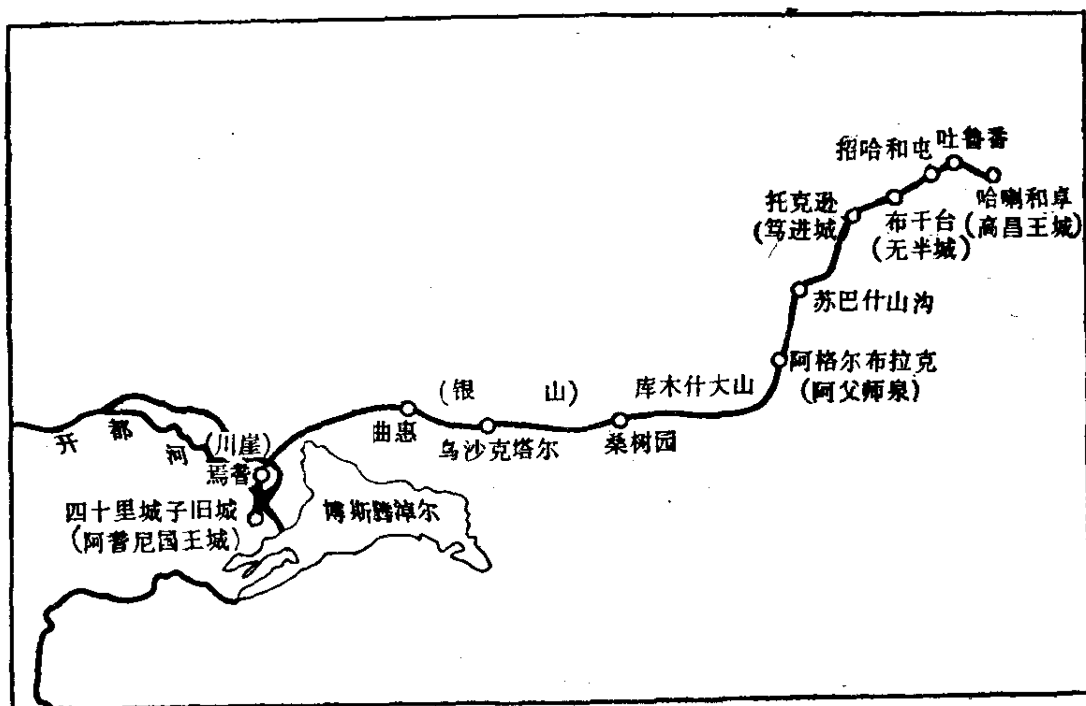


图 2　从沙州至阿耆尼国的行程图(二)

旧城(阿耆尼国王城)的行程，自哈喇和卓西北行七十里至吐鲁番，吐鲁番西二十里招哈和屯(雅儿湖)，西南一百里布干台，又西南七十里托克逊，又南而西入山行一百里至苏巴什山沟，又东南六十里阿格尔布拉克，又南折而西行库木什大山中一百五十里，再西行三百余里至乌沙克塔尔，博斯腾淖尔在其南。乌沙克塔尔西行六十里至曲惠，又西南行百余里至川崖，当指海都河北岸的焉耆而言，次日渡河南行四十里，才抵唐阿耆尼国王都所在之四十里城子旧城⑦。阿耆尼国王与诸臣出城迎接玄奘，延入供养，唯因与高昌有隙，不肯给马，玄奘只停宿一夜而过。

①据《西域图志》卷八，新瓜州在安西州西南三十里，古瓜州在新瓜州西十五里，东距安西州治四十五里，有土城。

②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谓双塔堡疑是唐瓜州晋昌县故址，又《元和郡县志》，晋昌县东二十步有玉门关，则唐代关址当在疏勒河支流窟窿河入口处以西及双塔堡以东之间。但如果古瓜州在安西州西南四十五里，则上面所说玉门关的位置就有问题。据斯坦因在其所著《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

程》(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编 1962 年北京商务版第 22—33 页)一文中说:“……哈密通道经过疏勒河的地方,确在瓜州城正北八英里,设若承认玄奘时代的疏勒河在今日河流之北两英里,我们的地图标示的旧河床所在,则与《慈恩传》五十余里之记载恰合。……玄奘时代的玉门关,确在何处,我现在还不能说。据我们在一九〇七年调查中发现的结果,这个原在敦煌西边很远的玉门关,就在玄奘时代,好像迁到瓜州之北为时不久。”证之《慈恩传》所记玄奘从瓜州起行的方向,斯坦因的说法,较为可信。

③《辛卯侍行记》卷六哈密歧路条谓城东二百二十里为沁城,沁城东南九十里为胡桐窝,其南一程为野马泉。斯坦因谓敦煌至哈密一道,在连接安西哈密通道之前,经过马莲井子的西边距离约有三十英里,位于马莲井子的西北西相当距离的地方,确有一处有水草,这或者是玄奘寻不着的野马泉。

④据《通典》卷一九一云:“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并置蒲类县。”又《西域图志》卷十云:“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其地必与高昌北境相属,故得藉此以为声援。今济木萨与东北境之伯什特勒克,皆有旧城,而自济木萨南逾天山,通辟展,即高昌地。疑汉时金满城,唐时浮图故址于是乎在也。”又《西域水道记》卷三云(沙钵镇)“又东五十里为济木萨,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唐为庭州金满县。……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唐像造碣、元造像碣。”

⑤《辛卯侍行记》卷六云:“辟展汉车师前国东境,北魏以后为高昌国之白棘城,或作白刃,讹为白力、白刀,宋人称宝庄,明曰北昌,今呼辟展,乃白棘、白刃之音译,以回语之芦柴,恐未必然也。或以为鄯善误也。”但《西域图志》卷一四谓辟展应即汉时柳谷,亦即唐侯君集次碛口而进营,姜行本出伊州而造械,以备攻打高昌的地方。又谓楚辉(在辟展西南二十里)距吐鲁番城一百六十里,应是魏白棘城地。《图志》的论据是:《魏书》高昌传载,高昌王马儒遣使迎韩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一百六十里,适与楚辉距吐鲁番的里程相符,惜《辛卯侍行记》的作者陶氏未曾见及,或者有意弃而不用。岑仲勉已对陶氏的主张提出疑问,并将白棘城与白力城分别列举,未作肯定的考证,亦未提及《图志》的记述。岑氏的论点之一谓“当日文泰急于见奘师,简上马数十匹,以相迎候,故行程特速,日暮抵白力而夜半到王城,则两者距离,约不出百里。今辟展在哈喇和卓东百二十里,陶氏谓白力即辟展,揆诸里程,似须商榷。”(《麴氏高昌补说》见《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 年北京中华版第 167—169 页)。以此衡之,则《图志》以楚辉为白棘城,亦有问题。但古代里程计数大于今代,今代辟展距哈喇和卓一百二十里,楚辉东北距辟展二十里,那么楚

辉距哈喇和卓只有一百里。在西北地区马行，据谢彬《新疆游记》，于1917年从伊宁往库车途中，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六时发济尔噶郎，晚上抵恰克魄住宿。共行一百七十里，可见半日能行八十五里。玄奘因得高昌良马兼程而进，于当日黄昏续行，夜半行一百里赶到王城，仅多出谢氏半日行程十五里，这是可以办得到的。所以《图志》以楚辉当北魏时代的白棘城，亦即玄奘时代的白力城，比较可取。

⑥《西域图志》卷二三库木什阿克玛塔克条。

⑦《西域水道记》卷二注。

又依今图，从托克逊至库木什的路线是先向南行，不必经过苏巴什和阿格尔布拉克，转向西，经马鞍桥之北，再转向西南，以达苏木(米)什。(1966年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41—42图)

阿耆尼国考

一、国名

阿耆尼国,《西域记》原注:“旧曰焉耆”, 即《汉书·西域传》的焉耆国。其他史书如《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北史·西域传》、《隋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新唐书·西域传》等均作焉耆, 但释藏僧徒传记和行纪如 《法显传》、《释氏西域记》、《高僧传》、《续高僧传》、《悟空行纪》等则或作乌夷、偽夷,或作乌耆、鄔耆、乌缠①。《慈恩传》原注曰:“旧云鄔耆,讹也”。此外,北齐后主天统二年(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即公元 566 年)翻译的《月藏经》作亿尼。这样同一个地方而有三类不同的名称: 一、焉耆,所有焉夷、傿夷、鄢夷、隝夷都是属于这一类; 二、乌耆,所有乌帝、乌夷、偽夷、乌耆、鄔耆都是属于这一类; 三、阿耆尼、亿尼或忆尼当与阿耆尼一样是来源于梵文 Agni。

玄奘的阿耆尼是焉耆的梵化名称,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对于焉耆这个史书上的旧名也没有意见, 但对于乌耆或乌夷一名则有所争论。贝烈(H. W. Bailey)据吕岱司(Lüders)之说, 谓乌耆原文是 Okñi, 而此字为 Ok 转出之形容词,龟兹语相对之字为 auk, 此言蛇,与哈喇沙尔国王的“龙”姓不无关系。法国伯希和(P. Pelliot)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说:“这些推想全要放弃,因为乌耆名称从未存在。可是负担此种错误的是若干中国版本, 而不是贝烈君。”② 他的结论是,偽夷为傿夷之误,乌夷为焉夷之误,乌耆为焉耆之误。他甚至于说一切释藏经文著录乌耆一类名称者,“好像是有人故意改窜。”这个论点并不是伯希和的发明,其实清朝乾隆年间所撰《西域

图志》早已说过“乌为焉字之讹”③。为什么说乌为焉字之讹?《图志》没有说明,伯希和却列举了不少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公元八一七年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法显传》音义,只有焉夷一名,足见慧琳所见《法显传》是作焉夷,并无乌夷或傷夷。第二个理由是,公元九四〇年可洪所注《法显传》音义作僞夷,并指出僞字作鸤(音坞)应是错误。第三个理由是,慧琳《一切经音义》在注《法显传》“焉夷”条虽则说,“前《西域记》已说”,但查《西域记》音义“阿耆尼国”条只说“古曰婴夷,或曰乌夷,或曰乌耆”,不见焉耆和焉夷之名。“总之,任何载籍皆未将乌耆同焉耆两名并列”,因为乌耆或乌夷名称从未存在,而一切释藏经文著录此类名称者,好像是有人故意改窜。第四个理由是,慧琳在注《西域记》音义时虽有“乌夷”或“乌耆”之名,但慧琳同任何注音义者,皆未注此“乌”字之音,因为在若干著录焉夷或焉耆之写本中,有人误焉作乌。幸而慧琳同可洪的音义受反切(谒乾反、於建反)之保障,使焉夷古名不致埋没。第五个理由是,一切旧本《水经注》引《法显传》和《释氏西域记》皆作乌夷,但因唐人所见的《法显传》既作焉夷,就应承认《水经注》原文是焉夷,唐以后的校勘家受了唐末乌夷讹写的影响,才将原文改作乌夷。第六个理由是,傷字不见字书,任何音义皆未注释其音,玄应、慧琳、可洪诸编皆然,公元九九七年行均之《龙龛手鉴》亦未收此字,然有僞字,即可洪所见之字,足证傷夷为僞夷之误。第七个理由是,焉字从来就容易误作乌。

伯希和虽则列举了这许多理由,但他的论点仍多可议之处。案《汉书·西域传》“乌秅国”条注云“郑氏曰:乌秅,音鷃拏。师古曰:乌,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声如鷃拏耳,非正音也。”唐颜师古注《汉书》是在七世纪上半叶,他所引的郑氏,是在他之前的一个《汉书》注释家,爵里未详,颜氏《前汉书叙例》把他排在汉末人名之间,并引臣瓒之说,谓即郑德。可见,在汉末(公元二世纪末

至三世纪初),乌秅的乌可以读作鷃。鷃,《广韵》乌涧切。《集韵》、《韵会》、《正韵》於谏切,音晏。为什么乌字会读作鷃?颜氏说乌字原音一加反,秅字原音直加反,两个字急读时的声音就像鷃拏,并且说这不是正音。无论颜氏把它说成是正音,抑或是俗音,至少可以说明,乌字在汉末有人读作鷃。伯希和以为郑氏注原本似作焉秅,而非乌秅,这话毫无根据。因为各史书乌秅的乌字从来没有作焉,虽则《后汉书》秅字作耗,不能因后一字改写而推测前一字亦必改写。此其一。

慧琳注《法显传》音义云:“焉夷国。上谒乾反。前《西域记》已说”。(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四卷事汇部第九二六页)又注玄奘《西域记》音义云:“阿耆尼国。两碛之西第一国也。耆音祇,古曰嬰夷,或曰乌夷,或曰乌耆,……”慧琳在公元八一七年所见《法显传》作焉夷,不作乌夷,但唐中叶雕版印书尚未流行,典籍传播,仍赖手抄,慧琳所见《法显传》,只是他所见的一种或几种抄本,不能代表当时所流传的所有抄本。也就是说,不能断定慧琳当时所未见到的《法显传》抄本都作焉夷,而不会写作乌夷。他在《西域记》音义中既云:“前《西域记》已说”,即告诉读者关于焉夷的详细音义,可参见《西域记》音义。据此,可以看出“古曰嬰夷”的“嬰”字为“焉”字之讹。伯希和对“嬰夷”一名却说“此名未详出处”,显然是有意避开这种合理的推论。冯承钧在伯希和注后加“(钧案疑为焉夷之误)”,也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伯希和所谓“任何载籍皆未将乌耆同焉耆两名并列”,就很成问题。既然在汉末,乌字有人读作鷃,於谏切,与焉同音。那么,当慧琳时代,焉夷或作乌夷,或作乌耆,同一地名的读音存在两种写法,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不能说乌字是焉字之讹,更不能像伯希和所说“好像是有人故意改窜。”此其二。

据唐释道宣所撰《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僧远传:“乃见眼边乌

黯”，附《字音》“乌黯”条注云：“上一减反，乌黑。”宋刻《碛砂藏经》是来源于宋开宝刻藏经，其所附《字音》，当是据宋以前流行之本，而“乌黯”之“乌”，绝不会是“焉”字之讹。“乌”字读“一减反”，“一”字据《唐韵》《韵会》读“於悉切”。“乌”字的反切与“傿”字“於建反”，其声母完全是一样，韵母亦极相近。可见，宋以前，不仅“乌耆”之“乌”可以读作“焉”或“傿”，一般用词中之“乌”，有时也可以读作“焉”或傿。五代释可洪所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日本昭和十一年希覯典籍蒐集会刊本）第二十六册第5953页《大唐西域记音义》第五卷“鄢陁”条注云：“上恶胡、恶古二反。王名鄔陁衍，唐言出爱。”又同卷第6090页《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音义》第二卷“鄔波”条注云：“上乌古反。”可见“鄢”、“鄔”读音同为“恶胡”、或“恶古”、或“乌古”反。此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鄢”、“鄔”二字并列在同一音义注释中，显然“鄔”不是“鄢”字之讹。此其三。

明《永乐大典》（上海涵芬楼影印《续古逸丛书》本）卷11，127水部引《水经注·河水》云：“东注蒲昌。”注：“……释法显自乌帝（杨守敬《水经注注疏》作乌夷）西南行，路中无人民，沙行艰难，所径之若（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达于阗。”又云：“南河，又径且末国北”。注：“……北河自岐沙东分南河，即《释氏西域记》所谓二支北流径屈茨、乌夷、禅善入牢兰海者也。”伯希和引王先谦校本《水经注》谓赵一清闻明末有一校勘家曾言《法显传》原文作偽夷，于是把乌帝、乌夷改作偽夷。其实福州东禅寺北宋刻《藏经》本《法显传》、福州开元寺宋刻《藏经》本《法显传》和《碛砂藏经》本《法显传》都已作偽夷。这些宋刻《藏经》，都是沿袭开宝《藏经》的。可见，宋初的《法显传》已作偽夷。既然“乌”字在汉末可以读作“焉”，唐时“焉夷”可以读作“乌夷”或“乌耆”，而“焉”字的异体或俗体可以写作鄢、隝、傿，那么“乌”字之可以写作“鄔”、“隖”、“偽”就很自然的了。可洪所见《法显传》作“偈夷”，因“偈夷”从未见他书著录，

所以他说"疑为偃之误",但"偃夷"也同样是未见他书著录,如果说"偈夷"是"傿夷"之讹,那么下文"正作傿"一句就毫无意义了。下文他又把原文写作"傿夷",注云:"亦作傿",原文既作"傿",何以注文又说"亦作傿"?这一注句,也同样毫无意义。因此,我认为从"亻"的偏旁来推断,原文似作"㑌夷",这样两段注释都通顺了,并且同下面"川音作隖、音坞"才相呼应。如果这样的推断无误,那么可洪撰写音义时已见有《法显传》作"㑌夷"了。"㑌"字的存在就可以上溯至公元九四〇年。"㑌"字虽则不见于现存字书,但我国古代字书很多已经失传,而字书所收异体字和俗体字不能保证毫无遗漏,北宋版《藏经》的《法显传》明明有"㑌"字,而北宋以后所编写的字书都不见著录;又如西晋竺法护用"楉"字译梵文 ña,但宋跋本《切韵》和《广韵》都没有"楉字",足为例证。此其四。

中国典籍在没有刻版印书之前,全靠传抄。既有版印以后,又因校勘不善,错乱讹误,往往而有,"焉"易误作"乌",固是事实,但"乌"误作"焉",间亦有之。例如《碛砂藏经》本《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等焉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剋。"其中"焉合"显然是"乌合"之讹。所以不能以"焉"易误作"乌"为理由,来断定刻本上"乌夷"或"乌耆"必为"焉夷"或"焉耆"之讹。此其五。

据《隋书》卷八四铁勒传,在拂菻的东方有国名恩屈,即西方记录中的 Ogur 或 Ugur。又《唐书》卷一一七上回鹘传:"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隋时的韦纥,即西方记录中的 Uguz 或 Uigurs,则隋以前中国史书对此一民族已有两种译音:一是袁纥(üngurs);二是乌护或乌纥(Ughuz、Uigurs)。可见,隋以前对外国或外族名称,其首字为单韵母时,可以译为有"n"收音的字,也可以译为无"n"收音的字④。袁之与乌,焉之与乌,其例一也。此其六。

总之,伯希和只抓住慧琳和可洪关于"焉"或"傿"的反切大做

文章。其实,他的论点往往陷于主观臆断,经不起严肃认真的科学考验。我们认为,根据汉末人的记述,"乌"字已存在两种读音:一读作"乌呼"之乌(见《说文》);一读作鹦或晏,於谏切。所以"焉耆"一名,至四世纪下半叶,法护译《大宝积经》作乌耆。五世纪上半叶,郦道元撰《水经注》引《法显传》和《释氏西域记》作"乌夷","乌"读作"焉"。(宋刻东禅寺本、开元寺本、碛砂本《藏经》的《法显传》均作"傿夷",高丽本《法显传》作"乌夷"。)六世纪初《高僧传》作"乌耆"(鸠摩罗什传),或作"乌缠"(昙摩流支传)。七世纪上半叶《续高僧传》作"乌耆"(达摩笈多传)。同书《僧远传》"乌黯"之"乌"读作"一减反"。又同时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阿耆尼国"自注作"邬耆"。八世纪初慧琳注《西域记》音义作"或曰乌夷,或曰乌耆"。八世纪下半叶《悟空行记》作"乌耆"。十世纪上半叶可洪注《法显传》音义"鄢"字引《川音》作"鸣",音"坞"。同书注《西域记》音义"鄢"字读"恶胡"、"恶古"二反,"鄢陁"与"邬陁衍"并列。综上所述,足证两晋南北朝以来,在僧徒著作中,"乌"、"邬"、"傿"可以读作"焉",因而"焉耆"、"焉夷"、"鄢夷"、"傿夷"可以写作"乌耆"、"乌夷"、"邬夷"、"傿夷",并不是由于版刻或勘校上的讹误。

"乌"、"焉"二字的读音可以互相通用,不始于汉末,还可以追溯更古的记载。据《史记·秦本纪》:"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西河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此事《吕氏春秋·当赏篇》所记更详:"公子连(按即献公)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按焉氏塞位于今甘肃省固原县东南。是公元前四世纪已有焉氏之名。又据《史记·匈奴传》:"秦穆公(公元前659—620年)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貅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其中之乌氏,据唐张守节

《正义》引《括地志》云:“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今甘肃宁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公元前337—311年)取之,置乌氏县地。”春秋时代乌氏之戎居今泾水上游地区,即甘肃省固原、平凉、镇原、宁县至泾川以北一带,正包括焉氏塞所在地。“乌”可读作“焉”,已如上述,则乌氏与焉氏为同名。公元前七世纪时乌氏之戎的关塞,至公元前四世纪时,则属于秦,被称为焉氏塞。是“乌”、“焉”二字的读音之互相通用,至迟亦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纪。如果认识这一点,那么,两晋南北朝以后,僧徒著作把“焉耆”一名写作“乌耆”,就不足为怪了。

二、都城

《汉书·西域传》谓焉耆国王治员渠城。《西域图志》卷一五谓哈喇沙尔(Kara-Shahr)“有旧城二:一在海都郭勒西十里,一在海都郭勒西南二十里,久废,今移建新城于哈喇沙尔,周一里五分,土田肥沃,鱼盐蒲苇之饶,甲于他处,为古焉耆国地。”据此,则知今哈喇沙尔城,乃清朝所移建,而在今城之西十里及西南二十里的两个古城已废。这两个古城始建于何时,《图志》没有说明。它又说:“惟是城郭变迁,今城南去博斯腾淖止四里,以《魏书》南去海十余里之文证之,度古员渠城故址,犹在今城北十数里,所谓水匝其城三十余里,形势宛存。”既然说汉员渠城尚在今城北十数里,而不是城西或西南,可见二古城都不是汉员渠城所在。据《清一统舆图》,在哈喇沙尔城西南方,有一“故城”,或即《图志》所谓哈喇沙尔西南二十里的旧城。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焉耆国条注云:“钱氏大昕以为员渠即焉耆之转,犹之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危须国王治危须城也。《后书》作南河城,《后汉纪》作河南城。……海都河南四十里,有旧城,雉堞犹存,周围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为员渠遗址。”徐氏又在《西域水道记》卷二海都河条云:“哈喇沙尔城,乾隆二十

三年(公元 1758 年)建,高丈三尺,周二百五十四丈。……余自乌沙克塔勒军台东行,前望山口,如树双阙,落日西衔,右瞻海气,苍茫之色,与天相接。淖尔西岸有故城,雉堞犹存,周九里许,谚曰四十里城,言去镇城四十里也。«汉书»焉耆国治员渠城,袁宏«纪»作河南城,«水经注»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是或员渠遗址欤?”这是主张汉员渠城即今四十里城,与«图志»所谓古员渠城犹在今城北十数里之说不同。又有主张今哈喇沙尔城即汉员渠城故址者,如丁谦«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云:“阿耆尼即«汉书»焉耆,今为喀喇沙尔城地,近设焉耆府。四面据山,谓东艮山,北察罕通格山,南呼尔克达山,西库尔勒山峡,西南二百余里逾小山,即逾库尔勒山峡,«水经注»所谓沙山铁谷关也。越二大河,当从«传»(«慈恩传»)云渡一大河为是,盖库尔勒西,除开都河外,余皆不足称大河。渡河后行平川七百余里,与今至库车城驿道相同。”张星烺亦主是说⑤。斯坦因说:“古代焉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俱占重要的时候,情形都与今日不同。紧靠淖尔(博斯腾淖尔)的北边,为古都城故址,今称为报达沙里 (Baghdad-Shahri) 的许多遗迹,就是一个证明⑥。”斯坦因只说报达沙里是焉耆古都城故址,没有明言是西汉焉耆都城员渠城。所谓报达沙里,实即徐松的四十里城。一九二八年黄文弼在焉耆附近进行考古工作,他不仅详细考察了哈喇沙尔以南及博斯腾淖尔西南方的大平原,并且在哈喇沙尔以西及西北面的大平原考察了几个古城遗址。据他说,四十里城市之东约四里地,有旧城一座,名博格达沁(按即斯坦因所称报达沙里),“位于草滩之中,墙基尚存,周约六里。城中已漫草荒芜,洼者且浸水而成池塘。城中有二土阜,审其发掘痕迹,似为土坯所砌之古房址。城西北隅有一大土墩,高丈余,附近拾有开元钱半枚及碎铜片数块,则此城确为唐代遗址。距大城约半里许,有一小城,周约三里,城垣已颓。小城中又有一个小城基,……至于此一带之古址,

在历史上应属于何国，虽未发现记录明文，无从臆度。清徐松《西域水道记》以四十里城市附近之旧城(即博格达沁)，为焉耆员渠城(卷二，页二二)，我以为非是。按员渠城，为汉代焉耆都城。我在此旧城中拾得唐开元钱，且其建筑为土坯所砌，盖唐以后之古址，决非焉耆旧都员渠城。审其形势及军事设备，或为唐焉耆镇所在地。其次，四十里城市西南沙阜中之遗址，有纪元前后遗物之发现。……据此，则此沙丘中遗址非焉耆之员渠城，而是尉犁城矣。”黄氏一方面否定以四十里故城为汉员渠城，一方面又把汉员渠城置于哈喇沙尔西面的阿拉尔旧城遗址之地，此遗址位于开都河南沙岭上。《汉书·西域传》谓焉耆南至尉犁百里，自阿拉尔旧城遗址至四十里旧城适当百里。开都河北岸，又有哈拉木登旧城遗址，与阿拉尔旧城遥遥相对，相距不过十余里。此一地区当为古焉耆国之政治中心。黄氏根据考察结果，认为博斯腾淖尔南、东两面均滨库鲁克山，沙碛纵横。北、西为天山，距海岸较远，中间隆起广大平原，开都河流贯其中，古之焉耆、危须、尉犁皆生息于此大平原上。据《汉书·西域传》，危须在焉耆之东百里，尉犁在焉耆之南百里，如以曲惠为古危须国地，曲惠之旧城为其治所，则古危须国是据海北面平野。如以哈拉木登为古焉耆国地，其旧城即古员渠城遗址，则海之西北面大平原为焉耆国区域。如以四十里城市一带之遗址为古尉犁国地，则海之西南平原为尉犁地⑦。

一九五七年九月黄氏第二次考察新疆，在复查博斯腾海西平原的遗迹时，根据唐贾耽《四夷道里记》“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的话，谓铁门关即今之哈满沟中塔石店南三公里河东岸之遗址，塔石店距四十里城子旧城二十公里，由四十里城子旧城至铁门关适为二十三公里，合四十六华里，与贾耽所记五十里略相当，因而认为唐焉耆国都城位于四十里城子旧城。但这里的遗址是否为汉代的员渠城，还成问题。又说，汉代员渠城遗址究在何地，还不

能确定。这就与他第一次考察时谓阿拉尔旧城为汉员渠城的话不同。以阿拉尔旧城当汉员渠城遗址之说，确有问题。黄氏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明屋出发，下午住锡科沁渠畔。可见由明屋至锡科沁，黄氏走了半天才到。黄氏虽未说明其间里程，但估计大约在六十里左右。他从锡科沁至察汗通格行了四十里，由察汗通格至霍拉山沟口约六、七里，由霍拉山沟口至阿拉尔旧城约行了三十里。黄氏是从明屋出发的，明屋在四十里城市西南约二十五里，则自四十里城市至阿拉尔旧城全程约合一百六十里。又黄氏谓四十里城市西南沙丘中的遗址是汉代尉犁国都城所在，但据《汉书·西域传》，焉耆南至尉犁百里，今计由阿拉尔旧城至四十里城市西南约五里的沙丘遗址约共一百六十五里，显然与《汉书》百里之数不符。据此而论，阿拉尔旧城不可能是汉代焉耆国都城所在。黄氏认为四十里城市西北二十公里的日仔和田旧城可能就是汉代焉耆国都城员渠城的遗址，我同意这一假定，因为由日仔和田旧城至四十里城市四十里，而四十里城市至紫泥泉子三十里，由紫泥泉子至哈满沟口四十里，合计共一百一十里，约略与《汉书·西域传》焉耆“南至尉犁百里”的记载相符。汉尉犁国故城当在今哈满沟口附近。黄氏相信唐时焉耆国都城已在四十里城子旧城，至于何时始从日仔和田迁至此地？依黄氏的意见，自魏晋时尉犁、危须并入焉耆，为焉耆二县，焉耆可能已将都城迁移于此。如果这样的推断无误，则在玄奘时代，焉耆国都城已位于四十里城子旧城的地方。又据《慈恩传》：“山（银山）西又逢群贼，众与物而去，遂至王城所处川崖而宿。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深伤叹焉。渐去，遥见王都。”所谓“川崖”，当即指开都河的北岸。玄奘次日渡河后，行了十余里，看见被贼劫杀的商胡遗骸。所谓“渐去”，即又行了一段路程，才远远望见焉耆国都城。从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看

出，玄奘渡河后估计行了三、四十里，才抵达都城，与今开都河距四十里城子旧城的路程亦略相当。谢彬谓自开都河南抚回庄大桥起，迤大路东南，连接唐王城，以抵四十里城子东面白墩子⑧。这里所谓唐王城，当系据土人所取名称，位于抚回庄大桥与四十里城子东面白墩子之间，尚在旧城之北，既无考古上的证明，是否在唐代曾为焉耆国都，殊难论定。

三、国势和历代诸王

焉耆地处东西交通路线的要冲，不特在军事上为西域各方势力所必争，且在经济上亦为有力者扼险掠货或征税之地。西汉时，其国有四千户，三万二千一百口，可当兵者六千人。在邻近诸国中，已称大国，当时仅次于乌孙和龟兹。西汉时，其国王名，史无记载。我们从《汉书·西域传》车师国条知道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此六国兵既有焉耆东面的危须国，又有焉耆南面的尉犁国，焉耆当然也包括在内。车师太子军宿不愿质于匈奴，逃到焉耆，因为他是焉耆的外孙。可见焉耆王女嫁给车师王为后，两国关系很密切。车师王前因避匈奴侵害，出投乌孙，乌孙留不遣归。至是，汉立军宿为车师王，尽徙其国人于渠犁。王莽建国五年（公元 13 年），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天凤三年（公元 16 年）莽遣王骏、李崇出西域，焉耆诈降，率姑墨、尉犁、危须兵袭击汉军，骏等遇害。可见终西汉之世，焉耆处于匈奴和汉王朝两大势力之间，不仅能自保，且相当强大，故在王莽时能击败汉军。后汉时期，焉耆国有一万五千户，五万二千口，可当兵者二万余人，比西汉时户数多近四倍，人口多近三之二，可当兵者多三倍以上，又远较西汉时为强大。后汉光武帝建武初年焉耆服属于莎车王贤，二十一年（公元 45 年）焉耆与鄯善等十八国皆遣子人

汉，求设都护，以拒莎车。明帝末年(公元 75 年)焉耆联合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明帝至章帝年间(公元 58—88 年)焉耆王名舜，其子名忠。和帝初年(公元 89—94 年)其王名广，班超讨焉耆诛广，立其左侯元孟为王。直至顺帝永建二年(公元 127 年)班勇与张朗击败焉耆时，元孟仍在位。灵帝建宁三年(公元 170 年) 凉州刺史孟佗等讨疏勒，焉耆兵参与此次战役。至三国时，据《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鱼豢《魏略》云:"中道西行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自此时始，危须、尉犁两国并入焉耆为二城。晋代焉耆国势不减于后汉，武帝太康中(公元 280—289 年)其王龙安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临终嘱其子龙会报仇，会既立，果征服龟兹，据有其国，遣其子龙熙回国为王。龙会王龟兹时国势大振，葱岭以东诸国均为役属，后为龟兹国人所杀。前凉沙州刺史杨宣等击焉耆，败之，熙率其属下四万人降于宣。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 382 年)前秦苻坚遣吕光征西域，进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旁国请降。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公元 448 年)遣万度归讨焉耆，大破之，进屠其城，王奔龟兹。据《魏书·西域传》，焉耆王姓龙，名鸠尸卑那，即前凉张轨所讨龙熙之后。度归攻焉耆时，其王尚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拒，自经屠城之后，国势大损，故《魏书》谓其"国小人贫"。太和二十一年(公元 497 年)焉耆为挹怛 (即哌哒 Ephthalites)所破，众不能自统，请主于高昌王麴嘉，嘉遣其第二子为焉耆王。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焉耆王名突骑支，其时铁勒莫何可汗强大，焉耆附之。隋时只有胜兵千余人，仅及后汉时的二十分之一。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突骑支请复开碛路，太宗许之，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这就是玄奘经此国时，其王不肯给马的原故。玄奘西行求经时期，焉耆依靠西突厥的庇护，然亦不免于高昌的攻掠，其国之弱小可知。贞观十二年 (公元 638 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十四年(公元 640 年)

侯君集讨高昌，遣使与焉耆相结。同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为唇齿。不久，焉耆王又叛归欲谷可汗（即乙毗咄陆可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安西都护郭孝恪讨焉耆，破之，虏其王突骑支，以突骑支弟栗婆准摄国事。西突厥囚栗婆准，会其吐屯来摄，吐屯因被太宗谴责，不敢王，焉耆立栗婆准为王，而其从兄薛婆阿那支自为王，号瞎干，执栗婆准献于龟兹，杀之。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阿史那社尔讨龟兹，焉耆王阿那支奔龟兹，保其城以御官军，社尔击斩之，立阿那支从父弟先那准为王[9]。据《新唐书》，焉耆国只有胜兵二千人。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高昌、处月、处密联军攻陷焉耆五城，掠去男女一千五百人。焉耆共有九城，若加上四城的人口，也不会超过一万人。

四、民族、语言和宗教

现今焉耆的居民，主要成分可分为回族(或称甘回)、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回族是从青海、甘肃迁来，蒙族是清初移来的土尔扈特及和硕特两部。有人认为维吾尔族是土著，但维吾尔族是唐代回纥之后，公元八四〇年左右才从外蒙古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到达天山和甘肃张掖、武威之间，转营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即使依《隋书·铁勒传》所载的“乌欢”(他本作护)，即后来的回纥，回纥祖先之到达天山，也只能追溯至公元六、七世纪间[10]。在此以前，焉耆的土著居民究竟属于那一种族？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的古楼兰遗址中发现一些他们认为是属于公元二世纪末的墓葬，其中有干枯的尸体，从头部骨胳和像貌观察，据说与阿尔卑斯人（Homo-Alpines)类型有极密切的关系，并断定这是今日塔里木盆地居民体质中具有的最普通的因素[11]。德人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更明确地说，在鄯善(罗布泊)附近及车师(今吐鲁番)地方的住民，依西域人骨骼(尤其是头盖)的研究，知道颇适合于伊兰人种型。日

人羽田亨亦同此说[12]。这些人仅凭极少数的墓葬遗骸，或壁画形象，或服饰习俗的某一方面来判断整个塔里木盆地，甚至于整个新疆地区的古代人种是从西部来的，这是不可靠的。勒柯克还说："这些人民（指从库车至吐鲁番的所谓"吐火罗人"）如何来住于中亚，还不明瞭。可是在天山之北，那里有草原和水供给游牧部族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在那里有许多坟墓，上面竖着石像，打开这些坟墓，就发现里面有铜器时代的东西，这些东西与南俄和克里米亚(Crimea)斯基特(Scythian)古物相符。而且这种石像具有南俄同类石像的特点。这些坟墓明显地指示一通道，在基督教时代以前，一种欧洲人部族（简言之是月氏人）沿着这条通道向中国推进。据中国的记载，西域于公元前三世纪间被一种人民叫做月氏（以弓箭为武器的骑士）的所征服，他们到达黄河河曲，但公元前170年，他们与匈奴血战而失败，被迫退回西方。他们到达伊犁河谷，在那里他们打败了塞种人，过着游牧生活的塞种人被迫向西迁移[13]。"按勒柯克的错误不仅在于歪曲了中国的历史记载，把月氏人从东向西的路线改为从西向东，而且把新疆天山以北与石像墓有关的民族和年代完全弄错了。十多年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考古工作人员曾在新疆北部草原地带，东起阿尔泰，西至霍城，南临乌鲁木齐，东南直伸至巴里坤，西南到达昭苏县的天山山谷，北至塔城专区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对于这些石像墓葬进行广泛的调查，已证明是属于突厥民族的，它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的时期内，其下限可能直至天山以北诸游牧部族信奉伊斯兰教为止。并不像勒柯克所说那样是属于从南俄来的月氏人的遗物[14]。

由于佛教之传入，僧徒和商贾亦随之而来，因而引起天山南路城廓诸国居民的人种混杂。东晋时的名僧鸠摩罗什，本天竺国人。父鸠摩炎，辞避相位，东度葱岭，为龟兹国王师。王以妹嫁之，生罗什。前秦苻坚遣吕光西伐龟兹及焉耆诸国，光又强迫罗什以龟兹

王女为妻。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则说的是四世纪下半叶的事情，追溯到一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情况也应如此。这说明了佛教东传后，塔里木盆地土著居民的体质如何混入阿利安(Arya)人血液的一般过程。焉耆国人民的体质，自然不能例外。因此，要研究西汉及其以前焉耆土著居民的人种类型，不能单纯以东汉以后焉耆居民的体质为依据。《汉书·西域传》大宛国云："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说明西汉时深目多须髯的人种类型只限于大宛以西诸国人民。这不是由于记载上的简略，而是反映当日的实际情况。至北魏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据《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条："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由东汉至北魏，时历四百年左右，新疆塔里木盆地(即大宛以东)的居民，除于阗一国之外，其余诸国居民，已由非深目高鼻多须髯的形貌，变为深目高鼻多须髯的形貌了。我们知道深目高鼻多须髯，不仅是阿利安人类型的特征，而且也是突厥人种类型的特征。据乌折夫利维(Ujfalvy)说，大月氏(应指贵霜王)的面貌高额隆鼻，口唇厚而多须髯，是鞑靼式，而非蒙古式。又说，突厥-鞑靼(Turco-Tatar)种原为蒙古及阿利安的杂种，故突厥种中有阿利安种的骨相，毫无足怪⑮。如果从突厥人种形成的历史来看，我们就更加清楚了。据阿尔泰山地区的考古材料证明，在突厥发祥地的阿尔泰山南部，远古的居民是属于长头的欧洲人种(即阿利安人种)。至纪元前五至六世纪时始掺入蒙古利亚人种的因素，于纪元初才形成突厥人的类型⑯。因此，我们就可以这样说，西汉及其以前焉耆土著居民既不是阿利安种，也不是突厥种，究竟是属于那一种族，还有待于考古学和人类学上的进一步研究和论断。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在甘肃和新疆地区劫夺了大量的我国古代极其宝贵的文物资料，曾经西方学者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发现

几种已经死亡的古代民族语言。其中流行于天山南路的一种，最初名之曰“吐火罗语”。后来又区分为甲乙两种方言，甲种方言通行于焉耆、吐鲁番一带，乙种方言通行于库车一带。据说这种语言是属于印度—欧罗巴 (Indo—European) 语系性质。其所以取名“吐火罗语”，仅凭缪莱 (F. W. K. Müller) 所译的一种回纥语题识。这一题识谓回纥文的《弥勒下生经》先从印度语编译为“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在甲种方言中既有此种经文，因而就认定甲种方言即“吐火罗语”。法人烈维 (Sylvain Lévi) 不同意用“吐火罗语”这个名称，他主张两种方言都称为“安西语”(根据甲种方言的文书中有 Ārci 一名)，又分别称库车语为“西安西语”，称哈喇沙尔、吐鲁番语为“东安西语”[17]。伯希和说，以甲种方言中 Ārśi 一名比拟 Strabon 地志中的 Asioi 及Trogwe Pompée 史书中的 Asiani，但前者表现于七世纪，后者则表现于纪年初年，相距至少有五、六百年。此种比拟似乎冒昧，至少可以说尚未成熟。Ārśi 也不能比拟“安西”，因为“安西”犹言“安抚西域”，纯属中国语名。甲种方言文书中的 Ārci(Ārśi)一名的起源、意义及其用法皆秘而难明。他同意称第一种语言的甲种方言为“吐火罗语”，可不是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说的语言，而是吐火罗地方说的语言。第一种语言的乙种方言是自有的库车语，或苦先语。可是此语在其东哈喇沙尔、吐鲁番一带也有若干效用。汉代此两种语言之相近，或者较吾人所见七世纪至十世纪的文件所表示者，尤为亲密。又说库车语在汉代与贵霜语为同一语言，而贵霜语即吐火罗语[18]。自从伯希和发表他的论文以后，西方一些学者继续研究和讨论，又发表了不少文章。据王静如归纳起起来，可作为定论的是：所谓“吐火罗语”，应改为“焉耆龟兹语”，因为七世纪初期吐火罗地方并没有流行这种语言。甲种方言即古代焉耆国中人民的通用语言，乙种方言即古代龟兹国中人民的通用语言。关于回纥文《弥勒下生

经》题识中的"吐何哩"(Turry)，不应读作"吐火罗"(Toxri)，大约是粟特文中"四吐何哩"的同字，而这一"四吐何哩"是包括别失巴里(Bišbolig)、高昌、焉耆等。甲种方言中"阿尔西"(Ārçi)一名，相当于突厥碑文中的"九阿尔西"，即指焉耆而言，而非亚利安(Arya)一词的变音[19]，按一些西方学者把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所发现的七至十世纪间的文书语言，统称为"吐火罗语"是一个错误，改称"焉耆龟兹语"，自然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但这里还有两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一是所谓"焉耆龟兹语"，是否能代表当时焉耆、龟兹居民自己的口说语言，抑或是借用外来的一种语言而略加修改，只用于官方文书，或作为僧徒传写经典之用？正如《大唐西域记》阿耆尼国条云："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经教律仪既遵佛教，诸学习者即其文而玩之。"当时官方文书和僧徒写经往往又同时使用汉文，其情况恐怕也是这样。所谓"焉耆龟兹语"是一种已经死亡的语言，不能以当地居民的现行语言来对证，就很难断定其为当时两地居民自己所通行的口说语言。二是"焉耆龟兹语"既然是借用印度婆罗谜(Brāhmi)文字，则此种文字之传入当系在佛教传入新疆之后。也就是说，所谓"焉耆龟兹语"之形成不能早于东汉。东汉以前，即"焉耆龟兹语"形成以前，焉耆、龟兹两地土著居民的语言究属何种性质，尚难论定。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何时，说者不一。有的说始于西汉末年，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20]。有的说始于后汉明帝时，永平八年(公元65年)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又给楚王英的诏书里说他崇尚浮图[21]。有的根据新疆考古材料，认为新疆佛教当起于东汉末季(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22]。按《后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谓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后数岁，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其名与天竺国别名身毒相同，足见印度文化已开始影响及于天山南路，佛教

当亦在此时传入。据玄奘所记，焉耆只有僧寺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均习小乘教。但从古代遗迹来考察，焉耆佛教曾经有过一个兴盛的时期。距今四十里城子西南约二十五里，有地名"明屋"，沙梁上下排列着已倾圮的庙基数十处。维语"明屋"义为千房，形容其房屋数量之多。每一庙基，墙址尚存，高约丈余。凡倚墙壁处，皆有泥塑像。又距此沙梁之西约五里处，山腰和山脚都分布许多佛洞，又在霍拉山沟口，亦散布许多废庙遗址，约计十八处㉓。据所发现的唐代钱币"建中通宝"，足见此遗址，至八世纪后期尚在活动。但从玄奘的记述，当时焉耆的佛教已渐趋衰落矣。

①章巽校本《西域记》注云："金陵本作'乌耆'，丽本作'焉(焉之俗写)耆'，今据改。"按南宋本、碛砂本均作"乌"，证诸《慈恩传》："旧云鄢耆，讹也。"丽本"焉"应为"乌"字之讹，而非"焉"字之俗写。

②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说吐火罗语》，见《吐火罗语考》，1957 年北京中华版，第 142 页。

③《西域图志》卷十五疆域八哈喇沙尔条引《西域记》阿耆尼注。

④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民 27 年长沙商务版，第 320 页。

⑤《中西交通史料汇篇》，北京辅仁大学版第六册，第 324 页。

⑥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 196 页。

⑦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版，第 1—7 页。

⑧《新疆游记》，第 285 页。

⑨《新唐书·西域传》焉耆国条谓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婆伽利死，国人请还前王突骑支，高宗许之，拜左卫大将军。为国死，龙嬾突立。

⑩《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1955 年中央民族学院编印。

⑪《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 110 页；王竹书译《天山南路探访记》，见《天山月刊》第 1 卷 4 期。

⑫羽田亨著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1934 年上海商务版第 10 页。

⑬"Buried Treasurses of Chinese Turkistan" Trans. by Anna Barwell, London, 1928. "Introductory".

⑭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见《考古》1960年2期;李征《阿尔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见《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李遇春《博尔塔拉自治州石人墓调查简记》,同上。

⑮《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第132页。

⑯周连宽《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见《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⑰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见《吐火罗语考》,第43—63页。

⑱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见《吐火罗语考》第64—105页。

⑲王静如著《吐火罗语考序》。

⑳《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鱼豢《魏略》。

㉑《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同书《楚王英传》。

㉒《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序言》第3页。

㉓同上,第3—5页。

从阿耆尼国至屈支国的一段行程

玄奘在阿耆尼只停留一夜，次晨即启程往屈支国。玄奘记此段行程，颇为简略。他说："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慈恩传》则仅云："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数百里，入屈支国界。"黄文弼曾考查玄奘所经途程云："小山即库鲁克山，二大河疑即孔雀河与克子尔河，是玄奘所行之路，与现在由焉耆至库车之大道一致。云西得平川，步行七百里乃至，其区域荒凉，无甚居民可知。"又说："我之赴库尔勒，是由四十里城市前往。旁博斯腾淖尔西岸大道行，三十里至紫泥泉子，本地称为效尔楚克。霍拉山支脉东南行至此，与库鲁克山相接，形成一狭口。孔雀河水由博斯腾淖尔溢出后西流，入狭口转西南流，穿行沟中，即有名之哈满沟也。此地出煤出铁，故古有'铁关谷'之名，又称为'遮留谷'，焉耆王龙熙伏击晋张植于遮留谷即此。两岸岩石壁立，中显通衢，河水流贯其间，清波荡漾，碧草弥绿。吾等沿河岸西偏南行，三十里出山口，转西南行约十里即至库尔勒。"①在焉耆以南的盆地上，东临海泊，西阻霍拉山，南屏库鲁克山，中通大道。从形势来看，这条大道，自汉唐以来，无甚大变化。如果玄奘时代焉耆都城确在今四十里城子旧城一带，则玄奘从焉耆往龟兹（屈支）的首段行程与黄氏现今的行程大致相同。但问题在于《西域记》谓从焉耆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然后经平川行七百余里，才抵屈支。《新唐书·西域传》龟兹国条云："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经大河二，又步行七百里乃至。"此段所记，显然是出自《西域记》。从文义来看，玄奘似已行了二百

多里之后,才逾一小山,越二大河。今大道从四十里城市向西南行一百里为库尔勒,由此西行四十里为上户地,又四十里为大墩子,又四十里为大石头,又三十里为胡土柯(羊达胡都克),又三十里为库尔楚(或称车尔楚、查尔赤)。那么,玄奘向西南行二百余里,约当今大石头至库尔楚之间。此间无小山,库尔楚附近有一土阜,唐时可能比今高大,或即玄奘所经的小山。黄氏谓小山为库鲁克山,是沿丁谦《新唐书·西域传考证》之误。所谓"越二大河",《慈恩传》只说"前渡一大河",我们仍应按《西域记》来推求二大河的所在。据《西域水道记》卷二海都河条云:"水又南流二十余里,经库尔勒庄与军台之间,又西南渫为苇荡,凡七十里经哈喇布拉克军台南二十余里,又经车尔楚军台南而西凡三百里,仍曰海都河。乃折而南行三百里。……当其折处,水势弯环。《汉书·郑吉传》: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以其曲折,斯有河曲之名矣。水又折而东入塔里木河。"此所谓海都河,今称孔雀河,汉唐时代西流远较现今为远,流经库尔勒之后,西向不仅过哈喇布拉克台之南,而且经库尔楚之南。其折南湾曲处当在库尔楚以西及策特尔以东某处,观于郑吉在河曲迎匈奴日逐王,可见河曲附近是交通要道,当时轮台尚在今轮台县南数十里,则从焉耆至龟兹大道,当在河曲附近渡孔雀河,然后西南行经过古轮台地。故玄奘所谓二大河,孔雀河是其一。但黄氏以为在库尔勒渡河,似于道里未合。黄氏又谓另一大河为克子尔河,按此河实即策纳尔河的东支,汉唐时代或为屯垦者所凿的渠道,并且太偏于西。今库尔楚西南方有一河名额什墨河,源出北山南麓,西南流一百八十里入于沙碛②。今虽涸竭,但在玄奘时可能仍然是一条大河。

自库尔楚以西,平原衍沃,即玄奘所谓西得平川。今驿道从库尔楚西行五十里乾沟,四十里野云沟,四十里策太雅,一名策特尔,

十里克尔雅合的，十五里卡巴呼图买哈，二十五里哈喇卡奇，十里八黑奇塔哈，十里洋萨尔，一里雅呼立克，三十里阿黑拉克奇，十里土斯栏杆，三十五里道南庄，五里轮台县城。出轮台西行三十里大穹巴克庄，五里小穹巴克庄，二十五里拉-苏河。四十五里阿尔巴特，七十里哈尔巴，七十里托和鼐，八十里库车。自库尔勒至库车，共程七百九十里③。总计上述里程只有六百一十五里，可能记述时有所遗漏，但从共程七百九十里来看，与玄奘过一小山二大河后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相符。从玄奘时代迄谢彬游新疆时已历千余年，焉耆至库车的大道，总的方向虽少变化，但广漠平川，沙山流水，变迁很大，驿站地点和名称，随时改易，故计程亦有所不同。依今考古，难免有不尽不实之处。例如，《新唐书·地理志》载唐贾耽《四夷道里记》云："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总计里程也只有六百三十里，与《魏书·西域传》龟兹条"东去焉耆九百里"及《西域记》的九百余里之数不符，显然有所遗漏。

玄奘称焉耆为阿耆尼，称安西都护府为屈支，安西都护府原设高昌，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才迁至龟兹。贾耽的记述，除焉耆、铁门关和龟兹三地尚可考定之外，其余各守捉的位置，毫无痕迹可寻。这些驿站在玄奘时代当已有之，但《西域图志》卷十五把于术守捉城置于车尔楚(今库尔楚)附近，榆林守捉置于英噶萨尔(今洋萨尔)，龙泉守捉置于英噶萨尔之西，东夷僻守捉置于玉古尔(今布古尔)之西，西夷僻守捉置于阿巴特(今阿尔巴特)。只据近代里程来推测，初无确实之佐证。唐时铁门关究在何处？说者不一。《西域图志》谓在车尔楚之东，未能确指其具体位置。《西域水道记》卷二云："今自库尔勒北二十里至岩口，所谓遮留谷，入山

径路崎岖，三十里越大石岭，下逼海都河，地处要害，或置关也。”《新疆游记》云：发库尔勒，东北行，过孔雀河，有木桥，经汉城，八里庄口。……二里升坡，入哈璃沟，古遮留谷也。两山夹崎，一线中通，路倚危石，侧临深沟，水流溯湃，日夜有声，湾环曲折，幽邃险阻，时有大风，行者心戒。十五里开都关，面山临水，驿路窄狭，仅容双轨，有一夫当关之势，驻屯兵以稽行旅，……五里哈璃沟口。”又云：“紫泥泉即旧哈勒噶阿璃军台，准语哈勒噶道路，阿璃山口，言地当山口也，唐铁门关即在此地，形势要害，今犹可观。”《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引述《水经注》所谓沙山铁关谷云：“沙山即今库鲁克山，铁关谷即今哈满沟。”又云：“铁门关即今之哈满沟中塔石店南三公里河东岸之遗址。塔石店距四十里城子二十公里，由四十里旧城至铁门关适二十三公里，合华里四十六里，与贾耽所记五十里略相当。”按今哈满沟即《水经注》的铁关谷，亦即《晋书·西戎传》的遮留谷，各家意见相同。但关于唐时铁门关的具体地点，依徐松之说，此关应位于哈满沟南口以北三十里大石岭下，依谢彬之说，应位于今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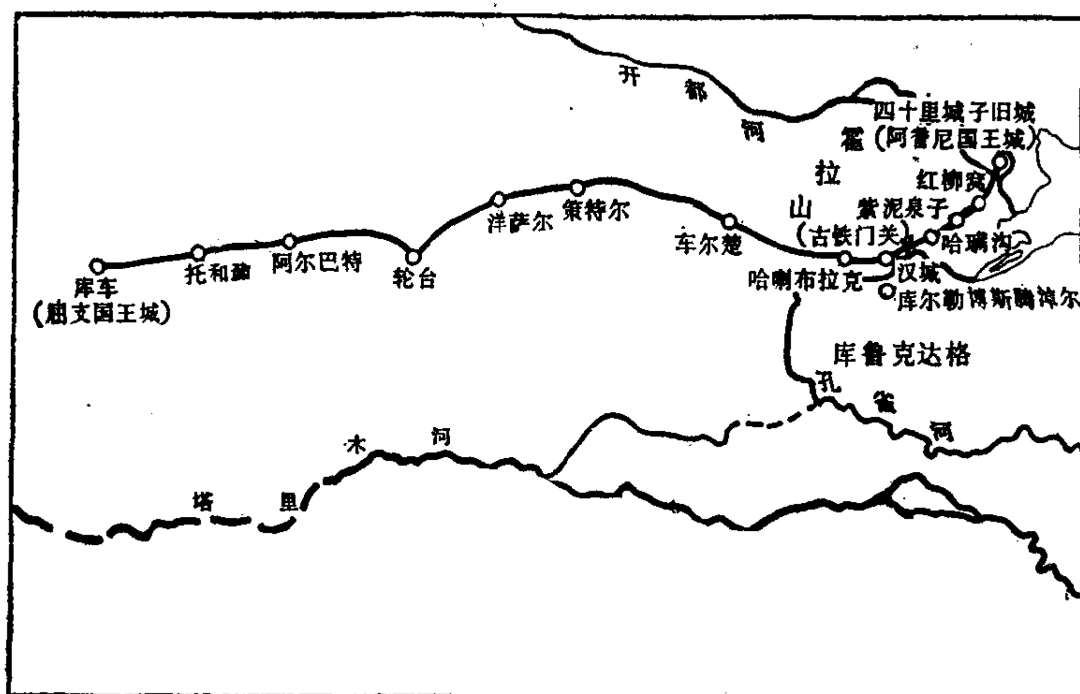


图 3　从阿者尼国至屈支国的行程图

泥泉子（硕尔楚克），依黄氏之说，应位于今四十里城子旧城西南四十六里的塔石店南河东岸的遗址。黄氏经过考古踏查，似较可信。

①《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8页。

②《清一统志》卷523哈喇沙尔条。

③《新疆游记》第282—283页。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第106—107图，从四十里城子至铁门关，要经奥特乌其、他什店（即塔石店）、老他什店三站；从铁门关至轮台，要经铁克其、和什巴克、上户、羊塔克库都克、库尔楚、库鲁克艾西买、野云沟、策大雅、其格力克、阳霞、其盖布拉克十一站。又第118—119图，从轮台至库车，要经二八台。大涝坝、牙哈三站。

屈支国考

一、国名

屈支国，中国史籍向称龟兹国。龟兹一名，最早见于《前汉书》，其后各史如《后汉书》、《三国志·魏志》、《晋书》、《魏书》、《梁书》、《周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均著此名，惟《新唐书》除龟兹一名之外，并著录丘慈、屈兹二异译。《汉书·西域传》打弥国条唐颜师古注龟兹一名曰："龟音丘，兹音慈。"《后汉书·班超传》唐李贤注龟兹曰："前书《音义》，龟兹音丘慈，今龟音丘勿反，兹音沮惟反，盖急言耳。"《宋史·外国传》谓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西州龟兹、龟兹回鹘。《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库彻，元《经世大典》作苦叉，《元朝秘史》作苦先、曲先(Küsän)、《明史·西域传》亦作曲先，但其国境已移于敦煌的西南方。同传又有别失八里，亦称亦力把里，其国境则包括很广，但仍以焉耆、龟兹两地为主，故亦称焉耆，或称龟兹。释氏书著录龟兹，异名更多，如西晋时竺法护译《申日经》作归兹，《水经注》引道安《释氏西域记》作屈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一作拘夷，龟兹沙门礼言《梵语杂名》作归兹，或称俱支那(Kucina)、俱支曩(Kucinan)，玄奘此记作屈支，注曰："屈，居勿反"，又曰："旧曰龟兹。"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四引《密迹金刚力士经》卷一作邱慈，注："或言龟兹，正言屈支也。"悟空《入竺记》龟兹国自注云："亦云丘兹，正曰屈支城。"为什么玄奘不用旧名龟兹，而必用屈支，而且玄应、悟空均以屈支为"正言"？大概是由于佛教东传以后，名僧大德，多习梵语，往往将西域各地土著语言的名称附会为梵语雅名。这样一改，不特多少

改变了土名的发音，而且对土名的原义也往往改变了。如拘夷那竭或拘尸那揭罗或鸠尸那(Kushinagara、Kuśinagara、Kuçinagara)义为“九士生地”，本来是印度一个城名，但佛徒却把龟兹一名附会为此梵语名称，于是成为《出三藏记集》的拘夷，《吉藏中论疏》的拘止(那)。其余如礼言的俱支那、俱支囊，玄奘的屈支，玄应的邱慈等等，都是由这一附会而来的。玄奘以屈支代替龟兹，正如他以阿耆尼代替焉耆，以跋禄迦代替姑墨那样，这已成为翻经佛徒的一种风尚。按《切韵》龟，居追切，其发音属见组，收音属脂韵，音 Ki̯^{w}i; 兹，子慈切，其发音属精组，收音属之韵，音 tsi。龟兹，音 Ki^{w}i-tsi。而屈支的屈，区物切，其发音属溪组，收音属物韵，音 Ki̯uət; 支，章移切，其发音属章组，收音属支韵，音 t'śi，屈支，音 Ki̯uət-t'śi。丘慈的丘，去求切，其发音属溪组，收音属尤韵，音 K'i̯ə̯u; 慈，疾之切，其发音属从组，收音属之韵，音 dz'i，丘慈，音 K'i̯ə̯u-dz'i。从上述语音上的分析来看，屈支、丘慈之与龟兹，既不同组，也不同韵。(只有兹和慈二音是同属之韵)龟字属见组，屈和丘二字都属溪组，见组不吐气，溪组吐气，这是声母上的区别，再加上韵母上的区别，使我们可以看出佛徒为了附会于梵语名称，而把西汉时代西域地名的译音改变了。但佛徒反而说他们的译音才是“正言”，旧的译音都扣上一个“讹也”的帽子。季羡林说得好：“其实这些旧日的音译也不‘讹’，也不‘略’，因为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有很多中译佛典的原文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中亚古代语言。这些认为是‘讹略’的旧译，就是从俗语或中亚语言里译过来的。”① 西方学者都以为库车的古代土名为 Kuci 或 Kuči，柯诺(Sten Konow) 并且以为 Kuči 即是吐火罗语中的月氏②。伯希和则谓 Kuči 不过是梵名，而不是未梵化的土名。库车这个地方自汉朝以来的汉名写作龟兹，后来又有丘兹、丘慈、屈茨几种写法。这些汉名，大致可当一种 Kuci、Küci (c＝ts)土名的写法，而不能作为 Kuči 的对

音[3]。根据上文语音上的分析比较，我们认为无论是 Kuci、Küci，抑或是 Kuči，都不能代表西汉时代龟兹的古名，只能是受佛教影响后梵化的名称。至于所谓 Kuči 即是吐火罗语中的月氏，更是穿凿附会，毋待多论。

今名库车起于何时？西方学者还未弄清楚。柯诺谓库车 Kučā 是 Kuči 的一种阴性写法。(《吐火罗语考》第 69 页) 勒柯克(Le Coq)在赫色尔(Qyzyl)和硕尔楚克(Šorčuq)所获古文书中有几处见到 Kučā 这个梵名，伯希和指出元《经世大典》一书中已有苦叉一名，是库车的同音异字[4]。王树枏在新疆所获维吾尔文摩尼教残卷两篇，其中所著录的四个人名中，有一人被称为Küsän-lig，并涉及 tört Küsän (上一字犹言四)之国，日人羽田亨考证其为库车人，伯希和赞同其说，并谓突厥蒙古区域在中世纪时习称库车(苦叉)之人曰苦先(Küsän)[5]。《元圣武亲征录》云"白(曲)先居彻儿哥思蛮之地，为黑邻赤哈喇者杀之"，《元史》则云："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清何秋涛校正《元圣武亲征录》) 如果苦叉(Kučā)为库车的同音异字，Küsän 是指库车人，我们就可以说，苦叉(Kučā)一名，最迟也始于元代，或者还可以上溯至十世纪。但据清和宁《回疆通志》卷十二库车条云："国朝乾隆二十三年定名库车。"则正式采用库车两个汉字来代替元明时代的苦叉、苦先、曲先，乃始于公元 1758 年。观于图理琛《异域录》称库车为库策，是知清初尚无定名也。

两汉时代龟兹一名，无疑是出于当时土著居民的语言，但此名的原义如何？已难稽考。《回疆通志》云："库车者，译言衚衕也，以其西南达回部之要路，故名。"但《西域水道记》卷二库车注则云："帕尔西语库，谓此地，车，谓眢井，地旧有眢井也。"和宁不言出于何种语言，徐松所说帕尔西，当系指波斯(Parsa)而言，但查今代波斯语 Kūyçha，义为一条狭窄街道或一个小村庄、或一个修道的庵

院。又印地语 Kўchā,义为衖衕、巷子,这个意义正与和宁的解释相符。徐松的解释恐有错误，或徐氏是依据梵语，而误以为帕尔西语,因梵语 Ku,义为地,正与“此地”之“地”相符。但无论如何,这些解释都不是依据西汉时代龟兹土著居民的语言，而是用后来西域其他国家的语言，将与龟兹或库车一名读音相近之字的含义附会为龟兹或库车土语的含义。

二、历代诸王

据《前汉书·西域传》渠犁国条，宣帝时(公元前73—49 年)其王名绛宾，绛宾死，子承德继立。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 年)莎车王破龟兹,以其子则罗为龟兹王，匈奴逐则罗，而以龟兹贵人身毒为王。明帝永平十六年 (公元 73 年) 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立白霸为王，此后龟兹王即以白为氏。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 年)王名白英,西晋武帝太康年间 (公元 280—289 年) 王名白山，前秦苻坚时，即东晋穆帝升平元年至孝武帝太元九年 (公元357—384 年) 王名白纯。后凉吕光时，即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至安帝隆安三年 (公元 386—399 年) 王名白震。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 521 年)王名尼瑞摩珠那胜。隋文帝开皇元年至炀帝大业十一年 (公元 581—615 年) 王名白苏尼咥(《北史》作白苏尼哑)。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王名苏伐勃駃,在位不久就死了,子苏伐叠继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苏伐叠遣使贡马。伐叠死，其弟诃黎布失毕继立，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曾两次遣使朝贡。次年为阿史那社尔所擒，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高宗永徽元年(公元 650 年)复以诃黎布失毕为王，显庆三年 (公元 658 年) 失毕死，子素稽继立。则天天授年间 (公元690—692 年) 王名延田跌。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 719 年)其王白莫苾死，子多币立，改名白孝节。唐德宗贞元四、五年间 (公元

788—789 年）悟空从天竺回国道经龟兹时，其王名白环。以上所列举的龟兹王名还不能完整地代表历代龟兹国王的世系，玄奘经过龟兹时，虽则记述其王是屈支种，“智谋寡昧，迫于强臣”，但未说明此王的名字，从上述各王的年代来看，其时龟兹国王应是苏伐叠。玄奘所记金花王御龙的故事，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所载不大相同，故事内容有所不同，龟兹王名亦不一样。前者说龟兹近代王号曰金花，后者则说古龟兹国王阿主儿。金花，梵名 Suvarṇapuṣpa。日人羽田研究两种回纥文文件，其中第二件提及苦先（龟兹）国王 Suvarṇapuṣ(pa)的故事，考订其人或为七世纪时龟兹国王苏伐叠 (Suvarṇadeva) 之父苏伐勃驶(Suvarṇapuṣpa)。烈维亦谓《唐书·西域传》龟兹国有王名苏伐叠，为唐太宗同时人，即位于六一八至六三〇年间，殁于六四四至六四七年间，为前王苏伐勃驶之子，后王诃黎布失毕之兄。苏伐叠为 Suvarṇate 的音译，六三〇年玄奘经过屈支时，适值此王在位。《唐书》之苏伐勃驶应即金花 (Suvarṇapuṣpa)，驶字应为驶字之讹。此王之二子，即分名其父之名，长名 Suvarnate，即苏伐叠，次名 Haripuspa，即诃黎布失毕。苏伐勃驶约殁于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年）或此年之后不久。吕傣司(Lüders)又从另外著录有 Suvarṇapuṣpa 一名的两种文件，研究其时代先后，认为龟兹（屈支）应有两王，皆名金花，其一王是较古时代的人，其一王是七世纪初年的人，而玄奘所记之金花，乃古之金花。伯希和则指出从公元六一九年至玄奘经过屈支之六三〇年，相距仅十一年，不能在此十一年中位置龙子生长，不恭王命，王引突厥等事，但突厥名称不见于六世纪中叶以前，屈支传说之采录此故事，只能在六世纪下半叶，故玄奘所言此“近代王”“金花”，必指当时国王之前王。伯希和又据龟兹早年有一著名佛寺名曰金花寺，有一佛经曾在此寺从梵文译为龟兹语，后于公元三九四年又从龟兹语译为汉文。则此较古之金花，最

晚应在四世纪中。我们可考定玄奘经过屈支之前在位不久之金花王，为《隋书》和《北史》所著录之苏尼咥或苏尼哑，苏尼二字大致为Swarna (Suvarṇa)之音译，但“咥”字不能对 Puṣpa。(《吐火罗语考》15、98、105—110 页)。烈维先曾将阿主儿还原为 Atchour，后来又改为 Acuni。伯希和则谓阿主儿古读假拟对音是 Ačuži，迁就亦可作 Ačuñi。烈维还原作 Acuni，近似真相，然在音声方面不甚完满。烈维又曾言及列宁格勒藏有古龟兹语书札一件，其中写一龟兹国王名 Kṣemārcune。(《吐火罗语考》第 57—58，109 页)。此外，《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二《虚空日分》第十之一《初声闻品》第一谓龟兹国有一龙王，名曰海德，烈维疑其梵名原为 Sāgaraguna⑥，如果不误，这个梵名后一部分 aguna 当是上述 Ačuñi 或 Arjuna 的同字异写。这个龙王或系当时实际在位的一个龟兹国王而被后人神话化了。这样看来，好象龟兹也象焉耆那样，其国王名字中包含 Arjuna 这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吕岱司研究勒柯克在和色尔和硕尔楚克两地所得的许多古文书，发现其残片中有两个龟兹王，一名 Vasuyásas，一名 Artep，皆不知何时人⑦。勒柯克又在硕尔楚克发现一用语汇集的残文一纸，所写者为延众供食之文，首数行为不规则之梵文，其后则写以甲种方言(古代焉耆国人民通行的语言)，内容言及 Agni (焉耆) 国王 Indrārjuna 偕同王后 Sūryaprabhā 延请弥勒及诸天神，并愿 Agni 诸王自去世已久之 Candrārjuna 以下皆得善生。烈维谓 Arjuna 一字似为哈喇沙尔诸王名称中的一种例有成分 (《吐火罗语考》第 57 页)。此残文虽未列举焉耆历代王名，但它提示了该国去世已久之旃陀罗阿顺那 (Candrārjuna) 王及后来的因陀罗阿顺那(Indrārjuna)王。按 Arjuna 一字在印度古语中义为“白”⑧。而在印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是一个勇敢善战的英雄。玄奘在《西域记》所载龟兹国金花王御龙及龙种难驯而引来突厥屠城的传说以

及《酉阳杂俎》所载龟兹国主阿主儿御龙的故事，都是从《摩诃婆罗多》中演变而来的。成书于公元 860 年左右的《酉阳杂俎》，较之公元 646 年成书的《西域记》迟了二百一十多年，但段成式所据材料似较玄奘所据者为早，因为玄奘所述故事涉及突厥屠城事，已是七世纪以后经过改造的传说。

东汉初期，龟兹有一王名身毒，这与印度古名相同，说明那时佛教东传，龟兹开始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公元一世纪七十年代班超所废的龟兹王名尤利多，还未以白为氏。班勇废尤利多而立白霸为王，这是白氏王朝的开始。Arjuna 一字义为“白”，龟兹诸王从白霸起即以印度古传说中的英雄 Arjuna 为氏。这样解释龟兹王白姓的起原，似较合理。向觉明所谓取义于龟兹国北之白山，固然错误，而冯承钧以为龟兹王 Suvarnapuspa（苏伐勃驶）和 Hari-Puspa（诃梨失毕）两名的共同组成部分 Puspa，其音译为“白”，是龟兹王以白为氏的起原，也未可置信⑨。伯希和谓把玄奘所说龟兹国王金花，比拟于殁于六一九年或此年后不远之苏伐勃驶，亦感困难，因为从六一九年至玄奘经过屈支之六三〇年，相距仅十一年，不能在此十一年中位置龙子生长不恭王命，王引突厥屠城等事。按金花王御龙的故事是一种神话化的传说，故事发展的过程，可以不受通常时间观念的约束。所以伯希和所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考《翻译名义集·七宝篇》“苏伐罗，或云修跋罗，此云金”，还原则为 Suvarna。又《百华篇》“布瑟波，此云华”，还原则为 Puspa。苏伐勃驶的“驶”字应是“驶”字之讹，苏伐勃驶即 Suvarna-puspa 的音译⑩。

或谓上文言焉耆王从去世已久之 Candrarjuna 至 Indrarjuna，都以 Arjuna 为国王名字的共同组成部分，何以史书所载焉耆王多以“龙”为氏，而不姓“白”？我们认为焉耆国自佛教传入及受印度文化影响以后，其王名曾象龟兹王名一样都有 Arjuna 这个组

成部分，因为两国人民的祖先都是来自一姓。后汉明帝时焉耆王舜，和帝时焉耆王广，顺帝时焉耆王元孟，都不言姓龙，焉耆王以龙为氏，乃始于西晋武帝时的龙安。其时焉耆与龟兹两国不睦，《晋书·四夷传》焉耆国条谓龙安临终对其子会说，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嘱会报仇，后会果然战胜白山，据有其国。所以不妨作这样的假定，龙安以前，焉耆诸王本与龟兹王同姓，至龙会因与龟兹王白山有仇，才别取一字为姓。按印度菩萨龙树原名为 Nagārjuna，汉译前半 Naga 义为龙，后半音译为树。焉耆王或即取前半的义译，而以龙为姓，但诸王的梵化名称中仍保留 Ārjuna 这个共同的组成部分以示不忘本，使我们借以窥见其民族的渊源。

三、都城

《汉书·西域传》："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据《后汉书·班超传》唐李贤注："龟兹国居居延城"。这条注文有两个"居"字相连，与《汉书》异，其故何在？其可能性有二：一是两个"居"字中有一个是衍文，从其他史书龟兹传都作"延城"来看，衍文的可能性较大；一是从《汉书》起，龟兹国都名称脱了一个"居"字，以后各书均沿其误。这个可能性较小，但不能说绝对没有，因为塔里木盆地诸国地名，有不少是由于其民族的祖先从中国内地迁来，仍沿用旧日的地名，以表其怀念故土之意，龟兹都城取名"居延"，正是沿用河西地区的"居延城"旧称。汉代龟兹国的延城或居延城究在今库车何地？尚无定论。《汉书》谓东至乌垒城三百五十里，若以今之策特尔当汉之乌垒城，由策特尔西至库车，依今里计之，约合四百八十里，汉唐古里小于今里，今一里等于汉唐 1.279 古里[11]，四百八十里等于汉唐 613.92 古里，（以后简称古汉里）与三百五十里之数比较，相差太多。故以今之库车城当

汉代之龟兹国都延城，殊难赞同。《西域图志》卷十五疆域八龟兹条云:“大抵延城、伊逻卢城故址，当在今额什克巴什郭勒之东，阿巴特、托和鼐间,而库车特其西境尔,是以《魏书》称其东有轮台,见轮台逼近延城之东,而《汉书》东至乌垒城三百(五十)里,可无疑于计里之太近也。”额什克巴什郭勒即东川水(城上河),今阿巴特(阿尔巴特)西距库车城二百里，托和鼐西距库车城六十里，阿巴特与托和鼐之间的距离为一百四十里。如果从轮台逼近延城之东来看,可假定汉代延城位于阿巴特或其附近。阿巴特距库车二百里，而策特尔距库车四百八十里,从四百八十里中除去二百里,尚余二百八十里,等于三百五十八古汉里多一点,正与汉代延城距乌垒城三百五十里之数约略相符。

《水经注》卷二云:“东川水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故延城矣。……又东南流，径轮台之东也。……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又东南径乌垒国南，治乌垒城。……又东南注河。”黄文弼谓:“枝水右出，即今城上河，西南入龟兹城,即今之库车城。右会西川枝水,是古时城上河流于轮台之东,右会渭干河,即西川水,直至野云沟之南入塔里木河。现在流至轮台之东，入塔里木河为渭干河,城上河流至库车与轮台间草湖即止,此古今易势也。”又云“在库车之东北城上河旁,地名皮郎,亦名哈拉墩。有大土墩一,四周均为居民住宅,上有古房址,在墩上远见有城墙一线,南北行,据说有四、五里长。……东川水即今铜厂河,由铜厂河分出西南流之城上河，即《水经注》之东川枝水。现城上河由苏巴什西南流入库车城，与《水经注》所称枝水右出入龟兹城完全相合。是现在之库车城即两汉时之延城也。但《水经注》作于北魏,《水经注》称‘故延城’，是在北魏时，龟兹已不都延城矣。”[12] 这是黄氏在第一次考察时的论断,但黄氏第二次考察时又谓从河流形势论之,与《水经注》所述暗合,而北墙和南墙基建筑,证明此城历时甚久,“但是否为两

汉时代延城，还需要地下古物作证明”。从《汉书》所载延城距乌垒的里程言之，《西域图志》所说较为近理，但从河流形势言之，则黄氏之说为强。后来黄氏又在《新疆考古的发现》一文中断定皮郎旧城即《水经注》之龟兹城，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述龟兹王所治之延城，并谓唐时龟兹王所居，即汉之延城，不过在汉延城遗址上重新修筑，改名为伊逻卢城[13]。

《后汉书·班超传》谓永元三年(公元 91 年)，龟兹降，以超为都护，拜白霸为王，超居龟兹乾它城。今渭干河以西有一小裕勒都司渠，渠岸有一旧城遗址，名三道城(土名于什加提，黄氏疑为金花王时代之龟兹旧都)。其西偏南有伯勒克斯村，村西南沙窝中有大望库木一带遗址。黄氏考察时发现五铢钱和小五铢，并认为可能是后汉时乾它城故址[14]。

《晋书·四夷传》龟兹国条云：“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今沙雅城西北方近渭干河右岸有一古城遗址名羊达克沁，城作三重，规模颇大，黄氏谓与《晋书》所说形势暗合，为第三世纪中期的旧城[15]。如果此说不误，则晋时龟兹国都已从延城迁到羊达克沁，北魏时又迁回延城故址，故《魏书》仍称龟兹国都延城。但《水经注》何以说“故延城”？可能是郦道元撰此书时龟兹国都又他迁了。迁至何地，已难稽考。

《隋书·西域传》龟兹条云：“龟兹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汉时旧国也。……都城方六里。”《隋书》记述焉耆、龟兹、疏勒三国都城的位置都说在白山之南，原是泛指天山而言，但证以《新唐书》、《隋书》所谓白山，应指有火之阿羯田山而言，《新疆图志》及《西域水道记》均称为额什克巴什山。《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黄氏曾至此山一带考察，描述所谓出火的情况最详，证实《释氏西域记》之说无误。据说此一带之山，名哈马木达

克，产铁、硫磺、石炭、白矾甚富，有几处常喷烟，夜则发光。《隋书》谓龟兹国都白山南百七十里，而《释氏西域记》则谓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出烟和火光，可见北魏有一个时期龟兹都城已迁至隋唐时代龟兹城以南数十里。

据《新唐书·西域传》龟兹条云："君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由于这一记载，我们才知道唐代龟兹都城的名称，玄奘经过屈支国时，其都城就是这个伊逻卢城。从《隋书》龟兹都城北距白山百七十里和《新唐书》北倚阿羯田山来看，隋唐两代龟兹都城可能是同在一处。关于伊逻卢城的具体位置问题，据《西域图志》说此城与汉代的延城均位于额什克巴什郭勒之东。法人沙畹(E. Chavannes) 谓今之库车，即公元六五八年安西都护所徙治之龟兹城，亦即《新唐书》之伊逻卢城⑯。斯坦因说：玄奘位置二昭怙厘于都城北四十里，核以苏巴什废寺南端至今库车城之距离八英里，大致相合。但就实际言，今库车城在苏巴什之西南南，不在正南。此外在河西今库车城位置处，未见有古城遗迹。斯坦因曾至河东岸较古之废城游历测量，此城确在苏巴什之南，距苏巴什较近，周围大致有十七八里，与玄奘之说合。此城应是唐代之屈支或龟兹都城。可是伯希和认为从《西域记》原文来看，二昭怙厘不是在唐代龟兹都城之北四十余里，乃在"荒城"之北四十余里。他在辩论有关"荒城"问题之后说；"无论如何，二昭怙厘在城北约四十里，其城或是唐代与晋代龟兹之同一都城，位在库车河东岸，抑晋代之龟兹古都，而在唐代业已迁都西岸。"⑰黄氏在第一次考察时疑苏巴什古城遗址即唐时龟兹国都伊逻卢城。但在第二次考察时又否定前说。他又认为苏巴什古城河西岸有一小城，既有塔庙，也有住宅，可能是国王来此受经听法时所居之地，但是否即是伊逻卢城，尚无确切之证明⑱。我们认为《西域记》所说荒城北四十余里有二伽蓝，隔河相对，同名昭怙厘，此二伽蓝应位于今苏巴什古城

遗址，那么，其南四十余里之荒城，应是今库车城东三公里之皮郎古城遗址。玄奘时代此城业已荒废，则当时龟兹国都伊逻卢城，根据《新唐书》所谓北倚阿羯田山及《隋书》所谓白山南百七十里，应位于今库车城或库车河西岸库车城附近的地方，而不是象黄氏所说唐时龟兹在汉延城遗址上重新修筑而改名为伊逻卢城。

四、语言文字和宗教

玄奘记述龟兹语言云："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按新疆发现的古文书中有三种世人从未认识的语言，经西方学者多年的研究，才知道除一种是中亚古窣利语(被称为第三种语言)之外，其余二种即所谓第一种语言和第二种语言，第一种语言被称为"焉耆龟兹语"，流行于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第二种语言被称为"塞语"或称"和阗塞种语"，流行于于阗、鄯善一带。第一种语言又分为两种方言，甲种方言是焉耆人民的通用语言，乙种方言是龟兹人民的通用语言[19]。1907年伯希和在库车西北约十六公里的夏德郎(Saldirang)峡口古垒中盗去一批木简，简上有婆罗谜(Brahmi)字写的文字，其中一枚，乃龟兹王 Swarnate 所签发的商队通行证。据烈维的考证，Swarnate(Suvarate)即唐太宗时代之龟兹王苏伐叠(季羡林作 Swarnatepi，相当梵文的 Suvernadeva，义为"金天")，其父名苏伐勃驶，此名经还原为 Suvarṇapuṣpa，义为金花，亦即玄奘所谓屈支国的金花王。又一简正面写有"Ksum 十一月"一行，"Ksum"一字，据烈维的考证，谓是苏伐叠的在位年号。他又说此种语言乃是龟兹土著之语言，并举《西域记》"其王屈支种也"一语及龟兹王自纪元世纪以来皆白氏一姓相承为证，从而论定古有阿利安种族一支，移居新疆，自立一国[20]。中国在纪元二世纪才开始有佛经的翻译，从音译方面来说，有些字音不能用印度原文对照，只能从龟兹语找出音译的原字。例如"沙门"梵文为 sramana，龟

兹语作 Samane; "沙弥" 梵文为 sramanera, 龟兹语作 Sanmir; "波逸提" 梵文为 Payantika, 龟兹语作 Payti。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前者与中国译音相差较远,后者则较近。从释义方面来说,也是这样。例如梵文之"prarrajya"义为前进,而汉译作"出家",即龟兹语 ost memlalne; 梵文之 mithydrsti 义为谬见,而汉译作"外道",即龟兹语 parnanne, 义为"外"; 梵文之 sama、santi 义为"和",而汉译作灭,即龟兹 kes, 义为"息"。这就说明中国所译佛经中,有一部分不是直接从梵文译来,而是间接地从龟兹语译为汉语。龟兹以西,人习梵文,龟兹以东,人习汉语,中国借龟兹语为媒介,在传播佛教上起着桥梁作用,故烈维称之为语言的"瓯脱"㉑。这种情况,与焉耆,吐鲁番一带所发现的甲种方言文书不同,甲种方言的写本文书只流行于焉耆、吐鲁番一带,在库车则无之,但乙种方言的写本不仅库车有,焉耆、吐鲁番一带也有。甲种方言是焉耆用于官方和佛教方面的语言,与古代焉耆居民的口说语言可能没有多大关系,但乙种方言除大量采用梵语之外,仍保留一些古代龟兹居民的口说语言,如上面所举的 parnanne、kes 等字,不是来自梵文,只能说是古代龟兹居民的土语。龟兹居民因与来自北方的突厥种民族接触,故在突厥语里也保存了一些龟兹语,如突厥语 tuman,来自龟兹语的 tumane、tmane㉒。乙种方言 (龟兹语) 虽则保存了一部分龟兹居民通用的口说语言,但不能说就等于龟兹人民通用的口说语言,乙种方言在文书中究竟还保存有多少龟兹人民通用的口说语言,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烈维称龟兹为语言的"瓯脱" (应该说"边界"), 从佛教经典的诵习和传译来说,固然是有一定的依据,但我们必须指出,古代龟兹人民亦习用汉语。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龟兹是一个大国,包括今之轮台、库车、沙雅、拜成、阿克苏、新和六县,而以库车为中心。人物殷富,交通便利。汉唐时代,西域都护即驻扎

于此。据《汉书·西域传》渠犁条："（龟兹王绛宾）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岁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当西汉后期，龟兹与汉朝来往如此之密，习染汉文化如此之深，在西域诸国中是罕见的。所以我们说龟兹人亦习用汉语。绛宾的儿子名丞德，丞与承通，丞德义为承继其父之德业，此为汉名无疑。后汉桓帝永寿四年（公元158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城诵》发现于拜城东北约200里之喀拉达格山麓博者克拉格沟口，诵文刻在岩石上。黄文弼曾于1928年亲至其地考察，重拓诵文，并校正前人传录之讹。据《汉书·西域传》龟兹国条，谓其王诸属官有左右将。又《后汉书·班超传》："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是刘平国为龟兹国的左将军无疑。诵文中第二行"从□人孟伯山狄畀贲赵□卑□羌"，"从"字下据叶昌炽、王仁骏均释作"秦"字，至黄氏重拓时，此字已不可辨。我细审清光绪间拓本，所谓"秦"字，左旁似有三点，而右旁则似"莫"，从整个字来看，更像"汉"字，而不像"秦"字。此行可与第一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连读，释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发家中随从汉人孟伯山狄畀贲……等六人[23]。"从官制和诵文都说明刘平国是龟兹国人，而采用汉文的名字。此外，黄氏在库车一带古城遗址中发现不少汉文书，如在沙雅西北通古斯巴什旧城中发现《李明达借粮契残纸》，所书年代为唐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大历为唐代宗年号，大历仅十四年，十五年已是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又有"白苏毕梨领屯米状》，书于唐大历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龟兹王姓白，则此苏毕梨是龟兹人而充当屯田戍卒者。又

有《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残纸》,只书丙午年,不记年号。考唐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为丙午,至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亦为丙午,至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为李唐最后一个丙午。究竟是那一个丙午,已难考定,但妣闰奴显然不是汉人,而是龟兹将军,其支付烽子钱的文件也用汉文,可见即在唐末,汉文仍通行于龟兹军政衙署之间。其余如诸佛洞岩壁的汉名题词为数更多。所有这些都说明汉唐时代汉语在龟兹颇为流行,龟兹人民习用汉语者,必非少数,尤其是在"龟兹语"未形成以前,更是如此。

至于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形成,时代较晚。迄今发现的"乙种方言"文书,其时代上限不早于七世纪。斯坦因在敦煌西边汉长城废址的屯戍站附近盗去一批古物,其中有木简和丝织物。据说有一段残绢,是属于西汉末年的遗物,上面用汉文和印度文写着绢的原来尺寸,证明从西汉末起,已有印度商人把印度婆罗谜文字带到塔里木盆地。又佛教经典之东传,初期多由月氏人转介,据《高僧传》所载,最早为月氏僧支谶,于汉灵帝时(公元168—189年)来到洛阳,并传译《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故黄文弼说:"吾人知道佛教初入塔里木盆地,是由大月氏王伽腻色迦二世之介绍,而伽腻色迦王传播佛教,是以犍陀罗为中心,向西方传播,势力及于塔里木盆地当在纪元后二世纪,发蒙滋长当在三世纪以后[24]"。黄氏此说,似较符合实际。三国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有龟兹沙门白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大乘方等部中之《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及小乘部中之《除灾患经》二卷。又晋简文帝咸安三年(公元37年)有月氏国人支施仑诵习《须赖经》、《首楞严》、《上金光首经》等,当时任翻译者名帛延,亦龟兹国人[25]。四世纪时名僧鸠摩罗什,原籍虽属天竺,但生长于龟兹,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至长安,此后三十年中凡译经九十八部。据伯希和说,有一佛经(《南条目录》402号)曾在龟兹

金光寺中从梵文译为龟兹语，后于公元394年又从龟兹语译为汉文[26]。六世纪下半叶名僧彦琮曰："如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国者，因而译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语。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宋高僧传》卷三《论》引文）根据以上的史料，我们不妨作如下的假定：龟兹在四世纪以前，原无文字，公元一世纪，印度商人把婆罗谜文字带来塔里木盆地，公元二世纪时印度僧人带来了梵文佛经，公元三世纪以后，龟兹佛教日益盛行，因而龟兹僧徒学习梵文者愈众。正如四世纪末法显经过鄯善国时所记的那样"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从两汉至南北朝，龟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都用汉文，但从四世纪起，龟兹人民已开始借用婆逻谜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文字，四世纪末已有僧徒用这种文字翻译佛经。此后不仅僧徒用以译经，民间亦渐流行，至六世纪后，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亦采用之，与汉文并行。

龟兹除南面有塔里木河流经之外，国中有二大河，即《水经注》所谓东川水和西川水，东川水指今铜厂河，西川水指今沙雅河（渭干河）。汉唐时代，沿河两岸的城镇市集，村舍田畴，佛寺僧舍，星罗棋布，今残垣故垒，尚历历可寻。如铜厂河畔的苏巴什古城遗址，规模宏伟，以塔庙为中心，河东三塔，河西三塔，高耸入云，周围环绕若干庙宇和佛洞。沙雅河畔的库木土拉千佛洞，克子尔河畔的千佛洞，都是古代龟兹佛教的中心地区。自公元三世纪中期起，龟兹佛教即日趋隆盛，至四世纪，前秦苻坚将吕光侵入龟兹之际，名僧鸠摩罗什住王新寺宣扬大乘教义，为龟兹佛教最盛之时。据《晋书》："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仅在王城之内，已有塔庙千所。又《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谓当时龟兹有僧一万人，其盛况可以想见。罗什离开龟兹以后，小乘教复占优势，但佛教仍未衰落。至

玄奘时代，据《西域记》所载，尚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魏晋时代，龟兹名僧大德之来中国内地传译佛教经典者，除罗什之外，尚有三国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译经于洛阳白马寺之白延，西晋时之帛元信、帛法巨、帛尸梨蜜多罗(Srīmitra)等，而当时所据梵本，来自龟兹者颇多。

据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谓渭干河丁谷山千佛洞与河西岸古城遗址，隔河相对，即辨机所记之东西二昭怙厘。黄文弼于第一次调查时亦以沙雅河(渭干河)两岸遗址(库木土拉千佛洞)为《大唐西域记》之二昭怙厘，并举出其南(应作西南)之于什格提大城遗址即记中所谓荒城。但他在第二次调查时，以距离及方向不合，而又放弃此说[27]。斯坦因曾测量库车河东岸之废城，周围大致有十七八里，与玄奘之说合，因而又认定此废城为唐代之屈支(龟兹)都城，而位于此城以北四十里之苏巴什废寺，应为玄奘所记之二昭怙厘[28]。伯希和同意以库车东北北苏巴什(Subaši)地方隔河两岸对立的两座庙宇为二昭怙厘，但他指出玄奘所记二昭怙厘是位于屈支东境荒城北四十里，而不是屈支城北四十里，也就是说，二昭怙厘南四十里之城，在玄奘经过时已经荒废，当时的屈支都城应在别处。玄奘所记二昭怙厘伽蓝，即《水经注》卷二引《释氏西域志》所说之雀离大清净，亦即《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之雀梨大寺。雀离与昭怙厘为同名异译，伯希和还原为 čägüri 或 čäkür，原义为"(候望)台"，后转训为塔尖，或以苏巴什二废寺之塔尖而得名[29]。我们认为玄奘所记之二昭怙厘应指今库车城东北北苏巴什隔河对峙之二寺庙遗址，而不是指渭干河库木土拉以北之千佛洞和古城遗址。阿奢理贰伽蓝经瓦特斯(T. Watters)还原为 A-shê-Li-yi，是来自梵语 āscharya，义为奇特[30]。但伯希和认为古读可还原作 āsariži 或 āčariži，疑由龟兹语一种含有 ñe 尾音的读法转变所致，可以比拟为梵文之 āšcarya[31]。关于此伽蓝的具体位置问题，徐松谓渭干河流

经胡木上(土)拉庄西，(库车城西六十里）渡河处为《唐书·地理志》安西西出柘厥关所经之白马渡，渡河后即至阿奢理贰伽蓝。伯希和说，应是今库木土拉（Qum-tura）之西，木札特河（Muzart-daria）畔之 Dulduraqur (Duldul-akhūr)，或是库车河西之 Qutlugh-ordu.（假定唐时龟兹都城在河东，不像今日之在河西）按唐时龟兹都城应在库车河西岸，则谓阿奢理贰伽蓝在库车河西之 Qutlugh-ordu，就不能成立。据上文二昭怙厘既然考定为苏巴什隔河相对的寺庙遗址，则渭干河库木土拉附近的遗址为唐时龟兹佛教中心之一，玄奘不会无一言提及。所以我们认为此会场西北渡河所至之阿奢理贰伽蓝，应在库木土拉附近的遗址中寻之。

五、音乐

龟兹古代艺术文化最特出的一方面是它的音乐。玄奘云："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音乐不仅著称于西域，而且给中国隋唐以后的音乐以很大的影响。《隋书·音乐志》云："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倭)国等伎"。又云："及大业中（公元 605—618)，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又云："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又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公元581—604年）其器大盛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又云："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

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十二人。”《隋书》这些记载，从中国音乐史上来说，特具重要意义。中国古乐自魏晋以后，日渐散亡，南朝梁武帝下诏有“韶濩（韶，舜乐；濩，殷汤乐）之称空传，咸英（咸池，黄帝乐；六英，帝喾乐）之实靡托”之叹；沈约请撰乐书，议者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纷呶不已。武帝乃亲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沈约，萧子云等为之制辞，梁乐虽备，然去古愈远，故隋文帝斥之为亡国之音。北朝拓跋氏建国，借与河西交通之便，引进了胡乐。早在东晋时，前秦苻坚遣其将吕光率兵伐龟兹，平之，得其乐。及光于公元397年自立为后凉国，龟兹乐遂行于河西。其后又渗合本地因素，稍有改变，号为秦汉伎，亦即后来隋炀帝所置九部乐中之西凉部。吕氏后凉国亡，其乐分散。北魏明元帝泰常七年（公元422年）平中原，复得龟兹乐。吕氏据有凉州时期，凉州一地除了流行龟兹乐及其变种之秦汉伎之外，还有天竺乐。这是前凉张重华（公元346—353年）时天竺使者所贡，即后来隋文帝所置七部乐中之天竺伎及炀帝所置九部乐中之天竺部。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国，（沮渠蒙逊）得秦汉伎。北周武帝天和三年（公元568年）突厥皇后来娉，带来了龟兹乐工苏祇婆（向达疑为 Suvajiva 的对音，日人林谦三谓应还原为梵文 Sujiva，义为妙生）[32]，苏祇婆的父亲是西域著名的乐师，家传有自，善弹琵琶，一均之中，间有七声。至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命乐工改定声律，益不能通，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有柱国公郑译奏请更正，据苏祇婆的演奏，调有七种，乃亲习琵琶，以其七调，勘校七声，正相符合，始得七声之正。苏祇婆所传，又有五旦之名，旦者，即中国旧乐所谓“均”也。而“均”者，即今所谓“调首”[33]。译用琵琶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各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

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又以其声考校太常所奏，发现其十一宫七十七音，都不能和合，因作八音之乐，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34]。经过郑译这番勘校疏理的功夫，中国旧乐的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声，才能用乐器正确地弹奏出来。郑译七调十二律旋转相交之议，虽因何妥的阻挠，不能施于雅乐。（雅乐只限用黄钟一宫，不许作旋宫之乐）但燕乐除清商之外，胡乐、俗乐二种，都是从龟兹乐演化而来。至炀帝时（公元605—617年）且用龟兹人白明达为乐正，大造新声。燕乐至唐代而益备，连雅乐也不免受龟兹乐调之影响。唐代俗乐勃兴，更是龟兹乐盛行所促成。由此可见，苏祇婆郑译二人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有很大的功绩，使频于崩坏衰亡的中国旧乐得以复苏。龟兹乐对中国旧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用龟兹七调校正了中国旧乐的七声；二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对“调”的观念，中国旧乐只限以宫声为“调首”，使“调”与“宫调”为同义语，但自引进龟兹乐后，宫声以外的六声（商、角、徵、羽、变宫、变徵）都可以作为“调首”而成“调”了；三是在乐器、歌曲、舞曲等其他方面都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旧乐的内容。

苏祇婆之琵琶七调，向达认为都是来自印度的，并谓与印度音乐中之北宗，即印度斯坦尼派（Hindostani School）相似，或竟出于北宗，为其一派[35]。据《通典》“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又《辽史·乐志》：“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益浊，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调，余二十一调失其传，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按所谓西凉乐乃龟兹乐之变种，而龟兹文化与印度文化有密切关系，则向氏之言，非无根据。其后林谦三又引南印度库几米亚马来碑铭（Kuạimiyāmalai）所刻梵语七调之名，与苏祇婆七调对照，发现其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固有的文化，即使在原始社会时期，也有

表现在石器、陶器及其他生活器具上的文化，况且据《汉书·西域传》，龟兹在受印度文化影响以前，已有城郭、官制，并且能铸冶金属，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再者，龟兹人既然特具音乐的才能，在其接受印度音乐影响以前，根据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来说，不可能在其本土没有丝毫音乐歌舞上的任何表现。我们在核对苏祇婆七调与南印度碑铭所刻七调时，还有沙识、沙侯加滥和侯利箑三调对不上碑铭的 Madhynma-grāma、 Ṣaḍja-grama 和 Kaiśika-madhyama 三调。从乐器来说，史书所列，龟兹部有竖箜篌，天竺部则为凤首箜篌；龟兹部有笙、箫、答腊鼓、腰鼓、鸡娄鼓、侯提鼓、齐鼓、檐鼓、弹筝，天竺部则无之。反之，天竺部有铜鼓，龟兹部则无之，计龟兹有而天竺部无之乐器多达九种。此外，《通典》卷 141 所载北魏世宗时所用乐器中，中沙腊＝Sādava，娑陀力＝sādhārita（向达以 Sadja 当之，误。），般赡＝Pañcama，鸡识＝Kaiśika，计有四调的名称是一致的，更进一步为苏祇婆七调来自印度找到有力的证据[36]。但我们认为刻有印度音乐七调名称的这个碑铭，既发现于南印度，则向氏所谓属于印度音乐系北宗之说，就有问题。向氏又说："故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绪余，龟兹本国固无文化。则谓苏祇婆琵琶七调乃龟兹文化之产物，实未为探本之论也。"又说：龟兹与印度北部在种族上同为伊兰民族，故"龟兹同印度竟是同种同文之国了[37]。"我们对于向氏这些论点，不敢苟同。关于龟兹人的种族问题，仅凭风俗外表上的一些特点是不能断定一个民族的人种类型。关于龟兹人的文化问题，说龟兹在受印度文化影响以前原无文化，这种论点是错误的。有屈茨（龟兹）琵琶。唐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云："南北截竹为觱篥，此乐本是龟兹出。"觱篥亦称筚篥，是唐代已视为龟兹乐，而不是天竺乐。据林氏的研究，隋唐龟兹部的乐器，依其所属系统来说，分属伊兰、印度、中国三系[38]。如此看来，龟兹乐中引进

印度、伊兰和中国的成分，而以印度的成分为多，这是事实。但与其说，龟兹乐完全出自印度乐，毋宁说，龟兹乐是在龟兹固有的音乐基础上大量吸取外来的成分，尤其是印度的音乐成分，创造出自己的一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龟兹乐。

①《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73—74 页。

②《吐火罗语考》，第 69 页。

③《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 1—7 页。

④ 同上。

⑤ 《畏吾儿文残卷中之地名》，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第 14—16 页。

⑥《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译丛》九编，第 160—234 页。

⑦《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

⑧John Dowson: 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and Religion, Geograph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9th ed.。

⑨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957 年北京中华版，第 161—172 页。

⑩同上，第 165—166 页。

⑪见下文《从跋禄迦国至赭时国的一段行程》。

⑫《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 27—31 页。

⑬《考古》，1959 年 2 期。

⑭《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 20—21 页。

⑮同上，第 23 页。

⑯《中国之旅行家》，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第 19 页。

⑰《吐火罗语考》，第 117—119 页。

⑱《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 136 页注五。

⑲《吐火罗语考》，第 64—66 页；季羡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见《语言研究》1956 年第 1 期。

⑳《吐火罗语考》，第 16 页。

㉑《史记·匈奴传》"瓯脱"注："韦昭曰：界上屯守处。"又《汉书·匈奴传》注："服虔曰：瓯脱，作土室以伺也"。

㉒《吐火罗语考》，第 41 页。

㉓《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 99—101 页。

㉔同上，第 81 页。

㉕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1956 年上海商务版，第 270 页。

㉖《吐火罗语考》，第 110 页。

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 17—18、136 页。

㉘Intermost Asia, p. 806。

㉙《吐火罗语考》，第 111—132，155—156 页。

㉚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65。

㉛《吐火罗语考》，第 111 页注五七。

㉜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 年北京三联版 第 275 页；林谦三著郭沫若译《隋唐燕乐调研究》，1955 年上海商务版第 14 页。

㉝向达谓"旦"即印度北宗音乐中之 thāt 一辞之对音，义为行列。当奏某调时，知此然后宫调弦乐管色之高低因之以定。《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 269 页。林谦三云："调首乃一调中之最重要的声律，当于欧洲音乐之 tonica（主音）《隋唐燕乐调研究》，第 9—10 页注四。

㉞林氏谓"应声"是郑译把印度乐调所用的 a(antara) 与Ka (Kākali) 那样的两声从苏祇婆学来应用的。《隋唐燕乐调研究》，第 56 页。

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 254 页。

㊱《隋唐燕乐调研究》，第 16—27 页。

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 280—284 页。

㊳《隋唐燕乐调研究》，第 144 页。

从屈支国至跋禄迦国的一段行程

关于跋禄迦国的方位问题，下文将有所论述，但要了解玄奘从屈支国至跋禄迦国的一段行程，有必要先假定跋禄迦国是位于今哈喇玉尔滚及其附近地区。玄奘所取似为确尔克达格山北一线，这段路线在唐代，从地理形势来观察，与今代的驿路相差不会很大。《西域记》云："从此西行六百余，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今代由库车出北门，五里官厅，向西行三里入戈壁，三十二里夏德郎，三十里盐水沟，即托和拉旦驿，二十里托和拉旦达坂，四十里大坂，自此转向西南行，四十里和色尔驿（旧名赫色勒），西偏北行一里渡和色尔河，三十九里赛里木城①。或谓山北一线开始几径向北行，至夏德郎始转向西北，与玄奘所记的"西行"不符。我们认为玄奘所谓从屈支国西行六百余里至跋禄迦国，是就整个路程的总方向言之。至于玄奘从屈支国至跋禄迦究竟取道山北一线，抑或取道山南捷径的问题，伯希和谓"有一较为直接之道途，现在几近荒废，此道自库车径向西行，在浑土拉(Qum-tura)之南渡穆杂尔特河，始终循 Cöltagh 山南行。我在 H. Cordiér 刊行 Yule 的《契丹路程》（第四册二三一页）一条附注中，曾说明这条南道就是鄂本笃(Benoït de Goes)在十七世纪初年经行之道。斯坦因君在《亚洲腹地》八一七页曾试为证明此道亦是六三〇年玄奘经行之道，并是八世纪末年贾耽所述之道。"② 可见斯坦因和伯希和都主张玄奘取道山南一线，此道较山北一线为径捷，自然里程亦较短，故向来被称为库车至阿克苏的捷径之一。清椿园氏（长白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六云："霍集占必弃（库车）城逃归叶尔羌去，去有路径两条，

一由城西之渭干爱曼(村落之谓),此地水浅，人马可渡，渡河则得向阿克苏之捷径矣。”据此，乃知直至清代此道仍可通行，并未荒废。从现今新版中国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交通路线中就有库车至哈拉玉尔滚这一条比较径捷的汽车通道。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玄奘必走南道，因为确尔克达格山南边有一道很长的沙碛,从渭干河西岸(库木土拉对岸)起,傍山南麓西行,直至阿克苏境,南道就在此沙碛中行进,全无水草,在往昔必须候至冬令下雪时,裹粮啮雪，骑行而过[3]。斯坦因描述此路的荒凉情况云:“五月初间我从库车动身向西，……阿佛拉兹果尔汗(Afraz-gul)派去测绘到阿克苏去最近的古道。这一条路经过荦确不平的沙漠到一座荒凉突出的小山之南,现在有好几站滴水俱无,实际上已废而不用了。”乃知斯坦因本人仍走北道，而遣阿佛拉兹果尔汗前去[4]。据《慈恩传》云:“时为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玄奘滞留屈支，时值冬令，而从屈支起程，约当四、五月间，这时已不适宜于大队人马通过沙碛。阿佛拉兹果尔汗出发虽则在五月初，但少数人为了执行测绘任务，充分携带水草粮食,亦可冒险通过,这与一般商队旅行的情况不同。依此而论,当日玄奘从屈支至跋禄迦应取道山北一线,而不会取道山南的捷径。

《慈恩传》云:“从此(屈支)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贼二千余骑,其贼乃预共分张行众资财，悬诤不平,自斗而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碛,至跋禄迦国。”计其日程,玄奘逢突厥寇贼,当在过赛里木之后,抵达拜城之前,寇贼来自北山，二千余骑不是小股，想系突厥兵的一支,而兼以劫掠为务者。若依今代驿程,从赛里木正西行,二十五里乾河子东岸,八里西岸，西偏南行三十二里官厅，五里抵拜城。离拜城西偏南行,七里官厅，十九里地名二十里两庚，又三十里地名四十里两庚,即沙哈尔庄，二十五里黑米孜，二十五里铜厂河，(上流曰木杂拉特河，下流曰渭干河)过河后二十五里察尔齐。从

此西偏南行，经戈壁，马行沙石上，坎坷颠簸，即《西域记》所谓"经小砂碛"者。四十里滴水崖，西行多沙窝，四十里盐水沟，亦称托和拉旦驿。自此行山峡中，三十里出峡，三十五里求里塔黑大坂，十五里哈拉玉尔衮驿⑤。玄奘经行时，究竟有多少及有什么驿站，已难稽考。我们只能从《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道里记》所载，略知几处。据云："安西(屈支)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其中柘厥关的"柘厥"一名，经伯希和还原为 Cäküri, Čögüri (<Čökür), Čäkür，今日在中亚一带尚有 turā 一字，以名候望台，并以名窣堵坡。此 Čäkür 在库车语与吐火罗语中，或亦兼有此二义。吐鲁番出土一石柱，上面刻着回纥文，文中有 Sutup Čäkur 二字，义为"窣堵坡尖"，此"尖"字之义可转训为"台"⑥。此安西西出之柘厥关(候望台)应位于库木土拉千佛洞之南，木札特河东岸。据黄氏的考查，在千佛洞南有旧城遗址名色乃当，城北里许有一土堡，本地人称之为"炮台"，为古时守戍官兵瞭望之所。此地发现唐代陶片数枚，其中一片且划有模糊不易辨认的汉字⑦。是知此处在唐代设有检查渡河行客的关卡，可能就是贾耽所记的柘厥关，而白马渡即是指木札特河东岸的渡头而言。自从《西域图志》把赛里木城比拟为贾耽所记的俱毗罗城，拜城比拟为阿悉言城之后，古今学者几无异议。我认为这种比拟大有问题，因为《西域图志》是以唐伊逻卢城位于库车之东阿巴特与托和鼐之间，而以白马河比拟于今库车城东的额什克巴什郭勒为前提的，前提既误，推论就不可靠了。贾耽所记路程，似为从库车西行，至库木土拉千佛洞之南，过柘厥关，渡木札特河，沿大裕勒都司渠北岸，经铁吉克，西北入山峡，经千佛洞，沿黄土层的山沟小道，越确尔克达格。黄氏云："在赛里木村边有土墩一座，高约三米，此处有小道，通裕勒都司巴克，现已无

人行走”。即指此小道而言⑧。出小沟后，沿山北的碛路西行，即所谓“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逻城，此城可能位于鄂依斯堂附近，因其西边有吉克地理克山沟，山沟西岸有佛洞六、七处，沟中又有土阜，为古庙遗址，看来此处在唐代是居民及僧徒聚居之所。从赛里木南方的山沟口至此约百二十里，与贾耽所记正符。“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此句里数似有脱误，“六”字前当有“百”字，即百六十里至阿悉言城，此城似应位于今盐水沟（托和拉旦译）附近，因为过此即入山峡，峡长约三十里，地甚险要，唐时设一小城于此，以扼峡口，为跋禄迦东面的屏障，很有可能。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今盐水沟至哈拉玉尔滚五十里，基本相符。玄奘是不是采取贾耽所记的同样驿路？看来不大可能，因为玄奘从屈支起程，时当初夏四、五月间，冰雪已开始溶化，山沟水深，不易通行。且贾耽著述《四夷道里记》已后于玄奘西行百余年，驿站位置和名称都不免有许多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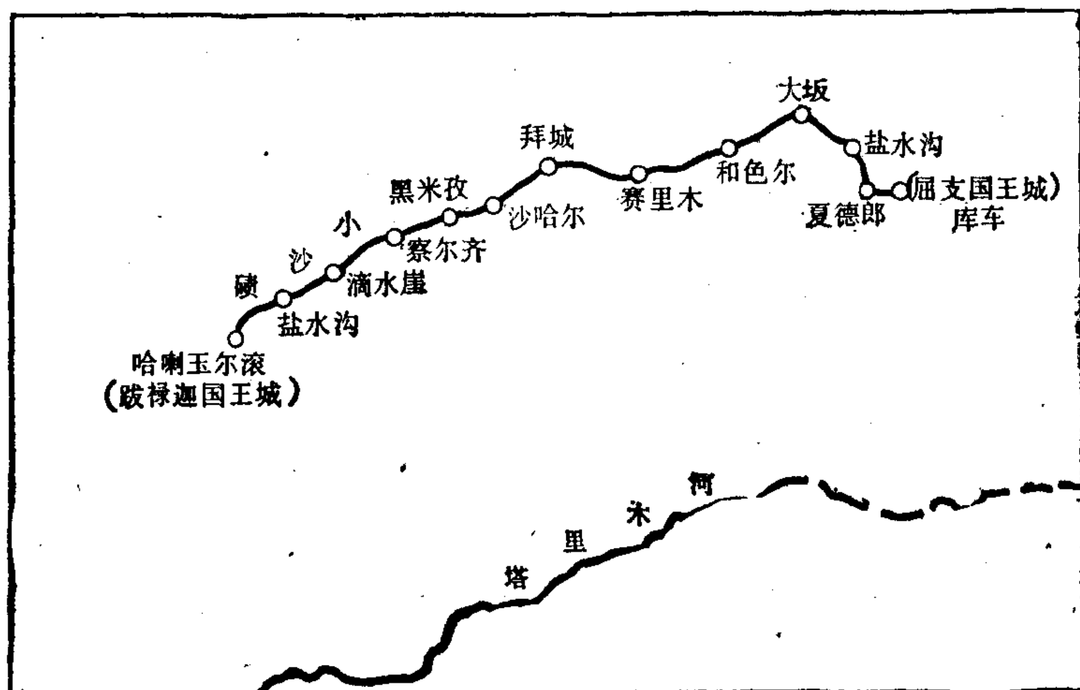


图 4　从屈支国至跋禄迦国的行程图

①谢彬《新疆游记》第183—184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122—123图和色尔作黑孜尔，赛里木作西里木。

②《吐火罗语考》，第126—127页。

③《新疆游记》，第187页。

④《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00页。

⑤《新疆游记》，第183—187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122—123图在这一段路程中只有察尔齐对得上，其余站名已改变。

⑥《吐火罗语考》，第131—132页。

⑦《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7页。

⑧同上，第18—19页铁吉克遗址条，又第38页及该书所附《塔里木盆地考察路线图》。

跋禄迦国考

一、国名

《西域记》跋禄迦国原注云:"旧曰姑墨,亦曰亟墨。"《悟空行纪》云:"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云怖汗国"。《新唐书·西域传》云:"自龟兹踰小沙碛,有跋禄迦国,小国也。一曰亟墨,即汉姑墨国。"又同书引贾耽《四夷道里记》云:"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按《汉书·西域传》有姑墨国,徐松《补注》谓王莽改称积善,(见袁宏《后汉纪》),《魏书》作姑默。所有姑墨、积善、姑默、亟墨、威戎、钵浣、怖汗、拨换、跋禄迦等名,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即今哈拉玉尔滚及其附近地区。比尔(S. Beal)说:"kih-meh 无疑是代表玉连(Julien)的 kou-mé,以前它原是指阿克苏的东部。跋禄迦(Bâlukâ)这个名称据说是来自四世纪时占据甘肃西北部的一个突厥部族。"①按比尔所说 kih-meh,乃"始墨"音译之所本,但"始"是"姑"之讹,玉连的 kou-mé 才是"姑墨"的音译。这个讹误,乃来自不同的版本,如四部本、嘉兴本、守山本、金壶本、支那本、国学本等,这些版本的《西域记》都把"姑"字误作"始"。但碛砂本、大正本和全集本不误。比尔说 Bâlukâ 一名乃出自一个突厥部落、此说不确,因为 Bâlukâ 一名乃来自印度梵文,义为"沙"或"沙漠"。瓦特斯(T. Watters)说:"玄奘似乎是第一个采用跋禄迦这个名称,只有《西域记》和《法师传》知道这个名称,而《唐书》的材料,显然是直接来自《西域记》的。玄奘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理由简单,历史上姑墨一名是出自突厥字 Kum(或Qum),义为沙或沙漠,在中亚地名中常见。从印度来的僧徒用梵名代替 Kum,于是

写作 Bālukā，玄奘则译为跋禄迦。”② 按瓦特斯谓玄奘似乎是第一个采用跋禄迦这个名称，此说也不确。因为六世纪下半叶那连提黎耶舍（Narendrayasas）所译《月藏经》，有西域诸国名录，其中有婆楼迦国，此名与跋禄迦同是 Bālukā 的音译③。关于此名的语原问题，据白鸟库吉说：“突厥语族中，阿尔泰语、Schor 语、Čagatai 语称‘沙’为 kumak，吉尔吉斯语称‘沙丘’为 kamak，Tobolsk 语、kudṇezh语称‘沙’为kumak，Yakut语称之为 kumack、kumac。因思‘姑墨’必非突厥语 kum 的对音，而系 kumak 的译音。蒙古语称‘细沙’、‘沙粒’、‘水中尘土’为 komak或 komaghi，Solon 语之称‘沙土’为(Sar)Khomugé，亦为同语。”④至于拨换、钵浣、怖汗之称，则为大食语 Barkhuan 的音译⑤。冯氏《西域地名》云：“或以为姑墨之名出于突厥语之 kum，此言沙也。今之阿克苏即《水经注》之姑墨州，贾耽之拨换河，其上流今名呼木阿里克（Kum arik），此言沙渠，故以姑墨为 kum 之对音；但突厥语流行之前，其地用语为吐火罗（Tukhara）语，此说恐误。”按玄奘记述此国的文字语言云：“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稍异。”上文已经说过，所谓吐火罗语应改称焉耆龟兹语，此语分甲乙两种方言，甲种方言即古焉耆语，乙种方言即古龟兹语。迄今发现的龟兹语文书，其时代上限不早于七世纪，而其形成，则在四世纪间。玄奘经过西域时，正值西突厥强盛之际，《慈恩传》谓玄奘离屈支后二月，途遇突厥寇贼二千余人，可见突厥人在天山南路一带如何横行作恶了。实际上此时天山南路城郭诸国，包括龟兹在内，都役属于突厥，所以不能说屈支、跋禄迦一带流行龟兹语，就不会受突厥语的影响。龟兹北的白山，《新唐书》称为阿羯田山，为突厥语 Ak-Tagh 的对音，就是一例。我们认为姑墨一名既不能追源于突厥语，亦不能追源于四世纪间才形成的龟兹语。它在西汉时代已经使用，究竟出于何种语言及其含义如何？可能是出于蒙古语和突厥语的

共同祖先，即所谓“原阿尔泰语”，但正确的答案，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方位、都城

玄奘所记跋禄迦国究竟相当于今代何地？过去学者的主张很不一致，概括起来，其说有五：(1)有的说相当于拜城，如丁谦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2)有的说相当于雅哈阿里克(Yaka-arik)，如《西域图志》；(3)有的说相当于哈拉玉尔滚(Kara-Youlgoun)，如《西域水道记》(见卷二阿克苏河条)、《清嘉庆重修一统志》；(4)有的说相当于阿克苏，如圣·马丁(M. V. de st. Martin)、格勒那尔(Grenard)、斯坦因、伯希和、张星烺、冯承钧等；(5)有的说相当于木札特河岸柯尔塘附近的喀拉马克沁旧城，如黄文弼。此外，比尔把它位于阿克苏的东部[6]。瓦特斯说：“圣·马丁考定姑墨或跋禄迦相当于今代的阿克苏，这一考定已被别的学者所承认。有的中国学者把它比定为今代的拜城，但别的学者更正确地比定为今代的哈拉玉尔滚，即我们的地图上的 Kara Yalghan、Kara Yurgun，它是在阿克苏行政区域之内的。”[7] 看来比尔和瓦特斯两人都可以归入第三说。按第一说，拜城距库车只有二百九十里，与《西域记》之六百余里及《新唐书·西域传》之六百里相差太远。第二说，雅哈阿里克距库车只有四百七十里，亦与《西域记》及《新唐书》所载里程不符。第四说，如假定玄奘取道山北，则由库车至阿克苏全程达七百里[8]或云八百里[9]，与《西域记》及《新唐书》所载里程比较，距离过远，也就是位置太偏于西，势必假定玄奘取道山南，由库车向西径达阿克苏，全程约五百余里[10]，与六百余里之数相差不多，但玄奘当日不会取道山南，已如上述。主第四说者曾举出三个理由：“一、据《前汉书》卷九六下曰：‘姑墨国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格勒那尔云：‘由雅哈阿里克或哈拉玉尔滚至和阗，从来无路可通，

今亦无路可达,若自阿克苏赴和阗,有路可通,正马行十五日也’。二、格勒那尔曰:‘《前汉书》姑墨国有人口二万四千五百,温宿有人口八千四百。今观阿克苏水泉甚饶,为土耳其斯坦要城之一,当时何致人口反少于几无水泉之雅哈阿里克或哈拉玉尔滚三分之二?若以阿克苏为姑墨国,乌什为温宿,则近似矣’。三、若以姑墨为今之阿克苏,温宿为今之乌什,《唐书》所志《四夷路程》,关于此二地之记载,始不难明瞭。据云:‘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西北渡拨换河。’此拨换河即今之阿克苏河,此河在思浑河即今之塔里木(Tarim)河之北。‘二十里至小石城’,此城在今之 Bourge,在阿克苏河及塔乌什堪河 (Taouch kan daria) 之间。‘又二十里至于阗(按于阗应作于祝)境之胡芦河’,此河即塔乌什堪河也。‘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此温肃为乌什无疑也。”⑪沙畹即据格勒那尔所提这些理由,遂考定姑墨即阿克苏,温宿即乌什之说,“为不磨之真理。”我们认为这些理由还有可议之处。

关于第一个理由,谢彬说:“哈喇玉尔滚即《唐书》贞观十一年阿史那社尔讨龟兹时,其王所逃往之拨换城,其地有二捷径,南行六日达和阗,东行二日达库车。”所言行程日数,未必准确,但当时从哈拉玉尔滚有捷径可径达于阗,谢氏曾亲历其地,必有所据。然则所谓哈拉玉尔滚至和阗,从来无路可通的话,未可置信。

关于第二个理由,据《唐书·西域传》谓跋禄迦国,“一名亟墨,即汉姑墨国,横六百里,纵三百里。”依此而论,《前汉书》所载姑墨国人口二万四千五百,非指姑墨都城人口,而是指整个姑墨国的人口,如果前汉时其国亦横六百里,东边应与龟兹接界,西边应与温宿接界,今阿克苏亦应包括在其西界之内,那里会“几无水泉”呢?即就哈拉玉尔滚及其附近地区而言,千年以来,地理情况,尤其是西域多沙漠地带,变化当必很大,又焉知千年前没有河流或溪泉经流其地?据《西域图志》卷二七阿察哈喇郭勒条云:“源在木素尔达

巴西南麓，至图格哈纳达巴西，分两流南下，当孔道。”按阿察哈喇郭勒，即今阿尔巴特河，亦称阿瓦提对里雅河，《西域图志》又谓为唐拨换河，此河支流在古代经哈拉玉尔滚之西。《西域水道记》卷二阿克苏河条云：“阿尔巴特河（阿察哈喇河）古称姑墨川水，唐之拨换河，水经山之东，而南流经哈喇裕勒滚台西，其地古姑墨国也。”又黄文弼谓由哈拉玉尔滚至札木台为一湖滩，遍生红柳苇草，有红柳为黑色，特异他处，故称哈拉玉尔滚。向西行，过一乾河川，又连过二小河，即抵札木台巴杂⑫。是则此地往昔的川流湖泽，至今尚有痕迹可寻。

关于第三个理由，主要是说，以姑墨为今之阿克苏，温宿为今之乌什，与《唐书》所志贾耽《四夷道里记》相符。按所谓“二十里至小石城”句与《新唐书·地理志》引《四夷道里记》的原文版有出入。原文云：“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祝）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刻《新唐书》）意谓由拨换城西北渡拨换河，至小石城，未言相距里数，其间即插入“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意谓由拨换河中游距思浑河（塔里木河）百二十里。但格勒那尔和沙畹却把“二十里”与下句“至小石城”连起来作为一句，而使“百”字架空，毫无意义，这显然是由于断句致误。据他们的考证，以阿克苏旧城（今温宿县治）当唐之拨换城，由此城西北渡拨换河至小石城，贾耽未言相距里数，如果依他们的说法为二十里，由小石城至胡芦河二十里，再加上由此河至大石城（温肃）六十里，合计只有一百里，但据《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安西大都护府条：“又从拨换西北二百里至大石城”，《西域图志》卷一六疆城九谓由阿克苏至阿克雅尔一一〇里，阿克雅尔至哲尔格哲克得五〇里，哲尔格哲克得至乌什

九〇里，共计二五〇里。又锺广生《新疆志藁》卷三载，自温宿底驿（阿克苏旧城）至乌什厅驿共二七〇里，最后这一里数适与《汉书》的里数相符。由是观之，贾耽所记里程与实际距离相差百余里，而格勒那尔、沙畹辈竟据以考定姑墨（跋禄迦、拨换城）和温宿的位置，如此立论，正所谓筑室沙上了。

至于第五说，即所谓唐拨换城位于今之木札尔河岸柯尔塘附近喀拉马克沁旧城，据黄氏所记路线，是沿北山边行，太偏于北，与《太平寰宇记》所谓安西都护府正西至拨换的方位不符。且玄奘所越过的凌山，不是指木素尔岭，而是指介于木素尔岭与拔达岭之间的粟克托尔岭（楚克达尔山，下文将有所论述）。但如果说跋禄迦在喀拉马克沁旧城，则必须越木素尔岭，所以第五说也有难通处。

现在只剩下第三说，即把姑墨位于今之哈拉玉尔滚，此说也有缺点，即哈拉玉尔滚一带迄今还没有发现过古城遗址。但从库车沿山北一路西行至哈拉玉尔滚，计程六百四十里⑬，与玄奘所记六百余里之数相符。玄奘云："国（跋禄迦）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凌山既是指粟克托尔岭，此岭在汗腾格里山的西南隅，《西域图志》称之为卓克达巴，（此书将卓克达巴比拟《唐书·地理志》之拔达岭，实属错误，其实拔达岭应是位于卓克达巴西南二百四十里的伯得里克岭。）而《一统舆图》则称之为楚克达尔山。清倭仁《莎车行记》云："阿克苏属西南巧塔尔达坂及赛里木所属之阿尔通霍什，均为赴伊犁捷径，道光八年奉旨封禁。"王树枏《新疆山脉图志》卷三谓巧塔尔即楚克达尔之转音，其言甚是，但所谓"阿克苏所属西南巧塔尔达坂"，"西南"应是"西北"之讹。从哈拉玉尔滚西北行，不必经阿克苏，可越赤沙山，过盐山口和达浪山口，抵阿克苏河东岸的塞赫莱(Shaikhley)，再渡河西南行，转向西北，经塔里木(Tarim)，以达粟克托尔岭（凌山），计程约百七十余公里，与玄奘所记的方位和里程正相符合。

《汉书·西域传》谓姑墨国王治南城，按南城是对北城而言，则汉时姑墨国应有南北二城，南城若相当于今之哈喇玉尔滚，北城又在何处？据黄文弼的记述，于1929年9月从札木台北行，经戈壁，约六十里进盐山口，北行经阿瓦提腰站、铁于可洛克庄、麻扎阿拉的等地，转向东北，登哈拉样大坂，入岭后经一草原，至克子尔不拉克驿，转东沿木扎特河行，至鄂斯堂不一，渡河抵哈拉巴克，滨河有一古城遗址，地名柯尔塘，旧城名喀拉马克沁，义为蒙古城，以石累砌而成，城内散布红陶片。据黄氏考查，此地由汉至唐，仍为居民活动中心，疑为汉姑墨石城及唐拨换城旧址⑭。按此旧城遗址，与哈喇玉尔滚南北遥遥相对，黄氏疑为汉姑墨石城，是也。但非唐拨换城，拨换城即玄奘时代跋禄迦国的都城，应位于今之哈喇玉尔滚，已如上述，则木扎特河北岸的石城，应是汉姑墨国的北城。

三、国　势

玄奘记述跋禄迦国的风俗、文字、语言和物产，虽嫌简略，然唐以前史书记载姑墨国的情况，则更为简略，甚至不为姑墨立传，大概是由于其国弱小之故。据《汉书·西域传》姑墨国条云："户三千百五，口三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新唐书》谓其为小国，其实，在西汉时代，较之温宿、渠犁、尉犁等国已不算小。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云："当为次大国"，是也。《汉书》又云："王莽时，姑墨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说明西汉末期，姑墨国力未衰，故能兼并邻国。《后汉书》不为姑墨立传，惟《莎车传》载，姑墨王为莎车王贤所杀，贤并遣将镇守之，则此时之姑墨，已沦为莎车之属地。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死，焉耆攻没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此时之姑墨又役属于龟兹。建初三年(公元78年)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超又上疏请兵，言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

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从班超的话我们可以看出：(1)《后汉书·班超传》说在攻姑墨石城之后，仍请朝廷增兵，先降服温宿姑墨，以便进攻龟兹，因知石城只是姑墨国西境的一个城堡，而不是姑墨的都城；(2)龟兹视温宿、姑墨二国为西境的屏藩；(3)温宿、姑墨二国的王族及其人民与龟兹不是同一种族。自此以后，姑墨国势渐衰，或沦为龟兹的附属国，或变为龟兹国境的一部分。《三国志·魏志》引鱼豢《魏略》云："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晋书·吕光传》云："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须(头)等国合七十余万以救之。"狯胡所引不及姑墨，想其时姑墨已为龟兹所兼并。《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均谓姑墨役属于龟兹。《隋书·西域传》不载姑墨国，裴矩所记原有四十四国，其遣使来朝者三十余国。隋末大乱，事多亡失，所录存者仅二十四国，则姑墨的记录可能就在亡失之列。《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条载，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遣阿史那社尔与郭孝恪等讨龟兹，大军破其都城，复遣苏海政追击，其王退保拨换城。大食语称跋禄迦为Barkhuan，拨换即Barkhuan的音译[15]。按大食势力及于中亚，始于公元八世纪初，高仙芝为大食兵所败，事在公元七五〇年，而阿史那社尔之讨龟兹，早在六七十年以前，何以姑墨会采用大食语的名称？想系由于中国史书所记者乃来源于过往大食商人的口述，而不是姑墨国人的自称。新旧《唐书》都不为姑墨立传，《新唐书》仅在《龟兹传》中略言之，并谓其为小国，横六百里，纵三百里，其材料显然是出自《西域记》。

①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Populer e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vol. 1, p. 24 [BKI] note 74。

②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64—65。

③烈维(Sylvain Lévi)著冯承钧译《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第168—183页。

④《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第126页。

⑤《西突厥史料》,第113页注二。

⑥Si-yu-ki, vol. 1,p. 24,[BKI]note 74。

⑦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vol. 1,p. 65。

⑧《西域图志》卷一六疆域九。

⑨《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二四阿克苏条。

⑩《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安西都护府条云:"正西至拨换五百六十里",大概就是指山南捷径而言。

⑪沙畹著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0—51页。

⑫《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39页。

⑬《新疆识略》卷一《新疆疆域总叙》。

⑭《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⑮《西突厥史料》,第113页注二。

从跋禄迦国至赭时国的一段行程

这段行程所涉及的地名，相当于今代何地？学者意见，颇不一致，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凌山

《西域记》卷一云："国（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玄奘所谓凌山，究何所指？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又要了解"凌"字的意义。据清徐松说："诗纳于凌阴，传曰：凌阴冰室也。《周官》：掌冰者曰凌人。是知凌即冰，《说文》作滕，引诗纳于滕阴[①]。"徐氏此一解释，当已得其正鹄，盖文人习于典雅，措字遣词，往往以出于经传者为尚，故玄奘不径称冰山，而称之为凌山。惟葱岭从大雪山(Hindukush)以北，伊斯色克库尔(Issikul)以南，绵亘数千里[②]，高峰结冰者不止一处，玄奘所谓葱岭北原的凌山，究在何处？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说法有三：(1)凌山是指今木素尔岭(Muzart Daban 或 Mushr-dabqhan)，主是说者有丁谦、圣马丁(V. de St. Martin)、比尔(S. Beal)、白莱脱胥乃窦(E. Bretschneider)等[③]。(2)凌山是指拔达岭(Bedal 或 Bedel Daban)，主是说者有黎希托芬(Richthofen)、沙畹(E. Chavanes)、白鸟库吉、冯承钧、张星烺等[④]。(3)凌山是指木素尔岭，而木素尔岭即拔达岭，把

两个山岭混同为一,主是说者有清徐松和李光庭[5]。

关于第一说，据徐松《西域水道记》引乾隆二十五年十月舒赫德奏语,由木素尔山南阿尔巴特阿璘攀登木素尔岭的一段路程,确甚艰险[6]。公元 1888 年英人兰斯得尔 (Henry Lansdell) 从伊犁往阿克苏,曾通过此岭，他描述由山北攀登此岭的艰险情况，更使人惊心动魄[7]。如果把这些情况与《西域记》关于凌山的记载互相对照，就觉得很相类似。但此说难通之处有三:(1)《西域记》谓凌山在跋禄迦国(其都城当在今阿克苏与拜城之间的哈喇玉尔滚)的西北,而木素尔岭乃在其正北，方位不符;(2)据欧洲旅行家证实，从木素尔巴什(Muzart-bash) 至塔木噶塔什(Tamqhatash) 的一段路程,非常陡削,故商队从阿克苏回去伊犁时,绝不取道于此,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说玄奘必定通过此岭;(3)由木素尔岭至伊斯色克库尔(热海),必须绕道特克斯(Tekec)河流域,从特克斯城转而向南,越过阿苏托尔(Ашутор)和哈喇该尔(Кара-Кыр)两个山隘,全程约共 500 公里,相当于 1,270 古汉里以上[8]。但《西域记》谓凌山至热海山行只有四百余里,相差太远。由此可见,所谓凌山即木素尔岭之说，殊难成立。关于第二说，据唐杜环《经行记》和贾耽《四夷道里记》所述由安西往西突厥各地，都要越过拔达岭[9]，可见此道在唐时商队往来,颇为频繁。山径峻险,其情况与《西域记》所载亦颇相类似[10],但此说也有两个缺点:(1)拔达岭依今代准确地图观察，应在跋禄迦国都城(今哈喇玉尔滚)的正西(见《苏联世界地图集》),而不是西北,与《西域记》所载方位不符;(2)从拔达岭至热海,中间经过招库卓山隘(Пер. Джукучок)，此道约长 125 公里，若不经此而取道巴尔斯昆山隘(Пер. Барскон),其里程亦相差无几,此一里程约合 320 古汉里,与《西域记》所谓山行四百余里,也不相符。

白鸟库吉谓玄奘所经凌山,并非天山的木素尔岭,实指《唐书》的勃达岭。他为了证明这一点，引清嘉庆间和瑛所撰《三州辑略》

冰山赞:“伊犁之南,渡浑河五六百里,有冰山焉,俗名八达坂,为适叶尔羌西藏西路,其冰一日数折,亦终古莫解,高撑云霄,下绝九地,分轸阴阳,回转日月。过此坂者,必以子夜。人马半道,亦辄闻天倾地裂之声。或竟陷入无间者,开合既倏,孰窥神奇,呼吸未周,已别人鬼。每星邮羽檄,取道于斯,虽蚊行蜡步,蜿枉鱼擘,或震栗失形,回皇堕魄,然舍此以往,别无他道。若天风不鸣,月魄晃朗,陟其巅者,入辄闻百丈以下,弦管丝竹,喧喧并举,聆其清绝肖子夜,或以为流澌沙石,上下搏击,其山咽吞吐,响或类斯,亦卒莫究其奇英。主宿顿者,必日拨回户二十,凿冰栈冰梯以通过客。余偶随将军至此,既目其灵异,又莫测其幽隐。”白鸟库吉说此文若与玄奘叙凌山之言相对照,可想见其艰险,决非寻常可比⑪。其实和瑛此赞所言,正是描述木素尔岭,而不是拔达岭。何以见得?因为:(1)赞云:“伊犁之南,渡浑河五六百里有冰山焉。”考《西域水道记》卷二罗布淖尔所受水下东渭干河条谓“伊犁惠远城南六百五十五里,中有大山曰木素尔岭”,正与赞文所说里程相符,若指拔达岭,则由伊犁至其地,何止五六百里?(2)赞文又云:“俗名八达坂。”考八达坂亦称冰达坂,木素尔(Muzur)义为冰,达坂(daban)义为岭,八达坂或冰达坂即冰岭之谓,与拔达岭不能混淆为一;(3)赞文又云:“主宿顿者,必日拨回户二十,凿冰栈冰梯以通过客”,正与《西域水道记》东渭干河条引舒赫德奏语所谓日派回户二十人凿冰为梯之说合。赞文其余描写艰险部分,则与英人兰斯得尔所言相类似。根据以上几点,适足以证明和瑛所言,乃指木素尔岭,而不是指拔达岭。白鸟库吉用自己引证的材料来反驳自己的主张,似系出于一时的疏忽。由此可见,所谓凌山即拔达岭之说,亦难成立。

关于第三说,据杜环《经行记》所述从拔达岭至热海的行程,其艰险情况与玄奘所经的凌山相类似,唐时由安西往西突厥诸地,似多取道拔达岭,故前人在论述凌山即木素尔岭时,往往引杜环和贾

耽所记拔达岭的情况，以为佐证。但此说不能自圆者二：(1)两道艰险情况虽略相似，惟贾耽所言过拔达岭后，列举许多地名，其中真珠河，经多数学者考定即今代纳林河，而实际上从木素尔岭至热海的途程，绝不会经过此河；(2)杜环和贾耽两人生当玄奘之后约百年，他们如果取道玄奘所走的旧路，为什么不提玄奘的旧名，而必改称拔达岭？或谓拔达之名乃起于玄奘西行之后，但贾耽记程，凡地有异名或旧名者，必为之列举，例如"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为什么在拔达岭之后，不举凌山之名？可见凌山与拔达岭是两个不同的山名，不能混同为一。

以上三说既不能成立，那么，玄奘所谓凌山，究何所指？瓦特斯不作肯定的主张，他说玄奘所越过的山隘，可以是拔达岭，也可以是拔达岭与木素尔岭之间的其他山岭，也可以是越过木素尔岭之后，再向西行以达大清池(热海)[12]。前后两条路线之不可能，已如上述，但他所谓拔达岭与木素尔岭之间的其他山岭一点，值得注意。根据今代苏联地图，在拔达岭与木素尔岭之间，确实另有一条商队通道，以达热海，即越过阿克苏河西支发源处的粟克托尔山隘(Пер. Сауктор)，沿着沙雷查斯(Сарыджаз)河谷向北行，再越哈喇该尔山隘(Пер. Каракыр)，沿秋浦(Тюп)河北岸以达热海。我认为主张玄奘走这条路线，有三个有利的论据：(1)粟克托尔岭正在哈喇玉尔滚的西北，与《西域记》所说的方向相符；(2)从此岭至热海东头约 190 公里，约合 480 古汉里，与《西域记》所谓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的里程相符；(3)《西域记》谓葱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Kunduz)，东至乌鎩国（叶尔羌）。按照这个方位来观察，玄奘所谓葱岭北原，应指汗腾格里山(Пик Хан-Тенгри)以西诸山脉而言，汗腾格里山已在此北原的极东部分，过

此即出葱岭范围，木素尔岭在汗腾格里山之东北，已出此范围而属于拜城和库车以北的天山系统。玄奘所谓凌山，应指汗腾格里山，亦即《西域图志》的萨瓦布齐鄂拉⑬。而粟克托尔山隘即在汗腾格里山的西南隅，故玄奘统称之曰凌山。或谓此路较拔达岭一路为长，为什么玄奘西行必舍短而取长？我认为取道拔达岭虽则较短，但必须再越招库卓山隘，这个山隘高达4,800公尺以上，而粟克托尔一路所经的哈喇该尔山隘，只有三千多公尺，若走巴尔斯昆山隘，虽则也只有三千多公尺，但其难险情况，正如俄人皮夫楚夫(M. B. Певцов)所述，非有大队人马在前面掘雪开路不可。而且在未越山隘之前，必须通过难行的沼泽地区，故今代苏联地图在这里已没有商队通道的标记。此外，由粟克托尔至哈喇该尔都是沿河谷北行，过了哈喇该尔之后，也是沿河谷西行，路较平易。或谓玄奘既取此道于前，何以百年后的杜环反不知走此平易的路线？关于这一点，很易理解，因为杜环是随高仙芝军攻打西突厥的，行军志在神速，捷径是求，艰险不计，这与玄奘的情况不同。

二、大清池（热海）

《西域记》又云："（大清池）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玄奘所谓大清池或热海，即今代地图的伊斯色克库尔，大家没有异议，但关于玄奘曾否亲到大清池？如果是亲到的话，究竟取道南岸，抑取道北岸？学者对于这些问题，意见还不一致。瓦特斯谓玄奘关于大清池的记述，不必亲到其地，亦可以得诸传闻，故怀疑玄奘曾否到达大清池⑭。我认为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因为依今图的路线察之，出汗腾格里山的西南隅粟克托尔山隘之后向西行，必然要经过热海。且湖水味兼咸苦，

人不能饮，水色暗蓝或暗青，冬不结冻，常有强风等等，都经苏联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所证实⑮。

至于玄奘究竟取道南岸，抑取道北岸的问题，瓦特斯主张玄奘取道南岸，他的理由是据唐释慧立所撰《慈恩传》卷二："循海（热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他认为玄奘走出了凌山之后，必须沿热海的南岸，保持右手临海，才能向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⑯。沙畹则主张取道北岸，他的理由有二：(1) 寻常通道在此湖之北，可以俄文地图证之，湖之南通行甚难，最近欧洲诸旅行家业已证明其事；(2)《西域记》卷一云："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注谓清池或名热海，至素叶碎叶并为同名异译，不难知之也⑰。"我同意沙畹所谓玄奘应走热海北岸的主张，他所举的第一个理由很重要，但第二个理由则不够明确，因为关于唐代碎叶城（素叶水城）的位置，他是主张在今代楚（或吹）河南岸的托克马克(Tokмак)⑱。由热海西头至托克马克只有 100 公里左右的路程，不符《西域记》所谓"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的里数，势必认为玄奘此处计程是包括热海北岸由东头至西头的距离约百余公里在内。我既不同意他把唐代碎叶城置于今代的托克马克，也不同意这种计程方法。我主张唐代碎叶城是位于今代苏联地图的哈喇波尔第(Карабалты)与哈林宁斯克 (Калининское)之间或其附近地区⑲。而不是在今代的托克马克。至于计程方法，按照《西域记》的通例，由甲地至乙地，只计此两地之间的距离里数，而不包括甲地或乙地本身由某一点至另外一点的距离里数，尽管热海由东至西长达百余里，但作为行程的一站而论，不应计算在总的里程之内。《西域记》先说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然后叙述大清池本身的范围或面积和一般情况，最后乃说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在这里玄奘把大清池作为一站或一个到达的地点来叙述，显而易见。而所谓"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又把大清池本身

的周距说明，已不必再计入总的里程之内。慧立不了解这一点，故凭自己的臆断而增入一个"循"字，而不知一字之加，不特影响玄奘著述之例，且影响热海以西整个途程中各个地点的位置和距离。热海从东至西的北岸线是倾向西南方的，若把它本身的距离计算在总的里程之内，亦与《西域记》所谓"清池西北行"的方向不符。所以我一方面同意沙畹所说玄奘应走北岸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他所举的第二个理由。

除了他所举的第一个理由足为此一主张的论据之外，我还可以举出两点：（1）瓦特斯主张玄奘取道南岸的主要根据是《慈恩传》，但比较此传更可靠的材料是唐释道宣所撰《释迦方志》，据云："山行自西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又名热海，亦名咸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四面有山，行人祈福。又西北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观此段文字，其末句并无"循海"二字，与《西域记》合。为什么我说此志材料比《慈恩传》更为可靠？因为道宣此志撰成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其时玄奘未卒（卒于麟德元年（664）。据其志后自跋云："往参译经，旁观别传，文广难寻，故略举其要。"可见此志是道宣参与译经时直接取材于别传的，而慧立《慈恩传》是撰于玄奘既卒之后，据该传彦悰序文说，慧立死后，其藁流离散失，搜购了许多年，才得复全。又据《宋高僧传》卷十七护法篇第五惠立传谓撰《三藏法师传》（《慈恩传》），未成而卒，后广福寺沙门彦悰续成之，则彦悰不特为之笺释，且加以笔削续编。这样辗转流散，收集重编，内容难免讹误。丁谦《西域记考证》凡例谓《三藏法师传》胜于本记，凡道里错误及遗漏乖戾之处，均依传订正记文。其实丁氏忽略了《慈恩传》的来历，以其相信玄奘卒后才撰述的《慈恩传》，何如相信玄奘生前亲述的《西域记》？今以《释迦方志》证之，《慈恩传》所谓"循海西北行"的"循"字，如果不是"从"字之讹，就是慧立或彦悰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而增入的⑳。（2）我在上面已论证玄奘所谓凌山乃

指汗腾格里山，而他所越过的山隘乃指此山西南隅的粟克托尔岭，过此即循沙雷查斯河谷北行，再越哈喇该尔山隘，以达热海的东头。如果这一论证不误，则玄奘势必舍较难通行的南岸，而取道北岸。

三、千泉

《西域记》又云："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 按千泉一名，《慈恩传》称之曰屏聿[21]。据伯希和考定此名应还原为中世纪突厥语 Bing-yul，义为千泉，但岑仲勉则引粤语读聿如 Lŭt，应是东突厥语之 Bing-bulaq[22]。但我仍同意伯希和的说法，因为岑氏之说必须附带两个条件：一即假定今代粤语全部合于唐代的古音，但据《广韵》：聿，余律切(iuet)，不作 Lŭt，我们既不能说粤语全部合于唐代的古音，那么，我们又何以证明粤语这一发音必合唐代的古音？二是假定 bulaq 里面的 bu 读音不显，因而玄奘在转译时略去，古人译音虽有此例，但不能视为通例。关于千泉的位置问题，《西域图志》谓应在图斯库勒(热海)西四百里的额得墨克 (Отмек)一带，即塔拉斯河上游支流所汇处[23]。它把热海作为唐时的素叶水，而素叶城则置于热海之南。《西域记》谓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因而又把千泉置于热海之西四百里的额得墨克一带，其谬误已属显而易见，不足置辩。圣马丁(St. Martin)注释玉连(Stanislas Julian)的《西域记》译本，主张在哈喇库尔(Karakul)之南，距锡尔河下游不远，有地名 Ming-bulak，蒙古语和其他东方语义为千泉，即玄奘所经之地[24]。如果照这种说法，势必把呾逻私城置于哈喇库尔与锡尔河之间，那么，由素叶城西至千泉，不是四百余里，而是一千四百里了，显然与

《西域记》所说不符，白莱脱胥乃窦已力辨其非。现在已没有那个还沿用圣马丁的说法。

多数学者都主张玄奘所经的千泉，应从阿历山大山（Alexandrian Mts.）北麓，托克马克与奥利-阿塔(Aulie-Ata)之间的大道上去找寻，但对于具体的地点问题，意见仍不一致。丁谦谓当在今俄属库穆阿雷克，此名已不见于今代苏联地图，但据丁氏依西距呾逻私城（奥利-阿塔）百四五十里处测得之，则其地约当今代苏联地图的阿该尔托布（Акыртобе）[25]。冯承钧《西域地名》只说在素叶城与呾逻私城之间，而不说明具体地点。比尔说，如果塔拉斯河上的奥利-阿塔即呾逻私城，那么，玄奘的路线必当越过哈喇噶梯(Karagati)河源(楚河支流)和雅尔苏（Jar-su）河源（塔拉斯河支流），这里就是千泉的位置[26]。白莱脱胥乃窦说玄奘所过的千泉，应从阿历山大山北麓去找寻，也未指出它的具体地点[27]。瓦特斯引徐楼(Schuyler)所著《土耳其斯坦》(Turkestan)一书说，在他旅行中央亚西亚时，曾找到一个地区名千泉，在阿克苏与奥利-阿塔之间的阿历山大山之北，右边是美丽的阿历山大山，峰顶白雪为盖，几乎每一步都要跨过山溪，与古名“千泉”的意义正合[28]。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和木村日纪都把千泉置于美尔克（Merke）[29]。考美尔克西距奥利-阿塔约150公里，约合380古汉里强，与玄奘所谓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的里数不符，未可置信。上述其余各家说法都相差不远，也就是说，玄奘所过的千泉，应位于呾逻私城(奥利-阿塔)以东约百四五十里的地方，相当于今代苏联地图阿该尔托布与泼得果尔诺(Подгорное)之间及其附近地区，这一地区不仅见于徐楼的记载，并且可以从兰斯得尔的纪行中得到证明。他说：从奥利-阿塔东行，第四个站抵摩尔达巴耶夫斯克（Maldabaevskaia），第五站为阿该尔托布，过此即抵明布拉克(Ming-bulak)或“千源”(Thousand sources)亦即中世纪旅行家所

称的"千泉"(Thousand springs)[30]。按十九世纪末叶以前，这一带地区从阿历山大山流下来的泉源必极丰富，否则就不可能汇成雅尔苏河，此河下游入于塔拉斯河，后来大概因为水源缺少或北边沙漠南移，把它掩埋而消失了，所以今代苏联地图的塔拉斯河已经没有雅尔苏河这条支流。但我们还可以从赛克斯兄妹（Miss Ena Sykes 和 Percy Sykes）合著的《通过中央亚西亚的沙漠和绿洲》（"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附作者路程地图中看出来。这条支流从哈喇噶梯河上游附近的雅尔苏（Jar-su）起，向西流经乌什-哈楼尔（Ush-Kalur）和乌松—布拉克（Uzun-bulak）三个地区，然后转向西北，而入于塔拉斯河。今代苏联地图的阿克—楚拉克(Ак-цулак)大约相当于赛图的乌松—布拉克，阿该尔托布相当于乌什-哈楼尔，泼得果尔诺相当于雅尔苏。从阿该尔托布与泼得果尔诺之间（千泉）东行至哈喇波尔第（Кара-балты)与哈林宁斯克(Калининское)之间（素叶城），计程约 160 公里，适符《西域记》所谓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的里数。

四、白水城

《西域记》又云："(呾逻私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逾胜呾逻私。"按白水城，《新唐书》亦称白水胡城[31]。学者对白水城的位置问题，迄有三说：(1)白水城相当于今代地图奥利-阿塔西南方的曼肯特城(Menkent)，主是说者有丁谦、瓦特斯等[32]。(2)白水城即阿剌伯地理家所称的"伊斯非得甲布"(Isfidjab)或"埃斯非得甲布"(Esfidjab)，义为白水，而伊斯非得甲布相当于今代地图的赛蓝(Sairam)，主是说者有列尔施(P. Lerch)、圣马丁、布莱脱胥乃窦、巴尔托(V. V. Barthold)、张星烺等[33]。(3)白水城在今代齐木干特(Tchimkent)或其附近，主是说者有沙畹、伊濑仙太郎等[34]。以上

三说所定的地点虽有不同，但相距不远，都在阿利斯(Aris)河以南，巴达木(Badam)河以北的区域之内。但我认为三说都不能解决从呾逻私城至白水城的里程问题。按之今代苏联地图，从奥利-阿塔(图称江布 Джамьул)，至曼肯特、或齐木干特、或赛蓝，无论是沿着汽车路线，抑或是铁路线，都必须行 150 公里以上，约合 380 古汉里强，与《西域记》所谓从呾逻私城至小孤城十余里，又从小孤城至白水城二百余里的里数不符。这条路线，自古以来，屡经变易，观于元明两代中国旅行家赴阿姆河流域，必经赛蓝城，但今代地图的赛蓝已不在大道上，而是孤立在大道的东南方，这就足以说明元明以后的路线已经变易。这条路线在唐代当更靠近塔拉斯山(阿克苏山)和柯尔禅台山(Хр. Коржантау)的西麓。唐代的白水城，不是在阿克苏(Аксу)河下游的曼肯特，或赛蓝河下游的赛蓝，或巴达木河下游的齐木干特，而是位于阿克苏河的上游，约当今代苏联地图的马丹尼(Мадани)或其附近。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定玄奘所取的路线是：江布（呾逻私）——小江布（小孤城）——加拉圭车夫卡（Головачевка）——布尔诺-奥克车雅布尔斯克(Бурно-Октябрское)——布尔诺（Бурное)——那圭尼柯拉耶夫卡(Новони-Колаевка)——拉耶夫卡（Раевка)——马丹尼（白水城）。这条路线约长 120 公里，约合 300 古汉里强，除去呾逻私至小孤城的十余里，约合 280 古汉里强，正与《西域记》所谓从小孤城西南行二百余里至白水城的里数相符。

为什么我说这一条路线应更靠近塔拉斯山和柯尔禅台山的西麓呢？除了上述里程上的理由之外，因为从呾逻私经白水城、赭时，以至俱战提(霍占)，在隋及唐初为以萨马尔干(Samarkand)为中心的昭武诸族抵御西突厥族的防线，至八世纪时，又变为阿剌伯回教徒抵御西突厥族的防线，故土人多依山筑垒，以资自卫。试阅今代地图，还可以看出许多城镇都在这一带的山麓，而在今代大道

上的平原地带，城镇反而较少，就是这个原故。这些城镇之间，在那时当有一条商队的通路联贯起来，否则，每至一城镇，必迂回于今代大道的平原地带与山麓之间数十里，这是不合乎情理的。或谓今代苏联地图曼肯特城西北约二公里处尚有地名白水（Белые Воды），应有其来历，或即唐代白水城的遗址。我认为考定古代地理，仅凭今代的同名地点是不大可靠的，例如今代苏联地图塔拉斯河上游南岸有地名塔拉斯（Талacc），我们不能就认为是唐代呾逻私城的遗址，因为根据前人记述，素（碎）叶城和千泉都应在阿历山大山以北，而呾逻私城则在此两地之西，从方位和里程核之，都与前人的记述不符。

五、笯赤建国

《西域记》又云："（白水城）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树林蓊郁。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国。笯赤建国周千余里，地沃壤，备稼穑，草木郁茂，花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贵也。城邑百数，各别君长，进止往来，不相禀命，虽则画野区分，总称笯赤建国。从此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这一段行程中最难解决的是恭御城和笯赤建国的位置问题。恭御不过是一个小城，而笯赤建则是一个周千余里的国家，它的规模与赭时国相等。如果能确定笯赤建国的位置，恭御城也就容易解决了。

中外学者对于笯赤建国的位置问题，不特主张不一，而且含糊其词，丁谦《西域记考证》云："笯赤建国即《西游记》赛蓝，《西使记》作赛蓝，《中亚游记》作车木干，地图琛姆罕特城东有赛喇穆城，即此。"王国维亦同此说[35]。丁氏曾考定白水城即今曼肯特城。按赛蓝在曼肯特之南约十余公里，那么，白水城距笯赤建国只有四五十古汉里，这与《西域记》所谓白水城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及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国的里程相差太远。丁氏既不说明他的

根据，且擅改南行至笯赤建国为西南行，谬误尤甚，殊不足取。比尔据圣马丁的说法谓爱得利斯(Edrisi)称笯赤建为 Nejkath，如果考定奥利-阿塔相当于古代的呾逻私城，则笯赤建的方位应从塔什干东面的察特卡尔(Chatkal) 河流域求之㊱。按白水城至察特卡尔河流域的方向是东南，与《西域记》的西南向不符，且必须越过哈尔禅台(Каржантау)、乌迦木(Угам)和蒲斯坎木(Пскем)几重山岭，玄奘要到西南方的赭时国，又何必绕道东南，翻山越岭，然后再回头西向，才到赭时国？或谓玄奘从呾逻私至赭时国不是取道曼肯特、齐木干特或赛蓝那一条路线，而是沿着塔拉斯河支流哈喇布拉(Karabura)南行，越过哈喇布拉山隘，再向南行，以达察特卡尔流域。这里确实有一条商队的通路，但玄奘如果行这条路，他所谓白水城将位置于何处？况且这条路始终是南向或东南向，与《西域记》的西南向完全不符，对于这些问题，又将如何解释？比尔只是含糊其词，没有说明。此外，乌迦木河与察特卡尔河之间还有一条商队的通路，就是从奥利-阿塔沿塔拉斯河东南行，过基罗夫斯克(Кировское)转向西南行，抵格罗斯诺(Грозное)，然后向南行，越迈删塔尔(Маисантал)山隘，再沿蒲斯坎木河西南行，以达布梨-姆拉 (Бри-Мулла)。玄奘是否可能走这条路？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这条路从整个方向来看，仍是向南行，与《西域记》的西南向不符，而且也要越过两重山岭。瓦特斯谓笯赤建 (Nu-Chih-Kan)可能读若 Nu-jikend，这个地名，除了玄奘在此处所述之外，知道得很少。据圣马丁说这个地点即美沙力克-阿拉布沙儿 (Mésalek-alabsar) 所述在呾逻斯与霍占 (Khodjend) 之间的 Noudjkeh (Noujkend)，但并未指出它的具体位置。又谓 Nujkend 可能是突厥语 Nujabahkend，义为贵族的领地 (The territary of the nobles)，此义似符合玄奘所述的情况㊲。按瓦特斯这番话并未解决笯赤建国的具体位置问题，至谓此名来自突厥语的 Nujaba-

hkend，亦是一种误解。考 Nujkend 乃突厥语新城之意，据《新唐书》卷 221 下波斯传："新城之国，在石东北赢百里，有笯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城，后为葛逻禄所并。" 笯室羯即 Nuzket (Nudjket 或 Noujkeh)的对音，与 Nujkend 同是新城之义。又同书卷 43 下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道里记》云："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此一新城乃在碎叶至呾逻私的大道上。德·高琪(De Goje) 据阿剌伯地理家伊宾·柯尔达倍 (Ibn Chordādbeh)和库达玛 (Kudāuma) 所记此段行程的各站名称，从碎叶 (Suj-āb)西行至呾逻私(Talas)中途有站名 Nuzkat，当即贾耽所述的新城㊳。这也是笯赤建或笯室羯即新城的一个旁证。

《西域记》谓笯赤建在赭时国(石国)之东，《新唐书》则谓笯室羯或新城在石国之东北，那么，我们不妨假定笯赤建国都城主要在石国之东、而略偏于北。我们知道玄奘所谓笯赤建国即《新唐书》的笯室羯，义为新城，并且知道它是位于石国之东，而略偏于北，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它的具体位置问题。新城在波斯语为 Yangi-shahr，亦称 Yanghi-Kend或 Yanghi-balich，又称 Yangi-bázár，bázá 一词在波斯语本来有市集或市场之义，但有时对有城的地方，也称 bázár，例如今代苏联地图察特卡尔河岸有城曰 Yangi-bázár，即陈诚《西域番国志》所谓赛蓝之东(南) 三百六十里的养夷城，十四世纪上半的美沙力克-阿拉布沙儿则称之为 Yanghi-balich。这本来是波斯人对新建城市的通称，故在楚河与锡尔河之间，以此为名的地方共达五处：(1)费尔干那(Ferghana)之北，赛蓝之东(南)三百六十里的 Yanghi-balich；(2) 公元 1220 年被成吉斯汗所征服的距锡尔河口一日程的 Yanghi-Kend；(3) 赛蓝之南约 40 公里的 Yanghi-bázár；(4)塔什干城之东约 25 公里的 Yanghi-bázár；(5)碎叶城与呾逻私城之间的新城。上列五个地点，究竟那一个是玄奘所到的笯赤建国？关于第一个地点的 Yangi-bázár 或 Yanghi-

balich，位于察特卡尔河岸，玄奘不会翻山越岭，绕道至此，其理由已见上文。关于第二个地点的Yanqhi-kend，距锡尔河口一日程，远离玄奘的路线，不必置论。关于第三个地点的 Yanghi-bázár，距马丹尼（白水城）只有 60 公里，与《西域记》所谓白水城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及从恭御城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国的里程相差太远，亦非笯赤建国的位置。关于第五个地点的新城，位于呾逻私之东，根本就不在白水城至赭时国的路线上。现在只剩下第四个地点，即塔什干城之东约 25 公里的 Yanghi-bázár，如果假定这个地点为玄奘所到的笯赤建国都城，就会发生一个疑问，即此地西距塔什干城只有 25 公里，约合 64 古汉里，而《西域记》则谓笯赤建国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岂不是相差太远？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重新考定唐代赭时国都城的位置，中外学者多数认为唐代赭时国的都城不在今代塔什干城的位置，而在塔什干城之西（稍偏南）约 50 公里处的旧石城（Old Tashkend 或 Shash）[39]。据兰斯得尔的中亚纪行，渡锡尔河后，在辛那斯（Chinaz）停宿一夜，次晨起行，过旧石城（Old Tashkend），沿齐尔齐克（Chilchik）河谷前进，午后方抵塔什干城[40]。足证离辛那斯之东不远，确有古代石国都城的遗址。如果从养吉-巴沙儿（Yanghi-bázár）西行，经过塔什干城转向西南以达旧石城，约共 75 公里，合 190 古汉里强，与《西域记》所谓笯赤建国西行二百余里（《慈恩传》作二百里，《新唐书》作赢百里）相差不远，也可以说基本相符。笯赤建国都城既经考定在今代地图塔什干之东约 25 公里的养吉-巴沙儿，那么，从此地向北约 17 公里（约合 45 古汉里）处，在今代苏联地图齐尔齐克与帕尔塔拉齐克（Полторачкий）之间，即恭御城的所在位置。玄奘从白水城西南行的路线应更靠近柯尔禅台山的西麓，而不是沿着今代地图的大道，其理由已见上文，所以他这一段路程是：马丹尼（Мадани）——兰格尔（Ленгер）——舍梯拜（Шетыбай）——土耳巴特（Турбат）

——齐尔齐克与帕尔塔拉齐克之间（恭御城）——养吉-巴沙儿。全程约共130公里，约合330古汉里强，除去恭御城至笯赤建国的四五十里，尚余280古汉里强，正与《西域记》所谓白水城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的里数相符。为什么玄奘从养吉-巴沙儿起行时不直接向西南行，以达赭时，而必先西行以经今代的塔什干呢？大概因为那时一般商队从恭御至赭时是直接西南行，不必绕道笯赤建，这是一条通常的大道，但玄奘为了更多地考察西域国家，所以先向南行至笯赤建国，再从笯赤建国向西行，然后复归大道，经今代的塔什干，以达赭时。《新唐书·波斯传》所谓"新城之国，在石东北，赢百里，有笯室羯城"，正足为《西域记》此段的注释[41]。

根据以上所论述的各点，从今代苏联地图测定玄奘这一段行程如下：从阿克苏与拜城之间的哈喇玉尔滚（跋禄迦国都城）向西北行约150公里（约合380古汉里），越过阿克苏河西支发源处的粟克托尔山隘（凌山），沿着沙雷查斯河谷向北行，再越过哈喇该尔山隘，然后循狄浦河北岸向西行，以达伊斯色克库尔（大清池或热海）的东头，由粟克托尔山隘至此约共行190公里（约合480古汉里强）。玄奘由伊斯色克库尔的东头至西头是取道此湖的北岸，再从此湖的西头出发，向西北行约215公里（约合550古汉里），乃抵哈喇波尔第与哈林宁斯克之间或其附近地区（素叶城）。从此向西行约160公里（约合410古汉里）至阿该尔托布与泼得果尔诺之间（千泉），从千泉向西行约55公里（约合140古汉里强），乃抵奥利一阿塔城（呾逻私城）。从奥利一阿塔南行约7公里（约合18古汉里）至小江布或其附近（小孤城），再向西南行，先循今代地图的大道，过布尔诺后略偏南（整个方向仍向西南）靠近塔拉斯山的西麓，约共行110公里（约合280古汉里强），乃抵阿克苏河上游的马丹尼（白水城）。从马丹尼西南行，仍靠近柯尔禅台山的西麓，约110公里（约合280古汉里强）至齐尔齐克与帕尔塔拉齐克之间（恭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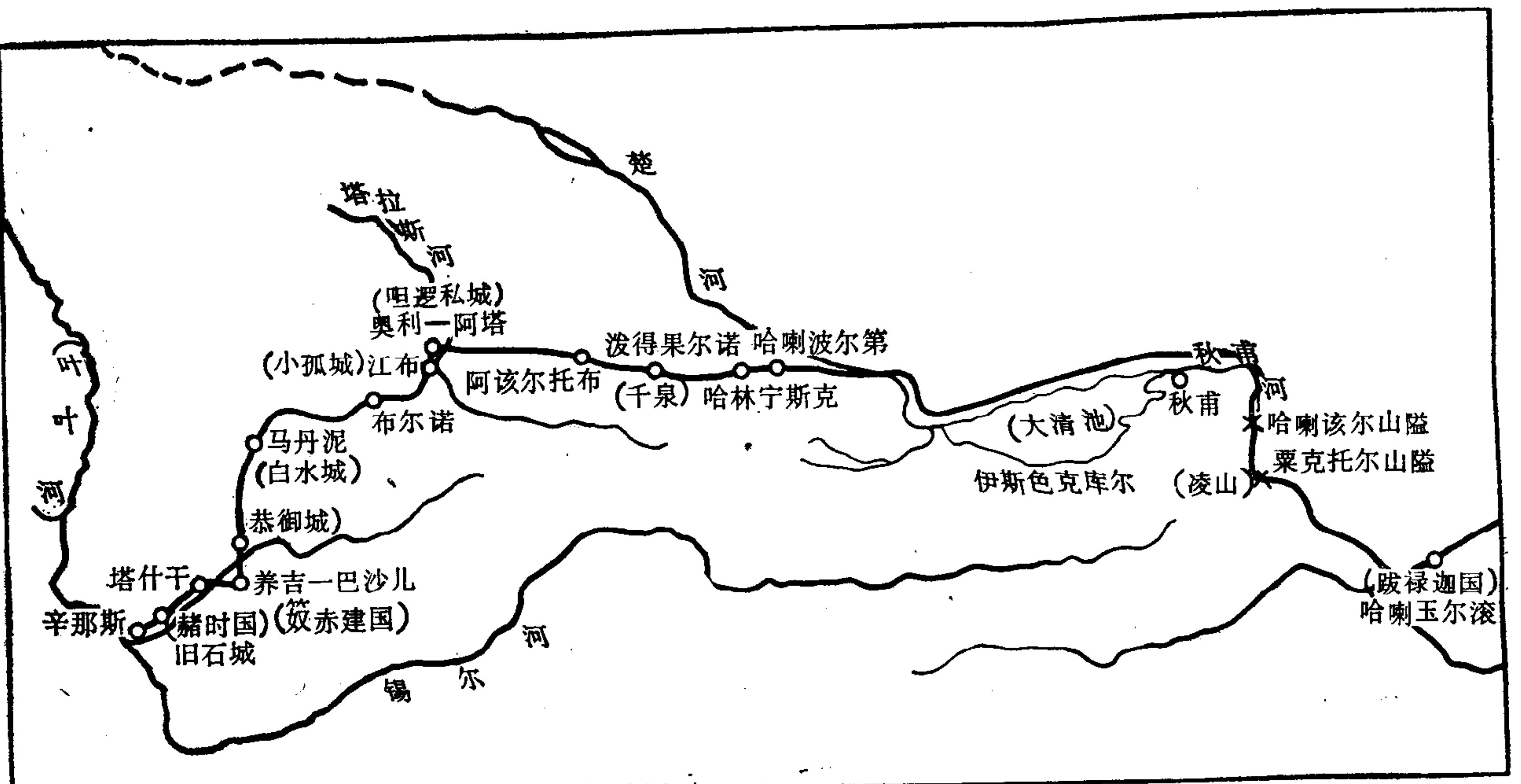


图 5　从跋禄迦国至赭时国的行程图

城），从此南行约 17 公里（约合 45 古汉里），乃抵塔什干城东边的养吉一巴沙儿（笯赤建国都城）。从养吉一巴沙儿向西行（过今代的塔什干后转向西南）约 75 公里（约合 190 古汉里强）至旧石城（赭时国都城）。这段路程的考定，在基本上既符合《西域记》所载从跋禄迦国至赭时国各个城站之间的方向，也符合各个城站之间的里程。

①清徐松撰《西域水道记》卷二罗布淖尔所受水下东渭干河条凌山注。（据清刻本）

②《西域记》卷十二活国条："葱岭者，据瞻部州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地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据 1957 年金陵刻经处校刻《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本）

③丁谦撰《西域记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Samuel Beal: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 Kegan Paul, Bk. 1, p. 25 note 76—77。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Lond., Kegan Paul, vol. 1, p. 227 note 538。

④Richthofen: China, Bk. 1, Tafel 9（见下列白鸟库吉著作转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1958 年北京中华书局版，第 11—12 页。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940 年长沙，商务印书馆版第 12—13 页。

冯承钧编：《西域地名》，1955 年北京中华书局版第 20 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北京辅仁大学版第五册第 105—106 页。

⑤《西域水道记》卷二罗布淖尔所受水东渭干河条叙述阿克苏城北木素尔岭的险峻形势最详，但他同时引杜环《经行记》所说拔达岭情况和《西域记》所说凌山情况，以木素尔岭形势论证玄奘和杜环之言为不虚，足见徐氏主张玄奘和杜环都是取道木素尔岭，也就是说拔达岭和木素尔岭为同地异名。李光庭撰《汉西域图考》卷一图说乌孙国条谓《唐书·地理志》所记拔达岭即木素尔岭，亦即《西域记》的凌山。

⑥同上书同条注："乾隆二十五年十月舒赫德奏言：臣等于九月二十五日致祭木素尔岭，臣察堪木素尔岭形势，由山阳之阿尔巴特阿璘入口，两面俱是

高峰，中汇大河，由山崖行百八十里，至塔木噶塔什军台，即山岭之足。初入岭口，绕行冰石相杂之地二十里，一山横亘，尽属坚冰，臣即将派出修道路回人一百二十户，内每日派二十人更番槌凿。过此地复冰石相杂，约六七十里至噶克察哈尔海军台，山阴积雪，柴薪甚乏”。

⑦Henry Lansdell: Chinese Central Asia: a ride to little Tibet, Lond., Sampson low; 1893. vol. 1, p. 262—299。据兰斯得尔说："木素尔巴什(Muzart Bash)义为“坟头”(head of the tomb)，从前有一个僧徒死于冰雪之中，路人过此，必致崇敬。一间方形砖筑碉堡，高踞冰崖之上，崖间凿痕累累，以便攀登。给养物资和燃料则从南边最近的塔木噶塔什(Tamgha-Tash)站用绳索拉上去，往阿克苏的商队马匹也用这个方法放下来，所以柯斯田柯(Kostenko)说，商队回程绝不取道于此，正因为把马匹拉上去是极端困难的，到达崖壁顶端，我们都下马，准备攀缘，崖壁几乎是垂直的，怎样才能下去呢？幸而有一个人挟住我的双手，一步一跌地滑下去。从木素尔巴什至塔木噶塔什，一路非常难行，大石不断地从附近的山上和冰河落下，足足用三小时才行了二英里，到达冰河的南端。完全下了冰河和石堆之后，才抵塔木噶塔什。”

⑧关于中国古代里程的计算问题，学者意见极不一致。威廉士(S. W. Williams)谓1英里=2.89古汉里，1公里=1.7957古汉里(Middle Kingdom, vol. 2, p. 83)。高比尔(Gaubil)则谓十二世纪时每一纬度可当388古汉里，也就是说1英里=4.89古汉里(Histoire de L'Astronomie Chinoise, i, 77)，1公里=3.038古汉里。格棱那尔得(Grenard)依照土耳其斯坦地方的实际，以汉时一里换算420公尺，即1公里=2.3809汉里。赫尔曼(Herrmann)以《汉书·西域传》西域诸国的距离，与现时实际里数对比，结里汉代一里约当400公尺，即1公里=2.5汉里。黎希托芬(Richthofen)主张以玄奘的纪行为基础，赤道一度相当于玄奘的250里，则一里约当440公尺，即1公里=2.2727古汉里。(以上见桑原骘藏著杨炼译《张骞西征考》1934年上海商务版第91—94页注83)。玉尔(Yule)据班查明(Benjamin)记君士坦丁城广十八英里，等于90古汉里，因而得出1英里=5唐里，白鸟库吉沿其说。(《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第30页)比尔亦主张1英里=5唐里(Si-yu-ki, Bk. 4, p. 202 note 110)。足立喜六从汉唐古钱的直径，测定汉唐的尺值，更从中国古籍中所记长安与洛阳之间的距离，测定汉代1里=1,368日本曲尺=414.545公尺。唐里分大小两种，大程1里=1,800日本曲尺=545.454公尺。小程1里=1,499.4日本曲尺=454.363公尺。依此计算，1公里=唐大程1.8333里=唐小程2.2008里。(足立喜六著吴晗译《汉唐之尺度及里程考》见《人文月刊》第5卷6、7期)桑原骘藏根据中国古籍和回教作家所

记关于 Khodjend(俱战提)与 Balkh(缚喝)之间的里程，测定《史记》所谓大宛大夏相距二千余里，实得 750 俄里，合 500 英里，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不论汉唐)十里相当于今代二英里半弱。(《张骞西征考》第 31,90—94 页)我认为这一比算，最符合玄奘所记西域诸国的里程。玄奘谓自清池(热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从此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奥利—阿塔)，据此，则素叶城适处于清池与呾逻私之间的中点。试从今代苏联地图实测清池至呾逻私全程约共 430 公里，其中点约在 215 公里处。玄奘由素叶城西行至呾逻私共计约五百余里，证之《新唐书》卷 221 上龟兹传所载素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西赢百里至呾逻私城，则玄奘此段行程可假定为 550 里，用 215 公里除之，即得 1 公里 = 2.558 古汉里。1 英里 = 4.116 古汉里。这与桑原骘藏所谓十华里约合二英里半弱，一英里约合四华里强之说合。以前我在《唐代西域裴罗将军城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1 年第 4 期)一文中曾说一公里约合 2.4 古汉里，此数仍未恰当，应改正为 2.558 古汉里。

⑨《通典》卷 193 引杜环《经行记》云："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敦达岭。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厥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其水岭南流者，尽过中国而归东海，岭北流者，尽经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数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日雪海。中有细道，道旁往往有水孔，嵌空万仞，转转堕者莫知所在。敦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兹地寒而不冻，故曰热海。"《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道里记》云："安西西出柘厥关……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旁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

⑩1889 年俄人皮夫楚夫(М. В. Певцов)率领探险队从热海南岸越过巴尔斯昆(Барскоўн)岭，山谷全被厚雪所封，先遣十人带十只骆驼在前面开路，非常艰苦，五小时还行不到二俄里。通过阿拉比尔(Арабел)河谷，遇着几个结了冰的湖，当即所谓雪海。过了许多山岭和谷地，才抵柯克沙尔(Кокщал)山麓，从这里越过拔达岭。(Путещест-вие В Кашгариюи Кун-Пунь，1949 年，M. ct. 41—47)

⑪《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第 12—13 页。

⑫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1941,

Reprinted in Peking, vol. 1, p. 67。

⑬《西域图志》卷21山二,天山正干萨瓦布齐鄂拉条。(据石印本)

⑭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68。

⑮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Гнститут Географий: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1958, изд. АК. 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ст. 554。

⑯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69。

⑰《西突厥史料》第12页。

⑱同上第13、133页。

⑲周连宽:《唐代西域裴罗将军城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4期。

⑳唐释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宋碛砂藏经本第439册。按一般来说,《释迦方志》的记述比《慈恩传》为可靠,但并不是说《慈恩传》的记述都不可靠,必须承认《慈恩传》有许多材料足补《西域记》和《方志》之缺。

㉑唐释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卷二:"自此(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屏聿,此曰千泉,地方数百里,既多池沼,又丰奇木,森沈凉润,即可汗避暑之处也"。(据1957年金陵刻经处校刻《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本)

㉒岑仲勉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第8页。

㉓《西域图志》卷十三疆域六天山北路三额得墨克条:"案今图斯库勒为碎叶川,即素叶水,额得墨克居其西,应属唐时五弩失毕部也,突厥传所谓五俟斤,居碎西者也。又自图斯库勒至塔拉斯郭勒约四百里,与《唐书》素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之说合。额得墨克一带,即塔拉斯郭勒上游支流所汇处,南倚额得墨克达巴、乌可克达巴,正所谓突厥可汗避暑处,南雪山而多泉池者"。

㉔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1, p. 228, note 583。

㉕丁谦:《西域记考证》又谓自素叶至千泉,断不止四百余里,当作千四百余里。这个错误是由于丁氏把素叶城置于楚河上游靠近热海西头之故。

㉖Si-yu-ki, Bk. 1, p. 29, [BKI] note 93。

㉗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1, p. 228, note 583。

㉘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72—74。

㉙伊濑仙太郎著《西域经营史の研究》,昭和30年,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第171、207页。木村日纪、小林元、松田寿男合编《中央亚西亚史、印度史》,昭和15年,东京,平凡社。附新旧中央亚西亚要图。

㉚Chinese Central Asia, p. 104—105。

㉛《新唐书》卷225下《西突厥传》:"咄陆败,袭取白水胡城以居。"

㉜《西域记考证》："白水城在其（呾逻私城）西南，今为曼肯特城，城滨阿克苏，阿克苏译言白水也。"瓦特斯云："我们最好是在今代曼肯特（Mankent）找寻唐代白水城的位置。"（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84）

㉝Si-yu-ki Bk. 1, p. 28—29,〔BKI〕note 92—93。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2, p. 94。V. V. 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from the Russian by v. aud T. Minorsky。Leiden, Brill, 1962. vol. 111, p. 7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5册，108页。《西域地名》原版 Isfidjab 条谓新旧《唐书》白水城，《新唐书》一作白水胡城，《慈恩传》白水城在呾逻私（Talas）西南二百里，并未说明相当于今代何地，但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时，编者加上"今 Sairam"一句。

㉞《西突厥史料》第140页。《西域经营史の研究》第193页。

㉟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 1926年，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第48页。

㊱Si-yu-ki, Bk. 1, p. 29,〔BKI〕note 94.

㊲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85.

㊳《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第9—12页。

㊴藤田丰八著《东西交涉史の研究》，附西域地图其二中央亚西亚，昭和八年，东京，冈书院。

㊵Chinese Central Asia, vol. 1, p. 94。

㊶苏联考古学家曾在塔什干与 Chilchik 或 Yangi-bázár 之间的 Binkath 地方发现一座古城，认为是赭时国的都城。（Беленичкий 等《中古中亚城市》列宁格勒 1973年第195—198页）我对此颇为怀疑，因为如果把赭时国的都城位于 Binkath，据《西域记》赭时国东去笯赤建国二百余里，那么，非把笯赤建国置于 Binkath 以西二百余里 Chilchik 和Angren 两河上源的 Chatkal 山区不可，但这与《西域记》有关笯赤建国的方位不符。

素叶水城考

《西域记》卷一跋禄迦国条云:“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葡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素叶以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素叶水城,《慈恩传》作素叶城,《新唐书》作碎叶城,素叶、碎叶都是 Sujab 的音译①,因城北有素叶水,故玄奘以素叶水城称之。关于此城的方位,上文已有说明,但此城在唐代为西域一重镇,唐王朝为了控制热海以西诸国,特遣将镇守,成为西域都护所辖四镇之一。西突厥可汗自称雄西域,亦即以其地为设牙之所,故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新唐书·西突厥传》谓统叶护勇而有谋,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但据《慈恩传》云:“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既与相见,可汗欢喜云: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令达官答摩支引送至衙安置。三日可汗方归,引法师入,可汗居一大帐”。又云:“自此西行四百余里至屏聿,此曰千泉,地方数百里,既多池沼,又丰奇木,森沉凉润,即可汗避暑之处也。”从此项记载,我们可以确知西突厥叶护可汗的牙帐设在素叶城,而千泉则仅为可汗避暑之所。新旧《唐书》所谓统叶护移庭于千泉,似不足据。至贺鲁叛唐,统有西域,始移庭于千泉,据《旧唐书·西突厥传》:“永徽二年与其子咥运率众西遁,据咄陆可汗之地,统有西域诸郡,建牙于双河及千泉。”又《册府元龟》卷九六四谓永徽六年遣元礼臣往西突厥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至碎叶城西,贺鲁兵拒之,不得前。足证

贺鲁的牙帐不在碎叶。

《新唐书·康国传》云:“有碎叶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达岭,南抵中国,北突骑施南鄙也。西南直葱岭赢二千里,水南流者经中国入于海,北流者经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繇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细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川长千里,有异姓突厥兵数万,耕者皆擐甲,相掠为奴婢。西属怛逻斯城,石常分兵镇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讫九月未尝雨,人以雪水溉田。”这段记述,有些意义不易明瞭,要加以分析:由“有碎叶者”至“春夏常雨雪”,是记勃达岭的四至及其附近形势;所谓“南抵中国”,是指勃达岭之南与中国境接;“北突骑施南鄙也”,是指该岭之北即突骑施部的南界;“西南直葱岭赢二千里”是指该岭西南至葱岭二千多里;“水南流者经中国入于海,北流者经胡入于海”,从这两句我们可以看出此处所谓勃达岭,不仅指今图的 Bedal Pass,而是指包括勃达岭以北至彼得罗斯克岭之间诸分水岭而言,那里正当纳林河的发源处,山岭终年积雪,故下文说“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从“繇勃达岭北行赢千里”至“人以雪水溉田”,乃记细(碎)叶川(吹河)流域的地理、气候、城镇和居民生活的情况。其东有热海(Issyk Koul),西有碎叶城,此城为西突厥叶护可汗建庭之所,唐玄宗天宝七载(公元 748 年)为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所摧毁,而碎叶城以西的怛逻斯(Talas)城,当时则为石国兵所占据。这与一百一十多年前玄奘经过此地时的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化。玄奘从跋禄迦国赴吹河流域,不是走勃达岭的路线,上文已有说明。《新唐书·康国传》所载路程,大概是出自贾耽的《四夷道里记》。玄奘以后,走这条路线的人逐渐增多,故有贾耽及《新唐书·康国传》的记载。玄奘过碎叶城时,正当西突厥兴盛时期,西突厥自莫贺咄叶护室点密起,即统有十姓部落,有兵十万,往平西域诸胡国,其辖境东至北

突厥，西至咸海(Aral)，南至疏勒，北至蒙古西北部的大沙漠，吹河流域，已入其势力范围之内。至达头可汗时，其辖境又扩大至于阗、波斯、挹怛(哌哒)三国，射匮可汗且统有玉门关以西的所有诸胡国。但西突厥可汗与诸胡国间只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一般关系，并未对诸国实行具体的统治，至统叶护可汗，不仅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且对各国国王，均授与颉利发的异姓最高官号，并遣吐屯一人监领，督征赋税，实际上已使西域诸胡国悉成为大可汗具体统治的属地。肆叶护虽统驭无略，但他的前期威力并未削弱，既击败莫贺咄俟屈利俟毗可汗，又北征铁勒，败薛延陀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玄奘经碎叶城时所见者，正是肆叶护可汗，而不是统叶护可汗。

唐高祖和太宗因欲先平北突厥，故对西突厥采用羁縻政策，北突厥较近，西突厥较远，远交而近攻，此正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封德彝对高祖所献之计也。及太宗崩，西突厥贺鲁叛，自号沙钵罗可汗。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遣苏定方，萧嗣业等讨击之，败贺鲁于碎叶水，追执贺鲁于石国而献于朝。贺鲁既平，高宗于其境内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龟兹)，这是唐朝势力首次实际控制了中亚地区，而碎叶城又成为唐朝军事的重镇②。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碎叶之列入安西都护所辖四镇之一，当在此时。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死之。同年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苏海政讨龟兹，苏海政杀兴昔亡可汗弥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继往绝可汗步真亦死，十姓部落无主，附于吐蕃，此时唐朝已不能控制碎叶，乃以焉耆补四镇之缺。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陷安西，罢四镇，此时的四镇是龟兹，焉耆、疏勒和于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西突厥复连吐蕃寇安西。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

及别帅李遮以归，行俭立碑碎叶城以纪功，副使兼安西都护王方翼并筑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街郭回互，夷夏纵观。此时复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③。开耀二年(公元682年)以杜怀宝统安西，镇守碎叶，可见此时安西都护驻节碎叶。则天垂拱初(公元684年)十姓为北突厥默啜可汗所侵，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傑、阿史那忠节率众讨吐蕃，乃克复四镇。次年吐蕃与西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俀子共寇武威道，王孝傑败之于冷泉，碎叶镇守史韩思忠又破泥孰没斯城④。自圣历(公元698—700年)以后，五失毕部落归附于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尝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长安中(公元701—704年)乌质勒与诸蕃不和，举兵相持，安西道绝⑤。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以斛瑟罗子怀道为十姓可汗兼濛池都护，未几擢碛西节度使。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乌质勒死，子娑葛立。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娑葛叛，自立为可汗，陷安西，四镇路绝。时碎叶镇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大破之，夺其所侵阿史那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宗楚客与忠节勾通，奏请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使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元振遣子鸿间道奏其状，复以元振为安西大都护，册娑葛为十姓可汗。初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入朝，勒兵攻陷于阗、坎城，遣人间道纳贿于宗楚客，郭元振知其谋，上疏论可汗子孙之不可恃，谓“顷年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兵士饥馁”。可见娑葛与忠节不和，西域动乱，碎叶被围数年，而镇守使仍能固守，虽曰城坚难攻，抑亦周以悌忠贞勇武捍卫西陲之功为不可没也。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十姓部落都擔叛，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击斩之，收碎叶以西帐落三万内属。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焉耆王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开元二

十三年(公元735年)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北庭都护盖嘉运以轻骑袭破突骑施于碎叶城，杀苏禄，威振四陲。同年盖嘉运大破突骑施于贺逻岭，擒其王吐火仙。此时碎叶城应仍为唐将所镇守。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立阿史那怀道之子昕为十姓可汗，遣兵送之。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昕至碎叶西南俱兰城，为突骑施可汗莫贺咄达干所杀。天宝二年夫蒙灵詧为四镇节度使，讨莫贺咄达干，斩之。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碎叶城壁被摧毁，邑居零落，杜环《经行记》言，昔交河公主(昕妻李氏)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执突骑施可汗及石国王。同年高仙芝与大食人战于怛逻斯城，败绩。以上略述与碎叶城有关的史实，充分说明了碎叶城在西域的重要地位，唐朝据有碎叶，即可屏障安西，以控西域，反之，西突厥据有碎叶，即可威胁北庭和安西。

①或作Sui Ye、Su Ye，见 E. Bretschneider: Mediaevel Researches, vol. 1, p. 227—228 note 583。

②《旧唐书》谓太宗破龟兹，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岑仲勉认为碎叶应为焉耆之误，因那时唐代势力未达碎叶，是也。(见《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29页)

③《册府元龟》卷九六七。

④此时之四镇，《旧唐书·王孝傑传》作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但《唐会要》卷七三苏氏记则天长寿二年所复四镇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

⑤《新唐书·西突厥传》：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

窣利考

玄奘在记述素叶水城之后，特别用一段文字来概述有关窣利的问题："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綵络頟。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按窣利一名，出自梵语 Surika，《梵语杂名》作苏哩，《大智度论四无畏义》第二十五作修利，《南海寄归内法传》及《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速利。可能也是突厥语的 Suliq，义为"有水"。但许多学者认为窣利一名乃来源于希腊人所称的 Sogdiana，阿刺伯人所称的 Soghol，波斯人所称的 Sughdha，Suguda，Sugda、Sugudal，亦即我国《后汉书·西域传》及《晋书·西戎传》的粟弋，《魏略》的属繇，《魏书·西域传》及《周书·异域传》的粟特①。大食人阿不都剌米撒儿（Abu Dulaf Misár Binal-Mahalhil）的《行记》则称锡尔河与阿姆河间的 Sogdiána 地区为 Ma-warán-nahr。根据玄奘的记述，窣利一名，乃代表一个地区，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民族以及这种民族的文字语言。在地区方面，他明白指出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的整个范围。羯霜那即《隋书》和《唐书》的史国。《唐书·康国传》云："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南四百里吐火罗也。有铁门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铁，为关以限二国。"羯霜那国南与吐火罗接，两国之间，以铁门为界，可见窣利的

整个地域是北面自素叶水城所在的吹河流域起，向南直至史国的铁门关止。自铁门以南，北迄阿姆河的一带地区，包括拘谜陀、呵咄罗、愉漫、赤鄂衍那、鞠和衍那等国，玄奘悉列入所谓覩货逻二十七国之中，故此地区，不入窣利范围。

但玄奘的窣利，从地域来说，又不完全等于希腊人所称的Sogdiana，药杀水（锡尔河）自古以来，即成为Sogdiana的北界，对于这一点又如何理解呢？在汉代，药杀水以北直至吉尔吉斯（Kirghiz）旷野，为康居国的境域，康居民族，据白鸟库吉的考证，是属于游牧的突厥种，与Sogdiana地区的城廓居民属伊兰种不同。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说，即康居人自南下统治了Sogdiana以后，逐渐与该地的土人同化，转为定居生活，故在玄奘时代，锡尔河以北的居民亦被称为窣利人了。在民族方面，Sogdiana地区诸国的王族均以昭武为姓，据《隋书·康国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姓温氏，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又《新唐书·康国传》："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在今甘州西北），为突厥（应作匈奴）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隋时有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二书关于昭武九姓诸国名，互有出入，经白鸟氏考证，应以《隋书》所载为准，即米、史、曹、何、安、那色波、乌那曷，穆及康国。《新唐书》之石国、火寻、戊地三国，均为误收。九国中之穆和乌那曷，至唐代为安国所并，那色波则隶属于史

国，实际上失去独立，于是昭武九姓国家一减而为六国了②。白鸟氏这种考定是正确的，但他完全否定了二书所云康国王为月氏人及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两点，则未免主观。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月氏人西迁后曾否统辖过 Sogdiana 地区，据《史记·大宛传》大月氏条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观此传，一若月氏所征服者，只有妫水南之大夏，其北之康居，似未受其影响。但同传康居条云："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所谓羁事，可理解为服属。可见康居在《史记》时代，只是一个小国，已服属于其南边的大月氏。月氏要渡妫水向南征服大夏，有必要先消除其北边的威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月氏在征服大夏之前。已先征服 Sogdiana 诸国。或谓既然如此，何以同传说大宛为张骞发驿，先抵康居，然后传致大月氏？这是因为《史记》时代康居只是一个小国，其辖境限于锡尔河以北，其王庭位于土耳其斯坦(Turkestan)至齐木干(Chimkend)一带，张骞从大宛都城 Kāsan 出发，以赴妫水北之大月氏王庭，有必要先经康居南境的赭时(Tashkend)。我同意羽溪了谛的主张，即《史记》时代康居尚未占领 Sogdiana 地区，至《汉书》时代，康居国势逐渐强大，才夺取该地③。此外，《史记》载大月氏有控弦者一二十万，若依康居有胜兵十二万，人口六十万，大宛有胜兵六万，人口三十万，乌孙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口六十三万，加以推算，则大月氏当时的人口不下三四十万，如此庞大的部落，仅赖妫水与铁门之间一带为游牧之地，实难维持其生活。这一点亦可以作为上述理由的补充。以上的说法如果不误，则隋唐二书所说康国王原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乃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本，很有可能，而不会像白鸟氏

所说是"全无佐证的空中楼阁之谈"。"昭武"二字纯是中国名称。昭者，显也，武指武功或武德，昭武，谓显示武功或武德也。唐置昭武校尉，元明有昭武大将军，清有昭武都尉。汉昭武县故城在今张掖县西北。西方学者把"昭武"一名比拟为 Siyāwūš（古伊兰民族间传说的勇士之名）、Javugasa（见于大月氏王货币上的刻文）、Schâba 或 Jabgu（突厥叶护）等等，都是附会之谈。按《突厥阙特勒碑文》有"alty Čub Sogdyq tapa Sūlädiniz"一句，其中"alty Čub Sogdyq"三字，可释为"六姓昭武的 Sogdyq"④。如果"昭武"是突厥的 Jabgu，为什么碑文不用 Jabgu，而必用 Čub？显然是因为 Čub 不等于 Jabgu，而是来自中国名称的"昭武"一名之故。这与隋唐二书关于康国王以昭武为姓的记载，并无矛盾。

或曰：大月氏既然在征服大夏之前，已统治了 Sogdiana 诸国，即昭武九姓诸国，何以《汉书・西域传》又载康居五小王，《新唐书》且考定其中苏薤王治苏薤城，为史国，阿剌伯人称 Kess（即今 Sahri-i-sabz）；附墨王治附墨城，为何国，阿剌伯人称屈霜你迦（Kušaniya，位于 Samarkand 之西）；罽王治罽城，为安国（即今 Bokhara）？这一问题，据白鸟氏的考证，《新唐书》此种考定，乃出于杜撰，不可置信。康居五小王的领域，应求之于锡尔河以北的康居本土⑤，而不是在 Sogdiana 的范围内。Sogdiana 的土著居民是属于伊兰种族，已为学者所公认，但玄奘时代此地的居民已不是纯粹的伊兰种，因历经外族的入侵，混杂了蒙古种和突厥种的因素。随着时代的迁移，其混杂程度愈加显著。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记述布哈尔（Bokhara）的民族时说，居民是由种种不同的种族构成的，主要的种族是伊兰族的塔吉克人，学者和僧侣属于这族人，乌兹别克和察合台土耳其人，都是蒙古种，沙尔特（Sarts）是一个混合种族，大多数是土著居民。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东方民族：波斯人、阿富汗人、吉尔吉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犹太人⑥。萨马尔罕

的居民成分大概也差不多，从整个 Sogdiana 地区来说，主要民族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苏联考古学家在花剌子模的古坟里发现一些古代人类头骨，并拿这些头骨与中亚 Sogdiana 地区的古代人类头骨相比较，证明它们是相类似的，被称为中亚河间人种类型(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Тип Среднеаzиагского Между Кечья)它们是欧洲人种，属于中亚河间型，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共同祖先。但长期以来，河间地区古代欧洲人种的居民，与蒙古人和突厥人相混杂，以致欧洲人种的特征逐渐减弱，尤其表现在现代乌兹别克人的头骨上⑦。

在文学语言方面，玄奘说："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关于窣利人的文字语言，只有这样的简单记述，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一种语言，没有其他史料，足以说明。直至本世纪初，西方学者在我国西北部发现了用五种完全不认识的文字写成的文书，这五种文字，冯承钧曾称之为月支语、龟兹语、康居语、安息语和于阗语。其中一种是属于伊兰系的，被称为康居语或窣利语⑧。窣利语从发见的地区分布来看，是广泛地沿着西域交通路线而使用的。后来经过研究，才认识文书中所记的月名，与十一世纪学者俾鲁尼(Al-biruni)的著作中所用窣利语的月名相一致，遂决定其为窣利语⑨。窣利语字母，即佛徒所用的字母，亦即黑城子(Qara Balgassoun)《九姓回鹘可汗碑》撰人所用的字母，完全属于闪(Sémiliquos)文系统，其地位介于回鹘字及闪文书法之间，而回鹘字乃是一种采用窣利字的字体⑩。窣利字母的古代文书，也发现于怛逻斯(Talas)河流域，其地点位于 Auliya-ata 之南⑪。1932 年苏联考古学家在塔吉克共和国萨马尔罕正东约 120 公里的穆格(Mugkala)山发现大批窣利文书，经考定其年代，最早可达公元七世纪中叶⑫。这就从实物证明了玄奘关于窣利地域和文字语言的记录之正确性。

①«西域地名»（增订本）Surika 条。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I, p. 71—72。«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 459 页。

②«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 456—457 页。

③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 174—177 页。

④«塞外史地论文译丛»424—427 页。

⑤同上, 409—413 页。

⑥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 上海开明书店, 民 37 年 4 版 85 页。

⑦Н. Г. Залкинд: Кран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uалы С Террuтории Древнего Хорезм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Этнотрафические Рабоы Хорязмокой Экспедичии 1945—1948, СТр. 197。

⑧冯承钧著«中亚新发现的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 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1957 年北京中华版 158—161 页。

⑨羽田亨著张宏英译«中央亚细亚的文化», 民 30 年上海商务版, 61—62 页。

⑩Robert Gauthiot 著冯承钧译«窣利语字母之研究», 见«女师大学术季刊» 1 卷 4 期。

⑪V. V. 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by V. and T. Minorsky, vol. I., Leiden E. J. Brill, 1962。p.8

⑫岩佐精一郎著«唐代粟特城塞之发掘及其出土文书», 见万斯年编译«唐代文献丛考», 1957 年上海商务版 140—151 页。

西突厥时代的赭时国

赭时国,《魏书》和《北史》均作者舌,杜环《经行记》作赭支,《新唐书》作石,或曰柘支,曰柘折,即阿剌伯人所称的 Cač,波斯人所称的 Šaš,今名塔什干(Tashkend)。按《魏书》和《北史》既有者舌国传,又有者至拔国传,白鸟库吉认为两传同指今塔什干,乃系突厥语 Čač-balik 的转译,义为 Čač 城①。这种比拟,颇有问题。他忽略了二书的其他记载,如者舌国去代万五千四百五十里,者至拔国则去代万一千六百二十里,两者相差三千八百三十里。若是同一国家,何以距离代的里数相差如是之多?又于者舌国云:"故康居国,在破洛那西。"于者至拔国则云:"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其东有潘贺那山,出美铁及师子。"记述也有不同,显然不是同一国家。

《西域记》云:"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东西狭,南北长。土宜气序,同笯赤建国。城邑数十,各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记述虽极简略,然玄奘已指出其无总主(国王),而且役属于突厥,这两点很重要。据《隋书·石国传》:"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勒(勤)甸职摄其国事。南去钹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隋书》关于石国的记载,远较以前的史书为详。首先记述石国的所在地

及其都城的规模，以下顺次记石国王的姓名，王座设置的地方，丧祭父母之礼，物产，风俗，为突厥所征服及监管，距钹汗及瓜州的里数，朝贡于隋的情况等等。我们据此才得知该国在玄奘到之前，原来是一个有国王的统一的国家，先已服属于西突厥，其后背叛，为射匮可汗所灭，被灭时其国王当即石涅国，时在隋炀帝大业初（公元 605—608 年）。据《隋书》，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石国朝贡之使，已是突厥官特勤甸职所遣，故西突厥之灭石国应在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以前。

西突厥自室点密可汗创业，统辖十大首领，号十姓部落，有兵十万，往平西域诸国。此可汗在位约当陈文帝天嘉三年至宣帝太建八年（公元 562—576 年）。赭时国在此期间，始服属于西突厥，但仍保持其自己的国王。至达头可汗，其辖境西至雷翥海（咸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北海）。于阗、波斯、悒怛亦曾归附之，此时赭时国自然仍在西突厥统属之下。后来隋助启民可汗合攻达头，文帝仁寿三年（公元 603 年）达头战败，奔吐谷浑，不知所终。炀帝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西突厥共立达头之孙射匮为大可汗②。射匮开拓疆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所役属，建庭于龟兹北之三弥山。射匮之灭石国，早在大业初，其时射匮虽未为大可汗，但据《隋书・西突厥传》："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则射匮当时已为西面之小可汗矣。赭时国自被射匮灭后，即无国王。自大业初以迄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玄奘经过时，赭时国一直为西突厥特勤所统摄，故玄奘谓"城邑数十，各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玄奘过此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赭时的情况仍是这样。

其后西突厥分为二国，咄陆可汗与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互相交战，咄陆遣石国吐屯攻沙钵罗叶护，杀之，并其国。咄陆率弩失毕部战，兵众不从，咄陆走吐火罗。阿史那贺鲁叛唐，取咄陆故地，

苏定方讨之，追至碎叶水，尽夺其众，贺鲁逃入石国苏咄城，城主送至石国，萧嗣业追捕之，西域悉平，时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贺鲁既平，唐遂分其地置诸府州。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新唐书》作三年，公元658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吐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③。唐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大食呼罗珊总督 Kutayba 曾占领石国④。唐玄宗开元初（公元713年），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石国王莫贺咄吐屯参与其役，有功，次年又册为顺义王。天宝初（公元742年）封其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二年（公元743年）石国王特勤遣女婿康国大首领康染颠献物，五年（公元746年）石国王遣使来朝，并献马十五匹，副王伊奈吐屯屈遣使献方物，六年（公元747年）石国王遣使献马，八年（公元749）石国王子远恩来朝，十年（公元750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石国无蕃臣礼，请讨之，国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俘以献，斩阙下，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Talas）城，大败仙芝军，自是石国遂臣服于大食。唐代宗宝应年间（公元762—763年）复遣使朝贡⑤。从上述石国首领的官衔及名字可以看出，此国自公元七世纪初以来，直至八世纪中叶，有时无王，有时有王，但迄未能摆脱西突厥的羁属。

①《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450页。

②《西突厥史料》，237页。

③同上，131页注四。

④F. H. Skrike and E. D. Ross: The Heart of Asia, London, Methuen, 1899 p. 61; E. Bretschneider: Mediá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 2 p. 55—56。

⑤《新唐书·康国传》石国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从赭时国至缚喝国的一段行程

玄奘记述从赭时国至缚喝国之间有许多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得自传闻，而非亲历其境。据«慈恩传»卷二:“国(赭时)西临叶叶河。又西千余里至窣堵利瑟那国,国东临叶叶河,河出葱岭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碛,无水草,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又西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又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国，又西百余里至伐地国，又西五百里至货利习弥伽国,国东临缚刍河。又西南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路深险,才通人步,复无水草,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即突厥之关塞也。出铁门,至覩货罗国。自此数百里渡缚刍河,至活国。……法师从求使人及邬落,欲南进向婆罗门国。设见云:弟子所部有缚喝罗国,北临缚刍河,人谓小王舍城……既至,观其城邑,郊郭显敞,川野腴润,实为圣地。”此传所谓缚喝罗国,即玄奘的缚喝。计慧立所记,只有十一国,而其中也有不是玄奘亲到的。究竟他亲到的国家有哪几个?必须结合路程来研究。

按玄奘从赭时国起行至飒秣建国,曾否向东南绕道至怖捍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据玄奘关于此国的记述，认为他是亲历的,有的则说,玄奘未曾亲到,而是得自传闻。怖捍,杜环«经行记»作拔汗那(Ferghana),汉代称为大宛国,«魏书»和«北史»均作(破)洛那国,«隋书»作钹汗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云:“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时谓破洛那。”瓦特斯举出三个理由,以证玄奘未曾亲历,他说，玄奘谓怖捍在赭时国东南千(余)里，较«新唐书»及其他著作所载里程多一倍;玄奘谓“山周四境”,但据晋法显

所记，西面无山；玄奘谓其国“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竞，不相宾伏，依川据险，画野分都”，但据《新唐书》，贞观中（公元627—649年），其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①。我认为此说比较可取，即《西域记》关于怖捍国的记述，玄奘只是得自传闻，不是亲历。玄奘从旧石城起行，沿 Chilchik 河北岸向西南进，约20公里至今辛那斯(Chinaz)，渡锡尔河，复向南略偏东行约130公里，至窣堵利瑟那国(今乌拉—求伯 Ura-Tube)。从上共计约150公里，若依一公里等于2.558古汉里计算，约合380古汉里强。窣堵利瑟那国即《新唐书·康国传》之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苏都识匿(回教作家称 Satrouchana、Soutrouchnak、Osrouchnah)，北距石国四百里许，与上述里程正合。但《慈恩传》却云：“(赭时国)又西千余里至窣堵利瑟那国。”一方面不言玄奘是否至怖捍国，而一方面又沿用《西域记》怖捍国条所谓“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窣堵利瑟那国”的里程，显然是慧立之误。《慈恩传》云：“又西北入大碛，无水草，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玄奘从乌拉—求伯起行，先向西稍偏北约130公里，经扎明(Zamin)以达季扎克(Jizak)，然后转向西南行，越塔美兰(Tamerlan)关隘，约90公里，乃抵飒秣建国。从乌拉—求伯经季扎克而至萨马尔干(Samarkand)，全程共计约220公里，约合563古汉里弱，与《慈恩传》的五百余里正符。所谓“西北入大碛”，是指锡尔河以西至季扎克的旷野，土人称之为“饥饿之旷野”，缺乏水草，一无居民，并有毒虫，伤害骆驼。玄奘是经过此旷野的东南边缘，故尚能望大山，即土耳其斯坦山脉(Turkistan Range)的西头也。

《西域记》飒秣建国自注云：“唐言康国”，即今萨马尔干。玄奘在记述飒秣建国之后，又提及东南的弭秣贺国(《新唐书》作米国，今 Maghlàn)，萨马尔干之北的劫布呾那国(今 Kebud)，又

西三百余里的屈霜你迦国(«新唐书»作何国，今萨马尔干西北 60 英里的 Peishambe 地方，比尔谓即今萨马尔干与布哈拉(Bokhara)之间的 Kashania)，又西二百余里的喝捍国(«新唐书»作东安，今 Kermineh)，又西四百余里的捕喝国(«新唐书»作安国，今布哈拉)，又西四百余里的伐地国(亦称西安，今阿姆河西岸的 Darganata 附近，马迦特考订为 Wardan 或 Wardana)，其西南五百余里的货利习弥伽国(«新唐书»称火寻或过利，今 Khiva 一带)[②]。«慈恩传»不记弭秣贺和劫布呾那两国。这些国家都是玄奘得自传闻，均非亲历。他直接从萨马尔干起行，向西南进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新唐书»作史国，或曰佉沙，即今沙里一舍布斯(Shahri—Sebz)。玄奘先向西南行约 75 公里，至塔尔祇勒迦 (Tardjilga)，然后转向东南，约行 50 公里，乃抵沙里一舍布斯。«西域记»云："从此(羯霜那国)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溪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慈恩传»记铁门云："峰壁狭峭，而崖石多铁矿，依之为门，扉又镙铁，又铸铁为铃，多悬于上，故以为名，即突厥之关塞也。"玄奘从羯霜那国向南稍偏西行，约 70 公里至古扎尔(Guzar)，然后转向东南，循古扎尔河行，约 35 公里至得干那得(Dehkanad)。又东南行，至铁门关(The Pass of Iron Gate)，印度称之为 Buzgola-khana 或 Goat-house (羊舍)。它的宽度由 40 至 60 英尺，长约 2 英里，关的东头拔海 3,540 英尺，西头拔海 3,740 英尺。有一小溪从中流过，其上有一村落[③]。十五世纪初，克拉维约奉西班牙国王亨利第三之命，出使中亚，往见帖木儿，他记东使行程云："八月二十二日，饭后动身，离开特尔梅兹城(Termez)。星期六(二十四日)穿过平原上的几座热闹的村镇，晚间停于一村中。星期日(二十五日)续行，夜

宿河岸上。星期一（二十六日）越过高峻山岭。……本日所过的山峡，极为狭隘，其窄处，似乎人之两手可能到，而两边巉岩峭直，不可攀援，不过路面尚平坦，岩顶上有一座村落，此处名为铁门，乃东西方往来上必经之咽喉要道，他处并无通路。因之，此处山岭，为萨马尔罕最坚固的屏障。……据居民所传，号称铁门之峡道，昔日确有铁门。当其关闭之时，人马难以飞越。彼时过关之人，皆须事先得到特许，现在铁门已经撤除④。”按克拉维约过铁门关已在玄奘以后七百余年，但其记述，尚可互证，足见玄奘记述之不虚。《慈恩传》云：“出铁门，至覩货罗国。自此数百里渡缚刍河，至活国。”《西域记》则云：“出铁门，至覩货逻国故地。……顺缚刍河北下流至呾蜜国。”下文连叙赤鄂衍那（今阿姆河北支 Surkhan 河上游的 Dehnau）、忽露摩（在今 Kafirnagan 河上流）、愉漫（今 Kafirnagan 河上流 Dushambah 附近）、鞠和衍那（今 Kafirnagan 河下流的 Kabadian）、镬沙（今 Surkhan 河上的 Lawakand）、珂咄罗（在今 Surkhan 河与 Pandj 河之间的 Khottal）、拘谜陀（今 Karategin）、缚伽浪（今 Kunduz 河右岸的 Baghlan）、纥露悉泯健（今阿富汗 Khulm 河上流 Rui 和 Haibak 等城）、忽懔（今阿富汗北部的 Khulm）等十个国家，都不是在玄奘从铁门至活国的通道上，当是得自传闻。有少数国家如鞠和衍那和缚伽浪，玄奘可能经过它们的国境，但没有必要访问其都城。呾蜜国即今特尔梅兹，位于 Surkhan 河注入阿姆河口不远处，为玄奘必经之地。玄奘过铁门后，向东南方续行，至士拉巴得（Shirabad），从得干那得至此，计程约 120 公里，过士拉巴得续行约 60 公里，才抵特尔梅兹。玄奘若从此处渡阿姆河，向西南行约 70 公里，即可达缚喝国（Balkh），但玄奘携有高昌王给其妹婿呾度设的信，必须先至其驻地活国（今 Kunduz），故不在特尔梅兹渡河，仍沿阿姆河北岸，先向东后转东南行约 120 公里，至爱万兹（Aivanj），由此渡阿姆河，向东南行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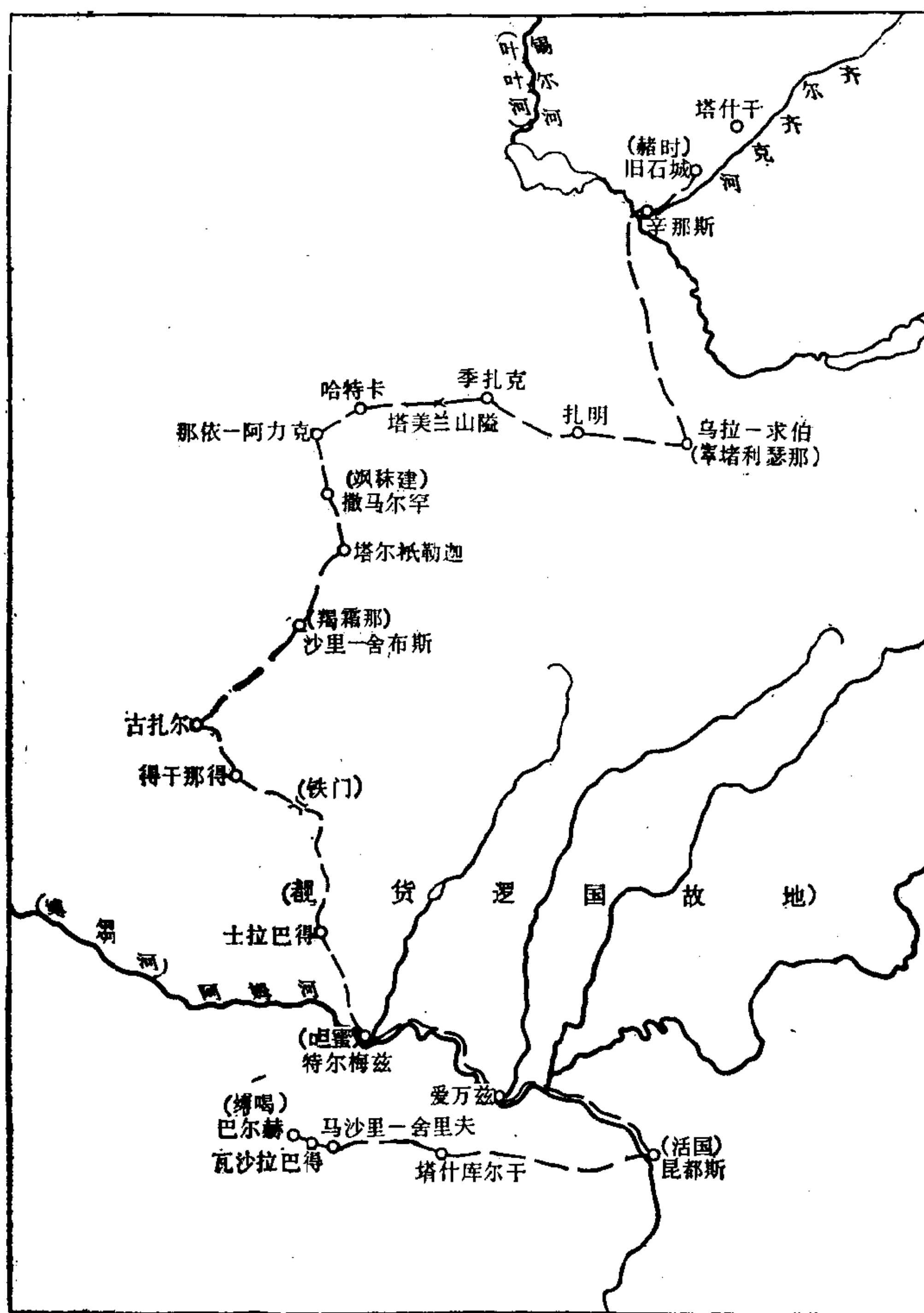


图 6　从赭时国至缚喝国的行程图

75 公里，乃抵活国。高昌公主已死，呾度设再娶新可贺敦，与儿私通，杀呾度设，前儿特勤篡位。玄奘离活国西行，约 180 公里，至缚喝（《慈恩传》作缚喝罗）。此地原为大夏国的都城，西汉文帝时大

月氏西迁后征服之。西汉末，大月氏移其王庭于阿姆河南之监氏城。据《魏书》和《北史》大月氏传，都卢监氏城，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薄罗城即玄奘的缚喝，相当于今之巴尔赫(Balkh)。此国为雪山北著名之佛教圣地，号称小王舍城。玄奘在此瞻拜藏有佛澡罐、佛牙、佛扫帚之纳缚僧伽蓝，伽蓝北之窣堵波，伽蓝西南之精庐，城北五十余里之提谓(Trapusha)城，四十余里之波利(Bhallika)城，以及城西迦叶波佛时所建之窣堵波。

①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89。

②各国名相当于今何地，主要参考《西域地名》(增订本)。

③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101—102。

④克拉维约(Klaviyo)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1947年上海商务版120—121页。

飒秣建国考

《西域记》卷一云:“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伎,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按飒秣建,《新唐书·西域传》称为康国,亦曰萨秣鞬,《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都作悉万斤。这些名称,都是 Samarkand 的音译。Samarkand 在伊兰传说中,曾呼为 Kang,而康国之“康”,即由此字音译而来。但这些名称无论在中国史书,抑或在西方文献中,都容易导致康国与康居两名的混淆不清。《魏书》、《北史》和《隋书》西域传都说:“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旧唐书·西戎传》亦云:“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惟有《新唐书·西域传》康国条云:“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不沿袭前史之说,但却又云:“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则唐人仍相信其国出自康居也。至于在西方文献方面,Avesta 经典中有 Kanha 和 Kang 二名,又据 Barthold 所说,距锡尔河右岸二十公里之处有河名 Angren,其沿岸的 Ak Qurgan 附近有废墟遗址名 Kanga 或 Kanka,至今犹存。Marquart 以为突厥碑文中所载的 Kàngare 民族,在八世纪时住居于咸海沿岸及锡尔河下流流域。今外高加索有民族呼为 Kenger。拉德洛夫则考定康居为属于突厥种的 Kangly,此名

在 Rubruck 氏的纪行文中称为 Cangle，在 Plano de Carpine 氏的纪行文中称为 Cangitae。据 Vambery 之说，Uigur 的 Kang 及 Čagatai 语的 Kan，都义为“广”，但据 Abulghazi 之说，Kankari 之 Kan，义为“车”。Uigur 的 Kang 亦义为“车”。又 Koibal 语称车为 Kanga，Krim 语及 Čagatai 语则称之为 Kangli。白鸟库吉说：“想必此一民族之所以得 Kangli 的名称，一如占据色楞格河(Selenga)流域的铁勒部之称为‘高车’，因其乘坐高轮车之故也。又就 Kangar 的名义而言，Konstaninos Porphyrogenetos 氏以为其义为‘高贵’，为‘强健’，然 Čagatai 语中称‘勇健’为 Kongar，Osman 语中称之为 Kingir，似均与 Kongar 同一语原，故 Porphyrogenetos 氏的解释，决非可以目为杜撰。依据上述的考证，Kangli 与 Kangar，自系别称，未可混同。而况一方面，目前尚有称为 Köngör 或 Kenger 的 Turk 民族存在；而另一方面，在 Nogai Tatar 之间，有 Kangli 民族呢？又 Zarafšan 河流域的 Uzebeg 族之中，亦有同名的部落。由此而言，Kangli 与 Kangar，既绝然有别，不容混同。康居在上述民族之中，究竟相当何种民族呢？康居，就其住域而言，就其音声而言，无论是 Kangar 或 Kangli，均可比较，但 Kangar 一名，自八九世纪起即已出现于西史之中，反之，Kangli 一名，至十三世纪左右始见之于记录。由此而言，汉代的康居，毋宁以之比拟 Kangar，或较为妥善？”①

岑仲勉据 Oppert 及 Spienger 两家之说，谓十二世纪初期，“耶律大石时八拉沙衮之突厥汗为 Kankli（康里）、Kipchák（钦察）、葛逻禄各族所迫，求救于大石，愿让以位。又据 Abul Ghazi-Khan 称，蒙古人称八拉沙衮为‘好八里’（Ghou Baliq，Ghou 即‘好’之谓），其汗懦弱，频频为 Qanqli（康里）人所抢掠。”又谓“迨松田寿男引《唐会要》七二之康曷利以比 Kangli，吾人才知康里之名，唐代业以别一译名出现。”据此，则

知白鸟氏所谓 Kangli 一名，至十三纪左右始见于记录之说，实疏于稽考。但岑氏又说："更有一项历史的原因，未经前人揭发。考康居盛时，粟特地区是其藩属，及东汉末匈奴势衰，率队西奔，所取路径虽不明，经过今之咸海，里海迤北之康居藩内，则似无可疑之事，巨敌猝至，康居不得不迁地以避其锋，一也。漠北匈奴既去，留下空隙，康居自然易被吸引而东来补充，二也。《魏书》一昭成帝什翼犍二十六年(三六三)'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高车即康居，是时游牧外蒙，其东迁尽可上推至三世纪。"[②]按岑氏之意，盖谓西汉时期之康居，与后来之高车原是同一民族，康居在东汉末因被匈奴所迫，东迁至漠北，至四世纪六十年代，北魏讨破之，史书称为高车。北魏末因不堪鲜卑、蠕蠕的打击，乃退回其西北老巢之里海北部，自唐迄元，史书称之为康里。也就是说，高车为康居之后，康里则为高车之后。岑氏此说，亦由于 Kangar、Kang、Kangli 等音读和字义之相类似，而加以附会。康居的发祥地在中亚锡尔河下流流域和咸海沿岸，而高车的发祥地在外蒙鄂尔浑河流域，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至于金、元时代的康里不是元魏时的高车，我在《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一文中[③]，已有所论证，此处不再重述。近年苏联学者把康居与花剌子模等同起来，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后汉书·西域传》云："栗(粟)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晋书·西戎传》康居国条云："与粟弋、伊利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魏书·西域传》和《周书·异域传》则称之为粟特。粟弋和粟特都是 Sughda 的音译，此名最早见于 Avesta 经文中，大流士王 Behistum 铭文作 Sugude，Persepolis 铭文中作 Sugda，Naks-i-Rustam 铭文中作 Sugude，Herodotus 的《历史》作 Soghdo。希腊、罗马作家的 Sogdiana，就是出自 Soghdo，其重要都会为 Samarkand，而希腊人则称之为

Marakanda。它有悠久的历史，亚历山大大王时已著名。

萨马尔干(Samarkand)的古城阿弗拉西巴(Afrasiaba)位于今城之北3.5公里，据苏联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来的材料，证明在马其顿侵占时期，城市由两部分组成，即堡垒和70斯塔吉(Stadia，古代希腊的尺度，不少于10.5公里长）的围墙部分。这座古城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叶，全部被占据（方围有35公里），大概还要扩展到它的境界之外。在遗址中发现城市建筑物的遗迹和灰坑，用陶轮制造和用手塑造的器皿，用组物模型制成的圆底粗糙的锅。还有武器和日常用品如小铁锹、带木柄稍形弯曲的铁镰刀、青铜镜子等以及国王雕像或挽弓神像的石印章。又发现一些较小的城市类型的居住地，其市场吸引了从各国来的商人，特别为了粟特工业者精巧的制品。大量的手工业者从事铁器加工制造、织布业和其他④。阿弗拉西巴古城后期的文化遗迹是一座宫殿和一个三角形的城堡(1,500×1,500 M.)，被三道城墙所围，第四道城墙则环绕着拉布得 (Rabud)。这个宫殿遗迹的特色是它的琉璃瓦，时代从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但1913年所发现的希腊—佛教式(Graeco–Buddhist) 的遗物，是属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的。这种传统后来为祆教徒所承继，直至七世纪，遗物有阿那基塔(Anakhita) 女神的赤土塑像、壁画和玻璃工艺品。六至七世纪的宫殿壁画是属于希腊—中国式(Graeco–Chinesa) 风格的。也有萨马尼 (Sâmânî) 朝代的建筑遗迹。此城在公元1220年遭蒙古人的洗劫⑤。

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从葱岭向西绵延的山岭很多，其东北部的阿赖山 (Alai Tagh) 由 Terek Pass 西行，直至 Khavatau 大雪山，分为南北两支，北支称为 Turkistan 山，南支称为 Zarafshan 山，两山之间流贯着 Zarafshan 河，中国史书称为那密水、萨宝水。此河中游在广阔的平川上分成许多支流，灌溉便利，土

质肥饶，萨马尔干城即在其中。萨马尔干，本突厥语塞米兹干特(Semizkent)，萨米兹(Semiz)，义为肥胖或富饶，干特(Kent)，义为城市，沿用既久，遂将富饶之城"塞米兹干特"读成萨马尔干(Samarkand)。但 Al Biruny 则谓 Semezken 是 Samarkand 的突厥语名称，义为太阳城(Sun City)[6]。在 Firdusi 所著《沙那美》(Shahnameh)中，经常提及 Sogdo 和 Samarkand。Ibn Khurdadbih(九世纪)、Istakhri、Ibn Haukal 都说 Samarkand 是 Sogdo 的首都。在阿剌伯人占领 Transoxiana 以前，这个地区都服属于突厥[7]。玄奘记述，涉及飒秣建国的国境、都城、人民、财富、物产、气候、风俗、兵勇等方面，简明扼要，惟缺宗教。据《慈恩传》云："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法师初至，王接犹慢，经宿之后，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遂致殷重。所从二小师往寺礼拜，诸胡还以火烧逐，沙弥还以告王，王闻令捕烧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师将欲劝善，不忍毁其肢体，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肃然，咸求信事。遂设大会，度人居寺，其革变邪心，诱开蒙俗，所到如此。"据此，我们才得知此国不信佛法，仇视僧徒，唯信火祆。故《隋书·康国传》云："有胡律，置于祆祠，罚则取而折之。"经玄奘宣扬佛法，其王及居民始稍信佛，但此后佛教仍无进展。故慧超《往五天竺传》云："(康国)等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杜环《经行记》亦云："有神祠名祆"，不言其佛寺僧徒。但《新唐书·康国传》云："尚浮国法，祀祆神"，则佛教与祆教并行矣。玄奘过时有二小师往寺礼拜，此寺即佛寺。可见在其排斥佛教最力的时期，仍有僧寺之存在。慧超、杜环所记，不过从大体上言之耳。

玄奘记此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据白鸟库吉的考证，"赭羯"一名"似与大宛语'煎靡'之'煎'同一语源，尤其是与 Uigur 语

Suguš,Kusnezk 语的'Sag'相近的原语的对音,由'战争''斗争'的意义,转变为称呼'战士'的名称。当时 Bokhara、Samarkand 一带的土民,当然是伊兰种,可是他们的君主及士兵,却系勇悍的 Turk 人,所以'战士'一名,必定依照 Turk 语,而称为'赭羯'(即 Sagas 或 Šugus)的了"。[8] 白鸟氏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随着时代的迁移,中亚政治的动荡,萨马尔干地区的王族及士兵未必只限于 Turk 种。萨马尔干以富饶著称于世,玄奘过后五百余年,元耶律楚材《湛然集》有《河中府诗》云:"园林无尽处,花木不知名。"又《河中春游诗》:"圆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时平。"其风物之盛,可以想见。又后二百余年,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于此谒见帖木儿,据他记述此城情况略云:萨马尔干建在一片平原上,城之四周,围以土墙,外有护城濠,城外四郊之房舍建筑以及园囿之属,连亘有二十里之遥。城外居民,较城内人口为多。城内外有沟洫多条穿过,泉水遍地皆是[9]。近代斯文赫定(Sven Hedin)云:"中亚细亚城市里面的珠玉却是萨马儿干"。又云:"在成吉思汗进攻的时候,有十一万兵士守城,但是城终于被攻下了,全城洗劫一空"[10]。

①《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20—22页。

②《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上册240—243页。

③《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二期。

④黄保安、崔连仲译《古代中亚史略》,见《古代世界史通讯》,1958年东北师范大学。

⑤Encyclopaedia of Asian Cirilizations,1977, Louis Fraderic Publisher,p. 31—32。

⑥《克拉维约东使记》,170页;Mediaevel Researches, vol. 2, p.60 note 827。

⑦Mediaevel Researches,vol. 2,p. 58。

⑧《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23页。

⑨《克拉维约东使记》,171页。

⑩Sven Hedin 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民37年上海开明书店87页。

覩货逻国故地考

《西域记》云:“出铁门,至覩货逻国(旧曰吐火罗国,讹也。)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所谓“覩货逻国故地”,意思是从前这个国家所在的地方,作为国王统御下的统一国家,至玄奘时代已不存在。覩货逻国的封域很广,以缚刍河(今阿姆河)中上游为中心,沿河的两岸伸展,向北直至铁门,向南直至兴都库什山,向西与波斯接境,向东直抵帕米尔高原。《西域记》又云:“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可见覩货逻国已在几百年前灭亡,玄奘时已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没有君主,原来统治这个国家的王族,已经绝嗣,各部落的酋豪分割了国土,相互纷争,分成二十七个小国。《西域记》卷十二叙述十三个国家时,都说是覩货逻国故地,它们是案呾罗缚国(今 Andarab)、阔悉多国(今 Khosf)、活国(今 Kunduz)、瞢健国(今巴达克山之南的 Munjan)、阿利尼国(今 Hazrat Iman)、曷罗胡国(今 Ragh)、讫栗瑟摩国(今 Kishm)、钵利曷国(今 Farkhar)、呬摩呾罗国(今 Daraim)、钵铎创那国(今 Badakshan)、淫薄健国(今Jerm一带)、屈浪拏国(今Kuran)、达摩悉铁帝国(今Wakhan),其余还有十四国,玄奘未经指出,但他在叙述覩货逻故地后,列举了呾密、赤鄂衍那、忽露摩、愉漫、鞠和衍那、镬沙、珂咄罗、拘谜陀、缚伽浪、纥露悉泯健、忽懔等十一国,都是阿姆河中上游附近的国家,亦应属于昔日覩货逻国的辖境。此外,《西域记》呾剌健国条云:“西接波剌斯国界。”又揭职国条云:“东南入大雪山……行六

百余里，出覩货逻国境，至梵衍那国”。则呾剌健国及缚喝国、锐秣陀国、胡寔健国、呾剌健国、揭职国都在覩货逻国境之内，合以上共计达二十九国，超出二十七之数，盖玄奘当时乃大略言之，未必如此准确也。

覩货逻，《魏书》作吐呼罗，《北史》既有吐呼罗国传，又有吐火罗国传，《隋书》作吐火罗，《魏书》的吐呼罗国传抄自《北史》，而《北史》的吐火罗国传则抄自《隋书》。《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也有吐火罗传。《隋书》谓吐火罗国于隋炀帝大业中（公元605—618年）遣使朝贡。《新唐书》谓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十九年（公元645年），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吐火罗国均遣使来献。贞观十九年那次且记吐火罗沙钵罗叶护之名。据《册府元龟》卷九六六：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入贡之吐火逻王名阿史那乌湿波。显庆中（公元656—660年）以阿缓（War—Waliz）城为月氏都督府，授王阿史那都督，后二年又遣子来朝献。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王那都泥利遣弟仆罗入朝，留宿卫。此外，《册府元龟》所载吐火罗遣使朝贡事，尚有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十二年（公元724年）、十四年（公元726年）、十七年（公元729年）、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八年（公元749年）、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三年（公元754年）及唐肃宗乾元元年二年（公元758、759年）。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遣使上书，备陈大食欺压之苦，请兵以御大食。开元十七年那一次入贡，并册其骨咄禄颉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悒怛王。其后为吐蕃所攻，叶护失里忙伽罗请求唐出兵，破之。乾元初吐火罗出兵参加讨伐安禄山之役。从以上的史实来看，自七世纪初直至八世纪中叶，吐火罗仍作为一个国家，与隋唐两朝交往。但何以公元630年间玄奘经过该地时说，“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原来西突

厥自室点密可汗(公元 562—576 年在位)起，即征服西域诸胡国，至射匮可汗(公元 612—617 年在位)开拓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曾于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 615 年)遣其犹子率诸胡朝贡。至统叶护可汗(公元 617—627 年在位)更直接统御西域诸胡国，各遣吐屯一人监领，督其征赋。所以玄奘说各酋豪“虽画野区分，统役属突厥。”吐火罗各小国平日虽各自为政，但与隋唐交往时常以地位较高之叶护为主，仍用吐火罗国名，故《新唐书》说其王号叶护，姓阿史那。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入贡者为沙钵罗叶护，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入贡者为阿史那乌湿波，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 729 年)册封骨咄禄颉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悒怛王。而实际上吐火罗人所建立的吐火罗国，早已灭亡。

《西域记》记述覩货逻人的风俗云:“其俗则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义，不甚欺诈。”按玄奘记述窣利人的性格亦云“志性恇怯”，这是定居的城乡和平居民的一般特性。但《北史》和《隋书》吐火罗传则云:“人皆善战”，似有矛盾。玄奘的覩货逻国故地是指广大疆域，居于这个疆域内的人民自然不是单一的种族，因而性格上的差异，自在意中。汉史吐火罗，就是西史的 Tochari。这个民族由来很古，生当纪元前后的希腊地理学家说过，公元前140—135年间从药杀水(锡尔河)北方南下征服 Bactria 的是 Asii、Pasiani、Tochari 和 Sakaroul 四个民族。关于这四个民族相当于中国史书的何种民族的问题，学者曾有过不少的讨论。Marquart 认为《史记》、《汉书》的大夏即西方记录中的 Tokhâra 的对音，且为其略译。汉史的月氏与西史的 Asiani、Asioi、Pasianoi 音声类似，而考定其为同一民族。又引 Trogas Pompeius 之言，谓 Asian 王在 Tokhârra 为王，灭 Sakarauk，Strabo 的 Pasianoi 即系 Pompeius 的 Asian，又必系汉史的月支，“月”字原音 get、gat，所以 strabo 的 pasiani 乃是 gasiani 的误写，而 Asioi 更为此语的转讹。按此点没有进一步

的证明，不能成立，已经Franke指出。Franke 谓·Ptolemaeos 的Iarcoc 如果是 Asioi 的转讹，则此等名称与月氏一名，声音上必有显著的类似。Strabo 的 Asioi、Pasianoi 是否即系汉史的月氏，虽不明瞭，但汉史的大月氏与 Strabo 及 Pompeius 所称的 Tokhâra，协同组成同一团体，亦不容怀疑，故公元二世纪时代的 Ptolemaeos 呼 Bactria 大民族为 Tokhâra，而《后汉书》称之为大月氏，要之，Tokhâra 与大月氏结局互相融合而成一个民族。Marquart 和 Franke 二人的共同点为 Tokhâra 与月氏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后来都西迁，征服了大夏(Bactria)，乃融合成为一个民族。二人的不同点为前者所谓 Pasianoi 即 Gasianoi(月氏)的误写，后者以为不能成立；又在 Tokhâra 和月氏西迁的路线问题上，前者主张《西域记》有关瞿萨旦那(Khotan)东方的睹货逻故国的记事，说明 ToKhâra 是自新疆大戈壁向西越葱岭而迁至 Bactria，与从药杀水南下侵入 Bactria 所取的路线完全不同；后者则主张大月氏于公元前 170 年逃向天山的时候，路过覩货逻故地，覩货逻人因住地为沙漠所侵迫，乃随月氏入天山北方塞种的地域，月氏人与覩货逻人协同驱逐塞种至南方，其后又因乌孙的攻击，而进入河间地区，最后乃南下征服 Bactria。Marqart 和 Franke 二人都相信《西域记》关于瞿萨旦那东方的覩货逻故国是 Tokhâra 人的发祥地，但白鸟库吉不同意这一主张，他认为玄奘所谓“故地”、“故国”的意义相同，不过是指这些地方在往代曾为汉人所知的覩货逻而已，但葱岭东方 Takla Mahan 之称为吐火罗，史乘无证，故玄奘以此地为覩货逻故国，实出于杜撰①。我认为白鸟氏的这一论证，没有说服力。我认为《西域记》所载瞿萨旦那东方的覩货逻故国，是大月氏西迁后，其余种曾经聚居过的地方，下文将有所论述。

玄奘列举了属于覩货逻故地者凡十三国，独于瞿萨旦那东方的这一地方称覩货逻故国，显然有所区别。白鸟氏为了追溯 Tok-

hâra 人的发祥地，引据 Ptolemaeos 的《地理书》，在“相当中国黄河的 Bautisos 河出西藏高原而转入北方”之处，以及“相当南山脉的 kasia 山脉东端”的 Thagour 山脉东麓，举出 Thagour 人之名，并于 Bautisos 河东岸，记有 Thagoura 城名。关于 Thagoura 城的方位问题，学者意见不一致。Richthofen 认为 Thagoura 即西史的 Tokhâra，位于相当于和阗东方 Takla Mahan 一带地方。Tomaschek 则认为它位于今日的凉州，汉代的武威郡，阿刺伯人的 Kudža。Grenard 认为它位于今日的兰州。Hermann 认为它位于今日的甘州。白鸟氏一方面赞同 Richthofen 考定大月氏即西史的 Tokhâra，一方面又反对他把 Ptolemaeos 的 Thagoura 置于和阗之东的 Takla Mahan，而赞同 Tomaschek 比拟为凉州之说。他的理由有二：一是凉州为汉代的武威郡，治姑臧城，在秦代是月氏戎所据，Aržibia 的学者 Idrisi 书中的 Kudža，即姑臧。“月氏”二字在官话中虽音 Yüe-si，然其古音实为 Nguet-si，Ngat-si、Gwet-si、Gwet-si，可知此一国名与凉州古称“盖臧”“姑臧”同名，凉州地方不仅为月氏的要区，而且月氏一名，亦起源于其古称“姑臧”，所以 Ptolemaeos 的 Thagoura、Thogara，即汉史的月氏，而西史的Tokhâra 即 Ptolemaeos 的 Thagour②。我认为白鸟氏所说第一个理由不能成为 Thagoura 即姑臧的有力证据，因为 Ptolemaeos《地理书》中的 Bautisos 是否即指黄河，Kasia 是否指南山，而 Bautisos 转入北方处及 Kasia 东端的 Thagoura 是否恰恰位于姑臧，都属于臆测，不能视为确论。第二个理由也没有说服力，因为“月”字，《唐韵》鱼厥切，音轨，属疑组果摄，而“姑”字，《广韵》古胡切，属见组，遇摄，既不同组，也不同摄。即便如白鸟氏所说，阿尔泰语中语尾“n”可以去掉，但这不是通例，如乌孙(Wu-Sun)之不为 Wu-Su，怖捍或拔汗(Fei-Han 或 Po-han)之不为 Fei-ha 或 Po-ha，屈浪拿之不为 Kura。则月氏与姑臧的读音显有不同，不能牵强附会可知矣。我们认为月氏、吐火罗等

民族侵入大夏以后，诸族混合为一[3]，故人们可以说大夏即月氏，月氏即吐火罗，或大夏即吐火罗，但在此以前，它们是各自为族[4]。Asii 为大月氏，其发祥地在甘肃河西地区；Pasiani 为康居，其发祥地在锡尔河上流流域及咸海沿岸地区；Sakaroul 为塞种，其发祥地在天山溪谷及伊犁河流域。（乌孙居地，据《汉书·乌孙传》，此区域“本塞地也”。）

①《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41—144 页。

②同上，145—148 页。

③大月氏等族之侵入大夏(Bactria)，约在公元前 140—135 年间，其时大夏最后在位之国王名 Heliocles。

④Strabo 所举南下灭大夏的四个民族中，Sakaroul 是塞 (Saka) 族，Tochari 是吐火罗(Tokhâra) 族，四个族名中读音比较接近月氏的是 Asii，此名可能由于希腊人呼月氏时转讹而来。Pasiani 即汉史的康居(《塞外史地论丛》第二辑 377—378 页)。据Trogas Pomeius 说，Asian 王在 Tochari 为王，则 Tochari 的统治者为 Asian(月氏) 族，但不能因此认为 Tochari 即月氏人，因为一个民族或国家被异族人统治，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尤以古代西域为然。

缚喝国考

《西域记》卷一缚喝国条云:“缚喝国,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刍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其城虽固,居人甚少。土地所产,物类尤多,水陆诸花，难以备举。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学习小乘法教。”缚喝(Pahl 或 Vāhlika),《慈恩传》卷二作缚喝罗,《魏书》和《北史》西域传大月氏国条作薄罗，正符 Pahl 或 Vāhlika 的音译。又二书哌哒国条云:“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此所谓“王舍城”,与《西域记》之“小王舍城”相同,“小王舍城”乃对摩揭陀国之王舍城而言,正足以证明拔底延亦是指缚喝。此外,二书吐呼罗国条云:“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汉楼河。”此薄提与慧超《往五天竺传》之缚底耶,《新唐书·谢飓国传》之缚底野,均与拔底延同一语源，即 Bactria 的音译，而 Bactria 则是今巴尔赫(Balkh)的古称。同一地方,梵文称 Bahlika,《希腊古地志》称 Zariaspa,希腊人又称 Bactria,波斯人称 Balkh。

巴克特里亚(Bactria)是一个很古的国家，即中国史书所称的大夏。据《史记·大宛传》云:“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又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月氏西迁,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氏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此种史料,是根据张骞西使时的记述。按大月氏的西迁,约在公元前 176—160 年之间，其灭大夏约在公

元前 140—135 年之间，则大夏国至公元前 140 年左右，仍然存在。巴克特里亚为公元前 550—529 年间居鲁士(Cyrus)统治的波斯帝国的一个省(Satrapy)，公元前 328 年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王所征服，公元前 302 年以后，成为塞流士帝国(Seleucid Empire)的一个省，公元前 250 年在 Diodotos 省长的统治下成为独立的帝国。Diodotos 一世及二世的领域尚未达到兴都库什山以南，至Euthydemos 王晚年时代(公元前 206 年以后)，其势力已达到阿富汗斯坦和印度河流域。Strabo 称 Menander 和Demetrios 为经略印度的希腊王。Euthydemos 一代为巴克特里亚王国最盛时期，其版图北拥 Sogdiana，南并阿富汗斯坦、喀布尔、旁遮普及印度河下流流域。Demetrios 继位，立即为 Eucratides (即位于公元前 171 年)所攻，不仅失去巴克特里亚，而且连印度方面几部分的领土也被夺去。Eucratides 时代，因为讨伐 Sogdiana、Arachosia、Drangiana、Aria 和印度等地，国力损耗，以致安息(Parthia)王 Mithridates 攻入其西境。Menander 王生存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国自 Eucratides 死后，Heliocles 即君临其土，大月氏之颠覆并吞此国，似即相当于此王时代。依 Justin 所记，Heliocles 一直至公元前 140 年止，确曾君临巴克特里亚。Eucratidos 家最后君主 Hermaeos 自失去 Gandhara 之后，即退守喀布尔，直至公元一世纪末叶，始为大月氏所并吞①。

《史记》谓大夏国人是土著，有城屋，善贾市，则当时其地必为大量货物财富集中之所。我们从考古发现的材料足以证明这一点。巴克特里亚的自然条件是各式各样的，在那里葡萄藤结着大而甜的果子，丰富的水流灌溉着干热的土地，最肥沃的土地用来种植谷物，而其他地方则变为牲畜的牧场。据普林尼(Pliny)的报导，这里种植的谷物，粒大等于通常的穗。从巴尔赫(Balkh)的考古发掘表明，其最古层属于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之末。在巴克特里

亚北部的米高扬那巴德地区发现了古代巴克特里亚时期的整个建筑物遗址。有八座用正方形的生砖筑成的狭窄房屋，有许多上古撒马尔干和米尔夫式的器皿。从遗物来判断，巴克特里亚的居民是从事陶业、织布、制铁、铸造青铜等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者。最有价值的发现是所谓"阿姆河的宝藏"，包括177种艺术品，还有1,300件金、银和钱币。据苏联考古家的意见，这些物品，基本上是属于公元前四至二世纪之间的，其艺术才能表现在用黄金制作的二轮马车，银制的小雕像、金手镯，其两端带有公山羊头，还有金鹿大雕像和许多其他物品②。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有一种宗教盛行，即中国史书所称的祆教(Zarathushtra)，其教主即住在巴克特里亚国的都城巴尔赫。大月氏征服大夏后逐渐移其根据地至阿姆河之南，至贵霜王朝时代，接受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据羽溪了谛的推定，大月氏归依佛教之时，当在贵霜迦腻色迦王一世的晚年(此王即位于公元前85年)，至公元二世纪初期至中期，即当迦腻色迦王二世在位期间，佛教已趋繁盛③。后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由大月氏来华之沙门支娄迦谶，在洛阳译出佛经二十三部，六十七卷。可见中国佛教之传布，大月氏东来之僧徒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惟《魏略·西戎传》所谓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一事，不见《汉书》记载，真否尚属疑问。

大月氏至公元480年已完全为嚈哒人所灭。据《魏书·西域传》嚈哒国条云："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马(乌)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地方十余里，多寺塔，皆饰以金，风俗与突厥略同。……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十万，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

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据此，则知嚈哒人虽属游牧民族，但亦有王都。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 518）宋云出使西域，二年（公元 519）入嚈哒国，据其所记：“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其人既凶悍能战，又不信佛法，则当其统治巴克特里亚时期，佛教必遭其摧残无疑④。但据《隋书·西域传》吐火罗国条云：“吐火罗都葱岭西五百里，与挹怛杂居，……其俗奉佛。”按吐火罗与大月氏在侵占巴克特里亚后，已逐渐混合成为一个民族，则嚈哒统治时期，吐火罗或月氏人仍信奉佛法。故《西域记》卷一总述睹货逻国故地云：“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而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月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据其多雨，亦是设教随时也。”又同卷缚喝国条谓人皆称其都城为小王舍城，伽蓝百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其次则描述纳缚僧伽蓝的壮严宝饰，及伽蓝西南之精庐，远方辐辏，高才类聚，诸窣堵波基址相邻，以数百计。玄奘到此国时，尚有如许伽蓝和僧徒，则七世纪初期，其地佛教仍颇兴盛。其时僧徒所习学者皆为小乘法教，但在大月氏统治时代，大乘教却居优势。西突厥以一叶护镇守其地，以缚喝为南牙，而以昆都斯(Kunduz)为北牙。（见《续高僧传·玄奘传》）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 667)回将诃喀木(Al Hakam ibn Amir al Ghifari)东侵呼罗珊(Khorasan)，略吐火罗，东南至兴都库什山脉。至八世纪初期，缚喝地方的佛教仍然流行。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此国僧人难陀(Nanda)来朝，贡献方物。至慧超西行时，吐火罗王之都城缚底耶已为阿剌伯回教徒入侵。据其所记云：“见今大寔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迫，走向东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见属大寔所管。”蒲持山之“持”字显为“特”字之讹，蒲特山即巴达山(Badakshan)，《西域记》作钵铎创那。又云：“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

小乘法，食内(肉)及慈悲(葱韭)等，不事外道。”⑤可见阿剌伯人入侵初期，佛教仍颇盛行。此后回教势力渐盛，佛教才归衰亡。

巴尔赫(Balkh)城相传为居鲁斯王所建，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代是该国的都城。其后为大月氏所攻占，成为大月氏的王庭。攻灭大月氏的嚈哒，亦以它为王庭。及西突厥灭嚈哒，则其叶护又以它为南庭。阿剌伯人攻占此城时，大被摧残。至公元1221年，终被成吉思汗所毁。据马可波罗的记述，其城历经鞑靼人及其他种人之残破，昔之美丽宫殿，以及大理石之房屋，已不复存⑥。巴尔赫曾以世界最古之城自负，亚洲人名之曰“诸城之母”，当时繁荣之景象，可想而知。十五世纪初叶，克拉维约(Klaviyo)奉西班牙国王之命东使，据其所记，此城宽大，四周有高约三丈之城墙围护，城内尚有堡墙两道，外墙与第一道城堡之间并无建筑，成为种植棉花之田地。第一道城堡与内堡之间虽有房屋建筑，但不繁盛。至内堡中，则人口稠密，房屋紧凑。此城在防守上，极甚坚固⑦。1845年法国旅行家费利耶(Ferrier)曾在此城发现方砖，上有楔形文字，据云:“砖大，火烧而成，面宽广约一公尺，厚八公分，其来源必较今城更古，殆为古城之遗物，而经成吉思汗复用以建筑堡垒者。……约在二十年前(公元1825年前后)，城中尚有整齐房屋不少，惟因春雨之后，有若干房屋倒塌，发现墙中藏有数瓮，其中满盛金钱。自是以后，巴里黑之居民遂自将余存之房屋拆毁而求伏藏。”巴里黑城旧墙中发现之金钱，疑是大夏国王之古币，后之经行阿富汗斯坦境内者，亦有相类发现，于是纪元前225至120年间大夏之诸希腊王名，几尽可以考证而出⑧。玄奘在记述缚喝国纳缚僧伽蓝后，谓大城西北五十余里有提谓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三丈余，为献麨蜜给如来之二长者所建。此乃僧徒故神其说，未可置信。惟所谓提谓(羽溪了谛作提谱 Trapusha 或 Tapassu)及波利(Bhallika)二城和窣堵波，则当实有其物。丁谦主张提

谓相当于今低瓦里城，波利今塔列尔城。比尔据哈第(Spence Hardy)之说，谓如来给二长者的遗物，是收藏在朗干(Rângun)地方著名的什维一达干(Shwè-dagun)寺中⑨。据《慈恩传》卷二，玄奘在缚喝国时曾往其西南之锐末陀、胡实健二国访问。锐末陀，《西域记》作锐秣陀(Yumadha)。据《西域地名》，其地在今阿富汗胡尔姆(Khulm)西南之 Sir-i-pul 附近。胡实健(Guzgan)在今阿富汗北境之希巴尔甘(Shibergan)之南。

①《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349—353 页；Encyclopaedia of Asian Civilization, Louis Frederic Publisher, 1977 vol. 1。

②加夫罗夫(T. Gafurov)著，黄保安、崔连仲译《古代中亚史略》(原书名《塔什克民族史》第一至七章)，见《古代世界史通讯》，1958 年东北师范大学 10—50 页。

③《西域之佛教》，67—69、86—92 页。

④沙畹著冯承钧译《宋云行纪笺注》，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25—30 页。

⑤藤田丰八著《慧超往五天竺传笺释》，1937 年校印，55—59 页。

⑥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1946 年上海商务版，上册 122—123 页。

⑦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1957 年上海商务版 111 页。

⑧《马可波罗行纪》上册，122—123 页注一。

⑨Si-yu-ki, vol. 1, p. 47 原 BKI, note163。

从缚喝国至迦毕试国的一段行程

玄奘访问缚喝国后，即向南行。《西域记》云:“从缚喝国南行百余里，至揭职国。”当日玄奘南行，应是沿缚喝河 (Balkh River 或称 Dehas Rud)而达其东岸的得哈斯(Dehas)，此段路程约计 80 公里，与《西域记》百余里之数基本相符，则揭职国当位于今得哈斯及其附近地区。《西域记》又云:(揭职国)“东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祟，群盗横行，杀害为务。行六百余里，出覩货逻国境，至梵衍那国”。玄奘从揭职国向东南方向行进，约 60 公里，经喀尔楚(Kartchoo)，每行 60 公里，经胡路木 (Khulum) 河西岸的路伊(Rui)，转向南行，越哈喇山隘 (Kara Pass)，以达速尔哈布 (Surkhab)河上流的赛汗(Saighan)，计程约 70 公里。从赛汗至梵衍那国(今巴缅 Bamian)亦约 70 公里。从揭职国至梵衍那国，总计路程约为 260 公里，约合 610 古汉里，正与《西域记》的六百余里相符。梵衍那国在大雪山 (Hindukush Range)中，其都城位于巴缅河流域。据Colonel Yule说:“突起于河谷的悬崖之上，被无数塔寺残迹覆盖着，险峻的一面，绵亘六七里，分布无穹尽的古洞，其中一部分至今仍被用作住所。堡垒和残垣标志着旧城的实际位置。在谷地当中孤峙的大石上，有古城遗迹，今称古谷剌 (Ghugula)。”瓦特斯说，古谷剌可能代表此国都城的一部分，七世纪时名为罗兰(Lolan)①。玄奘不言从梵衍那至迦毕试国的里程。《慈恩传》云:“梵衍那王出迎，延过宫供养，累日方出。……如是，经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岭，遇猎人示道，度黑岭山，至迦

毕试境，……将至其都，王共诸僧并出城来迎。”也未言里程。所谓“如是，经十五日，出梵衍”，一般都理解为玄奘行了十五日，我认为这不仅指玄奘从梵衍那都城行至其国边境的日数，而且包括他停留在该国的日数，因为“如是”两字是总括玄奘在梵衍那的全部活动而言。这样，我们就不能凭所记日数来考定玄奘此段行程的里数。要知道这段里程，首先就要研究迦毕试国全境的方位及其都城所在地。《西域记》云：“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据恭宁翰的考证，如果玄奘的测量数字接近正确的话，迦毕试的国境必定包括卡非里斯坦(Kafiristan)的全部以及葛尔班得(Ghorband)和彭赤什尔(Panjshir)两河流域，因为彭赤什尔河流域周围不超过300英里②。丁谦谓迦毕试即阿富汗国喀布尔城地，迦毕试为喀布尔之转音③。Julien认为迦毕试包括今彭赤什尔和柯希斯坦(Kohistan)北界的塔迦布(Tagab)流域，其都城若不在尼赤拉布(Nijrab)，就在塔迦布④。白鸟库吉谓玄奘《西域记》于喀布尔河流域之中，曾举迦毕试(Kapîsa)、滥波(Lampaka)、那揭罗曷(Nagara)、健驮罗(Gandhāra)、弗栗特萨傥那(Portosthanar)五国。迦毕试即系今日喀布尔河上流的乌比安(Upian)⑤。按恭氏关于迦毕试国境的考证是正确的，而Julien所说该国都城所在地，比较接近，但不准确。现代考古家已证明，迦毕试国的都城是在今阿富汗葛尔班得与彭赤什尔两河交汇附近的贝格拉木(Begram)地方。这里在公元初一、二世纪间是健驮逻国贵霜王的夏都，有窣堵波的残迹和许多具有希腊佛教艺术形式的雕像。考古家发现了一个宝藏，在许多遗物中有丰富的象牙雕刻品⑥。玄奘离开梵衍那都城后向东行，中途进入葛尔班得河谷，沿此河谷东行，乃抵迦毕试国都城贝格拉木。此段行程约共150公里，约合400古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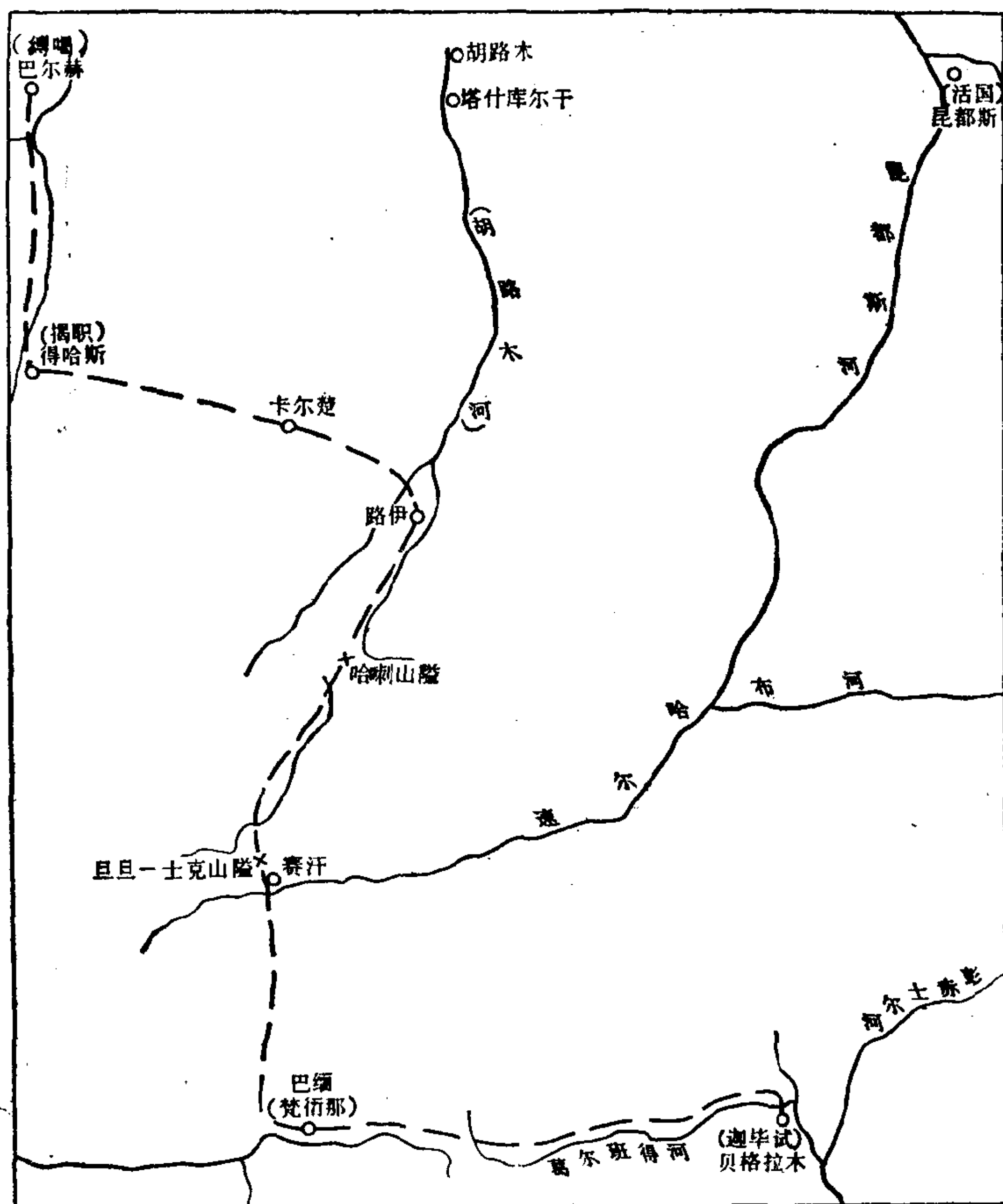


图7　从缚喝国至迦毕试国的行程

①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116。

②同上, p. 124。

③丁谦著«大唐西域记考证»。

④Samuel Beal: Si-yu-ki, popular ed. London, Kegan Pul, Trench, Trübner, p. 54 note 190。

⑤«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 255—256、277 页。

⑥Encyclopedia of Asian Civilazations。

就学那烂陀寺

（从滥波国到摩揭陀国）

《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条云："自此东行六百余里，山谷接连，峰岩峭峻，越黑岭，入北印度境，至滥波国。"玄奘叙述去程，到了滥波国，始称入了北印度境。滥波国位于喀布尔河以北阿陵伽尔（Alingar）与库那尔（Kunar）两河之间的拉格曼（Laghman）地区（详见归程）。从迦毕试国都城贝格拉木东行，途中越过黑岭，才能到达滥波国，则可推知玄奘当日所取路线，不是沿彭赤什尔河岸东南行，而是向东入山谷地带，直至阿陵伽尔河西边的一条支流的发源处，然后沿此支流向东南行，过阿陵伽尔河下流，以达拉格曼。此段路程，依今图测之，约为 100 英里，合 500 古汉里，不及六百余里之数，可能是由于黑岭岩谷间，迂回曲折，故玄奘所行实际里数较多。《西域记》同卷滥波国条云："从此东南行百余里，逾大岭，济大河，至那揭罗曷国。"玄奘从滥波国的都城察哈尔伯格（Chahar-beg）东南行二十余英里，渡喀布尔河，至素尔哈布(Surkhab)河口附近的那揭罗曷国都城。（详见归程）《西域记》同卷那揭罗曷国条云："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五百余里，至健驮逻国。"健驮逻国的都城号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位于今巴基斯坦北境白沙瓦（Peshawar)城的西北地方。玄奘于此国巡礼许多圣迹后，东南行至乌铎迦汉荼城，此城即今图阿托克(Attock)之北的温德(Und)，西北距白沙瓦约 50 英里，合 250 古汉里。《西域记》卷二健驮逻国条云："从乌铎迦汉荼城北逾山涉川，行六百余里，至乌仗那国。"又卷三乌仗那国条云："坚城四五，其王多治瞢揭里城。"乌仗那国都城瞢

揭厘,据恭宁翰的考订,相当于今斯瓦特(Swat)河上流东岸的芒格洛尔(Manglaur,或作 Mankuil,北纬 35° 东经 72°30')玄奘行了六百余里,依今图测之,约 100 英里,即 500 古汉里。乌仗那国条又云:"从此东行,逾岭越谷,逆上信度河,飞梁栈道,履危涉险,经五百余里,至钵露罗国。"钵露罗(Bolor),《新唐书》作钵露,又有大小勃律,其国境包括今克什米尔西北部之巴勒提斯坦(Baltistan)及巴基斯坦东部雅辛(Yasin)河流域。瓦特斯怀疑玄奘关于此国的记述,乃在瞢揭厘城得之传闻,并非亲历。观于《慈恩传》对此国无所记述,其言可信。玄奘从瞢揭厘回到乌铎迦汉荼城,故《西域记》云:"从此复还乌铎迦汉荼城,南渡印度河,……渡河至呾叉始罗国"。呾叉始罗(Taksasila,亦称 Taxila),其都城相当于今哈桑阿卜多尔(Hassan-Abdal)。从温德南行渡河,至哈桑阿卜多尔约计行程为40英里,合 200 古汉里。(详见归程)《西域记》同卷呾叉始罗国条云:"从此东南越诸山谷,行七百余里,至僧诃补罗国……从此复还呾叉始罗国北界,渡信度河,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石门,……从此东南山行五百余里,至乌剌尸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玄奘先从呾叉始罗东南行七百余里,至僧诃补罗国,再回到呾叉始罗国北界,然后渡信度河,东南行五百余里,至乌剌尸国。僧诃补罗国的都城,据一般考定为今杰卢姆(Jhelum)西南盐山东头北麓之基塔斯(Ketas)。(详见归程)乌剌尸国(Urasa)的都城,据恭氏考订,位于今模扎法拉巴德(Muzafarabad)西呾塔瓦(Dhantawa)地区的剌什(Rash),后来学者以今哈里普尔(Haripur)相当于乌剌尸国都城,其实际位置则在哈里普尔城堡下的皮尔马莫卡(Pir-Mâmaka)回教寺院①。据《西域记》,从呾叉始罗北界渡信度河东南行二百余里,至大石门,又从大石门东南行五百余里,至乌剌尸国,则从呾叉始罗北界(大约在今 Hazro 的对岸)东南行至乌剌尸国都城的行程约共 800 里。今从印度河北岸至哈里普尔只有 50 英里左右,约合

250 古汉里，相差很远，且方向是东北，而不是东南，似与《西域记》的记述不符，但没有发现更准确的相当地点之前，我们只能暂时采用哈里普尔之说。

《西域记》同卷乌剌尸国条云："从此东南，登山履险，度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迦湿弥罗(Kashmira)，《新唐书·西域传》作个失蜜，王治拔逻勿逻布逻城，西濒弥那悉多(Vitasta)大河。斯坦因考订此拔逻勿逻布逻乃 Pravarapura 之对音，即斯里那加(Srinagar) 之古名②。从哈里普尔向东稍偏北行，再沿杰卢姆河以达斯里那伽，为程约 200 英里，合 1,000 古汉里，与《西域记》的千余里基本相符，但《西域记》言方向为东南，而此则向东稍偏北，为稍异耳。《西域记》同卷迦湿弥罗国条云："从此西南，逾山涉险，行七百余里，至半笯蹉国。"半笯蹉(Punach)，《迦湿弥罗诸王史》(Rajata-rangini)作Parnotsa，据恭氏的考订，即迦湿弥罗人所称的 Punats，西界杰卢姆河，北界皮尔潘查勒岭(Pir Panchal Range)，东及东南界剌阇乌里(Rājauri)，其都城即今图的盘赤 (Punch)。从斯里那伽西南行至此约 80 英里，合 400 古汉里，但《记》作七百余里，相差颇多，或玄奘当日是绕道而行。《西域记》同卷半笯蹉国条云："从此东南行四百余里，至曷逻阇补罗国。"曷逻阇补罗(Rajapura)的都城即今克什米尔西南端的剌阇乌里，从盘赤西南行，沿盘赤河东岸，至剌阇乌里约 40 英里，合 200 古汉里，与《记》言四百余里，相差较多。《西域记》同卷曷逻阇补罗国条云："从此东南，下山渡水，行七百余里，至磔迦国"。磔迦(Takka)的国境相当于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Panjab)西部地区，据恭氏的考订，其都城即今阿萨路尔(Asarur，北纬 31°42'东经 73°36')，位于剌阇乌里西南 112 英里处，合 560 古汉里，此乃直线距离，故里程较《记》文的七百余里(约 140 英里)为短。其旧都奢羯罗 (Sakala) 此在此城西南十四五里处。惟《记》文的方向是东南，而非西南，稍有差异，故瓦特斯疑之，

而未提出其他更适当的地点③。

《西域记》卷四磔迦国条云:“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至那仆底国”。至那仆底(Chinapati)的国境,从刺维(Ravi)河一直延伸到萨特累季(Satlaj)河,它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为今柏提(Patti或pati),在比雅斯(Biyas)河之西 10 英里,卡须尔(Kasur)之东北 27 英里,是一个大而古的城,随地见碎砖和水井。从阿萨路尔至柏提约 120 英里,合 6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基本相符。《西域记》同卷至那仆底国条云:“从此东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阇烂达罗国。”阇烂达罗 (Jalandhara)的都城即今印度北境之贾朗达尔 (Jalandhar或Jullundur)。从柏提至此约 60 英里,合 300 古汉里,而《记》文的里程只及一半,但方向则与《记》文相符。《西域记》同卷阇烂达罗国条云:“从此东北,逾峻岭,越洞谷,经危途,涉险路,行七百余里,至屈露多国。”屈露多 (Kuluta) 的国境包括今比雅斯河上流的库卢(Kulu) 地区，亦称为 Kôlūka 或 Kôluta，其都城为今苏丹普尔(Sultänpur)，但旧都城则为那伽拉(Nagara 或 Nagarkôt)，位于比雅斯河上流的库卢地区之北。从贾朗达尔至那伽拉约为 140 英里,合 700 古汉里,与《记》文七百余里基本相符,方向也一致。《西域记》同卷屈露多国条云:“自屈露多国南行七百余里，越大山，济大河,至设多图卢国。”设多图卢 (Satadra) 的国都经一般考订为今锡尔兴得 (Sirhind)④。从那伽拉南行至锡尔兴得约 150 英里,合 750 古汉里,与《记》文七百余里正合,方向亦相符。《西域记》同卷设多图卢国条云:“复从此西南行八百余里，至波理夜呾罗国。”波理夜呾罗 (Paryatra) 的都城，经雷诺 (M. Reinaud) 考订为今拜拉特(Bairat),从锡尔兴得至此,直线距离约 220 英里，合 1,100 古汉里，而《记》文只有八百余里，相差颇多，方向为西南，基本相符。

《西域记》同卷波理夜呾罗国条云:“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秣

兔罗国。”秣兔罗(Mathura)的都城即今朱木拿(Jumna)河西岸的马土腊(Mattra)，从拜拉特至马土腊约 100 英里，合 5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基本相符。«西域记»同卷秣兔罗国条云:“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萨他泥湿伐罗国。”萨他泥湿伐罗 (Sthāneś-vara)的都城，经一般考订为今安巴拉 (Anbala) 地区的塔讷萨尔(Thānesar 或 Tānesar)，恭氏肯定了这一考订，但瓦特斯认为在距离和方向上还有疑问，Tānesar 约在今马土腊北北西 180 英里处，但萨他泥湿伐罗则在秣兔罗之东北约 100 英里处。比尔认为玄奘可能在离开马土腊之后，先返回原路，直至汉西(Hansi)，然后转向西北行 100 英里，至塔讷萨尔。

«西域记» 同卷萨他泥湿伐罗国条云:“从此东北行四百余里，至窣禄勤那国。”窣禄勤那(Srughna、Srughin)，«慈恩传» 作禄勤那，实脱一“窣”字，恭氏曾考订为今粟格 (Sugh)村，三面为旧朱木那河床所环绕，但方位和距离都与«记»文不符。«西域地名»考订为今印度北部的罗塔克 (Rohtak) 之北，未知何据。比尔认为从 Sthanesver 东北行四百余里所到达的地方应在卡勒西(Kalsi，北纬 30°32′ 东经 77°53′)，位于锡尔模尔(Sirmur)之东的壮萨尔(Jaun-sar)地区内，但从方向和距离来看，以比尔的考订为强。从塔讷萨尔东北至卡勒西约 80 英里，合 400 古汉里，与«记»文的四百余里基本相符。«西域记»同卷窣禄勤那国条云:“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秣底补罗(Matipura)的都城，据圣马丁和恭氏的考订，约以罗希尔坎德(Rohikand)西部比兹脑尔(Bijnor) 附近的大镇曼达瓦(Madawar、Mundore)当之。从卡勒西至曼达瓦约 80 英里，合 400 古汉里，«记»文只言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而不言里数。«西域记»同卷秣底补罗国条云:“从此北行三百余里，至婆罗吸摩补罗国。”婆罗吸摩补罗(Brahmapura)，据恭氏的考订为今印度北部伽尔瓦勒(Garhwal)的库马安(Kumaon)地区，但他为«记»文的“北”向为

“东北”向之讹。这只是说此国包括的范围，它的都城应位于伽尔瓦勒地区的特里（Tehri）。从曼达瓦至特里约70英里，合350古汉里，与«记»文的三百余里相符。

«西域记»同卷婆罗吸摩补罗国条云：“从秣底补罗国东南行四百余里，至瞿毗霜那国。”瞿毗霜那（Goviśana），据恭氏的考订，此国境界应包括今之卡什普尔（Kashipur），拉姆普尔（Rāmpūr）和皮利布希特（Pilibhit），其都城为今卡什普尔之东1英里乌战（Ujain）村附近的一个旧堡垒。玄奘从特里回到曼达瓦，然后再至乌战，为程约60英里，合300古汉里，与«记»文的四百余里相差较多。«西域记»同卷瞿毗霜那国条云：“自此东南行四百余里，至垩醯掣呾罗国。”垩醯掣呾罗（Ahikshetra、Ahichatra）的国境包括今罗希尔坎德的东部，它的都城则为今拉姆那伽尔（Ramnagar，今图作Rampur）。从乌战至此约40英里，合200古汉里，与«记»文的四百余里相差颇多。«西域记»同卷垩醯掣呾罗国条云：“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罗删拏国。”毗罗删拏（Virasana）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在今卡利那第（Kali Nadi）河西岸的阿特兰吉卡拉（Atranjikhara）。（详见回程）从拉姆那伽尔至阿特兰吉卡拉约80英里，合400古汉里，与«记»文的二百六七十里多出百余里。

«西域记»同卷毗罗删拏国条云：“从此东南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国。”劫比他（Kapitha）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相当于今萨姆基萨（Samkisa）。从阿特兰吉卡拉至此约50英里，合250古汉里，与«记»文的二百余里相符，方向也一致。«西域记»同卷劫比他国条云：“从此东南行，减二百里，至羯若鞠阇国。”羯若鞠阇（Kanyakubja）的都城旧名拘苏摩补罗（Kusumapura），义为花宫，后因仙人不满于国王配以稚女，施恶咒使九十九女皆曲腰，乃改名曲女城，即今卡瑙季（Kanauj）。从萨姆基萨向南稍偏东行至卡瑙季约50英里，合250古汉里，与«记»文的减二百里，相差不多。

《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条云:“自此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陀国。”阿踰陀(Ayadhya)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为今坎普尔(Cawnpole)西北20英里的卡库普尔(Kakupur)旧城，但他主观地把《记》文的六百余里,改为60里,这是没有根据的。一般学者认为玄奘的阿踰陀国，即法显的沙祇大国，亦即“Brihat—sanhita”的 Sāketā 或 Oudh⑤,因而考订阿踰陀国的都城相当于今之乌德(Oudh)，位于卡脑季之东稍偏南约140英里,合700古汉里,与《记》文的六百余里基本相符。《西域记》同卷阿踰陀国条云:“从此东行三百余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国。”关于阿耶穆佉(Ayamukha)的都城位置问题，恭氏曾考订为今之旦得雅—赫拉(Daundia—khera)，位于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的西北约104英里处,但他以卡库普尔当阿踰陀国的都城为前提，前题既失，结论也误。《西域地名》则比拟为今乌德东南之阿扎姆伽尔(Azamgarh、Azimgarh)。从乌德至此约70英里,合350古汉里,与《记》文的三百余里相符,但《记》文作东行,而阿扎姆伽尔实在乌德的东南。

《西域记》同卷阿耶穆佉国条云:“从此东南行七百余里，渡殑伽河南,阎牟那河北,至钵逻耶伽国。”钵逻耶伽(Prayaga)的都城即今恒河与朱木那河汇合处西岸之阿拉哈巴德。从阿扎姆伽尔至此约150英里,合750古汉里，与《记》文的七百余里相符，但方向为西南，而不是东南。《西域记》同卷钵罗耶伽国条云:“从此西南入大林中,恶兽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党,难以经涉,行五百余里,至憍赏弥国。”憍赏弥(Kausamb)的都城相当于今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萨姆(Kosam)(详见归程)。其行程只有38英里,合190古汉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不符。五百余里之“五”字可能是衍文，或作百余里。

《西域记》同卷憍赏弥国条云:“城西南八九里,毒龙石窟。……龙窟东北大林中行七百余里，渡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罗城，……自

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迦国。”鞞索迦(Visaka)，恭氏认为即法显的沙祇国，亦即阿踰陀或乌德。此说不足信，因为玄奘在同一旅程中，不会前后用两个不同的名称，以呼同一地点，而无所说明。《西域地名》关于鞞索迦的方位举出两说：一说在今印度毕塞普尔(Biseipur)，一说在今印度锡塔普尔(Sitapur)南二十英里之尼姆赫尔(Nimkhar)。按此两地从总的方向来看，约偏于西北。斯密士(V. Smith)认为玄奘的迦奢布罗(Kasapura)可能是卢克瑙(Lucknow)南14英里的一群以摩汉勒尔干兹(Mohanlalganj)为中心的遗迹，并把巴拉邦基(Barabanki)地区内距摩汉勒尔干兹直线距离约27英里的库尔司(Kursi)比拟为鞞索迦，库尔司距迦奢布罗170或180里(不满30英里)。此地既然在卢克瑙之南，则其方向亦嫌偏于西。我认为首先要确定迦奢布罗城的位置，此地经恭氏考订为今哥马提(Gomati)河上的苏丹普尔(Sultanpur)旧城，它的印度名称为库萨巴瓦那普罗(Kusabhavanapura)，简称库萨普罗(Kusapura)。迦奢布罗城既经考定，那么，它以北百七八十里(约合35英里)处有地名比卡普尔(Bikapur)或即鞞索迦国都城所在。从柯萨姆至此约120英里，合600古汉里，此为直线距离。玄奘先从柯萨姆至西南八九里的龙窟，再由龙窟东北入大林中行七百余里，渡殑伽河，至苏丹普尔，然由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比卡普尔，合计行程约达900里，路较迂回，故实际里程超过600里。

《西域记》同卷鞞索迦国条云：“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室罗伐悉底国。”室罗伐悉底(Sravasti)的都城虽已荒颓，尚有胜军王宫殿的遗迹。据恭氏的考订，为拉普提(Rapti)河南岸的一大废城，名塞特马赫特(Sahat Mahet)，位于乌德之北约58英里，合290古汉里。玄奘从鞞索迦东北行至此，为程约100英里，合500古汉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基本相符，方向亦一致。《西域记》卷六室罗伐悉底国条云：“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至劫比罗伐窣堵国。”劫

比罗伐窣堵(Kapilavasta)的国境包括哥格拉 (Gagra) 河与干达克(Gandak)河之间的地带,从费沙巴德(Faizabad)至两河的汇合处。卡尔叻勒(Carlleyle)又考订其都城为今布伊拉(Bhuila),在巴斯提(Basti)地区的西北部,距费沙巴德东北约 25 英里。但瓦得勒(Waddell)博士举出一个印度政府考古队所发现的新位置,认为是真正的劫比罗伐窣堵,主要以石柱铭文为依据,其发现地点在帕得利亚(Paderia) 村附近的尼泊尔特赖 (Nepalese Terai),距伯格万普尔(Bhagvanpur)之北约 2 英里及尼格利瓦(Nigliva)约 13 英里。富勒(Führer)博士又在戈拉克普尔(Gorakhpur)之北的特赖 (Terai) 发现一座石柱,其上刻着阿育王在位二十一年亲来向释迦牟尼诞生处礼拜的铭文⑥。从塞特马赫特至戈拉克普尔之北的特赖约 120 英里,合 6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基本相符,方向亦为东南。

《西域记》同卷劫比罗伐窣堵国条云:“从此东行旷野荒林中二百余里,至蓝摩国。”蓝摩(Ramagrama)的都城相当于今何地,学者意见不一致。一说是在关于 Gautama Buddha 宗族起源的传奇中释种的 Devadah 或 Koli,一说是在今拉姆普尔(Rampur),一说是在尼泊尔南境。但据《记》文,从劫比罗伐窣堵国东行二百余里至蓝摩国,则其都城必位于干达克(Gandak) 河沿岸无疑。今干达克河西岸尚有地名拉尼普尔(Ranipur),位于戈拉克普尔之东稍偏南约 60 英里,合 3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二百余里基本相符,或即为蓝摩国都城所在。《西域记》同卷蓝摩国条云:“自此东北大林中行,其路艰险,经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盗、猎师,伺求行旅,为害不绝。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罗国。”拘尸那揭罗(Kusinagara)的都城,据足立喜六的考证,应在论民园东约百五十英里,贝萨尔(Besarh)西北约百十英里,瓦腊纳西(Benase)东北百五十英里之地。换言之,非在干达克河支流之拉普提 (Rapti) 河上游地方不可⑦。但

恭氏曾考订为今卡斯亚(Kasia)村，位于戈拉克普尔之东35英里，其附近有一地名死王子(Mathakaar)可证。从拉尼普尔至此约44英里，合220古汉里。

《西域记》同卷拘尸那揭罗国条云："复大林中行五百余里，至婆罗痆斯国"。婆罗痆斯(Varanasi)的都城经一般考定为今印度北部恒河左岸的瓦腊纳西。从卡斯亚西南行至此约115英里，合575古汉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正合。《西域记》卷七婆罗痆斯国条云："从此顺殑伽河流，东行三百余里，至战主国。"战主(Chan-chu)是Garjanapati的意译，义为战争之主(Lord of Conflict or battle)。此地的印度原名为伽尔扎普尔(Garjapur)，其都城即今伽兹普尔(Garzipur)，位于恒河北岸，从瓦腊纳西东行至此为50英里，合250古汉里，与《记》文的三百余里、尚差约100里，玄奘当时可能是绕道而行。

《西域记》同卷战主国条云："从此东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厘国。"吠舍厘(Vaisali)的都城经恭氏考订为干达克河以东的贝萨尔村，其地现名拉勒干兹(Lālganj，见《法显传考证》附图三)，这里有古废堡，今尚称为Raja—Bisal—ka—garh，或Raja Visala堡垒。从伽兹普尔东北行至此约为100英里，合500古汉里。《记》文所谓渡殑伽河，实际是渡过几条恒河的支流，故里程远远超过百四五十里。《西域记》同卷吠舍厘国条云："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弗栗恃国。"按《慈恩传》记玄奘从吠舍厘国南行，经吠多补罗城(《记》作湿吠多补罗僧伽蓝)，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国，不言至弗栗恃国，但他所记弗栗恃国故宫城及诸圣迹的情况颇详，应是亲历。弗栗恃(Vriji)，《记》注言北人谓三伐恃(Samvajji)国，此国经圣马丁考订为今贾那卡(Janaka)或贾那卡普尔(Janakapur)，又作贾尼克普尔(Janikpur)，位于达尔班伽(Darbhanga)之北稍偏西约40英里处，其首府米蒂拉(Mithila)当在附近。但《西

域地名》谓弗栗恃在今达尔班伽北部马达班尼 (Madhabani)之北，其首府为波里伽尔(Baligarh)。《记》言其都城名占戌拿，今图马达班尼有地名贾伊那伽尔(Jaynagar)，与占戍拿之音较为相近。从贝萨尔东北至贾伊那伽尔约为 100 英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基本相符。《记》文虽说“从此西北千四五百里，逾山入谷，至尼波罗国”，又云:“从此复还吠舍厘国，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国，”但比尔认为玄奘并未亲历其境，关于此国的简单记述，是得自弗栗恃的传闻[8]。玄奘是从弗栗恃回到吠舍厘，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国。

摩揭陀(Magadha)乃五印度大国，位于恒河南岸，其都城为巴连弗，又名拘苏摩补罗(Kusumapura)、香花宫城，婆吒梨子城 (Patliputra) 及华氏城，即今之巴特那(Patna)。由贝萨尔至巴特那约30 英里，合 150 古汉里。玄奘求学的目的地是那烂陀寺 (Nâlanda sanghârâma)，寺在巴特那东南约 60 英里或九十余公里处，但据《慈恩传》，玄奘不是直接从巴特那往那烂陀寺，而是先行八十余英里，至巴特那之南稍偏西的伽耶(Gaya)城，再往南行 7.5 英里至菩提树，又往东行 20 英里至鸡足山。然后依原路回到伽耶城，从此东北行 25 英里至王舍城(梵名 Rājagrha，译言曷罗阇姞利呬城，又名罗阅城，即今之 Rajgir)，最后始到达城北 7 英里的那烂陀寺，总计从巴特那至那烂陀寺约共行了一百六十余哩。此寺为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学院，《慈恩传》描述其盛况云:“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集。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建立以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粳米酥乳数百石。由是学人端拱无求，而四事已足。艺业成就，斯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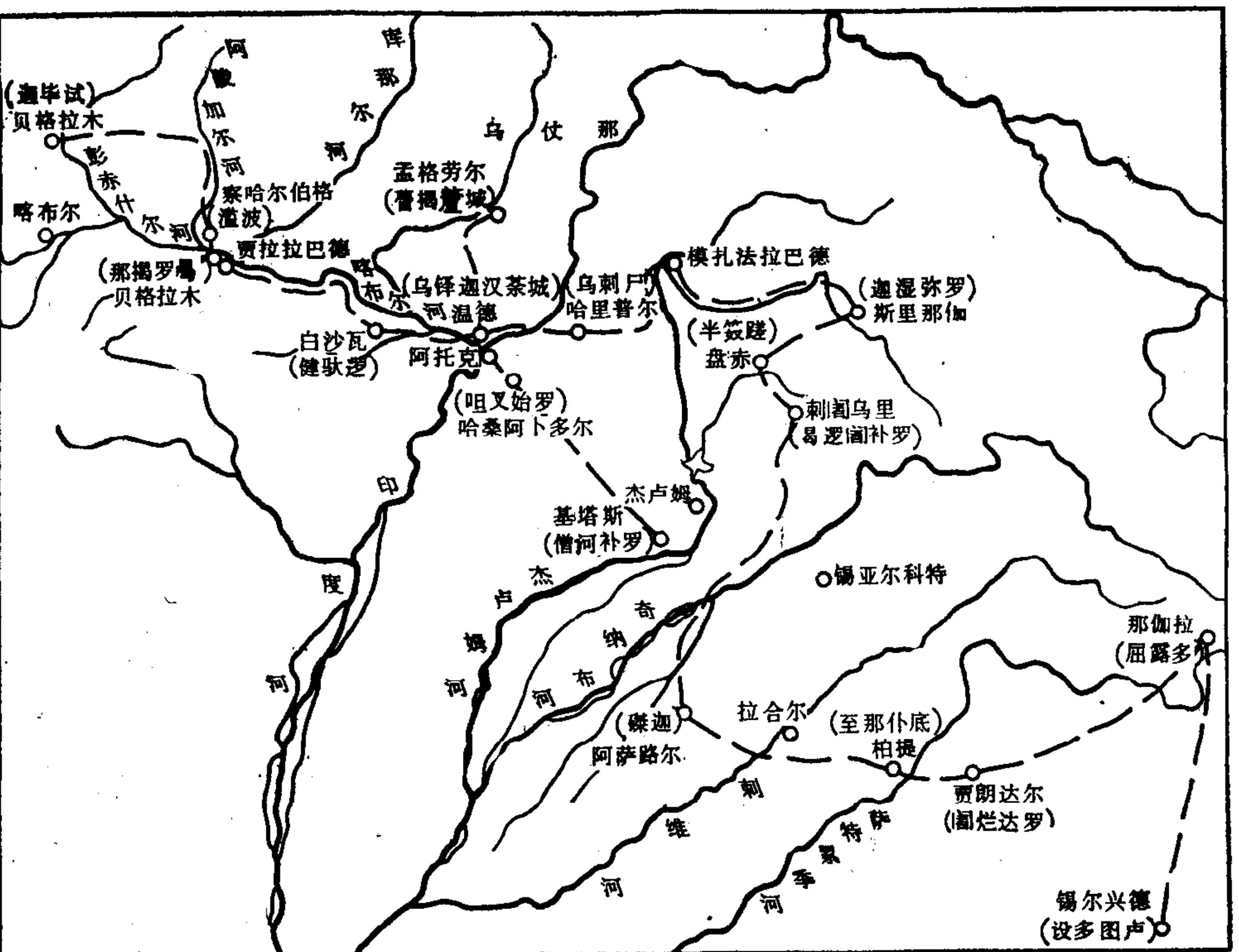


图8　从滥波国至摩揭陀国的行程(一)

图9 从滥波国至摩揭陀国的行程图(二)

焉”。玄奘在此寺学习《瑜伽论》，以及《正理》、《显扬》、《对法》、《因明》、《声明》、《集量》、《中》《百》二等论，钻研诸部，兼学梵书，停住了五年。公元1197—1203年间，此寺为外来的侵略者所毁，如今只剩下一个废墟。十九世纪间，欧洲考古学家根据玄奘的记述，进行发掘。本世纪初印度考古部门才将寺院残基发掘出来。一群用红色砖石砌成的建筑物遗迹，规模宏大。一部分像是学生宿舍，每间大小近二十平方米。宿舍附近还有一个较大的厅堂，大概是作为讲话之用的。那烂陀的主庙建筑在一个小山丘前，像一座古城堡，共分四层，每层都有很多大的石柱，石柱之间的石壁上雕刻着佛像，四周都刻着精美的花纹。发掘出来的文物，都陈列在废墟附近的一座博物馆里。为了纪念玄奘对中印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贡献，在本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印两国合作，在那烂陀寺附近修建了一座玄奘纪念堂。这是一座中国式建筑，造型和面积近似北京故宫里的大殿，加上红漆门窗和大柱，显得辉煌雄伟⑨。

①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256—257。
②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152页注二。
③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290—291。
④Si-yu-ki, vol. 1, p. 178 原 BK. IV, note 34。
⑤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354—355。
⑥同上，vol. 2, p. 16。
⑦《法显传考证》，168—170页。
⑧Si-yu-ki, vol. 2, p. 81 原 BK VII, note 103。
⑨李路：《那烂陀怀古》，《人民日报》1981年6月18日第4版。

南巡圣迹

（从伊烂拿钵伐多国到摩揭陀国）

玄奘在那烂陀寺勤学苦练了五年，为了更广泛地听取五印度高僧大德的议论及更多地巡礼圣迹，于是决计南游。《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条云："从此东入大山林中，行二百余里，至伊烂拿钵伐多国。"伊烂拿钵伐多(Hiranya-Parvata)，译言金山，但瓦特斯主张还原为 Irana-Parvata，译言荒山。经恭氏和费格孙沿用圣马丁之说，考订为今孟吉尔山 (Hill of Monghyr)，其国即以此山得名①。在昔时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北临恒河，控制着此山与恒河之间的陆路及恒河的水路。依今图约测，从巴特那东行，沿恒河南岸，至孟吉尔约 60 英里，合 3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二百余里基本相符。玄奘在此停住一年，向如来密和师子忍二大德学"毗婆沙"、"顺正理"等。

《西域记》卷十伊烂拿钵伐多国条云："从此顺殑伽河南岸东行三百余里，至瞻波国。"瞻波(Champa)，经恭氏考订为今巴伽勒普尔(Bhagalpur)，从孟吉尔沿大河南岸东行，至巴伽勒普尔约 50 英里，合 250 古汉里，与《记》文的三百余里稍为少些，可能因为实际路线比较迂曲之故。《西域记》同卷瞻波国条云："从此东行四百余英里，至羯朱嗢祇罗国。"羯朱嗢祇罗(kajughira 或 Kajangala)，经恭氏考订为今拉兹马哈尔(Rajmahal)。从巴伽勒普尔沿恒河南岸东行后，转向南行，至拉兹马哈尔约 80 英里，合 400 古汉里，与《记》文的四百余里基本相符。《西域记》同卷羯朱嗢祇罗国条云："从此东渡殑伽河，行六百余里，至奔那伐弹那国。"奔那伐弹那

(Punyavardhana)，恭氏曾考订为今之帕布那(Pubna 或 Pabna)，但费格孙则考订为今之兰普尔（Rangpur）附近②。从拉兹马哈尔东北行至兰普尔约 120 英里，合 600 古汉里，与《记》文的六百余里基本相符。

《西域记》同卷奔那伐弹那国条云："从此东行九百余里，渡大河，至迦摩缕波国。"迦摩缕波(Kamarupa)，经恭氏考订为今卡姆路普(Kamrup)，或西阿萨姆(Western Assam)，它的都城为今哥哈提（Gohati 或 Gauhati)。从兰普尔东北行至哥哈提约 200 英里，合 1,0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九百余里基本相符，惟方向则作东北而非东。《西域记》同卷迦摩缕波国条："从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国。"三摩呾吒(Samatata)相当于今何地，学者有不同的主张，但从方向和里程来看，以费格孙所考订的达卡(Dacca)地区比较可取。它的都城是锁那尔伽安（Sonargaon）位于达卡东南数英里处③。从哥哈提南行至锁那尔伽安，直线距离约 210 英里，合 1,050 古汉里，与《记》文的千二三百里相差不多。

《西域记》同卷三摩呾吒等国条云："自三摩呾吒西行九百余里，至耽摩栗底国。"耽摩栗底（Tanmalipti）据一般考订为今之塔姆路克(Tamluk)，位于舍赖（Selai）河与胡格利（Hughli）河相汇处。从锁那尔伽安西行至塔姆路克约 180 英里，合 9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九百余里相符。《西域记》同卷耽摩栗底国条云："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羯罗拏苏伐剌那国。"羯罗拏苏伐剌那(Karnasuvarna)，圣马丁谓羯罗拏(Karna)是安伽(Anga)的国王，他的都城应位于卡尔那伽尔(Karnagarh)，靠近巴伽尔普尔。卡尔那伽尔位于塔姆路克之北稍偏西约 190 英里，而由此至乌荼远达 300 英里，都与《记》文的七百余里不符。费格孙认为这个国家应包括布尔得万(Burdwan)的北部，比尔布姆(Birbhum)的全部和木尔什达巴德(Murshidabad)的基什那伽尔(Kishnghar)和遮索尔(Jessore)地

区。按此等地区都位于塔姆路克之北及东北，玄奘没有走此回头路的必要。恭氏认为这个国家的首府须就苏伐尔那——里克萨(Suvarna-riksha)沿岸的某地去找寻，此地约在辛格布姆(Singhbhum)和巴拉布姆(Barabhum)地区，并说巴拉巴沙尔(Bara Bazar)是巴拉布姆的主城，它的位置很接近于玄奘的记述，所以它应是七世纪时这个国家的首府④。《西域地名》谓今印度东北部之巴拉布姆地区及其附近。从方向和里程来看，以巴拉布姆地区及其附近相当于此国首府的位置，似较可取。从塔姆路克西北至巴拉布姆直线距离约 110 英里，合 550 古汉里，实际路程应较多，故《记》文作七百余里，方向则完全相符。

《西域记》同卷羯罗拏苏伐剌那国条云："从此西南行七百余里，至乌荼国。"乌荼(Udra)相当于今奥里萨(Orissa)，其首府一般考订为今之贾兹普拉 (Jajipura)。从巴拉布姆西南行至此直线距离约为 150 英里，合 750 古汉里，与《记》文相符。《西域记》同卷乌荼国条云："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余里，至恭御陀国。" 恭御陀(Kongudha 或 Konyodha)，经恭氏考订为今之甘贾姆(Ganjam)，后来的学者则认为其都城位于齐利卡(Chilka) 湖之北，在届塔克(Kuttack)与阿斯卡(Aska)之间的某地，阿育王大石柱之一就在其地。按恭御陀国的都城应位于阿斯卡附近 (北纬 19°37'东经 84°42')，一因它即在甘贾姆地区的范围之内，与恭氏的考订相符；一因若置于齐利卡湖之北，则里程相差太远。从贾兹普拉至此约 170 英里，合 850 古汉里，与《记》文的一千二百余里相差较多，方向则一致。

《西域记》同卷恭御陀国条云："从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餧伽国。" 羯餧伽(Kalinga) 的都城，经恭氏考订为今之哥达瓦里(Godavari) 河上的拉贾马汉得里(Rajamahandri)。从阿斯卡至此约 320 英里，合 1,600 古汉里，方

向是西南，与《记》文基本相符。《西域记》同卷羯餧伽国条云："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余里，至憍萨罗国。"憍萨罗(Kôsala)，亦称南憍萨罗(The Southern Kosala)，其都城经恭氏考订为今之那格普尔(Nagpur)。从拉贾马汉得里至此，直线距离为300英里，合1,500古汉里，方向为西北，实际里程必不止此数，所以可以说与《记》文的千八百余里基本相符。《西域记》同卷憍萨罗国条云："从此大林中南行九百余里，至案达罗国。"案达罗(Andra)的都城，恭氏曾考订为今之特令伽马(Telingama)，但费格孙认为是温吉(Vengi)城，与《记》文所载其都城号瓶耆罗的读音相近，今从后说。从那格普尔南行至此约320英里，合1,600古汉里，较之《记》文的九百余里超出许多。《西域记》同卷案达罗国条云："从此林野中南行千余里，至驮那羯磔迦国。"驮那羯磔迦(Dhanakataka)的都城，据费格孙的考订，为今之贝兹瓦达(Bejwada、Bezwara或Bezwada)。如果这一考订无误，则非承认《记》文的千余里为百余里之讹不可，因从温吉至此只有40英里，合200古汉里故也。

《西域记》同卷驮那羯磔迦国条云："从此西南行千余里，至珠利耶国。"珠利耶(Chulya、Chola)，恭氏曾考订为今之卡尔努勒(Karnul)地区，在建志补罗(Kancipura)之北北西，直线距离为230英里，及达兰尼柯塔(Dharanikotta)之西南西160英里。但费格孙假定玄奘在这里的旅行目的是要到乘船去锡兰的地方，故依方向和里程来看，其目的地应为讷劳尔(Nellore)，它是当时一个交通重地⑤。按从贝兹瓦达至卡尔努勒，其方向稍偏于西，而《记》文作西南，至讷劳尔，其方向稍偏于南，两者的距离均为150英里，但以讷劳尔相当于珠利耶的都城，理由较强。150英里，合750古汉里，与《记》文的千余里相差较多。《西域记》同卷珠利耶国条云："从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达罗毗荼国。"达罗毗荼(Dravida)的都城，《记》文称为建志补罗，恭氏曾考订为今康契普

腊姆(Conjeveram),但《慈恩传》谓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而此城不在海口。费格孙考订为今那伽帕塔姆 (Nagapatam), 此说似较可取⑥。从讷劳尔南至那伽帕塔姆约 270 英里, 合 1, 350 古汉里, 与《记》文的千五六百里相差不多。

《西域记》同卷达罗毗荼国条云:"从此南行三千余里, 至秣罗矩吒国"。惟据《慈恩传》卷四云:"自此国界三千余里,闻有秣罗矩吒",既云"闻有",则非玄奘亲历之地可知。《西域记》卷十一在叙述僧伽罗国后又云:"自达罗毗荼国北入林野中,历孤城,过小邑,凶人结党,作害羁旅。行二千余里, 至恭建那补罗国。" 按玄奘对秣罗矩吒国和僧伽罗国的记述,均非亲历,他是从达罗毗荼国直接至恭建那补罗国。恭建那补罗 (Konkanapura) 的都城位置何在, 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而以恭氏所考订的阿那贡第 (Anagundhi) 较为可取⑦。此城在通伽巴得拉(Jongabhadra)河上流的北岸, 从那伽帕塔姆至此的方向为西北,直线距离约 400 英里,合 2,0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二千余里基本相符。

《西域记》同卷恭建那补罗国条云:"从此西北入大林野, 猛兽暴害, 群盗凶残, 行二千四五百里, 至摩诃剌侘国。" 摩诃剌侘 (Maharashtra、Maharattha)的都城, 据弗利特(Fleet)和布尔格斯 (Burgess)的考订, 应位于那西克(Nasik)或其附近⑧。从阿那贡第至此,直线距离约 370 英里,合 1,850 古汉里, 与《记》文的里数相差颇多,可能因为玄奘当时所走的实际路线比较曲折之故,但方向与《记》文相符。《西域记》同卷摩诃剌侘国条云:"自此西行千余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禄羯呫婆国。" 跋禄羯呫婆(Bharukaccha)的都城,据瓦特斯说相当于今之布罗奇(Bharoch 或 Broach),而所渡的耐秣陀河,即今之纳巴达(Narbada)河。从那西克至此, 直线距离约 140 英里,合 700 古汉里,与《记》文的千余里相差颇多。方向为西北,与《记》文的"西行"亦稍有差别。

《西域记》同卷跋禄羯呫婆国条云:“从此西北行二千余里，至摩腊婆国。”原注又云:“即南罗罗国，南印度境。”摩腊婆(Malava)的都城位置何在,学者尚无定说。恭氏和圣马丁都认为其都城位于达拉那伽拉(Dharanagara)，比尔则以东伽尔普尔(Dongarpur)当之。但他们都误解了《记》文所谓“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据莫诃河东南”句中之“据”字的意义。他们以为此字乃“限以”或“屏障”之意,即都城东南阻以莫诃河或东南为莫诃河所屏障,因此把都城置于莫诃河以西。前提既失，结论乃误。我认为“据”应解作“占据”，即其都城占据莫诃河的东南地区。《西域地名》谓此国在印度纳巴达(Narbada)河以北,今马尔瓦(Malwa)一带地方。从读音来看,此说似较可取。但马尔瓦是一个大的地区,它的都城究在何处,此问题并未解决。莫诃河即今摩希(Mahi)河，已无疑问，则其都城的位置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为必须在摩希河之东南方;二为必须在马尔瓦境内。今之拉特拉姆(Ratlam)似较接近。如果摩腊婆国的都城位于拉特拉姆或其附近,则从布罗奇至此,其路线经过巴拉达(Barada)、哥得拉(Godhra)、多哈得(Dohad)等地，为程约200英里,合1,000古汉里,方向是东北,而非西北,里程和方向都与《记》文不甚相符,只能作为一种假定。

《西域记》同卷摩腊婆国条云:“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厘国。”阿吒厘(Atali),据瓦特斯说，可以假定玄奘实际未到过这个国家,因为那里没有圣迹可以巡礼,而且在他的旅行路线之外。我们从《西域记》下文,玄奘住契吒国,不是从阿吒厘起行,而是依然从摩腊婆出发来看,比尔的假定,似属可取。《西域记》同卷阿吒厘国条云:“从摩腊婆国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国。”契吒(Kachha或Khach)的都城，经恭氏考订为古吉拉特(Gujarat)的一个大城开拉(Kaira),位于阿梅达巴德(Ahmedabad)与康贝(Khambay)之间[9]。从拉特拉姆至此约150英里,合750古

汉里，较«记»文的三百余里为多，但方向相符。«西域记»同卷契吒国条云:“从此北行千余里，至伐腊毗国。”伐腊毗(Valabhi)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为今之古吉拉特东部的波那伽尔(Bhaonagar或Bhaunagar, 北纬21°42′东经72°15′)。从开拉至此约90英里，合450古汉里，方向是西南，里程和方向都与«记»文不符。

«西域记»同卷伐腊毗国条云:“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阿难陀补罗国。”阿难陀补罗(Anandapura)国的位置，据恭氏的考订，为从西边的巴那斯(Banas)河口至东边的沙巴尔马提(Sabarmati)河之间的三角地带，但不言其都城所在。按今巴那斯河西岸有阿布(Abu)山，其西麓有地名阿那得拉(Anadra)，读音与阿难陀补罗相近，或即为此国都城所在。从波那伽尔至此约150英里，合750古汉里，与«记»文相符，方向为北稍偏东，差异不大。«西域记»同卷阿难陀补罗国条云:“从伐腊毗国西行五百余里，至苏剌侘国。”苏剌侘(Surat或Surashtra)的都城，据«记»文谓西据莫醯河，去城不远，有郁鄯多山。玉连把郁鄯多山还原为Ujjanta，恭氏谓此山为巴利文Ujjayanta，并考定其为吉里那尔(Girinar)山，在朱那伽尔(Junagarh)旧城间矗起。朱那伽尔亦作朱那伽第(Junagadh)，即苏剌侘国的都城，位于卡提阿瓦尔(Kathiawar)半岛的南部。玄奘从阿难陀补罗回到伐腊毗，然后从伐腊毗的都城波那伽尔西行至苏剌侘的都城朱那伽尔，直线距离约110英里，合550古汉里，在方向和里程上都与«记»文相符。

«西域记»同卷苏剌侘国条云:“从伐腊毗国北行千八百余里，至瞿折罗国。”玄奘从朱那伽尔回到波那伽尔，然后再北行，以达瞿折罗国。瞿折罗(Gurjjara、Guchala或Guchara)即今古吉拉特(Gujerat)地区。它的国境和民族语言延伸至今拉兹普塔那(Rajputana)和马尔瓦的南部。«记»文谓其国都城号毗罗摩罗(Bhilmala)，圣马丁比拟为今巴尔梅尔(Balmair、Barmer或Balmer，北

纬25°48′东经71°16′)。从波那伽尔北行至巴尔梅尔约280英里，合1,400古汉里，与《记》文相差不多，方向正合。《西域记》所述此后的行程，有些似乎与一般旅行路线不合，所以不得不参照《慈恩传》的记载。据《慈恩传》卷四云："又东南行二千八百余里，至邬阇衍那国。"邬阇衍那(Ujayana 或 Ujjiyana)的都城，一般考定为今之乌贾因 (Ujjain，北纬 23°9′东经 75°43′)。从巴尔梅尔至此约 330英里，合1,650古汉里，与《传》文的里数相差较多，方向相符。《慈恩传》同卷云"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掷枳陀国。"掷枳陀(Jijhoti或 Jajhoti) 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为贾佐提(Jajhoti)王国，它的都城是卡拘拉哈(Kajuraha 或Kujura)，在今之本德尔汗(Bundelkhand)地区。但这是一个广大地区，它的都城可能是查塔尔普尔(Chhatarpur)，与掷枳陀的读音相近。从乌贾因至此约230英里，合1,150古汉里，里程和方向均与《传》文相符。《慈恩传》同卷云："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至摩醯湿伐罗补罗国。"摩醯湿伐罗补罗(Mahesvarapura)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为今那尔巴达河上流的马那拉(Manala)旧城，但此城的方位太偏于南，与《传》文的东北不符。《西域地名》谓在印度北境，今昌巴尔(Chambal)河以南，瓜廖尔 (Gowalior) 及其附近。按此地位于查塔尔普尔之北稍偏西，从查塔尔普尔至此约150英里，合750古汉里，方向和里程都比较与《传》文接近。《慈恩传》同卷云："从此又西还苏剌侘国，自此复西行至阿点婆翅罗国。"按从摩醯湿伐罗补罗西南还苏剌侘，路程太远，玄奘似无必要如此迂回，故此处应改从《西域记》，它在叙述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后云："从此还至瞿折罗国，复北行荒野险碛，经千九百余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国。"信度(Sindh)的都城，《记》文谓号毗苫婆补罗(Vichavapura)，据丁谦的考订，相当于今之什克普尔(Shikarpur)城，从方位言之，尚属可取⑩。由巴尔梅尔向北稍偏西至什克普尔，直线距离约230英里，合1,150古汉里，与《记》

文的千九百余里相差较多。

《西域记》同卷信度国条云:“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渡信度河东岸,至茂罗三部卢国。”茂罗三部卢(Mulasambhura、Mulathanipura 或 Morasampuru)，一般考定为今巴基斯坦的木尔坦(Multan)。从什克普尔东北至木尔坦，直线距离约230英里,合1,150古汉里，与《记》文相差不多。《西域记》同卷茂罗三部卢国条云:“从此东北行七百余里，至钵伐多国。”按钵伐多(Parvata)的都城塔克西利亚(Taxilea)远在东部(见下文),此时玄奘似无必要前往。《西域记》同卷钵伐多国条云:“从信度国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点婆翅罗国。”玄奘若不远往东部的钵伐多,则应由茂罗三部卢国回到信度,即由木尔坦回到什克普尔,然后再从信度至阿点婆翅罗国。阿点婆翅罗(Adhyavakila 或 Adinava-chila)，恭氏考订为信度国的第四省，七世纪时称为卡奇(Kachh),但卡奇为印度西海岸一大地区，其首府是今布季(Bhuj)，此城或即阿点婆翅罗国的都城。从什克普尔向南稍偏东行,至布季约320英里,合1,600古汉里,与《记》文相符。《西域记》同卷阿点婆翅罗国条云:“从此西行，减二千里,至狼揭罗国。”狼揭罗(Langala、Longhir 或 Lankar)，恭氏认为这个国家可比拟为勒库拉(Lakarian 或 Lakura)，是一个大的废城，经马孙(Masson)发现于科兹达尔 (Khozdar) 与基拉特(Kilat)之间⑪。从布季西北至此约400英里,合2, 000古汉里,与《记》文的减二千里基本相符。

《慈恩传》卷四云:“又从狼揭罗东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按此处所言方向有误,盖《记》文谓从阿点婆翅罗国西行，减二千里,至狼揭罗国,又谓从阿点婆翅罗国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则臂多势罗应在狼揭罗之南或东南,而不是在狼揭罗之东北。故《慈恩传》所云从狼揭罗东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应作东南行。臂多势罗 (Pitasila) 的都城，恭氏的考订为海达拉巴德

(Haidarabad)，今图海达拉巴德旁印度河，其对岸不远有地名皮塔罗(Petaro)，读音与臂多势罗相近，当即为其都城所在。从勒库拉尔南行至此，直线距离约230英里，合1,150古汉里，较《传》文的七百余里为多。《慈恩传》同卷云："从此(臂多势罗)东北行三百余里，至阿軬荼国。"阿軬荼(Avanda或Avanta)的都城，据《西域地名》谓在巴基斯坦印度河中流地区今拉詹普尔(Rajanpur)附近。从皮塔罗至此，直线距离约270英里，合1,350古汉里，《记》和《传》均作三百余里，恐为一千三百余里之讹，方向相符。《慈恩传》同卷云："从此(阿軬荼)又东行七百余里，至信度国。"又云："从此(信度)东行九百余里，渡河东岸至茂罗三部卢国。"按玄奘既然到了拉詹普尔，从旅行路线来看，似无必要再回到信度(什克普尔)，可直接由拉詹普尔东北行至茂罗三部卢(木尔坦)，为程约100英里，合500古汉里。《慈恩传》同卷又云："从此(茂罗三部卢)东北行七百余里，至钵伐多罗国"(《记》作钵伐多)。钵伐多罗(Parvata)的都城，据《西域地名》谓今克什米尔之查谟(Jammu)地方。按从木尔坦东北至查谟约270英里，合1,350古汉里，较之《记》和《传》所载之七百余里几多一倍，实难赞同。据帕尼尼(Panini)的考订，这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在旁遮普境内塔克萨西拉第(Takshasiladi)族之中⑫。今旁遮普南部有地名塔克西利亚(Taxilea)，位于萨达累季(Sutlaj)河的东岸。读音与塔克萨西拉第相近，或即为其都城所在。从木尔坦向东稍偏北行至此约150英里，合750古汉里，方向和里程均与《传》文相符。

《慈恩传》同卷云："从此(钵伐多罗)复东南还摩揭陀施无厌寺礼正法藏。……复还那烂陀寺，著《会宗论》三千颂。"摩揭陀的都城即今之巴特那，从塔克斯利亚东南行至此，直线距离约800英里，合4,000古汉里，但玄奘的实际行程必不止此数。玄奘从巴特那再向东南行约60英里，合300古汉里，才回到那烂陀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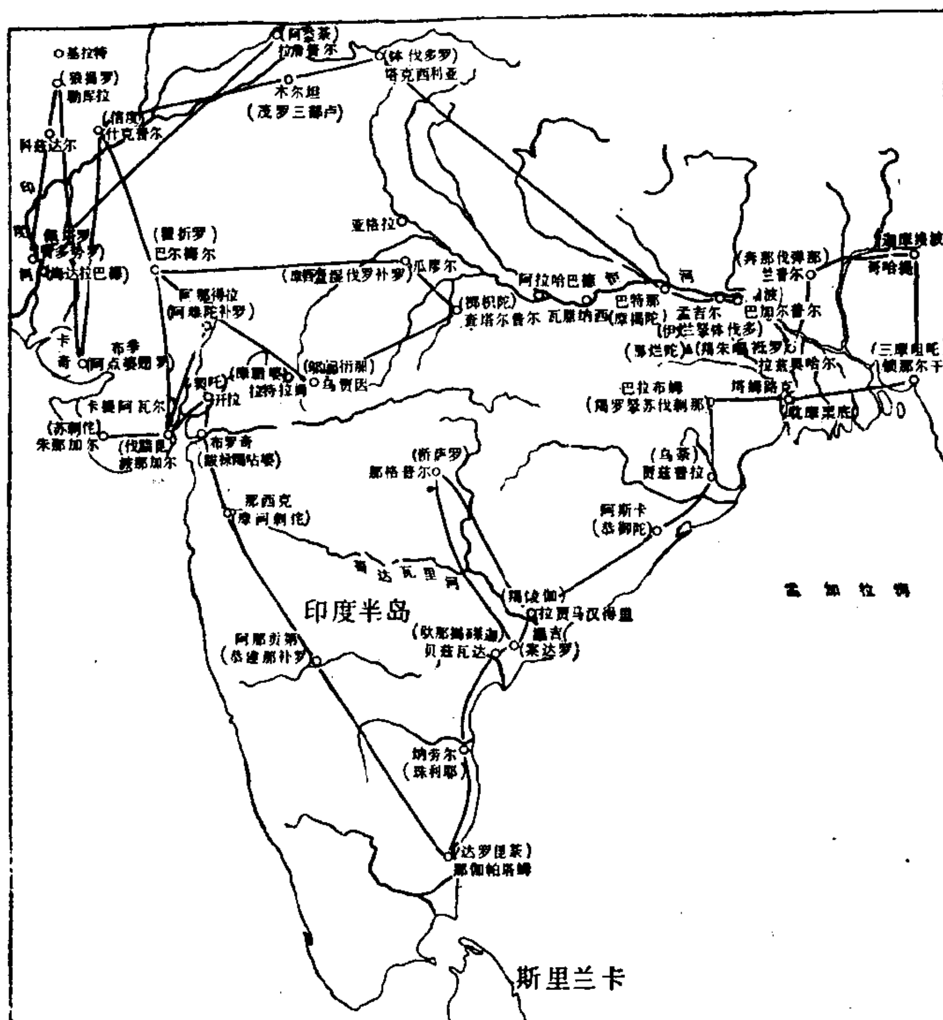


图 10　从伊烂拏钵伐多国至摩揭陀国的行程图

①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179。

②同上, p. 185。

③同上, p. 188。

④同上, p. 192—193。

⑤同上, p. 225。

⑥同上, p. 226—227。

⑦同上, p. 238。

⑧同上, p. 240。

⑨同上, p. 245。

⑩《大唐西域记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

⑪Samuel Beal. Si-yu-ki, vol. 2, p. 277 原 BKXI note 89。

⑫同上, p. 275, 原 BKXI, note 87。

学成归国

（从迦摩缕波国至达摩悉铁帝国）

玄奘在印度南游，巡礼圣迹后，回到那烂陀寺，正欲应戒日王（King Siḷaditya）之请，前往乌荼国。适迦摩缕波国鸠摩罗王（King Kumāra）亦遣使来请。玄奘已决意归国，诸德劝阻，请示戒贤，得其同意。乃因戒贤之劝，先随使往迦摩缕波国，会见其王，留月余。又因戒日王催促，遂与鸠摩罗王乘船溯殑伽河至羯朱嗢祇罗国，会见戒日王。王为玄奘召集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开一大会于曲女城，宣扬大乘教义。以玄奘为论主，悬其论点于会场门外，经十八日，无敢异议者。此会盛况空前，正如《慈恩传》所载："虽六齐之举袂成云，三吴之挥汗为雨，未足方其盛也。"大乘众尊称玄奘为"摩诃耶那提婆"（Mahāyāna Deva，此云大乘天），小乘众称玄奘为"木叉提婆"（Mo̓ksa Deva，此云解脱天），这是玄奘在印度期间声誉最隆之时。大会共开了十八日，第十九日玄奘欲返，戒日王又请同往钵罗耶伽国，参加七十五日的第六次施舍大会。会场位于殑伽河与阎牟那河汇合处之西岸，周围十五里，以往五次诸国王均曾在此大施舍。到会者五十余万人，经八十日方施毕，又数日方散。玄奘欲辞归，又被戒日王强留十余日。贞观十六年（公元 642）四月间，玄奘从钵逻耶伽起程回国。

《西域记》卷五钵逻耶伽国条云："从此入大林中，恶兽、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党，难以经涉，行五百余里，至憍赏弥国。"关于憍赏弥国的方位问题，曾经有过不同的主张，据瓦特斯说，恭宁翰考订憍赏弥的都城位于今Allahabad（Prayaga）西南 38 英里的柯萨姆

(Kasam)。这一考订，是由于恭氏误信玉连(Julien)译《慈恩传》时，把 500 里误写为 50 里之故。圣马丁(M. Saint Martin) 对憍赏弥的位置并无明确的考定，但他似乎认为此国位于钵逻耶伽的西北，而不是西南。斯密特(Vincent A. Smith) 断言，恭氏的考订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玄奘两次访问的憍赏弥有待于找寻，但当我们找寻的时候，就发现它是在巴格尔汗总监 (Baghelkhand Agency) 的一个土邦中，位于顿斯河(Tons River)谷，距连接 Allahabad 与 Jabapur 之间的东印度铁路不远，萨特那 (Satna) 火车站大致可以代表憍赏弥的位置。但这一考订，也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玄奘由钵逻耶伽西南行，已越出他的旅行路线之外，这样迂回的路程，尤其在他的回程时是不必要的①。比尔(Samuel Beal)认为憍赏弥的都城距钵逻耶伽 150 里，并考定其地名 Kosàmbinagar，距钵逻耶伽 30 英里，是朱木那(Jumnâ)河上的一个古村②。足立喜六说，拘睒弥（玄奘称憍赏弥）即今 Allahabad 西南 31 英里之 Kosam 村③。这些学者都以恭氏的考订为依据，但所说钵逻耶伽与柯萨姆的距离稍有出入，不知何故。比尔谓 30 英里，瓦特斯谓 38 英里，足立喜六谓 31 英里。但无论如何，谓其距离为三十余英里，不会差错。此一距离的里数，若依 1 英里等于5古汉里计，也不及 200 里，与《西域记》所载五百余里之数，相差太多。即据《慈恩传》所记玄奘从钵逻耶伽至憍赏弥，行了七日，亦不相符。这是恭氏考订的最大弱点，但他也有比较强的三点：第一是距钵逻耶伽较近，玄奘回国时再次巡礼劬师罗长者施佛园处的圣迹，非不可能；第二旅行方向与《记》、《传》相符；第三地名读音相近。此外，《法显传》云“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国名拘睒弥。”今从贝拿勒斯(Beneras，即《法显传》之波罗奈，《西域记》之婆罗痆斯。)之北（鹿野苑所在)西北行至柯萨姆村约 80 英里，正与十三由延的距离相符。所以我宁取恭氏的考订，而又不得不认为玄奘所谓五百余里，或系百

余里之讹，实衍“五”字。

至于《慈恩传》所谓行七日，乃据五百余里推算，非别有所据。《慈恩传》卷五云：“自发钵罗耶伽国，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赏弥国城南劬师罗长者施佛园处，礼圣迹讫。复与乌地多王（King Udita）西北行一月余日，历数国，重礼天梯圣迹。复西北行三逾缮那，至毗罗那拏国都城。”慧立在这里未明言玄奘所行经的是那几个国家，但所谓“重礼天梯圣迹”，知是指劫比他国。《西域记》卷四劫比他国条云：“伽蓝大垣内有三宝阶，南北列，东面下，是如来自三十三天降还也。”这是从憍赏弥国往毗罗删拏国途中所经最后一个国家，它的都城即今萨姆基萨（Samkisa），位于卡脑季（Kanauj）西北二百余里。从此又西北行三逾缮那至毗罗删拏，若依一逾缮那等于30里计，当为90里。《西域记》卷四毗罗删拏国条云：“从此东南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国。”可见从曲女城西北至劫比他二百余里，从毗罗删拏东南至劫比他也是二百余里，劫比他适在毗罗删拏与曲女城之间，两段距离约略相等。毗罗删拏国（Vîrasana），据恭氏的考订，其都城位于 Kali Nadi 河西岸 Karsana 之南四英里，Eyta (Etah)之北八英里，是一个遗迹的大土墩，名叫阿特兰兹卡拉（Atranjikhara）。《西域地名》谓毗罗删拏即今埃塔（Etah）府之比耳撒儿（Bilsar 或 Bilsand）。两者都在埃塔附近。《西域记》毗罗删拏国条又云：“大城中故伽蓝内，有窣堵波，基虽倾圮，尚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大土墩或即此窣堵波的遗迹，且方位明确，似较可取。据《慈恩传》，玄奘访问憍赏弥后，即西北行，并未复返钵罗耶伽。他所取路线，当是经过今巴尔伽尔（Bargarh）、曼尼克普尔（Manikpur）、班打（Banda）等地以达恒河西岸的坎颇尔（Cawnpore）。从此又西北行，至萨姆基萨，这就是劫比他国的都城。据《西域记》，从毗罗删拏国东南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国，则由劫比他国都城西北至毗罗删拏的行程约50英里。总计从钵罗耶

伽至毗罗删拏的行程约共 420 英里，合 2,100 古汉里。

《慈恩传》卷五：（毗罗那拏）"复西北行一月余日，经数国，至阇兰达国，即北印度王都。复停一月，乌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余日，至僧诃补罗国。"毗罗那拏即《西域记》的毗罗删拏，阇兰达，即阇兰达罗，今印度北境的贾朗达尔（Jalandhas）。玄奘从毗罗删拏西北行，若取道今哈特拉斯（Hathras）、伽兹阿巴德（Gaziabad）、安巴拉（Ambala）。卢迪阿纳（Ludhiana）以达贾朗达尔，行程约为 380 英里，合 1,900 古汉里。僧诃补罗（Sinhapura 或 Simhapura）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位于杰卢姆（Jhelam）附近盐山（Salt Range）北面的纥塔斯（Khetas 或 Ketaksh），距品达丹（Pind Dadankhan）16 英里，查柯瓦勒（Chakowāl）18 英里，北纬 32°43′东经 72°59′）。这一考订，恭氏并未坚持，但后来却为斯坦因（Stein）和布勒尔（Bühler）所确认。此处的神圣池沼，今尚为来自各方的巡礼者所访游④。玄奘从贾朗达尔经今拉哈尔以达纥塔斯的行程，依今图约测为 175 英里，合 875 古汉里。

《慈恩传》同卷云："如此复二十余日，山涧中行，……如是二十余日，行至呾叉尸罗国。"呾叉尸罗（Takshaśilā 或 Taxila）《西域记》作呾叉始罗，法显解释这个国名的意义为截头，别的作家则释为削石或凿石。巴利文作 Takkaasilā。胡格勒男爵（Baron Hügel）以为这个旧城的位置相当于今之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但恭氏则考订为今之沙得里（Shahdheri）附近，位于今之卡拉卡一舍赖（Kalaka-Serai 东北 1 英里处，他发现那里有一个城堡的遗迹，不少于五十五个窣堵波、二十八个庙和九个祠的遗迹。圣马丁以亚力山大大王远征的报告为依据，把呾叉始罗位于沙得里西北 8 英里的哈桑阿卜多尔（Hassan-Abdal）⑤。我认为哈桑一阿卜多尔在通道上，比较可取。它位于阿托克（Attock）之东稍偏南约 20 英里，拉瓦尔品第之西稍偏北约 35 英里，印度河支流哈罗（Haro）流经

其北。从《慈恩传》的记载来看，好像玄奘是在山涧里行二十余日，出山涧后又行二十余日，共约四五十日。其实，慧立用"如是"两字，就是总结了山涧中的行程，应仍是二十余日，而非四五十里。《西域记》卷三呾叉始罗国条云："从此东南越诸山谷，行七百余里，至僧诃补罗国。"假定行了二十五日，每日平均行三十里，因是山行，故较迟缓。

《慈恩传》同卷云：(呾叉尸罗)"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河，……法师与迦毕试王相随西北行一月余日，至蓝波国境。……至都，停一大乘寺。时王亦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蓝波国(Lampa，梵文作Lampāka)，据恭氏的考订，即今之拉格曼(Lamghan，俗称 Laghman)，位于喀布尔河之北，西界阿陵伽尔河(Alingar River)，东界库那尔河(Kunar River)。但拉格曼是指整个地区而言，作为此国的都城，究在何处？没有说明。按《西域记》卷二滥波国条云："从此东南行百余里，逾大岭，济大河，至那揭罗曷国"可见滥波国的都城是在那揭罗曷国都城西北百余里的地方，百余里约合二十余英里。所谓"逾大岭"，是指越过阿陵伽尔河与库那尔河之间的山岭；所谓"济大河"，是指渡过喀布尔河。这就说明滥波国的都城不会靠近喀布尔河北岸，因为从北岸至都城，还隔着一大山岭。至于那揭罗曷(Nagarahara)的都城，据恭氏的考订，位于今贾拉勒阿巴德(Jalalabad)之西二英里的贝格拉木(Begram)，圣马丁谓应在贝格拉木稍西，而斯姆孙(Simpson)经过仔细的考察后，认为它应位于贝格拉木之西素尔哈布河(Surkhab River)与喀布尔河汇合处的石台上。这是一座堡垒，是贾拉勒阿巴德地区的长官驻地⑥。如果从这里渡喀布尔河，又西北越一大山岭，共行二十余英里，则滥波国的都城应位于卡拉克—卡非尔达拉河(Karak—Kafirdara River)与阿陵伽尔河之间，约略相当于今之察哈尔伯格(Chaharbeg)地方。从哈桑—阿卜多尔西行，渡印度河，经白沙瓦(Peshawar)、达

卡(Dakka)、贾拉勒阿巴德、贝格拉木以西堡垒，渡喀布尔河，以达察哈尔伯格，全程约 170 英里，合 850 古汉里。

《慈恩传》同卷又云:"此(滥波国)复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剌拿国，礼圣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国，又西北往漕矩吒国，又北行五百余里至佛栗氏萨傥那国。从此东出迦毕试国境，王又为七日大施讫，法师辞发，东北行一逾缮那至瞿卢萨谤城，与王别北行。"伐剌拿(Varana)的都城，据圣马丁的考订，以为应在骨马勒河(Gumal River)中游的法内(Vanêh)，但恭氏则认为相当于今库拉姆河(Kuram River)地区的班努(Bannu)。从拉格曼至班努，为程约 150 英里，玄奘行了十五日，每日平均行 10 英里，合 50 古汉里⑦。

《西域记》卷十一伐剌拿国条云:"从此西北踰大山，涉广川，历小城邑，行二千余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国"。可见《记》文在伐剌拿国与漕矩吒国之间，并未提到所谓阿薄健国。关于漕矩吒(Jāguda)的都城位置，恭氏沿用圣马丁的说法，以为是今赫勒曼河(Helmand River)上的骨兹拉(Guzra 或 Gusaristan)。瓦特斯认为是今加兹尼(Ghazni)附近的札布勒(Zaḇul)旧城，但一般比拟为加兹尼，因《记》文谓其都城号鹤悉那，在读音方面较为接近故也。从班努至加兹尼的行程约 160 英里，合 8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二千余里相差太多，恐有讹误，慧立或即因此只记方向，不言里数。所谓阿薄健国，既然位于班努与加兹尼之间，依今图在此路线上较大的城镇有马屯(Matun)，它位于库拉姆河一支流的北岸，其东北面有地名宰木克特(Zaimukht)，与阿薄健读音有些接近。漕矩吒北行五百余里所至的佛栗氏萨傥那(Vrijisthāna、Parśusthana 或 Vardasthana)，《西域记》作弗栗恃萨傥那，并说其都城号护苾那，圣马丁因此考订为今之胡皮安(Hupian 或 Opian)，但恭氏把护苾那还原为 Kophene，并考订为今之喀布尔城。玉连则比拟为今加兹尼北 40 英里之瓦尔达克斯(Vardaks 或 Wardaks)。按胡皮安位

于今查里卡尔(Charikar)稍北,(北纬 35°2′ 东经 69°1′) 适当帕姆干 (Pamguan) 岭东北端山隘的入口⑧。其本身已在迦毕施国境之内，与《兹恩传》所谓“从此东出至迦毕试国境”不符。以喀布尔为弗栗恃萨傥那国,亦有此缺点。以瓦特克斯为该国,其缺点则在于里程只有 40 英里，合 200 古汉里，与《记》文从漕矩吒北行五百余里至该国的里程相差太远。我认为把弗栗恃萨傥那国置于喀布尔河上流地区，比较合理，因为据《慈恩传》东北至迦毕试国境之言，可以推知该国应在迦毕试国之西。又从加兹尼北行沿劳加尔(Logar)河向西南的一条支流,以达舍卡巴德(Shekabad),再沿劳加尔河向西北的一条支流,逆流而上,过乌乃(Unai)山隘,转而东向,沿喀布尔河以达卡斯塔姆克勒 (Kastam Khel)，此地或即为该国都城所在。从加兹尼至此,全程约 120 英里，合 6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基本相符。从方位和里程来看，都比上述三个比拟的地方为强。

玄奘从弗栗恃萨傥那东行，沿喀布尔河北岸，在喀布尔(Kabul)城对岸循大道转向北行，以达贝格拉木(Begram 与那揭罗曷国都贝格拉木同名异地)之南约 30 古汉里(一逾缮那)处，北距查里卡尔(Charikar)不远，(Charikar 或作 Charakar，可能是《慈恩传》所谓沙落迦寺所在地)参加迦毕施国王所召集之大施会。会后北行至贝格拉木，即迦毕试的国都所在，亦即《传》文的瞿卢萨谤(Grosapam)城。此城名称的来历或与哥尔班河(Ghorband River)一名有关,亚力山大大王曾在此处建一城堡,故亦名亚力山大一迦毕试(Alexandra—Kapisu)。

《西域记》卷十二弗栗恃萨傥那国条云:“从此国东北，逾山涉川,越迦毕试国边城小邑凡数十所,至大雪山婆罗库那大岭。岭极崇峻,危隥攲倾,蹊径盘迂,岩岫回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冻,凿冰而度。行经三日,方至岭上。寒风凄烈,积雪弥谷,行旅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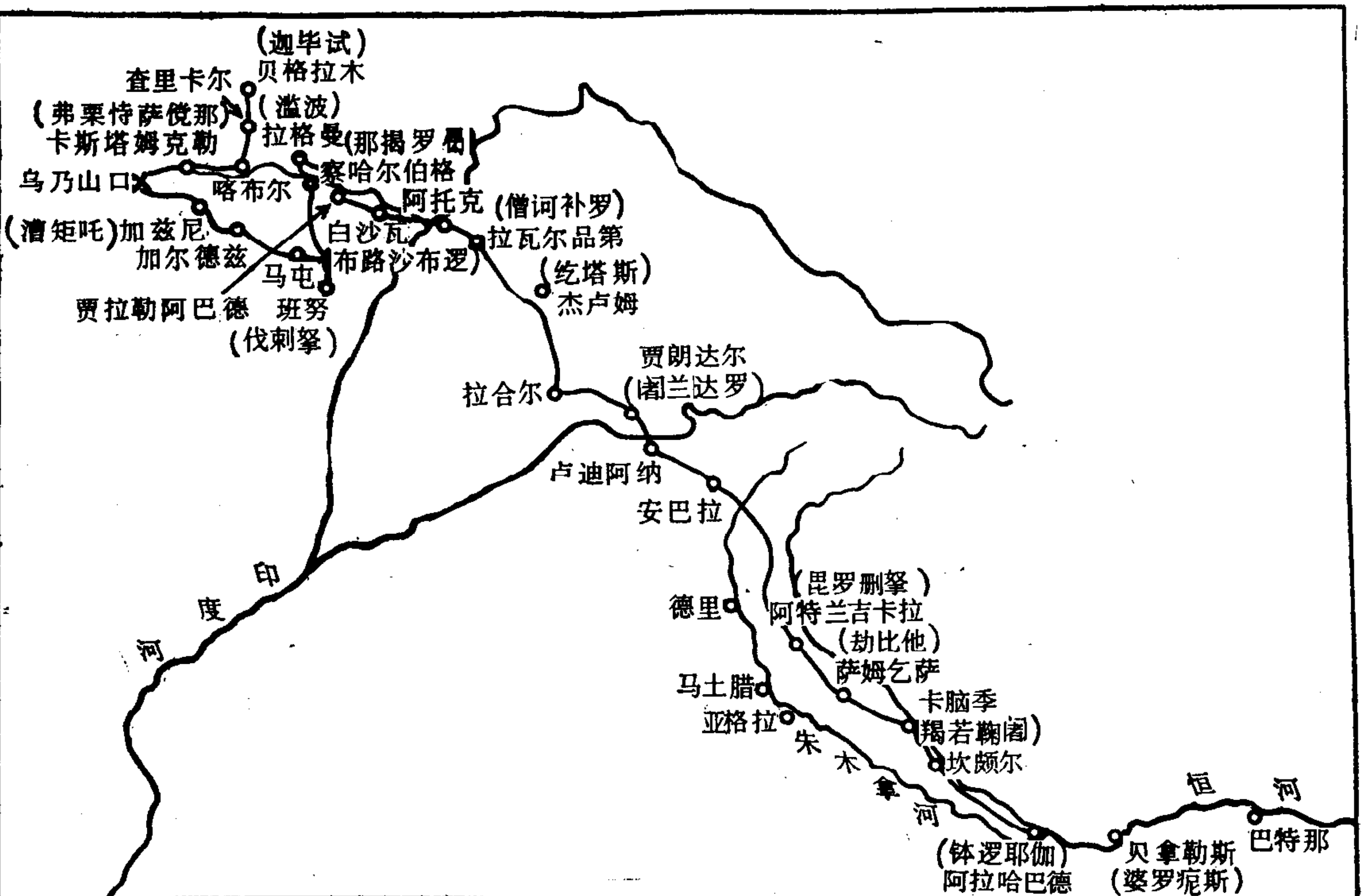
涉，莫能伫足。飞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后翻飞，下望诸山，若观培塿，瞻部洲中，斯岭特高。其巅无树，惟多石峰，攒立丛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岭，至安呾罗缚国。”《慈恩传》记此高山途程，与《记》文稍有不同。《记》言行三日至一岭上，又三日下岭，至安呾罗缚国，而《传》言行七日至大山顶，又行七日至一高岭，岭下有村，玄奘一行在此停宿，半夜复行，次日至岭底，又登一白石岭，此岭最高，又经五六日下山，至安呾罗缚婆国。前者行程只需六日，后者行程则需二十一至二十二日，相差颇大。《记》文所谓大雪山中的婆罗犀那(Varasêna)大岭，据比尔说，可能就是吴德(Wood) 所描述的卡瓦克山隘 (Khawak Pass)，海拔 13,000 英尺[9]。从贝格拉木东北行，沿今潘杰锡尔河(Panjshir River)上流河谷，经古勒巴哈尔(Gulbahar)、巴克沙拉克(Baxarak)、马尔兹(Marz)等迦毕试国小城邑，以达卡瓦克山隘，为程约 70 英里，合 350 古汉里。此段行程，《传》言须行七日，《记》未说明其所需日数。所谓“行经三日，方至岭上”及“又三日行，方得下岭”。仅指从卡瓦克山隘至安呾罗缚国的一段路程而言。安呾罗缚 (Andarab) 的都城应位于今印达拉布河(Indarab River)上流，今图其处尚有地名印达拉布(Indarab)，或即其都城所在。从卡瓦克山隘横越兴都库什(大雪山)，以至印达拉布约 30 英里，合 150 古汉里。前段行程依《传》言七日，后段行程依《记》言六日，则从贝格拉木(迦毕试)至安呾罗缚，共计行了十三日。全程约共 100 英里，合 500 古汉里，平均每日约行 38 里。

《西域记》卷十二安呾罗缚国条云：“从此西北，入谷逾岭，度诸小城，行四百余里，至阔悉多国。”阔悉多(Khousta 或 Khost)，玉尔(Yule)比拟为位于塔里汗(Talikan)与印达拉布之间，即今阿富汗的霍斯特(Khost)地方，在库拉姆河(Kuram River)流域之南。按库拉姆河尚在哥里河(Ghori River)或昆都斯河(Kunduz River)

之西，不在塔里汗与印达拉布之间的地区。今图确有地区名查勒霍斯特(Chal Khost)，正位于塔里汗与印达拉布之间，西界昆都斯河，东界富尔汗河(Furkhan River)。玉尔所言只有前面一部分正确，后面一部分则把昆都斯河误作库拉姆河。阔悉多国的都城在那里？没有说明，但从方向和里程来看，可以推定在今富尔汗河岸的伊什卡米什(Ishkamish)或其附近。从印达拉布西北行，经纳林(Narin)至此为程约80英里，合400古汉里，与«记»文的四百余里基本相符。

«西域记»同卷阔悉多国条云："从此西北，逾山越谷，度诸城邑，行三百余里，至活国"。活国即大食著述中所称的 Warwaliz，经考订为今之昆都斯(Kunduz)，从伊什卡米什西北行，经汗那巴德(Khanabad)至此约60英里，合300古汉里，与«记»文的三百余里基本相符。据«西域记»同卷，从活国东出，即入葱岭，东行百余里，至瞢健国。从此东逾峻岭，越洞谷，历数川城，行三百余里，至讫栗瑟摩国。从此东逾山越川，行三百余里，至呬摩呾罗国。从此东行二百余里，至钵铎创那国。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从此东南，逾岭越谷，峡路危险，行三百余，至屈浪拿国。从此东北，登山入谷，途路艰险，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从上述可以看出，玄奘所谓葱岭，已包括喷赤河以西的巴达克山，作为它的西界。此瞢健国不是卷一所称的纥露悉泯健国，后者经比尔考订为巴格兰(Baghlan)西42英里的萨孟干(Samangan)，位于胡勒姆河(Khulm River)上流流域，包括今路伊(Rui)、库拉姆(Kuram)和海巴克(Haibak)诸城邑。但比尔在注释«西域记»卷十二时，又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据一般的考订，此国是指今巴达克山之南，科克恰河(Kokcha River)及葛格达什脱河(Gogardasht River)两源之间的梦章(Munjan)。但这个地方北距玄奘的路线很远，而且与«记»文东行百余里，至瞢健国的方向不

符。玉尔以今塔利汗(Talikhau)当玄奘的瞢健，从方向和里程来看，似较适合[10]。据今图约测，从昆都斯东至塔利汗为 40 英里，合 200 古汉里，与《记》文的百余里基本相符。讫栗瑟摩(Khrishm)，玉尔考订为今基什姆(Kishm 或 Kashm)，即马可波罗的 Casem，距塔利汗三日程。玄奘为了避开拉塔班(Lataband)山隘，先取道东北行，至科克恰河南岸，然后沿河东南行，以达基什姆，故路线较长，依今图约测，为程 60 英里，合 3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三百余里基本相符。呬摩呾罗(Himatala)，玉尔考订为今达赖姆(Daraim 或 Dara-i-aim)，玄奘从基什姆至达赖姆，似非径向东行，而是先西北行，再沿科克恰河东南向，然后转至另一支流，以抵达赖姆，计程约 45 英里，合 225 古汉里，但《记》文作三百余里，仍有差距。钵铎创那(Patach'an 或 Badakshan)，玉尔考订其都城在今法札巴德(Faizabad)或其附近。从达赖姆先向西北行，抵科克恰河后转而向东，沿河北岸以达法札巴德，为程约 40 英里，合 2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二百余里基本相符。淫薄健(Inpokin 或 Impakan)，玉尔谓即今自哲尔姆(Jerm)以上科克恰河流域的古名雅姆干(Yamgan)，其都城当即今之哲尔姆。从法札巴德至此约 40 英里，合 2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二百余里基本相符。屈浪拿(Kuran)，玉尔考订为科克恰河流域上部的名称，其都城约当今之拉杰瓦尔德(Lajward)，以产瑠璃(Lapis Lazuli)著名。从哲尔姆沿科克恰河向南稍偏东行至此约 60 英里，合 3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三百余里基本相符。达摩悉铁帝(Dhammasthiti，大食语作 Termistat)，一般考订为今阿富汗东北境之瓦汉(Wakhan)，其都城为伊什卡什姆(Ishkashim)。玄奘先从拉杰瓦尔德沿科克恰河上流南行，至萨尔伊泯健(Shahr-i-minjan)，然后转向东北绕过梯尔伽浪岭(Tirgaran Range)的南端，经瓦尔都杰河(Warduj River)上流的僧格利齐(Sanglich)及该河中流的伊斯卡吐勒(Iskatul)、泽巴克(Zabak 或


(迦毕试)
贝格拉木
查里卡尔
(滥波)
(弗栗恃萨傥那)
拉格曼
卡斯塔姆克勒
(那揭罗曷
察哈尔伯格
乌乃山口
喀布尔
阿托克
(僧诃补罗)
(漕矩吒)加兹尼
白沙瓦
拉瓦尔品第
加尔德兹
布路沙布逻)
马屯
(纥塔斯)
杰卢姆
贾拉勒阿巴德
班努
(伐剌拏)
贾朗达尔
(阇兰达罗
拉合尔
卢迪阿纳
安巴拉
印
度
河
(毘罗删拏)
德里
阿特兰吉卡拉
(劫比他)
萨姆乞萨
马土腊
卡脑季
亚格拉
羯若鞠阇)
朱
木
拿
河
坎颇尔
恒
河
巴特那
(钵逻耶伽)
阿拉哈巴德
贝拿勒斯
(婆罗痆斯)
图11 归国行程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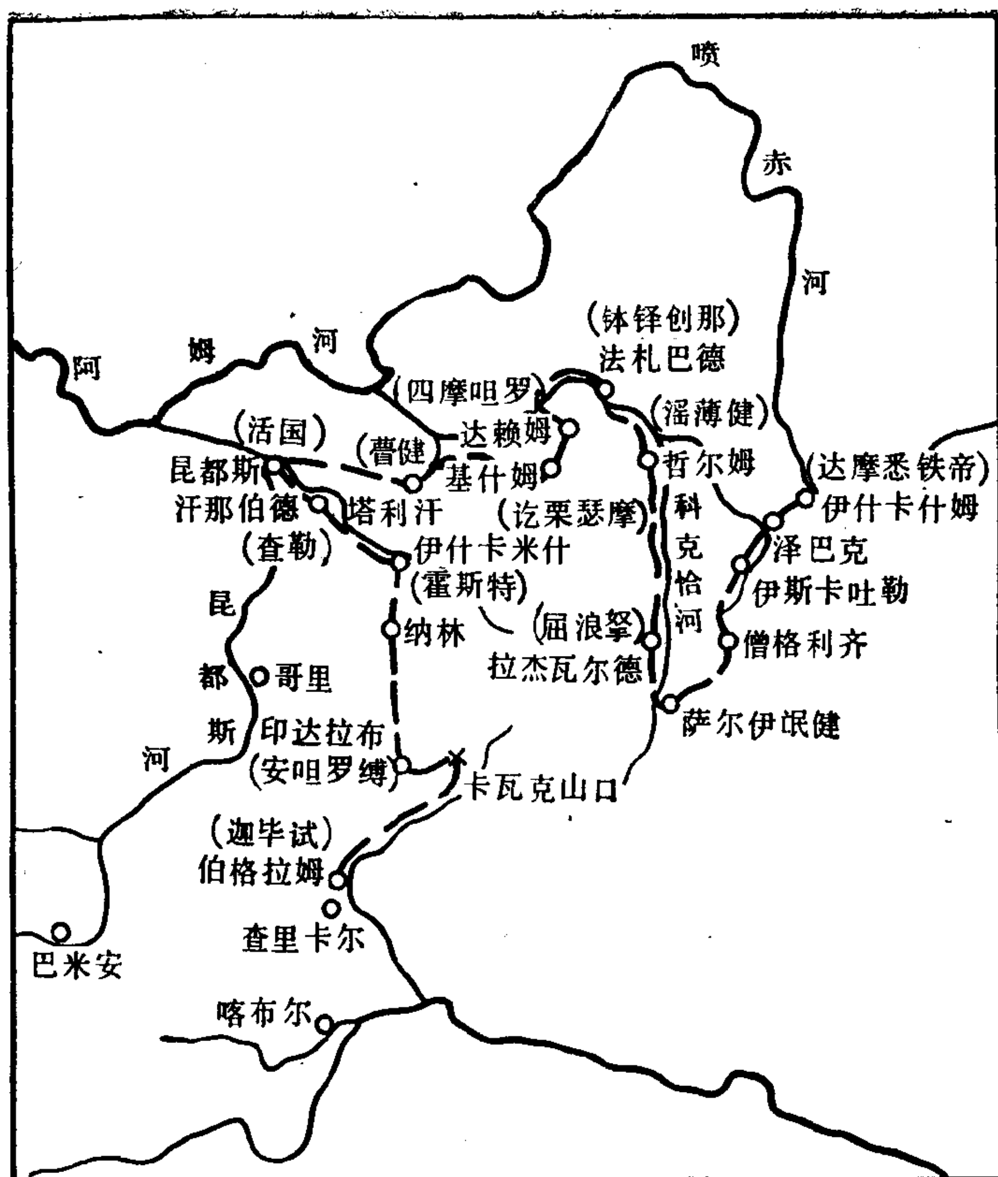


图 12 归国行程图(二)

Zibak)以达伊什卡什姆,计程约 100 英里,合 500 古汉里,与《记》文的五百余里基本相符。

①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366。

②Si-yu-ki, vol. 1, p. 234—235, 原 BK. v, note 62、63。

③《法显传考证》, 240 页。

④Si-yu-ki, vol. 1, p. 143 原BKIII, note 69。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 249。

⑤Si-yu-ki vol. 1, p. 136, 原BK. III, note 43。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I, P. 240-241。

⑥同上, vol. 1, p. 186。

⑦同上, vol. 2, p. 262—263。

⑧Si-yu-ki, vol. 2 p. 285 原BK. XII, note 9。

⑨同上, vol. 2, p. 286, 原 BK. XII, note 10。

⑩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272。

从达摩悉铁帝国至朅盘陀国的一段行程

《西域记》卷十二于叙述达摩悉铁帝国之后云:“逾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又在叙述尸弃尼国之后云:“越达摩悉铁帝国大山之南,至商弥国。”此乃玄奘以达摩悉铁帝国为基点,根据传闻,略述其北之尸弃尼(Shighnan)和其南之商弥(其都城在今 Mastuj,或曰在今 Chitral)。瓦特斯谓此两国不是玄奘所亲历①,其言可信,故下文云:“国境东北,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此所谓“国境”,乃指达摩悉铁帝国,而玄奘之往波谜罗川,即由此国起行。达摩悉铁帝,《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作达摩悉须多,均为大食语 Termistat 之音译。《新唐书·护蜜传》云:“护蜜者,或曰达摩悉铁帝,曰镬侃,所谓钵和者,……”是知此国亦即《后汉书》之休密,《梁书·西北诸夷传》之胡密丹,《悟空行记》之护密,《往五天竺传》之胡蜜,即今阿富汗东北境之瓦汉(Wakhan)地方。《西域记》达摩悉铁帝国条又云:“昏驮多城,国之都也。”日本东寺观智院藏宋本、《四部丛刊》影印南宋本、碛砂本、明径山本“昏驮多城”上均有“尸弃尼国”四字,核以《慈恩传》卷五,此四字实系衍文,日人藤田丰八《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及《西域地名》均沿用衍文,误也。《新唐书·护蜜传》又云:“王居塞迦审城”,与《西域记》所载都城异名,意者其王有时居昏驮多,有时则居塞迦审。据马迦特(Marquart)的考证,塞迦审即今之伊什卡什姆(Ishkashim),昏驮多即今之杭都特(Khandut),两城皆位于喷赤(Pandj)河左岸②。《西域记》所谓国境东北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据藤田氏

的考证，波谜罗川是指大波蜜罗(Pamir Kulan)，亦即大帕米尔。依今图约测，从伊什卡什姆至维多利亚湖(大龙池，Sir-i-kul 或 Victoria Lake)，计程约 150 英里，合 750 古汉里，适与《西域记》七百余里相符。若从杭都特起行，该城在伊什卡什姆以东 50 英里，要除去 250 古汉里，仅余 500 古汉里，与《西域记》的里程不合。故玄奘计算里程的起点，不是杭都特，而是伊什卡什姆。玄奘从伊什卡什姆起行，沿喷赤河南岸向东北行，过杭都特。但此河流经哈喇喷札(Kala Panja)之后，分南北两支，南支东行为阿布—伊—喷札(Ab-i-Panja)河，北支东北行为帕米尔河，故东西通道亦分为南北两条路线③。南线为一般旅行家和商队所经，故不少人认为玄奘取道南线④。南线沿着阿布—伊—喷札河东行，过瓦赫哲尔(Wakhjir)山隘，再沿瓦赫哲尔河南岸，行抵贝伊克(Beyik)，过此转北稍偏西，沿塔赫敦姆巴什(Taghdumbash)河东岸，以达塔什库尔干(Tashkurghan)。但我认为玄奘是取道北线的，因为玄奘所到之波谜罗川，乃指大帕米尔的广大地区而言，玄奘谓此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包括大龙池在内，只有此一地区足以当之。他沿着帕米尔河，经大龙池北岸以进入大帕米尔，然后沿着伊斯的克(Istik)河西岸东北行，直抵阿克苏(Aksu)河东岸的塔赫敦迷失伯格(Takhtamisbeg)之南，自此转南偏东，在辛地(Shindy)地方，转向东偏南行，越帕米尔高原的分水岭，经利亚俾尔得尔岭北麓，转向东北行，以达塔什库尔干(朅盘陀)。这条路线是从阿克苏河流域往塔什库尔干的捷径，与《西域记》所谓"自此川中东南，登山履险，路无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余里，至朅盘陀"，其行程和方向基本相符。玄奘从大龙池东头至塔什库尔干，计程约 125 英里，合 625 古汉里，与《西域记》的五百余里相差不多。这条路线与瓦特斯的附图比较，从伊什卡什姆至辛地的一段，基本相符，但瓦特斯附图的路线经辛地后，仍沿阿克苏河转向西南，直至此河上源帕米尔湖西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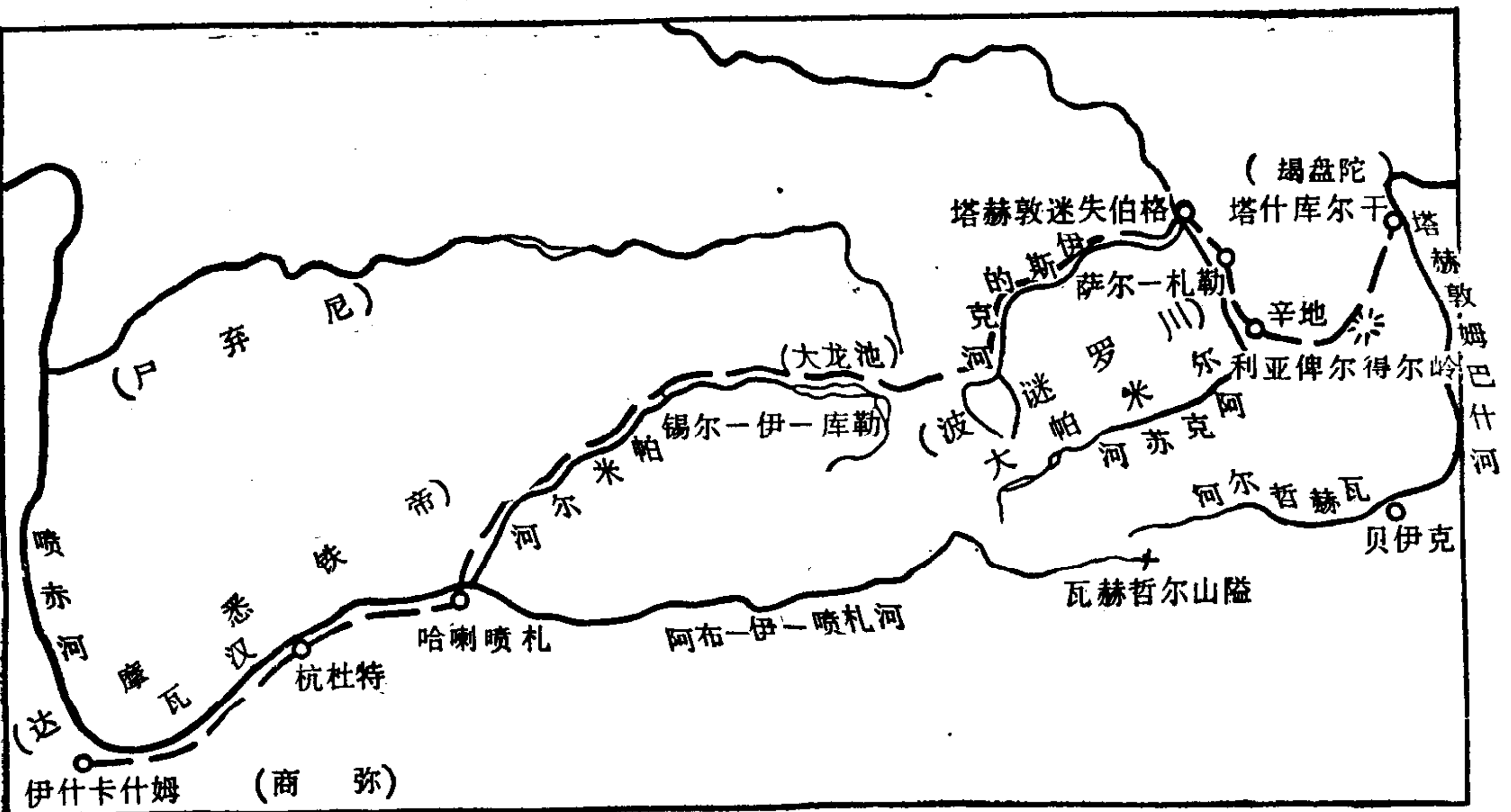


图 13　从达摩悉铁帝国至羯盘陀国的行程图

然后转向东行，过贝伊克(Beyik)后，转北以达塔什库尔干，要转了一个大弯，路程较长。玄奘归国心切，故宁取捷径⑤。

①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284。

②沙畹著冯承钧译《宋云行纪笺注》，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25页。

③《苏联世界地图集》第61—62图。

④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32—34页。

⑤据 Benedict Goës 中亚旅行路线图约测，并参考《苏联世界地图集》第61—62图。

朅盘陀国考

一、方位和都城

《西域记》的朅盘陀国，汉为无雷国地，《魏略》作喝盘陀国，《宋云行纪》作汉盘陀国，《魏书》作渴槃陀国，《北史》同。《南史·外国传》作汉盘陀国，《梁书·西北诸戎传》作渴盘陀国。又《续高僧传》作渴罗槃陀国，《隋书·西域传》不著录，其地当属朱俱波国。《新唐书》作喝盘陀，并云："或曰汉陀，曰渴馆檀，亦谓渴罗陀。"又引唐贾耽《四夷道里》云："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慧超《往五天竺传》作渴饭檀。《西域地名》云："今为蒲犁县治，县全境亦名色勒库尔(sharikol)。"至于《法显传》的於麾，《魏书》的权於摩，《清一统志》卷三二〇谓权於摩与渴槃陀二国同为一地，学者多从之，我于此不能无疑。据《法显传》，他从于阗国西行，在道二十五日，先到子合国，住此国十五日，南行四日入葱岭山，才抵於麾国，则於麾位于子合国之南。《汉书》谓蒲犁国南与西夜、子合接。又《魏书》谓权於摩国，故乌秅国也。"据《汉书》，乌秅国"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则乌秅国又在子合、蒲犁之南，故从方位言之，於麾国不可能在西夜、子合之西或西北，即不可能在渴槃陀国的位置，《魏书》既有权於摩国传，又有渴槃陀国传，是也。

沙畹把朅盘陀还原为 Karband或Garband①，但藤田丰八说是伊兰语 Kuhundiz 的对音，城寨之义②。按朅盘陀，古音读Kât buān dâ 与伊兰语 Kuhundiz 不类，应以沙畹之说为是。藤田氏又据《宋云行纪》"汉盘陀国正在山顶"，即以为此国治城至后世才在塔什库尔干。推其原意，是说旧都城原在他檀巴斯波谜罗(Taghdu-

mbash Pamir)山顶。其实从整个葱岭的形势来看，塔什库尔干即位于葱岭的最高地区。斯坦因曾考察过塔什库尔干附近的旧城，四周绕以石垣，中包一座塌了的中国堡垒，现在只是一座小村。从《西域考古记》所附第十七图，可以看出此旧城遗址是在山上，这可能就是玄奘所谓基于大石岭的朅盘陀国大都城。

二、迦舍罗国与朅盘陀国的区别

白鸟氏谓《水经注》的迦舍罗国相当于今之Sarikol溪谷，其国都为今之塔什库尔干，亦即《西域记》的朅盘陀国③。按玄奘时代朅盘陀国的都城之在今塔什库尔干附近的旧城遗址，已如上文所述，《水经注》的迦舍罗国，不能比拟为朅盘陀，尚有进一步论证之必要。《水经注》云："河水自葱岭分源，东径迦舍罗国。城南有水东北流，出罗逝西山，径岐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径无雷国北，又东流径依耐国北。河水又东径蒲犁国北，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若依白鸟氏的解说，河水是指叶尔羌河，其分源如果是指西源，发自小帕米尔高原(葱岭)，东径迦舍罗国(Sarikol)，城(Tashkurghan)南有水(Taghdumbash River)，东北流，出罗逝西山，径岐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径无雷国(Wacha河流域)北，又东流径依耐国(Raskam河与Wacha河两流域之间)北。河水又东径蒲犁国(Raskam河上流流域)北，河水又东径皮山国(Guma)北。此说牵涉到汉代无雷、依耐、蒲犁、皮山等国的方位问题，必须加以考察。据《汉书·西域传》蒲犁国条云："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如果把蒲犁国置于Raskam河下流流域，而Raskam河还在泽勒普善(Zarafshan)河的上流，溯此河上行，过Buramsa庄不远，即有东西二支水来会，东支为Chop河，有Chop庄，西支为Raskam河，其下游之东为Raskam岭，其西为塔什库尔干岭，河经两岭之间，白鸟氏所指为汉蒲犁国地者，当在此处。沿此河谷，今代地图

不当孔道。若从此处(约略与 Chop 庄同一纬度)沿河北向,经 Buramsa 庄、屯(Tong)庄以达托里布伦河北岸的 Tibis, 计程约三百里,然后又从此沿河西行,在 Hunsu Terek 庄对岸转北,再沿 Tsasrabansu 河谷,过 Taratokoi 庄,转东经Chihil-gumbaz,乃沿驿道经英葛沙尔,以达疏勒, 计程约 540 里, 总计从 Raskam 河下流至疏勒约共 840 里,与《汉书》所载从蒲犁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之数不符。

我们要追溯葱岭诸古国的方位, 《汉书·西域传》虽则有不少互相抵牾之处, 但基本上仍不失为我们研究的主要依据。《汉书》之疏勒,即今喀什噶尔(《西域地名》谓今于旧城设疏附县, 新城设疏勒县),此为无可置疑者。《汉书》之莎车, 据疏勒国条云:“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实际方向是东南偏南)。又莎车国条云: “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实际方向是西北偏北)。又汉皮山国的都城相当于今 Guma,已为大家所承认,那么位于疏勒东南偏南五百六十里及皮山西北三百八十里处之为汉莎车国, 也就确然无疑了。我们就从这三个国家的方位出发, 来推定葱岭其他国家的方位。据《汉书》莎车国条谓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 西夜国条谓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零四十六里,那么西夜在莎车西南三百里。西夜国条谓东与皮山接,则西夜国都城位于莎车西南三百里,东与皮山界相接。又莎车国条谓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 按莎车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 蒲犁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则蒲犁、莎车与都护治所的距离相差六百五十里, 此数比较接近于七百四十里之数, 足证蒲犁国条所谓至莎车五百四十里之“五”字为“七”字之讹。又蒲犁国条谓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 与莎车北至疏勒五百六十里,仅相差十里,而疏勒实处于莎车西北偏北, 所以蒲犁约略与莎车西东处于同样的纬度附近。蒲犁国条谓南与西夜子合接,则蒲犁在北,西夜子合在南, 东与莎车接。依耐国条的记载错误颇多,此国东北去都护治所只有二千七百三十里,

比莎车东北去都护治所尚少二千零十六里，核其方位，应在莎车西南方（因此条云："南与子合接"），显然二千七百三十里之"二"字为"五"字之讹，应作五千七百三十里，其都城则位于莎车西南九百八十四里处。又此条云："至莎车五百四十里，至无雷五百四十里"，而不言方向，其有缺文，显而易见。蒲犁国条云："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依耐国条云："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则知依耐国都城北距蒲犁国都城只有一百里。但蒲犁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依耐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七百三十里，两者相差三百三十四里，乃知伊耐北距疏勒六百五十里的"六"字为"八"字之讹，伊耐与蒲犁两国都城相距不是一百里，而是三百里。无雷国条云："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比莎车东北至都护治所的距离尚少二千二百八十一里，乃知二千之"二"字为"五"字之讹，故无雷国东北去都护治所应为五千四百六十五里，较之莎车东北距都护治所的途程多七百十九里，但据蒲犁国条云："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无雷国条云："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字当为"东"字之讹。若然，则无雷国都城应东距莎车一千零八十里，而无雷乃处于葱岭中部诸国的最西境。难兜国条云："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较之莎车东北距都护治所的途程尚少二千八百九十六里，显然二千之"二"字为"五"字之讹，故此国东北至都护治所应为五千八百九十六里。这样，从东往西，其位置为莎车、蒲犁、无雷，三国互相接境，正符«后汉书»莎车国传所谓"西经蒲犁、无雷至大月氏"。莎车东南至皮山城为三百八十里，西夜子合国都城东北距莎车为三百里，则西夜子合国境之东与皮山国境相接。又依耐国都城在蒲犁国都城之南三百里，东北距莎车九百八十四里，其国境则北与蒲犁，东与西夜子合接。又依耐国都城位于蒲犁国都城之南三百里，东北距莎车为九百八十四里，其国境则北与蒲犁，东与西夜子合接。据«水经注»，一水东流径依耐国北，则依耐国境的西部应

向北突出一部分，东又与蒲犁接境。西汉时无雷国都东距蒲犁国都为五百四十里，应位于今塔什库尔干或其附近地区。诸国分布大略如图。

我们试用此图来解释《水经注》文，“河水自葱岭分源，东径迦舍罗国”，即指 Karachukar 河(或称 Wakhjir 河)从帕米尔高原南端分源，东径迦舍罗国。此国应位于 Karachukar 河流域。“城南有水，东北流，出逻逝西山”，城是指迦舍罗国都城，今 Karachukar 河上流北岸的一支流上有庄名喀喇台(Karatai)，可能是都城所在地。“径岐沙谷”，此谷是指塔格敦巴什河所流经的山谷。“出谷分为二水”，即指塔格敦巴什河经塔什库尔干的东北，分作两支，一支北流，一支东流，故云:“一水东流，径无雷国北”，“又东流径依耐国北”。又云:“河水又东流，径蒲犁国北，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出，白鸟氏所谓《水经注》的迦舍罗国相当于南北朝时代以迄隋唐时代的渴槃陀国或汉盘陀国或朅盘陀国，未可置信。

岑仲勉对《水经注》的迦舍罗国，又别持一说，他认为此国应在今巴基斯坦的 Chitral，而非我国新疆西部的塔什库尔干④。他把兴都库什山当作两汉以至六朝时代的葱岭，以此作为他的论点的前提。他忽略了《汉书·西域传》的序文，有几处提到葱岭，所指都是帕米尔高原，而不是指兴都库什山脉。例如序文说: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从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师前王庭，随北山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此段提葱岭一名者凡五处，没有一处可以证明其为兴都库什山脉。关键之点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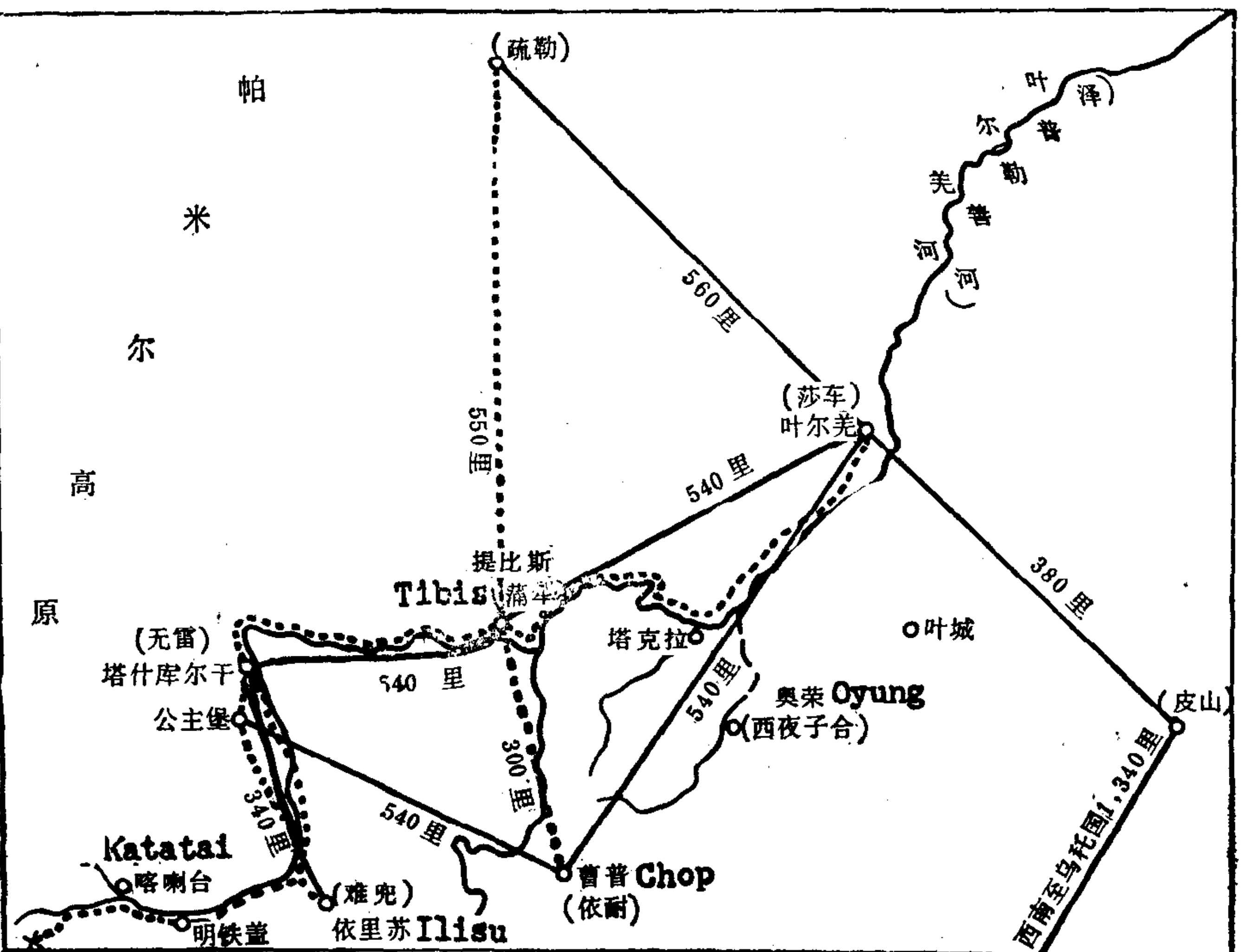


图14 汉代葱岭诸国方位示意图

于葱岭与河源有密切联系，据《水经注》："葱岭高千里，《西河旧事》曰：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亦即《汉书》所谓葱岭河东注蒲昌海者。这里的葱岭，应该是指帕米尔高原的分水岭，其北头从大喀喇库勒西北面的Kawfmann山（高22,920英尺）起，向东南延伸，经Rongkul和小喀喇库勒、Ghujah庄西、塔什库尔干西，以达小帕米尔的西南端。其主脉称为赫色勒-雅克（Kizil-yak），南北行，成为大分水岭。发源于此分水岭而东流的水，为中国河源，发源于此分水岭而西流的水，为阿姆河源。至于绵亘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其东头虽则有小部分伸入瓦罕境内，但与葱岭原为两个不同的山系，从地理学上来说，不能混为一谈。明乎此，则《水经注》所谓河水自葱岭分源东流所经的各个国名或地名，就不能置于此分水岭以西或西南的任何地方。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三记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释智猛从长安出发，往天竺求经云："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论国。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将欲阇毗，忽失尸所在，猛悲叹惊奔，于是自力而前，与余四人，共度雪山，渡辛头河，到罽宾国。"这里所谓雪山，是指兴都库什山脉，但雪山与葱岭并举，足证两者是不同的山岭，不能混淆。《西域记》卷十二活国条亦云："从此东入葱岭。葱岭者，据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地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玄奘所述葱岭，虽范围较广，但仍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脉）区别开来。岑氏以兴都库什山脉当葱岭之说，既不能成立，则《水经注》的迦舍罗国就不能位于Chĭtral了。

三、民族和宗教

朅盘陀国的民族，在历史上经过很多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今蒲犁县居民的形貌，来推定一千年以至两千年以上该地居民的人种类型，我们应该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研究其种族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变化。据《汉书·西域传》无雷国条云:“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又同传西夜国条云:“西夜国王号子合王，……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西汉时代西夜子合同为一国，西夜子合既系羌氐行国，朅盘陀在汉为无雷国地，而无雷国俗与子合同，则无雷国亦同出羌氐可知。羌氐是西藏种，在人种学上是蒙古利亚种的藏缅一支。但有些学者却颠倒了历史，如白鸟库吉主张原居朅盘陀国的土人为伊兰种，后来才有大批突厥人移居其地。又说，塔什库尔干即Sorikol地，一如现在，即在希罗多德(Herodotos)时代，似亦为伊兰人的本土⑤。岑仲勉则说，《汉书》之西夜，为种族名称，即指塞种，亦即释种。塞之原音为Sakiya或Sakya。依勒柯克(Von Le Coq)之考查，并参以我国记载，大约自西汉起，至九世纪中叶止，新疆北部——或东至哈密，大都被伊兰之粟特人所占。种族为吐火罗(Tuxara)，属印欧语系。西南二方至疏勒附近，被伊兰别一系塞种所占。蒲昌南界则为印度人所占，彼辈自印度西北部向东推进，并与藏族通婚，面部想已多少与东亚人相像，故中国史家称作羌族⑥。依岑氏此说，西汉时代不仅塔里木盆地南北诸国，被阿利安种伊兰系之粟特人所占领，而且葱岭诸国(包括朅盘陀在内)也被阿利安种伊兰系之塞种人所占领。这是不顾历史事实和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主观地从现代居民的形貌，以推断两千多年以前的人种类型。《三国志·魏志》引鱼豢《魏略》云:“敦煌西域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

据此，可知从西汉至三国时代，葱岭一带，一直是羌氐族游牧生息的地方。我们不仅有历史文献为据，而且有考古学上的证明。197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郊的香宝宝古墓地，发现了一批两三千年前的少数民族墓葬。从一部分墓葬的人头骨特征和随葬品中的装饰物的特点来看，可能是我国古代羌族的遗存⑦。《魏略》又云："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此为三国魏时通往西域的南道。经喝槃陀后，即度葱岭，出葱岭后又过护密(Wakhan)，依此推知，当时喝槃陀的方位，正与塔什库尔干一带相合。沙畹以《魏略》之满(蒲)犁与依耐、亿(德)若三国，位于今之塔什库尔干，而忽略了上文已有喝槃陀国之名⑧。又云："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蒲)犁国、亿(德)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修(循)国、琴国，皆并属疏勒。"亿(德)若、榆令、琴三国无考，但其叙述次序，自东而西，则蒲犁至捐毒之间的国家自应包括在内，故渴槃陀在当时也应役属于疏勒无疑。据《新唐书·西域传》疏勒国条云："王姓裴氏。"又喝盘陀国条云："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此足为渴槃陀役属于疏勒之旁证，又可知三国魏时此国王族是属于疏勒民族。疏勒人在人种上是属何类型?《汉书》记载简略，没有说明。据《魏书·西域传》疏勒国条云："人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皆不育。"手足皆六指，显然是当时疏勒人在人种上的主要特征之一，《通典》卷一九二疏勒条亦有同样记载云："其王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不育。"此为杜佑沿袭《魏书》之文，但"人"字已改为"王"字，说明其王族仍保持六指的特征，百姓则未必尽如此。洛克希尔(Rockhill)在记述西藏人的体格云："在西藏所观察各点之中，普通最易获见的畸形，即系六指。通常自拇指之旁分歧，然有时亦有生在手掌之中，与小指密接之处。"⑨此正与《魏书》所言疏勒人种的

特征一致。

据《后汉书·西域传》疏勒国条，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凉州刺史孟陀遣从事任涉，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等兵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足见其时疏勒国仍甚强大。《后汉书》无渴槃陀传，其时渴槃陀似尚未立国，但可能是疏勒统辖下的一个部落或地区。直至三国时代，仍是如此。《晋书》也无渴槃陀传。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法显从长安出发，往游天竺，途中入葱岭山，到于麾国安居。於麾国，《北史》卷九七作权於摩，《清一统志》以为权於摩与渴槃陀二国同在一地。足立喜六亦以法显所经之於麾国相当于宋云所经之汉盘陀国[10]。但都是臆测，没有充分的佐证。按法显所到之於麾国，即《汉书·西域传》的乌秅国(见《魏书·西域传》权於摩国条)，《汉书》谓乌秅国“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依方位测之，当在泽普拉善河(叶尔羌河)上游，喇斯卡姆河以北地区，其首府约当今之阿孜朵尔(Azdor)，显然与宋云之汉盘陀非同在一地。法显之不言渴槃陀，说明直至西晋及东晋前期，渴槃陀仍未立国。渴槃陀最早见于史书者为《宋云行纪》(见《洛阳伽蓝记》卷五)，作汉盘陀。宋云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公元519)行经汉盘陀，记述其国颇详。他从朱驹波国(奇盘河流域)至汉盘陀，乃走葱岭南道。《魏书·西域传》呎哒国条云:“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又渴槃、钵和、赊弥诸国条均云附于呎哒。又魏太和四年(公元480)左右，从北方来的民族呎哒灭亡罽宾。乃知渴槃陀之附于呎哒，即在此时。根据上述，渴槃陀之正式立国，似不能早于东晋后期(大约在公元401—420年之间)。宋云所记呪服池龙的国王是今王的十三世祖，事属神话，未可置信。渴槃陀早期的政权，掌握在疏勒人手中，只维持了二百多年，就被西来的另一种民族所攘夺。

《西域记》卷十二朅盘陀国条记述了一个这样的神话传说，略谓其国王自称是至那提婆瞿呾罗(Chinadeva-gotra,“汉日天种”)。此地从前是葱岭中的荒川，有波利斯国(不是指波斯国，而是Zebak与Chitral之间的一个小国,《魏书》称为波知国,亦即《马可波罗游记》巴达克山南的波沙)王娶妇汉土，迎归途中，至此适值兵乱，不能归国，随从官兵置女于山顶上(即今公主堡)。不久有娠，官兵惊惧。侍儿言，每日中午日轮中有一丈夫来会所致。官兵怕罪,不敢返国,即奉女为后,建官为主。后产一男，继母为王，威名远播,邻国称臣。母是汉人,父是天日之神，故其王族，貌同中国，身衣胡服。这一传说，虽属神话，但也可能反映一定的史实。记文只说“建国以来,多历年所”，究竟建国以来,经过多少代或多少年，无从推测。但自从《魏书》和《北史》对渴槃陀国有简单记述之后，至《隋书》不为立传。可以推想，自南北朝后期以迄唐初,此国已不复为疏勒人所统治,代之而起者，为波知国人。按中国史书,并无关于公主下嫁波知国王的记载，虽则有人将《穆天子传》关于周太王亶父以元女妻季绰于春山(葱岭)的故事套上,但毕竟是牵强附会,不可为据。所谓“娶妇汉土”,或指当时西北边境的地方政权,以女嫁给波知国王，也有可能。所谓与日神相会有娠，显然是野合有娠,而神化之,以图掩饰罪过。波利斯国居兴都库什山中，其民族为Galča种。此一神话正反映Galča人从波利斯国东移,侵入葱岭，而夺取了朅盘陀国的统治权。据《梁书·西北诸戎传》:“渴盘陀国,于阗西小国也。西邻滑国,南接罽宾国,北连沙勒国,所治在山谷中,城周十余里。国有十二城,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古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麦，资以为粮。多牛马骆驼、羊等。出好毡、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献方物。”所谓葛沙氏，即Galča的音译，是指山地的塔吉克(Tadjik)人。托玛显克(Tomaschek)认为现今尚在葱岭山地的Galča民族。

为 Arya 人的苗裔（Centratasiatische Studien)。据《梁书》所记，那时统治渴槃陀的民族，已不是疏勒人，而是西来的葛沙种人。正与《西域记》所载关于“汉日天种”的神话传说有相符之处。波利斯人的政权直至唐初玄奘经过该国时，仍然存在。王族是葛沙氏，但百姓仍以疏勒人为主，故《西域记》云：“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慧超往五天竺传》云：“又从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以(川)，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汉名葱岭。”按慧超从天竺归至安西(今库车)，是在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十一月，其抵葱岭镇，当在是年九月间⑪，从玄奘至朅盘陀国以迄慧超经葱岭镇，约历八十余年，据慧超所记，其旧王裴星，可见在此期间，疏勒人裴姓又重握政权，直至吐蕃攻没四镇，其王背叛投降。至开元中始被唐王朝所征服，于此设镇，即所谓葱岭守捉也。慧超谓国界已无百姓，其荒凉可想而知矣。

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一云：“塞勒库勒在叶尔羌城西八百里，为外藩总会之区，种人黄须绕颊如狮毛，不同诸国。”又谢彬《新疆游记》云：“蒲犁县东西一千四百里，南北一千二百七十里，有庄二十七。其民多塔吉克族(塔吉克即突骑施之音转，盖突厥也)。布鲁特次之，皆旃幕而牧，亦有服田畴者。其俗礼拜诵经，持戒如缠回。山出犁牛及羊。”按谢氏谓塔吉克为突骑施之转音，乃出于附会，因前者出自 Arya 种，后者则西突厥之一部，不能混淆也。布鲁特，即吉尔吉斯(Kirgis)，为突厥种。据此可知，现今蒲犁县居民的体质，包括西藏种阿利安种和突厥种或三者的混杂。

朅盘陀虽属小国，但因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为商旅和僧徒所必经，故佛教颇盛。《魏书·西域传》渴槃陀国条云：“亦事佛道。”玄奘所记较详，谓其王及百姓都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学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又说，王以其故宫为童受论师建僧

伽蓝。童受原是北印度呾叉始罗（Taxila）国人，梵名 Kumaralabdha，此名出自 Kumara，义为战神。彼曾教学于罽宾国，早负盛名。据传说，朅盘陀国势强盛时，其王兴兵往呾叉始罗国，将童受夺归供养。此一传说，未可置信，盖朅盘陀之立国，不能早于五世纪初，已如上述，而童受则为三世纪时人。且朅盘陀国王率军入侵呾叉始罗，亦难获充分史料，足为旁证。玄畅《诃梨跋摩传三论玄义》卷上以童受为有部(Sarvāstivadin)之学者，而《大乘玄论》卷五则谓其学出于昙无德部（Dharmagupta，法藏部），然《西域记》卷三，Kalhana《印度佛教史》及《唯识论述记》卷二，都说童受是经部(Sautrantika) 之师，其弟子诃梨跋摩（Harivarman）曾以迦旃延(Katyāyana)之《发智论》授诸僧众。《唯识论述记》卷二又谓呾叉始罗经部论师鸠摩罗多所造有《九百论》、《喻鬘论》，羽溪了谛认为鸠摩罗多当即童受。至于同书谓其为佛灭后一百年之人，明是错误⑫。童受居于印度北部，与东方之马鸣(Aśvaghosha)，南方之提婆(Deva)，西方之龙猛(Nāgārjuna)，号称"四日照世"。玄奘又谓童受"所制论凡数十部，并盛宣行"，但瓦特斯谓他所制诸论，没有一部遗留在中国大藏中⑬。

①《宋云行纪笺注》，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1957 年北京中华版，21 页。

②藤田丰八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民 20 年北平泉寿东文书藏校印，86 页。

③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民 29 年长沙商务版，69 页。

④岑仲勉著《课余读书记》。

⑤《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70、98 页。

⑥岑仲勉著《隋唐史》，47 页。

⑦《解放军报》1977 年 12 月 5 日。

⑧《魏略西戎传笺注》，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1957 年北京中华版，43—51 页。

⑨《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36页。

⑩足立喜六著何健民、张小柳译《法显传考证》，民26年上海商务版，48—50页。

⑪《慧超往五天竺传笺释》，83—87页。

⑫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1956年上海商务版338—339页。

⑬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289。

从朅盘陀国至佉沙国的一段行程

《西域记》卷十二朅盘陀国条云:"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大崖东北逾岭履险，行二百余里，至奔攘舍罗。……从此东下葱岭东冈，登危岭，越洞谷，溪径险阻，风雪相继。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铩国"。所谓大石崖和奔攘舍罗两个遗迹，玄奘闻于土人，未必亲到。《慈恩传》卷五仅谓城东南三百余里，至大石壁"，而不记奔攘舍罗。所以我们对"从此东下葱岭东冈"，只能理解为从朅盘陀都城向东出发。我们要研究玄奘这段行程，又必先解决乌铩国的方位问题。乌铩国究在何地？学者意见不一致，玉连(Julien)说，即费尔干纳(Fergana)的乌什(Osh)，其方位之不合，自不待言。丁谦谓即今叶尔羌西稍南之阿尔帕雷克回庄地，按阿尔帕雷克(Arpalik)在叶尔羌西南赫色勒塔克山 (Kizil Tag)中，与徙多河(叶尔羌河)相距尚远，且非"地土沃壤，稼穑殷盛"之地，与《西域记》所载不符。玉尔(Henry Yule)以今齐希勒坎巴孜(Chihil-gumbaz)当之，此名义为"四十寺院(Forty Domes)。此地当为玄奘东北行赴疏勒所必经，方向相符，但距朅盘陀只有百余里。据《西域国志》卷十八塞尔勒克条，由齐齐克里克(Chichiklik)西南行八十里至其地，而齐齐克里克至齐希勒坎巴孜的距离只及上述一半左右，与《记》、《传》所载八百余里相差太远。圣马丁(Saint Martin)、恭宁翰 (Cunningham) 和斯坦因均比拟为今之英吉沙尔(Yangi-hisahr)。按此城与疏勒、叶尔羌、和阗被称为"西四城"，地当蒲犁至疏勒及叶尔羌至疏勒两条通道的会合点，地处要冲。但此说可疑之处有二：一是《记》言乌铩国大都城南临徙多河(叶尔羌

河），则南临徙多河者为该国都城，并非如斯坦因所说其国境南临此河。从今图察之，此城南距徙多河最近处也有三百里左右，二是英吉沙尔西北距疏勒一百五十里，而《记》言从乌铩国北行五百余里至佉沙国，里程相差太远。藤田丰八谓乌铩南临徙多河，地土沃壤，则殆今之哥杀剌布(kosarab)，按哥杀剌布，《西域图志》作和什剌布，《清一统舆图》作火什喇普，今图作库斯拉甫，有小城，东距叶尔羌二百六十里，位于叶尔羌河上流托布伦河与泽普拉善河交汇处的东北方不远，叶尔羌河湾曲地流经其东南。此说可以解决南临徙多河及产玉问题。但也有缺点，依今代里程，从莎车西往蒲犁县治共十三程，七百九十里[1]，若除去莎车至哥杀剌布二百六十里[2]，只有五百三十里，与《西域记》从朅盘陀国东下葱岭东冈，行八百余里至乌铩国的里程不符。所以白鸟库吉把乌铩国位于今之叶尔羌(即古之莎车)[3]白鸟氏此说，不特解决了南临徙多河及产玉问题，而且与《西域记》从朅盘陀国至乌铩国八百余里的里程相符。以上诸说，我认为白鸟氏之说较为可取，即以今叶尔羌比拟玄奘时代的乌铩国，而乌铩一名是由《魏书·西域传》的渠莎演变而来。但莎车与渠莎原来不是同一国家，《魏略·西戎传》既有莎车国，又有渠沙国是为明证。渠沙国都城或即在今哥杀剌布，Ko-sarab，亦作Kusharab，头两个音节Kusha，恰为渠沙的音译，至北魏时渠沙已与莎车合并，故《魏书》云"渠莎国居莎车城"，而渠莎国都城已移至莎车。玄奘称渠沙为乌铩，其国境当亦兼有三国魏时的渠沙和莎车两国地。

玄奘从朅盘陀国都城塔什库尔干旧城起行，据今代驿程，从塔什库尔干至申底(Shindi)八十里，然后转向东北行，七十里至齐齐克(Chichilik)，六十里至塔尔巴什，五十里至托鲁伦，六十里至赤里拱拜(Chiligumbar)，自此转而东向，七十里塔希代克，七十里八海，六十里开子(Kizil)，六十里阿普利克(Arpalik)，六十里托呼拉

克，四十里协坦耿山口，六十里牙合孜勒克(Yaka-arik)，四十里热瓦奇，十七里阿拉巴哈奇八栅，十里卡木拉，十里上密霞庄，三里莎车城。以上共计七百九十里。古里小于今里，与玄奘所言从朅盘陀国至莎车国八百余里的路程相差不多。古今驿站名称虽有差异，但路线的差异想不会很大。

白鸟氏认为玄奘赴乌铩国的起程地点在奔攘舍罗(Punya sā-la)，据他考定，其地在今 Kundar 山④，此是误解《西域记》原文。据《慈恩传》卷五朅盘陀国条明说"法师在其国停二十余日"，不是在奔攘舍罗停二十余日，然后说"复东北行五日"，就是说在朅盘陀国停留了二十余日，然后向东北行进。我们应该理解为从朅盘国的都城东北行。如果理解为从奔攘舍罗起行，则大石崖在朅盘陀都城东南三百余里，奔攘舍罗又在大石崖东北二百余里，合共约六百里，从朅盘陀国都城至奔攘舍罗即使取直线行进，也要三、四百里，那么从奔攘舍罗至乌铩国只有五百余里，与玄奘所记八百余里之数不符。

《慈恩传》云："复东北行五日，逢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玄奘描述这段行程为"登危岭，越洞谷，溪径险阻，风雪相继"，估计每日只能行六十里左右，则其逢贼的地点当在离赤里拱拜不远处。

《西域记》乌铩国条云："从此北行山碛旷野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据《汉书·西域传》谓疏勒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从里程和方向来说，以莎车(今叶尔羌)当玄奘时代的乌铩国，正相符合。依现代的驿站，出叶尔羌城西行，八十里至巴什栏杆(Kok-robat)，转向北偏西行，十里必格尔满栏杆，十里土打阿浑栏杆，三十里阿吉儿瓦特(河色尔驿)，十里儿代克起栏杆，十里马雅克吉儿格栏杆，十五里玉代克栏杆，二十五里黑孜尔驿(Kizil Bazar)，十里察木伦庄，十里库图克庄，十五里踏木叶庄，十里合什公伯子庄，十里托和

布拉驿(Topluk),十里克立品,十里库车托和鼐,二十里柳树泉,二十里哈喇巴什庄(Karabash), 十四里英吉沙尔 (Yangi-hisar), 十里忙升庄,十里过库山大河,至麻木鲁克庄,十五里色依提庄,五十里雅布泉(Yapchak), 四十里塔斯浑庄, 二十五里疏勒[5]。以上从叶尔羌至疏勒全程计四百六十九里。若依锺广生所记自喀什噶尔至莎车驿程表, 从疏勒府底驿南七十里, 至雅卜藏(库森塔斯浑), 八十里至英吉沙尔,五十六里至托和布拉, 六十八里至黑孜尔, 五十三里至和色尔,五十二里至科科热瓦,八十里至渠沙驿。全程共计四百五十九里[6]。古里小于今里,与玄奘所记五百余里, 相差也不会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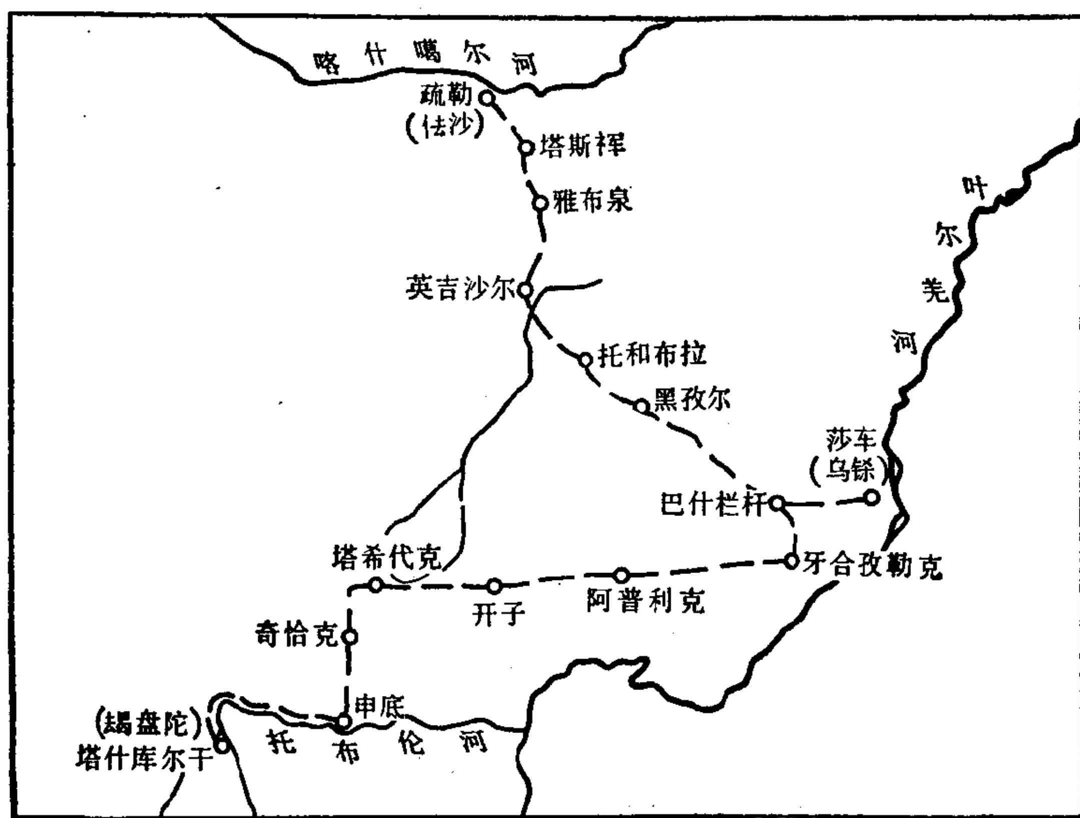


图 15 从朅盘陀国至佉沙国的行程图

①谢彬《新疆游记》,227 页。

②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一,和什喇布注。

③《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94页。

④同上，93页。

⑤《新疆游记》，222—224页。

⑥锺广生著《新疆志稿》，1930年哈尔滨中国印刷局排印，卷三86—87页。

佉沙国考

一、国名和都城

佉沙国，即两《汉书》的疏勒国。《三国志·魏志》引鱼豢《魏略》云："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蒲犁国、亿(德)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修(循)国、琴国皆并属疏勒。"则竭石只是疏勒属国之一，非即疏勒，故《西域地名》云："《魏略》作竭石，误也。"《晋书·四夷传》不为疏勒立传，但在鸠摩罗什传中作沙勒国。《魏书》、《北史》、《隋书》均有疏勒国传，《新唐书·疏勒传》云："一曰佉沙。"佛徒著作如《法显传》作竭叉国，《宋云行纪》作沙勒，《出三藏记集》作奇沙，《高僧传》及《续高僧传》作沙勒。惟《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伽师祇离，慧琳《一切经音义》作迦师佶黎 (Kashgiri)。喀什噶尔(Kashgar)之名，始见元代，《元史》译作可失哈耳，但藤田氏认为祇离与噶尔，为同音异字，若然，则唐代已有 Kashgar 之名①。至于疏勒一名的语源，据瓦特斯作 Sulik 或 Sulaq，出于Su，义为水②。白鸟氏则云："据《汉书·西域传》，今日的 Kashgar，为汉代的疏勒，Turk 语称"水"为 Su，称"有水"为 Suluk，Kashgar 地域，水草美好，故得此名"③。至于喀什噶尔(Kashgar)一名，据清徐松云："回语谓各色为喀什(Kash)，砖屋为噶尔(gar)，地富庶多砖屋也。"④但瓦特斯指出，此种解释，未必正确，Turk 语 Kasha (或 Kaska)，义为各色(variously cloured)，而 gar，蒙古语作 ger，是印度语 ghar 之讹，义为屋(a house)⑤。羽溪了谛引 Grenard 之说，谓伊兰语 kāsh，义为玉，baluc 语 ghar，义为市，又引白鸟

氏之说，谓瓦罕(Wakhan)语、阿富汗语 ghar，义为山，认为 Kashgar 一词，似系玉市或玉山之意。《西域记》佉沙国下注云："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讫栗多底，疏勒之言，犹为讹也。" 玉连(Julien)把室利讫栗多底还原为 Srikritati，字典中未闻有此字，可能是中国注释者搞错了⑥。羽溪氏则引斯坦因之说，谓其义"含有恶性之物"，为梵语 Kalusàntara、Kalusadhara、Kalusottara 之对音，并说"此名称恐为印度文化输入此国后，而附会其国民性之谓，当非此国固有之名称也⑦。" 按羽溪氏之说，比较可信，因为玄奘关于西域地名，往往习于附会为音读相近似之梵语，而不顾其意义之是否一致，以焉耆古名附会为梵语之阿耆尼(Agni)，即其例证。

玄奘记述一国的情况，依例必略叙都城的规模和形势，小国如遏逻胡(今阿姆河南岸的Ragh)，其国境周围只有二百余里，亦记其国都城周十四五里，而周五千余里的佉沙国，却无一言及之，宁非怪事？玄奘说佉沙是国名，疏勒是城名，但《新唐书·疏勒传》："疏勒，一曰佉沙。……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迦师城。"则疏勒亦为唐时国名，别名佉沙，其都城名迦师。据《魏书》和《北史》疏勒传均云："其都城方五里，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此乃指汉魏南北朝时代的疏勒旧城，非唐时之迦师城。《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道里》云："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谢彬云："伽师八栅，土人皆呼排素巴特。"按排素巴特，《西域图志》卷十七作牌租巴特，西距喀什噶尔城二百里。谢氏又谓伽师无城，玉代里克东北五十里山麓有废城，东西南三面断垣，存五尺许，北垣圮尽，相其基址，宏阔类王府。即阿摩支王所居之伽师城⑧。1929 年黄文弼曾考察喀什噶尔河畔的古城遗址，据他所记喀什噶尔附近的地理形势云："喀什噶尔旧设疏勒、疏附两县。疏勒设新城，疏附设旧城，两城相距约十公里。马路平直，树

以柏杨，沟渠萦回，房屋鳞比，在新疆市镇中，除伊犁外，当推喀什为首，现喀什设专署，疏附移设托库托克。……有喀什噶尔河，发源于葱岭山，东流经喀什城西北，分一支流，绕至城东，合为一河，亦名克子尔河，红水之义，《新唐书》称为赤河。……另一大河为盖孜河，亦发源于葱岭山中。有两源，西为木吉河，西南为雅满雅尔河，流至疏勒县境，合为盖孜河，东流灌疏勒、岳普湖两县地，余水入沙。《西域水道记》称：雅满雅尔河与克子尔河合，误也。喀什噶尔正因有两河流贯其境，故水草丰饶，民物殷阜，在南八城中，以喀什为最富。"又记牌素洼提（排素巴特）与英尔瓦特途中二古代遗址：一是阿西克栏干附近的托卜沁，城墙已颓，现存者高一米左右，为土坯所砌，城作方形，周三百六十三米，无遗物；另一个是在托卜沁东南约六七里，东北距英尔瓦特约六十余里的黑太沁（汉人城之义），区域甚广，横直三十余里，必为一大城，周围有烽墩及古房屋遗址，发现不少铜钱和陶片，与库车附近发现者同，盖为唐代遗址。黄氏认为若以喀什东北二十五公里伯什克勒木（按《西域图志》卷十七伯什克勒木西距喀什噶尔三十五里）之古城为唐疏勒镇城。（据《新疆图志·建置志》，则此地为达漫城。又一说为唐伽师城。而地方官所指为唐伽师城者，可能是大道旁的守望站，非古城遗址[⑨]。从规模来看，黑太沁遗址，应是唐疏勒国王阿摩支所居之迦师城，可能就是玄奘过此国时的大都城。汉魏六朝时代的旧城则应位于今疏附县治，即所谓回城。《魏书》和《北史》均谓其都城方五里，今城东北隅，尚有后汉时耿恭所凿井的遗迹。旧城在清乾隆二十四年曾重修，道光十八年阿奇木早敦又拓宽其西南面，光绪二十四年因协署在城外，复开西门，包以月城，周十二里七分，规模较旧城更大。

二、国势和历代诸王

疏勒在西汉时代，并非西域大国。据《汉书·西域传》，疏勒国只有一千五百一十户，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七口，胜兵只有二千人，与鄯善国约略相等而稍弱，因后者有一千五百七十户，一万四千一百口，却有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但其国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为汉通西域北道的中间站，故得迅速发展。至后汉时已蔚为西域大国。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其国领户二万一千，较西汉时增长十多倍，胜兵竟达三万余人，较西汉时增长二十多倍。西汉时诸疏勒王统，已无从稽考。至《后汉书》始载有疏勒王名。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 73)以前，其王名裴成，成于是年被龟兹王自建所杀，立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同年冬汉遣军司马班超劫缚兜题，而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安帝元初中(公元 114—120)疏勒王名安国，安国死，以遗腹为王。安国舅臣磐借月氏势力，夺取王位，而以遗腹为磐稾城侯。顺帝阳嘉三年(公元 134)臣磐遣使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臣磐在位直至灵帝建宁元年(公元 168)才被其季父和得所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国时其国尚强大，《魏略》载葱岭十二个国家，均服属于疏勒。北魏时其国转衰，胜兵只有二千人，役属于哌哒，孝文帝太和末年（公元 499）遣使来献。隋时其王字阿弥厥(《新唐书·疏勒传》作阿摩支)，大业中(公元 605—618) 遣使贡方物。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遣使献名马。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贡方物。高宗仪凤年间（公元 676—679）吐蕃破其国。长寿元年(公元 692)王孝杰败吐蕃，克四镇，于是疏勒复归唐有。中宗景龙二年(公元 708)突厥首领娑葛叛，自立为可汗，遣弟遮弩率众犯塞。娑葛发兵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时左骁卫将军兼校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在疏勒，于河口栅，不敢动。娑葛乃陷安西，四镇路绝。三年(公元 709)娑葛遣

使来降。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始遣大理正乔梦松册疏勒君裴安定为王。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其首领裴国良来朝。肃宗上元中(公元760—761)置疏勒都督府。唐以安西大都护控制西域,而安西又以四镇为屏障,四镇之中,除安西之外,又以疏勒一镇为关键,此郭元振之所以固守疏勒,以暂避娑葛叛军之锐锋也。疏勒地处唐帝国、西突厥、吐蕃三大势力之间,虽有时反侧,但始终成为唐帝国边陲的重镇。

三、疏勒与西突厥、吐蕃的关系

从上文我们只能获知历代疏勒极少数的王名,远不能构成疏勒的王统。疏勒处西域北道要冲,为军事必争之地,故自北周武帝保定天和间,以迄唐太宗贞观末期,西突厥据之,以制天山以南城廓诸国。《魏书·疏勒传》云:“每岁常供送于突厥”按此语不确,盖北魏时疏勒尚役属于哌哒,至公元五六三至五六七年间哌哒才为西突厥所灭,此殄哌哒之西突厥可汗,据沙畹考证,为达头可汗之父室点密(Istami)⑩,《魏书》为什么有此错误?因魏收原书,已佚二十九篇,今本《魏书》为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补,可能是校补时把《隋书》或《北史》疏勒传此语补入。(《魏书·西域传》已佚,后以《北史·西域传》补之。)西突厥势力之及于疏勒,当在北周武帝天和二年以后。《新唐书·西突厥传》:“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东即突厥,西雷翥海(Aral),南疏勒,北翰海。”同书《疏勒传》云:“突厥以女妻之。”西突厥与疏勒结成姻亲,其重视疏勒的地位,于此可见矣。(《旧唐书·西戎传》疏勒国条云: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玄奘行经此国,当在贞观十八年初,其时疏勒仍在西突厥势力之下。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阿史那社尔、郭孝恪等讨龟兹,破之。《新唐书·龟兹传》云:“西域震惧,西突厥安西国归军馕焉。”疏勒当于是时归唐。高

宗永徽元年(公元650)西突厥贺鲁叛,总有西域之地,疏勒亦叛附于贺鲁。显庆三年(公元658)苏定方平贺鲁。同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四年(公元659)既平贺鲁,思结阙俟斤都曼分镇其地,以弥射、步真不绥御之,遂率疏勒、朱俱波、朅般陁三国复叛,击破于阗[11]。龙朔二年(公元662)苏海政受诏讨龟兹及疏勒。麟德二年(公元665)疏勒、弓月两国共引吐蕃兵,以侵于阗[12]。咸亨二年(公元671)吐蕃陷安西,罢四镇[13]。四年(公元673)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从麟德二年至咸亨四年,此八年间疏勒实际上是听命于吐蕃和西突厥。仪凤二年(公元677)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疏勒为吐蕃所破。调露元年(公元679)裴行俭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匐以归,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14]。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助李都护再谋拔四镇[15]。从则天长寿元年王孝傑败吐蕃,克四镇,至中宗景龙三年娑葛遣使来降,已见上文。

四、民族、文字语言和宗教

《魏书》、《北史》、《隋书》均谓其人皆六指,产子非六指不育,我在上文叙述朅盘陀国时已经指出,此为西藏种人的特征。汉魏至南北朝时代,疏勒人民主要是属于西藏种的羌族,从北周之季以迄唐初,为西突厥所侵,始渗入突厥人种的因素,同时西来的阿利安人逐渐增多,定居日久,互相混杂,因而出现了"文身绿睛"或"文身碧瞳"的形貌。但据《通典·西戎传》谓其王手足皆六指,则唐时疏勒国王族仍保持西藏种人的特征。

《记》云:"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按疏勒国文字,取则印度,即模仿婆罗谜(Brāhmi)文字,但语言则是本地的,与西域诸国不同。伯希和谓佉沙语,我们毫无所知,但一印度名录胪列各种语言,已有佉沙语在内,别有

朅盘陀、乌铩二国，属此系统[16]。

《记》又云："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按疏勒为安西都护所辖四大镇之一，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居重要地位，而且在宗教上也居重要地位，据玄奘所记，屈支(龟兹)和瞿萨旦那(于阗)都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而佉沙国却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可见其时疏勒之佛教，仍然兴盛。惟因系小乘教，似不为玄奘所重视，故其所记，颇为简略。疏勒佛教，始于何时，已难确考。《汉书·西域传》疏勒国条没有言及其信奉佛教之事，《后汉书·西域传》疏勒国条虽亦不言佛教，但天竺国条则云："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又云："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此外，卷七《桓帝纪》，卷六十下《襄楷传》，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卷一〇三《陶谦传》，卷一一五《东夷传》三韩诸国条，都有关于浮图的记载。又《西域传》疏勒国条载：安帝元初中(公元 114—119 年)，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后臣磐借月氏兵力归国为王。其时月氏正当迦腻色迦二世(Kaniska II)在位。此王不特恢复其先王所占有之旧领土，且葱岭以东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皆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杂宝藏经》卷七六谓王曾越葱岭，征伐东方而未果，其人且为一热心信奉佛教之徒，此时大月氏之佛教实已臻全盛时期。疏勒与月氏的关系，既如是之亲密，则疏勒受佛教之影响，其势必然。但羽溪氏把疏勒王安国流徙臣磐于大月氏事，与《西域记》迦毕试国条有关质子伽蓝的传说附会牵合起来，谓臣磐是疏勒国送往健陀罗国迦腻色迦王二世的质子，迦腻色迦王二世乃在其夏都所在之迦毕试为

质子建此伽蓝[17]。此说殊不足信。一因河西蕃维所送者为质子，而疏勒王所流徙者为有罪的舅臣磐；二因《记》文谓王"治兵广地，至葱岭东"，而畏威送质者乃河西蕃维(甘肃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此地区之不同也，用兵扩张领土，与畏威送质子，此事件性质之不同也。又羽溪氏在论述大月氏诸王之年代时，谓迦腻色迦二世约即位于公元一一〇年，在位十年以上。但在论述此王兴隆佛法时，又说其在位大约当于公元五六十年[18]。自相矛盾，仍以前者较为可信。

至于公元二世纪初年以前，疏勒是否已传入佛教，尚无可靠的史料，足以肯定。据烈维(Sylvain Lévi)对佉卢(Khorostra)文书中所引《华严》、《大集》等经的研究，证明在公元初数世纪中印度佛经之境界，已逾印度至于于阗、疏勒。玄奘所称之佉沙(Khasa)，在佛徒译经中，有时也指雪山(兴都库什山)中之民族或国家，如公元五八七年阇那崛多 (Jinagupta) 译《方广大庄严经》，译 Khāsya 或 Khāsya 作疏勒，而同一译者所编纂之《翻梵语》一书，则释"佉沙"之义为"边"，范围广泛。《毗婆沙论》所谓佛以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其所列各民族中，即有佉沙(Khasa)之名，是指雪山中诸佉沙民族。《月藏经》中佛说分布阎浮提品第十八品星宿摄受品所录各国之名，在十七毕宿二十五国中，既有第九佉沙国(Khasa)，又有第二十三沙勒国 (Kachgar)。又列举佛现处诸国名录，既有第四十五佉沙国(Khasa)，又有第四十八沙勒国(Kachgar)[19]。从上述看来，佉沙(Khasa)一名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古印度西北边境(今巴基斯坦东北)或雪山中诸民族，狭义则有时指疏勒，有时指雪山中一国家。但无论如何，玄奘的佉沙国是专指疏勒，即今之喀什噶尔，无可置疑。

据《水经注》卷二引释道安《西域记》云："疏勒国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方四尺，王于宫中供养。"可见公元四世纪中叶，疏勒国

王崇信佛教，且有来自天竺国之佛浴床，于宫中陈设供养，佛教已臻隆盛，则其国之浸染佛道，由来已久。我们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也可以看出当时疏勒佛教的盛况。《传》谓其母携什还龟兹，途中停住沙勒一年。什在沙勒曾顶戴佛钵，忽轻忽重，如其心所觉，与公元五世纪初释智猛往天竺，途经奇沙国顶戴佛钵时几有同样感觉。猛在此国又见佛石唾壶，而早于猛几年到竭叉国之法显，亦在竭叉国见佛石唾壶，因而一部分学者如沙畹、斯坦因、足立喜六等认为疏勒、奇沙、竭叉原系同一个国家，即今喀什噶尔(Kachgar)地方。但也有一部分学者不同意此说，如劳林孙(Rawlinson)和白鸟库吉均主张法显的竭叉，相当于今塔什库尔干(Tashkurghan)。岑仲勉则主张竭叉国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的Chitral，其语源为 galča，而智猛之奇沙，则相当于今 Chitral 东北相隔约一変的 Ghizar[20]。按法显从于阗西行，在抵达竭叉国之前，先行二十五日到子合国，再行四日到于麾国。子合国在汉代与西夜合为一国，《汉书》称“西夜国王号子合王”，大约位于今叶尔羌河一支流奇盘河流域。于麾国即《北史》权于摩国，据《北史》云：“权于摩国，故乌秅国也。”汉乌秅国大约位于泽普拉善河上游及 Raskam 河以北地区。法显又从于麾国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即从 Raskam 河流域向北行二十五日至喀什噶尔，其途程大约是从 Raskam 河西段 Surukawat 附近，沿河谷西北行，然后转北，沿泽普拉善河谷，直至叶尔羌河北岸，即汉代蒲犁国所在的提比斯(Tibis)附近，约一百五十英里，若依一英里合五汉里计算，合七百五十汉里，再加上从蒲犁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合计一千三百汉里，行了二十五日，每日平均行五十四里，在葱岭山谷崎岖险阻的情况下行进，似颇合理。至若劳林孙(Rawlinson)和白鸟氏主张竭叉国在塔什库尔干，按白鸟氏把塔什库尔干比拟为希罗多德(Herodotus)的 Caspi，拖雷姆(Tolemaeos)的波斯第十五太守管区的

Casia，还缺乏有力的佐证，波斯大流士(Darius)王的势力是否能达到塔什库尔干，殊属可疑[21]。岑仲勉主张竭叉国在今巴基斯坦东北部 Chitral 东北的 Chizar，法显从 Chizar 至陀历(Daril)又何需在道一个月，而且要度过葱岭，始入其境？所以我仍认为以喀什噶尔当法显之竭叉国，较为可取。

罗什在沙勒诵阿毗昙，并讲《转法轮经》，又寻究外道经书，博览四韦陀典及五明诸论。又从莎车王子须利苏摩(Suryāsoma)学大乘，乃叹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沙。"这是罗什一生学业的转折点。稍前于罗什而来至沙勒的名僧，有佛陀耶舍，据《高僧传》初集卷二《耶舍传》云："后至沙勒国，国王不念，请三千僧会，耶舍预其一焉。"不念似系其时国王之名，若然，则又可补充公元四世纪时疏勒国的王统。耶舍善解《毗婆沙》，罗什师事之。隋开皇初，天竺名僧达摩笈多至沙勒国(羽溪氏作开皇五年，即公元585年，似不正确，因为笈多于开皇十年，即公元590年，到达长安，在此以前，曾停住沙勒二年，龟兹二年，乌耆二年，高昌二年，伊吾一年，在入长安前九年，即开皇元年冬天到达沙勒。)，停住国王所建寺中两年，讲《念破论》三千偈，《如实论》二千偈[22]。笈多到中国后所译之佛经均属大乘经论。疏勒国自罗什至笈多，曾行大乘。俄人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曾在此地发现古梵文《法华经》残卷，足证其地确有大乘经典传入[23]。但玄奘过此国时，则万余僧众均习小乘，玄奘讥其"不究其理，多讽其文"，说明其地佛教，已大不如前。《慧超往五天竺传》记疏勒国云："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按慧超从天竺返国，途经疏勒，时在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超记龟兹、于阗两国，均云："足寺足僧"，而于疏勒，则云："有寺有僧"，可见其时疏勒的佛教，又更趋衰落矣。

①藤田丰八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民20年北平泉寿东文书藏校

印,87—88 页。

②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291。

③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930 年长沙商务版 126 页。

④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一。

⑤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292。

⑥同上, p. 291。

⑦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 1956 年上海商务版, 291—922 页。

⑧谢彬著《新疆游记》,204 页。

⑨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8—59 页。

⑩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1958 年北京中华版 200—202 页。

⑪《册府元龟》卷 420。

⑫同上,卷 449,995。

⑬《唐会要》卷 73。

⑭《册府元龟》卷 967。

⑮岑仲勉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 年北京中华版 61—62 页。

⑯伯希和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91 页。

⑰《西域之佛教》,105—108 页。

⑱同上,95、108 页。

⑲冯承钧译《史地丛考续编》,民 23 年上海商务版 149—243 页。

⑳《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208—214 页。

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208—214 页。

㉒《高僧传》二集卷三笈多传。

㉓《西域之佛教》,296 页。

从佉沙国至瞿萨旦那国的一段行程

《西域记》卷十二佉沙国条云:“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济徙多河,逾大沙岭,至斫句迦国”,这段行程有几个特点:一,从佉沙至乌铩五百余里,从佉沙至斫句迦,也是五百余里; 二,不言经过乌铩; 三,要渡徙多河; 四,要逾大沙岭。根据这四个特点来考察玄奘这段行程,就可以看出,他从佉沙出发,仍先循疏勒至莎车的通道,但至巴什栏杆(即科科热瓦驿，亦称喀喇布札什台)不是转向东往叶尔羌,而是继续向南行,至雅克阿里克,经图木苏克、卡崇亦作卡群(Katyung),渡叶尔羌河(徙多河)，至其木都(Chimdul),即进入奇盘河流域的斫句迦国。所谓“逾大沙岭”，据黄文弼从叶城至奇盘河流域考察,先渡听杂布河(Tisnab River),然后转向西南行,入戈壁，骑行九十里，才抵奇盘庄①。此戈壁就是玄奘所逾越的大沙岭。这样玄奘从北至南,不必向东绕道叶尔羌，因路线较直，故全程合计,也只有五百余里。

《西域记》同卷斫句迦国条云:“从此而东,逾岭越谷,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玄奘从斫句迦国所在的奇盘河流域出发,向东行,经库木土块(Kumtuqai)，此地有城名米仔也甫伯克(Mizyap-bek),相传为清中叶伯克所筑，又东行里许，至萌木克亦作莫莫克(Mamok)石城,西临听杂布河,渡河后又沿听杂布岭北麓东行，渡乌鲁古斯腾(Ulugustang)河，经东岸的乌萨巴西(Ushabashi)庄，复东行以达皮山(Guma)。此路经过葱岭东岗，从方向和地形来看，正符合玄奘所谓“从此而东，逾岭越谷”。若依一般学者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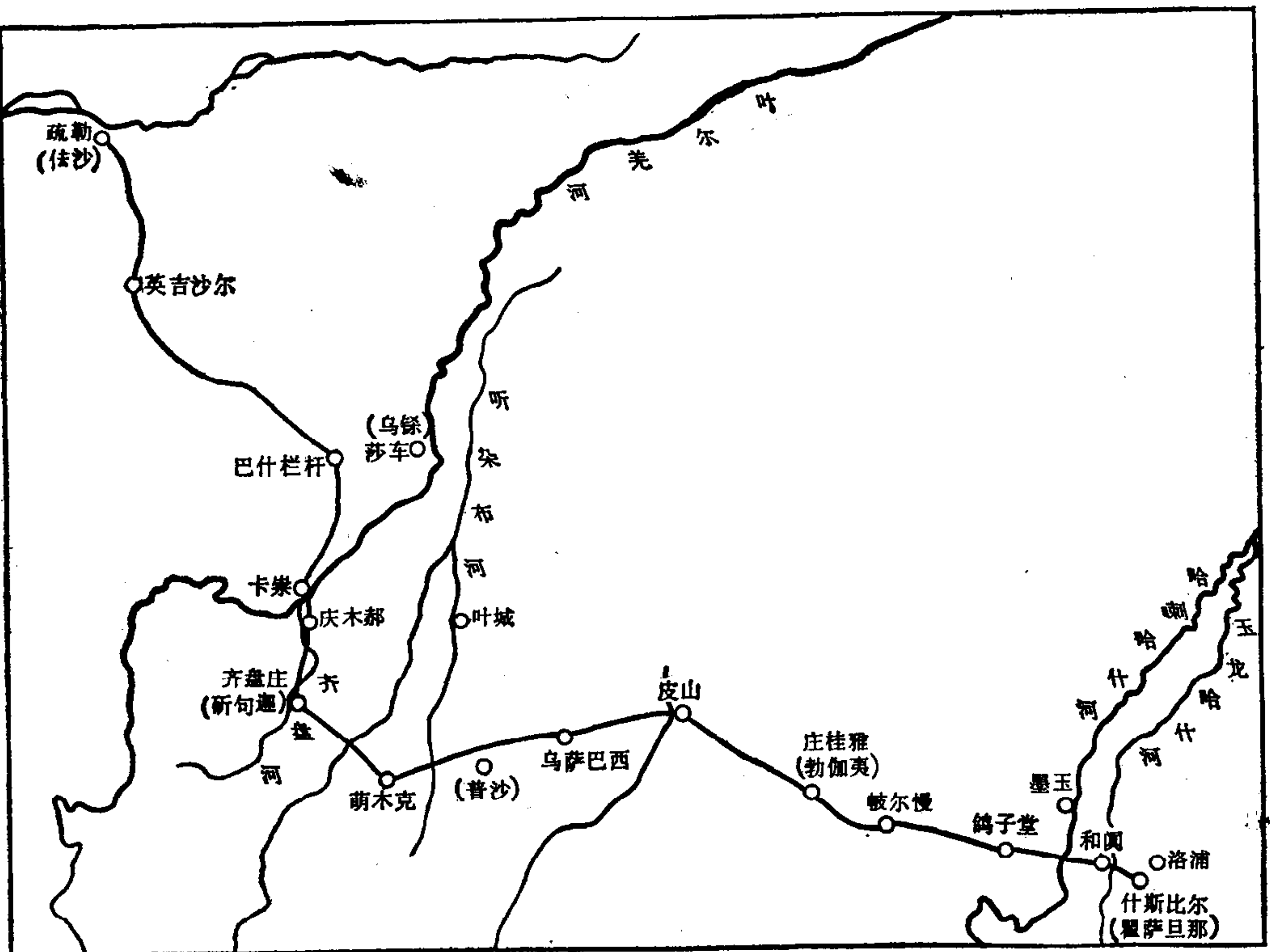


图16　从佉沙国至瞿萨旦那国的行程图

见，以叶城(Karghalik)当斫句迦，则东行只有沙丘绵延，何需“逾岭越谷”？这也是斫句迦应位于齐盘河流域之一证。

皮山以后的行程，据现代驿站，出皮山，东偏南行，十六里入戈壁，十四里英桂雅庄，十里两庚，三十里秋打庄，二十里木吉驿，十二里入戈壁，三十三里滚图里克栏杆，十五里庄桂雅亦作奎牙，十里入戈壁，六十五里腰站子，一名沙依栏杆，二十五里皲尔慢亦作皮牙勒马，二十里黑斯里赛格斯，十五里塔哈提坂，二十里阿赫栏杆，二十五里鸽子堂，十二里塔巴哈什，十里札瓦驿，过一大渠，俗呼札瓦河，十里库也明，七里玛库雅明，五里哈雅什明八栅，十五里巴拉玛什明八栅，五里哈喇哈什河沿，渡河行六里哈里巴克八栅，二十里哈斯库雅，四里和阗县城②。唐代瞿萨旦那王城应在今和阗县城东南约四十余里之古城遗址。从皮山至此约共四百七十里。一千多年前，玄奘经行时的里程，尤其是驿站名称，当然与今有所不同，许多地方要通过戈壁或戈壁边缘，变化很大，但总的方向和基本路线不会相差很大。玄奘说从斫句迦至瞿萨旦那八百余里，除去四百七十里，尚余三、四百里，此是从齐盘河中游地区至皮山的路程，依图约测为三百里，再加上由皮山至瞿萨旦那王城的四百七十里，合共七百七十里，古里小于今里，与玄奘所记八百余里之数相差不多。

①《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7—58页。

②谢彬著《新疆游记》，233—23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1966年，图145—146、151—152、153—154。

斫句迦国考

一、国名、方位和都城

斫句迦，《汉书·西域传》作西夜国，并云："王号子合王"，是知两汉时期子合国王兼有西夜国地。《后汉书·西域传》既有西夜国，又有子合国，可见其时西夜已摆脱子合王的统治，自立一国。该《传》谓《汉书》误将西夜、子合并为一国，其实《汉书》非误。《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鱼豢《魏略》，只有西夜国，而无子合国。晋《法显传》作子合国。《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纪》作朱驹波国。《晋书》不为立传。《魏书》和《北史》均作朱居国。据两书《疏勒国传》均云："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则朱居即朱俱波之略称，但两书又重出《悉居半国传》云："故西夜国也。一名子合，其王号子（合），治呼犍（谷），在于阗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作遮拘迦国。《隋书》不为立传，但该书《疏勒国传》云："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于阗国传》云："西去朱俱波千里。"《通典》卷一九三云："朱俱波，后魏时通焉，亦名朱俱槃，汉子合国也。并有之（之字衍）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国地。"唐详公《法华经传记》卷一引《西域志》作遮拘槃。

《西域记》的斫句迦，瓦特斯翻其原音为 Che-Ku-Ka，按斫，《唐韵》之若切，应读作 Tsiak；句，《唐韵》九遇切，应读作 Kiu，斫句迦应作 Tsiak-Kiu-Ka，而不是 Che-Ku-Ka。《新唐书》的朱俱波，应读作 Tsiu-Kiu-Po 而不是 Chu-Ku-Po。《魏书》和《北史》的悉居半，岑仲勉云："悉万斤与 Samarkand 相当，则悉应为 Sa，如 Chupan 之 Ch 读作 K，则 Chupan 适为居半之对，故曰悉居半之语原乃 Sa

(rugh)-Chupan (《西域地名》谓即今 Sarhad)也。质言之,子合者今 Sarhad 以东之地也①。按《西域记》斫句迦国下注云:"旧曰沮渠。"沮,《唐韵》子余切,读 Tsio,渠,《唐韵》强鱼切,读 Kio,沮渠应读 Tsio-Kio,玄奘梵语化为 Tsiak-Kiu-Ka (斫句迦)。沮渠原为匈奴官号,东晋时有沮渠蒙逊,以官为氏,建国河西。蒙逊死,后继者为牧犍,为魏太武帝所灭。其弟无讳复据高昌。无讳死,安周继之,至北魏和平元年 (公元 460) 为柔然所灭。羽溪了谛疑其余部逃往于阗西之旧西夜子合国地,而据有之,因以沮渠名其地,此事虽属推想,但也有可能。我们应该据《西域记》的注文来追溯斫句迦的语原,而不能象岑氏那样附会 Wakhan 娑勒城(Sarhad)以东之 Sarugh Chupan,以当《魏书》之朱俱波及《西域记》之斫句迦。据《隋书·西域传》于阗国条谓于阗西去朱俱波千里,又《新唐书·西域传》疏勒国条谓朱俱波直于阗西千里。(《通典》作千余里),若依岑氏之说,法显从于阗西至娑勒城,假定不是采取于阗经 Gnma、Karghalik、Yarkand、Kashgar、Tashkurgan、Beyik 一条较迂回的路线,而是从于阗西南行,沿哈喇哈什河上流,转西经 Kilian Kurghan、Kirgis Jangal、Chiragh Solo,再循 Raskam 河岸,经 Ilisu、Beyik,以达 Sarhad,计程约 440 英里(依 Benedict Goës: The Central Asia 附地图略测),约合 2,200 古汉里(依斯坦因 1 英里等于 5 唐里计算),超过上述千里或千余里之数远甚。法显在这段路程中,行了廿五日,平均每日行八十八里。从一般平原行旅的速度来说,不算太快,也不算太慢,但从法显整个旅程的平均速度(依足立喜六计算为每日行三、四十里至八、九十里不等)来看,已达最高速度②。这段路程绝大部分是在崇山峻岭的峡谷中,法显是否能保持这样的速度,殊属可疑。1897 年英人 Deasy 从克什米尔的 Srinagar 出发,经 Gilgit,越 Kilik Pass,沿 Raskam 河谷以赴叶尔羌,他记在此河谷中从 Suyukwat 至 Bazar Dara 一段路程,只

有约 10 英里的距离，却需很长的时间才能通过，因为不断地涉水，马在多石和深水的谷底很难前进。他出发在 1897 年九月，至 1898 年一月才抵叶尔羌，行程约经四个月[3]。假定法显走过这段 2,200 里的路程，用了廿五日的时间是合理的话，那么，他从子合国娑勒城至竭叉国，依岑氏的考定，即由娑勒城至色托拉尔(Chitral)也要用廿五日，但依地图略测，从娑勒城西南行，越巴洛希勒山口(Baroghil Pass)，然后沿雅尔罕河(Yarkhan River)谷，以达色托拉尔，计程约 120 英里，约合 600 古汉里，只及前一段路程的三分之一强或四分之一弱。何以也需廿五日才能到达？岑氏对此段行程却避而不作任何解释，显然是因为与前段行程自相矛盾之故。

关于西夜、子合的方位问题，除岑氏说之不能成立，已如上述之外，《西域图志》卷一八裕勒阿里克条云："按汉西夜国，北与莎车接，莎车即今叶尔羌，则西夜故国，当在叶尔羌南境，裕勒阿里克西南也。所治以谷名，应附葱岭而居者，至北魏时为悉居半，唐为朱俱波也。"又库克雅尔条云："按后汉时西夜、子合，各自为王。裕勒阿里克为西夜国，则库克雅尔当为后汉子合国也，在唐亦属朱俱波国地。"又塔克布伊条云："按魏朱居国亦属唐朱俱波国也。《魏书》称其人山居，今塔克布依，傍山为城，且与裕勒阿里克、库克雅尔相连，应属朱居国旧地。"按《魏书》和《北史》既有悉居半国，又重出朱居国，朱居即朱居波的略称，而朱居波即悉居半的异译，同为一国，《图志》不察，误分为二国。《图志》以裕勒阿里克(Yularik)西南当西夜国，库克雅尔(Kokyar)当子合国，两地相去仅五里，若依《后汉书》所说西夜子合分为二国，两国都城只有五里之距，殊难理解。《图志》只据《汉书》西夜国北与莎车接的方向来拟定其位置，此外别无他证。丁谦把斫句迦置于裕勒阿里克河与固玛河(西图作 R. Kilian)之间，是指裕勒阿里克东南地区而言，与

《图志》之说没有多大差别。西方学者的主张也不一致，Klaproth以子合当英噶萨尔(Yangi-hissar)，按英噶萨尔位于莎车(叶尔羌)之西北，与《汉书》所谓北与莎车接的方位不符。比尔和瓦特斯以为相当于叶尔羌(我国学者如张星烺亦从此说)。瓦特斯把沮渠一名与莎车(Sa-Kü)一名等同起来，按《汉书》明载西夜子合北与莎车接，《后汉书》既有莎车传，复在德若国传下云:"与子合相接。"足证两汉时代西夜子合与莎车各自为国。《魏略》记载疏勒所辖诸国中，既有莎车国，又有西夜国。《魏书》和《北史》都载"渠沙国居故莎车城，在子合西北。"可见，所谓玄奘的斫句迦即莎车之说，不可置信。

自从沙畹以今哈尔噶里克 (Karghalik) 当玄奘的斫句迦之后④，学者多从之⑤。白鸟库吉则将汉代的西夜子合国与南北朝时代的子合国或悉居半国区别开来，前者当 Asgansal 河(即齐盘河)流域，后者当今叶城(Karghalik)⑥。按《魏略》尚有西夜国之名，此后即不见于史书，则西夜国已为子合国所并，至南北朝时代称为朱俱波(朱驹波、悉居半)，实兼有两汉时代西夜、子合二国也。我认为西汉时代西夜、子合并为一国，其中心地区在奇盘河流域，至后汉时代，西夜、子合分为二国，西夜的国境，位于听杂布河以东，叶城以南，普沙(Pussa)以北一带，子合国则位于奇盘河流域、南北朝时，朱俱波已兼有西夜子合二国地，仍以奇盘河流域为中心。《后汉书》谓西夜国一名漂沙，今叶城南三百余里处，尚有地名普沙，可能就是漂沙的遗音，《汉书》谓"子合土地出玉石"，今叶尔羌西南产玉之山有奇盘山和密尔岱。王树枏《新疆山脉图志》卷四云:"密尔岱山，奇盘之水出焉。是生玉石，多牦牛、狢猁、狐。"又引《新疆图说》云:"密尔岱山在叶城西南三百四十里，奇盘水亦名逮燕水，发源此山，东流一百里至奇盘庄，折而北流五十里至一西泥(应作一泥西，今奇盘水下流西岸有地名 Inish，当即其地)而入叶城境。又

流六十里至庆木郝(应作其木都 Chimdul),与泽普勒善河会。”《西域水道记》详记叶尔羌至密尔岱山的路程云:“密尔岱旧作辟勒,自叶尔羌城南七十里至坡斯哈木 (Posgam-bazar),又西南五十里至汗亮格尔(Khan Langar),又东南百五十里至英额(奇盘)庄,又西南三十里至齐盘山 (齐盘即奇盘),又西南五十里至阿子汗萨尔(Asgansal),又西南六十里密尔岱山,峻三十里许,四时积雪,谷深六十余里。”《新疆山脉图志》又云:“英额齐盘山,其上多玉。”《西域图志》又云:“英额齐盘塔克在叶尔羌西南,英额齐盘(庄)西十里,与裕勒阿里克塔克,东西相望,俱在叶尔羌谔斯腾境内。”《叶城乡土志》云:“英额齐盘山在县城西南二百八十里,山上平坦宽旷,周百余里,产玉。”按齐盘山距密尔岱山百一十里,齐盘河流经两山之间,《图志》称英额齐盘,徐氏自注云:“原音英伊什齐盘,英伊什,回语下坡之谓;齐盘,帕尔西语谓牧羊者,山城之下多游牧处,故名。”按俱波、俱槃、居半乃齐盘或奇盘(Chupan)的异译。由于 Samarkand 可译为悉万斤,所以悉居半,可还原为 Sad-i-Chupan, Wakhan 及 Sari-Kol 语称“百”为 Sad,原以百户或百部落为行政上的划分单位,后来又以“百”字代表郡县的意义,故 Wakhan 附近有许多地名前面冠以 Sad-i-,如 Sad-i-Mastog Sad-a-Istrakh、Sad-Khandut、Sad-Ispani、Sad-Sarik-Ćhaupan 等。Sad-i-Chupan,犹云牧羊者百户或牧羊者郡县。朱俱波或朱居槃的“朱”,也可以用蒙古语来解释,喀尔喀(Khalkha)语称“百”为 žo; Suhu,达呼尔(Dakhur)语称之为 Tsao,则 Žo-Chupan 或 Tsao-Chupan,亦有牧羊百户之义⑦。这样看来,以奇盘河流域当两汉时代的子合国及南北朝时代的朱俱波国,就不会像岑氏所说那样没有对音的根据了。而且据《后汉书》,子合国治呼犍谷,呼罗珊的原音为Khorassan,那么,呼的原音为 Kho,呼犍可读 Khogan,今奇盘水发源的奇盘山上有庄名 Kogan,可能是呼犍的遗音。

黄文弼曾亲自考察奇盘河附近的遗迹，他说:"由叶城首途赴奇盘，转泽普，初向西偏南行，约二十里过提仔拉普河 (Tisnab River),我国地图称为听杂布河,流于奇盘山之东,下流入沙，河宽里许,水浅可搴裳而过。渡河后转西南行,入戈壁,骑行九十里,至奇盘庄。有奇盘河发源于阿子安山及阿尔达格,至阿子安庄北,会狭锡河水，下灌奇盘地，至准噶尔入叶尔羌河。河宽约里许,水亦不大。居民沿河两岸而居，村舍相续。据说: 此地甚早即有居民，称为奇盘,故山亦以奇盘为名。" 黄氏察看了奇盘庄南二十余里的八个佛洞,位于奇盘河两岸的半山岩上，发现壁画残片⑧。阿子安山(西图作 Atsala Tag)在奇盘庄南百余里，又南四十余里为柯尔塔克(西图作 Tokhta Kor Tag)，终年积雪,当即《图志》所称产玉的密尔岱(Mirdjai)山。《西域记》云:"山阜连属，砾石弥漫，临带两河,颇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实繁。" 据黄氏所记该地情况云:"奇盘山势莽平,土阜起伏,居民咸散布于山阜中,以牧畜为业，兼营耕植，旧地图总名奇盘山误也。"可见该地形势，与玄奘所记，颇相类似。至于所谓临带两河当系指奇盘河与该河以西的叶尔羌河另一支流而言。玄奘又谓国南境有大山,山上有许多崖龛石室，为印度诸阿罗汉栖止之处，正与黄氏所记奇盘庄南二十余里山岩上的佛洞相符。由此观之,斫句迦国的都城,当即位于奇盘庄或其附近。

二、民族、文字语言和宗教

斫句迦国的人民，与葱岭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在两汉时代，主要是羌氐族,即《汉书》所谓"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白鸟库吉早已有所论述⑨。南北朝以后，属于伊兰种的 Galča 人(山地塔吉克人)逐渐从西方向葱岭东进,乃混入原来的羌氐种族之中,即在西藏种的血液中混入

伊兰种的因素。其后又迭经哌哒人和突厥人的入侵，因而在风俗生活方面，也受其影响。玄奘谓斫句迦"人躁暴，俗惟诡诈，公行劫盗。"或即受哌哒人和突厥人的影响所致。斫句迦人的文字语言，据玄奘说："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又在记述瞿萨旦那国时说："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也就是说，斫句迦人所通用的文字，取法印度梵文，但体势稍有改变。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公元519)宋云、惠生经过此国(称朱驹波)，其《行纪》云："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婆罗门同。"《新唐书·西域传》朱俱波国条谓"文字同婆罗门"，即袭《行纪》之文。玄奘说言语与瞿萨旦那国有异，《行纪》则说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这两句话并无矛盾，即是说，斫句迦人的土著语言与于阗语言在相似之中又有所不同。

斫句迦是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家，早在法显时代，已有僧徒千余人，多习大乘学。《魏书》和《北史》都说其国人"咸事佛"。早于玄奘约七十年，健陀罗国名僧阇那崛多(Jñanagupta)来中国，据其所述云："于阗东(西)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彼王纯信，敬重大乘，诸国名僧入其境者，并皆试练，若小乘学，即遣不留，摩诃衍人，请停供养。王宫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大经，并十万偈，王躬受持，亲执键钥，转读则开，香花供养。又道场内种种庄严，众宝备具，兼悬诸杂花时非(菲)时果，诱诸小王令入礼拜。彼士称此国东南二十余里，有山甚崄，其内安置《大集》、《华严》、《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陀罗尼》、《华聚陀罗尼》、《都萨罗藏》、《摩诃般若》、《八部般若》、《大云经》等凡十二部，皆十万偈。国法相传，防护守视[10]。"可见自五世纪初年至六世纪中叶，该国佛教实臻全盛时期，国王笃信大乘，对小乘教徒，概不招待，对王宫内所藏经典，亲持锁钥，惟恐有失，对山崖洞穴所藏经典，更严密守护，著于国法，则其有功于大乘者多矣。据玄奘所记，其国"淳信三宝，好乐福利"，但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只有百余人，较之

前代，只及十分之一，则知此国佛教，至七世纪初期，已告式微。黄文弼曾访察叶城南约百余里的不尔项佛洞遗迹，洞甚宽大，可容百人，尚有石刻残余，证明此地为古寺庙遗址。又在叶城西南约百余里，奇盘庄之南，山岩间见佛洞八处，或即昔时收藏大乘经典之所。玄奘又记斫句迦国南境大山崖石室中多有印度果人栖止，今尚有三阿罗汉入灭心定。此辈佛徒自然是属于大乘教派，可能来自健驮罗和迦湿弥罗。此两国原以小乘最占势力，然五世纪初期，亦曾有大乘流行⑪。

①岑仲勉著《佛游天竺记考释》，31—32页。

②《法显传考证》，113页注八。

③Captain H. H. Deasy: In Tibet and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1, pp. 120。

④《西突厥史料》，115页注一。

⑤《西域地名》，Karghalik 条；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239页；《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6页。

⑥《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73—75页。

⑦同上，46—47页。

⑧《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7—58页。

⑨《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36页。

⑩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⑪同上，49、343页。

瞿萨旦那国考

一、国名

《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注云:"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瞿萨旦那乃 Kustana 或 Gostana 的音译,梵语义为地乳。于阗为什么取名地乳,据玄奘所述:该地开国之王老而无嗣,往毗沙门天神(Vaiçravana)处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忽然剖出婴孩,但无乳育养,恐难成长,以此又祈祷神像,神像前面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婴孩就之饮乳,遂得长大。此王乃地乳所育,因而以瞿萨旦那为国名。这是一种神话传说,未可置信。此神话在玄奘以前,早已流传,玄奘不过把于阗国名附会为梵语具有同样意义的雅名 Kustana 或 Gostana(地乳)。按毗沙门天原为印度古代婆罗门教之福神俱乞罗(Kuvēra),其后为北方之守护神夜叉(Yakṣas)之王。于阗之四护世者(Lo Ka Pālás)中,北方之守护神毗沙门天,特为其国祖先所崇拜。羽溪氏相信此种传说渊源于佛教的氛围中而后成立,而此传说之构成要素中,必混杂有佛教的传说①。果如羽溪氏所言,则此种神话传说应发生在佛教传入于阗之后。可是,于阗一名早已存在于佛教传入于阗之前,据《史记·大宛传》:"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 138—126 年间,司马迁撰《史记·大宛传》,乃取材于张骞所记。我们说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于阗已经立国,似无大误。而佛教之传入于阗,即使据佛徒不大可靠的著作,如藏文《于阗古史》② 也不过是公元前 74 年之际③。所以说于阗应该

是本地的古名，非出于佛教带来的梵语。玄奘所谓“旧曰于阗，讹也”，竟把时代颠倒了。按“于”，《唐韵》羽俱切，音 jiu 或 gjiu，日本语 u。“阗”，《唐韵》待年切，音 dien，“于阗”，音 jiu dien 或 gjiu dien. Udien. 藏文《于阗古史》所记于阗之音为 U-then，为都与河之义。此 U-then 与 jiu dien 或 U-dien 之音最近。又白鸟库吉谓西藏语呼玉石为 gyu(yu)，正与古音 jiu 或 gjiu 相符。又呼城邑、村落为 tong，则与古音 dien 相近，于阗有玉城玉邑之义④。无论是比拟为都与河之义的 U-then，抑或比拟为玉城玉邑之义的 gyu tong，都以西藏语为依据，我认为后一比拟结合本地的著名特产，较为可取。在西汉时代，于阗象从敦煌南山一直分布至葱岭的婼羌一样，其人民是属于羌氐种（关于于阗人种问题下文将有论述），故于阗一名的起源，依据西藏语来解释，较为合理。又洛克希勒(Rockhill)曾说，西藏语称于阗为 Li-yul，义为钟铜之国（Bell-metal Country)，但瓦特斯则谓 Li 即犁，指犛牛(yak)而言，此种野兽，突厥称为 Katas，今尚可在于阗地区见之⑤，这两种主张都没有什么说服力。

二、建国传说

于阗立国始于何时？中国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惟于阗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已如上述，则其立国，至迟亦不能晚于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东西学者多据《西域记》及《于阗古史》所载本地神话传说，认为于阗立国应始于印度阿育王(Asoka)时代（即公元前 242 年顷)。玄奘所述，已见《记》文，兹仅就《于阗古史》的记载，略述如下：

达摩阿输迦(Tharmāsoka)之治世第十三年，其皇后生一男，占者多以此儿有伟大之相，其父王在生时，此儿亦当为王。王虑此儿将夺其王位，遂下令弃之。母后想若不弃此儿，王将杀之，勉从

其命。然王子被弃之时，地上出一乳房，乃以乳养之，得不死。由是呼此儿为瞿萨旦那(Kustana)，即地乳之义也。

此时适有大菩萨——中国(Rgya)之王者住于此。彼有子九百九十九人，欲得一子以满千人之数，乃祈愿于毗沙门天(Vaiçravana)，毗沙门天转眼望四方，知此被弃之小儿瞿萨旦那为将来有望之人物，故携之来此为中国王者之子，王遂养育之。一日，王之众子与瞿萨旦那相争，众者讥以非王之子，此儿大闷，遂请于王，欲出寻本国。王告以彼确为其子，愿无他虑。瞿萨旦那转求王愿得一王国之地，乃率一万人赴西方，来至于阗(Li-yul)之美-斯卡尔(Me-skar)。当时印度达摩阿输迦王之宰相耶舍(Yaça)，大扩张其家族之势力，王深恨之，耶舍遂率领七千人去国，东西寻求安身之地，来至于阗(U-then)河之下流。

其时瞿萨旦那之从者中有二商人，著拖鞋逃出美-斯卡尔，道出托-拉(To-La)。二人仍著拖鞋(babeu)步行，以故此地得名 Babeuhbrangs-pai-sa 或 Hbru-so-lo-nya。彼等见此大好去处，杳无人烟，不禁大喜，自思此堪为瞿萨旦那王子之领地。其后，彼等于南方访见宰相耶舍之幕帐。耶舍已知瞿萨旦那为彼等之王，乃遣使至美-斯卡尔，曰：汝为王族，余为贵族，吾等何不协同建国于于阗之地。汝可为王，余为宰相。于是瞿萨旦那乃率其从者，来至于阗河南 Hang-gu-jo 地方，与耶舍会见。王子与宰相于领地之分划，意见不能一致，两方遂动干戈。于是毘沙门天与吉祥天(Çrimahaderi)于彼等之前出现，彼等乃于其地建立祠寺，各奉一神。尔后，两神遂被尊为护国神。

从此，瞿萨旦那与耶舍始相和睦，前者为王，后者为宰相。瞿萨旦那之支那从者，则居于于阗河下流及 Mdo Me-Skar 与 Skamshed 之上部；宰相耶舍之印度从者，则居于于阗河之上流与 Rgya 及 Kong-dzeng 之下部。于彼等所居之两地间，则中国人与印

度人杂居，实无区别。其后，乃共筑一城⑥。

玄奘记述此传说与《于阗古史》所载，差异很大，兹将异同之处大致分列如下：

（甲）相同之处

一、于阗建国始于阿育王时代。

二、瞿萨旦那对毗沙门天之崇拜。

三、此国东界最早之统治者为中国人，《西域记》称为东土帝子，《于阗古史》称为大菩萨——中国(Rgya)之王。

（乙）相异之处

一、《西域记》以瞿萨旦那为国号，《于阗古史》则以之为无忧王（阿育王）太子之名。

二、《西域记》言于阗东土帝子最后战胜西主，统一全国，《于阗古史》则称印度人无忧王太子瞿萨旦那，从印度逃至于阗，投于中国王为太子，后请求迁往西部，与印度叛臣耶舍共建一国。

三、据《西域记》，依地乳养育成长者，为毗沙门天神像额上剖出之东土帝子之子，在《于阗古史》则谓依地乳成长者，为无忧王所弃之太子。

四、《于阗古史》言瞿萨旦那从者中之二商人觅得为王子建国之地，《西域记》无此记载。

五、《于阗古史》言阿育王之宰相耶舍不容于王，率七千人去国，来到于阗河下流，与瞿萨旦那王子相遇，因争领地而互动干戈，由于毗沙门天和吉祥天居中调解，复归和好，瞿萨旦那为王，耶舍为相。《西域记》无此记载。

六、据《西域记》，战争发生于东土帝子与西主之间，《于阗古史》则谓战争发生于阿育王太子瞿萨旦那与宰相耶舍之间。

七、《西域记》有涂灰外道以瓠水遣流，指基建城的故事，《于阗古史》无之。

八、《西域记》言阿育王太子在呾叉始罗被抉目事，《于阗古史》则只言太子为王所弃，不言被抉目事。

九、《于阗古史》记载几个瞿萨旦那领地的具体名称，《西域记》无之。

关于此一传说，《慈恩传》也有记载，据云："其王雄智勇武，尊爱有德，自云毗沙门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无忧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罗国，后被谴出雪山北，养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无子，因祷毗沙门天庙，庙神额上剖出一男，复于庙前生奇味，甘香如乳，取向养子，遂至成长。王崩后自立，威德遐被，力并诸国，今王即其后也。先祖本因地乳资成，故于阗正音称地乳国焉。"据此，慧立所记，又与《西域记》有些不同之处。第一、《传》言于阗建国始祖即阿育王之太子，而《记》言阿育王太子被抉目后，王怒遣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后辗转至于阗西界，尊立为王，与东土帝子战，战败被杀，东土帝子占有其国，建立城郭，则于阗建国始祖，实际上是东土帝子。第二、《传》言毗沙门天庙神额上剖出而地乳养育成长者，为阿育王太子之子，但《记》文则言此依地乳成长之王，乃战胜阿育王太子的东土帝子之子。

在以上三种记载中，最值得我们注意者，为《西域记》，因为据它所记，最早在于阗辟土建国者为中国人，比较符合于历史事实。

关于于阗的历史，较古著作除各史西域传所提供的材料之外，只有藏文史料两种：一种是《于阗国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The Li Country)；一种是《于阗纪年》(The Annals of The Li Country)⑦。前一种是关于释迦牟尼对于阗地方在他寂灭后佛教兴衰的预言，这显然是古代于阗佛徒所伪造，以图提高于阗佛教在整个佛教传布史上的地位，不可置信。后一种虽亦渗杂许多佛徒伪造

之迹，但也有一部分可以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事实的材料，需要我们具体分析，辨伪存真。据汤姆斯(F. W. Thomas)的考证，«纪年»编成于公元 1046 年，约在玄奘撰成«西域记»后 400 年。经过这样长的时间，传说又不断有所修改增添，其变化自在意中，因而有几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一个问题是于阗建国是否与阿育王有关？«记»文说参与陷害阿育王太子的辅臣僚佐，被谴谪至雪山北，辗转移徙至于阗西界，推举其王，这只是西界之王，不是整个于阗的开国始祖。«慈恩传»说于阗王之先祖，即阿育王之太子，«纪年»则谓于阗建国之王瞿萨旦那，是印度阿育王之太子，与«慈恩传»所载，基本一致。按阿育王即位于公元前 273 年，卒于公元前 232 年，在位凡四十一年，相当于我国战国时代周赧王 42 年至秦王政十五年。阿育王共有三个儿子，即库纳拉(Kunāla)、贾劳卡(Jalauka)、提伐罗(Tivara)⑧，库纳拉原名法益(Dharmviyardhana)，因为他生来有一双很美的眼睛，象雪山(Hindukush)的一种鸟名库纳拉的眼睛那样，阿育王即给他一个别名库纳拉(一说库纳拉是喜马拉雅山化身之鸟，Himarat bird)。尼赫鲁则说，阿育王有一个儿子名摩哂陀，和女儿僧伽蜜多罗，被派往印度南方和锡兰⑨。但«印度通史»只说以摩哂陀王公为首的使团被派往锡兰，而不是阿育王的儿子。被派去统治呾叉始罗国的就是库纳拉。此事亦见于«西域记»卷三呾叉始罗国条，库纳拉作拘浪拏，据称他为其继母所陷害，诈发诏书，谕令太子抉目。最后太子回到王宫，阿育王发现太子双目为继室所害，怒加刑辟。后求得阿罗汉瞿沙(Ghosha)救治，眼复得明，辅臣僚佐，并受谴责，诸豪世禄流放于雪山北沙碛中。呾叉始罗国条叙述阿育王太子拘浪拏被抉目事，至此为止。雪山是指兴都库什山，此山北面的沙碛，当系指诸帕米尔地区而言，并未涉及于阗建国之事。至同书瞿萨旦那条始把被谴辅臣僚佐牵引到于阗，据说彼等迁人

逐物，至瞿萨旦那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按阿育王太子被抉目事，《阿育王传》、《阿育王经》和《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均载之。《阿育王传》第五记此事至王杀第一夫人帝失罗叉为止，不言谴谪辅臣僚佐至雪山北，也不言此辈迁移至于阗西界。《阿育王经》第四记此事说，指使抉太子目者，为第一夫人微沙落起多，王察觉后将她置于屋中，以火焚之，又复令杀德叉始罗人。亦不言谴谪辅臣僚佐至雪山北及迁移至于阗西界。《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南条目》作《阿育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记此事说，王大夫人净容与辅臣耶舍共谋抉太子法益双目，王察觉后收夫人和耶舍投入狱所，以火烧杀之，亦不言谴谪辅臣僚佐至雪山北及迁移至于阗西界。《经律异相》三十三记此事与《阿育王经》同。《西域记》有关这个传说，是玄奘据当时于阗僧徒所述，僧徒则据上述诸经的记载，又捏造阿育王谴谪辅臣僚佐至雪山北及迁移至于阗西界等情节，把于阗建国传说强附于阿育王身上，其作伪之迹，显而易见。《慈恩传》竟言于阗王之先祖，即阿育王之太子瞿萨旦那，可能是慧立误解玄奘原文所致。《纪年》作者看出诸经中被抉目者为阿育王之子拘那罗（库纳拉），而非于阗传说中的瞿萨旦那，强为牵合，易致破绽，于是抛弃了抉目之事，而直说瞿萨旦那为阿育王之子，被弃于野，为地乳所养。又捏造原住于阗之中国王者，有子九百九十九人，欲得一子，以满一千之数，乃借毗沙门天之力，把瞿萨旦那从印度携带至于阗，给中国王者为子，以足一千之数，并率一万人赴于阗西方，开辟领地，而把《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中之辅臣耶舍，拉来陪衬，作为宰相，以不容于阿育王，率七千人叛逃至于阗河下流，最后两人共建此国，瞿萨旦那为王，耶舍为相。其作伪之迹，更为明显。

阿育王大臣耶舍之名，不见于《阿育王传》和《阿育王经》，前者言阿育王第一辅相为罗提掘多，后者言阿育王第一臣为成护，而耶舍则是鸡寺（鸡头摩寺）上座大德。只有《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言

王有臣名耶舍，王子法益曾以手拍其头，耶舍怀恨在心，乃与王大夫人净容共谋陷害法益。可见《纪年》所说的宰相耶舍是从此经摘取出来的，按此经有二译：一为公元二世纪中叶大月氏僧支娄迦谶所译，译本已亡佚；二为公元四世纪下半叶苻秦三藏昙摩难提所译，今所存者，只此一本。经中谓阿育王将阎浮提一半，赐与法益统摄，其中包括新头河表，至娑伽国、乾陀越城、乌持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这一个国名录不特越出印度境界，并且包括整个西域和中国，这和一些大乘经中偏重西域和中国一样。我们从《大集经》中之日藏经（Surya-garbha）和月藏经（Candra-garbha Sutra）都可以看到其国名录，也包括印度以外之西域和中国。又如《毗婆沙论》谓世尊以圣语说四圣谛，但各国人随类各得领解，所列国名中，有支那、月氏等。《大宝集经》（Ratna-kūta）中之《密迹金刚力士会经》（Tathāgataguhya Sutra）所列国名或民族名中，有月支、丘慈（龟兹）、于阗、沙勒、禅善、乌耆、前后诸国、匈奴、鲜卑、吴蜀、秦地、诸麽夷狄等等。又如《申日经》说，月光童子表示心愿，佛告阿难，预言涅槃后，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秦土及诸边国、鄯善、乌苌（乌耆）、归兹、疏勒、于阗、大宛，附以羌虏夷狄，皆奉佛法。《德护长者经》所言同一主题涉及中国，则更为明显，谓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国内一切众生信于佛法。又谓我佛钵当至沙勒国以至大隋国。

烈维曾指出此等佛经中国名或民族名录，几纯粹出于一种中国地志，而不能谓出于印度梵文原本。于阗为大乘文学最活动之中心，于阗佛徒为感化邻国，乃伪造此等经典[10]。因此，我怀疑《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也来源于阗。

所有以上关于于阗建国之传说，不仅夹杂着许多神话，而且充满佛徒伪造的材料，殊不足信。

三、于阗国王统

于阗国历代王名，中国史书所记，很不完备。据«后汉书»，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 25—57 年)于阗王名俞林，建武末年，莎车王贤攻并于阗，徙俞林为骊归王，改立其弟位侍为于阗王[11]。明帝永平年间(公元 58—75 年)于阗王为休莫霸，休莫霸于围攻莎车时中流矢死，立其兄子广德为王。顺帝永建年间(公元 126—132 年)于阗王为放前，冲帝元嘉元年至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45—175 年)于阗王为安国(熹平四年安国攻破拘弥国，此后安国当仍在位，但至何年为止，史已失载)。三国魏文帝时(公元 220—226 年)于阗王为山习。北魏献文帝时(公元 466—471 年)于阗国王无考，惟«梁书·西北诸戎传»有中于王秋仁，可能当时于阗国分东西中三部，各部均设小王，秋仁则为中部王，故称中于王。隋大业年间(公元 605—618 年)于阗王姓王，字卑示闭练。(见«隋书·西域传»，但«北史·西域传»作字早示门练，恐误。) 唐初(公元七世纪前期)于阗国王为尉迟屈密[12]。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 年)于阗国王为伏阇信[13]。则天垂拱三年(公元 687 年)于阗国王为伏阇雄[14]。则天天授三年(公元 692)于阗国王为伏阇璥[15]。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 728 年)于阇国王为尉迟伏师战[16]。伏师战死，伏阇达为于阗国王。肃宗乾元三年(公元 760 年)尉迟腾为于阗国王。后入朝留宿卫，腾以其弟尉迟曜为于阗国王[17]。尉迟曜以后，继任于阗王者，史已失载。至五代时，于阗王族已为李姓所代替。据«五代史·于阗国传»云:“(后晋)天福三年(公元 938 年)，于阗王李圣天遣使来贡，高祖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圣天自称为唐之宗属。”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圣天曾来朝献，则于阗国李朝尚维持至十世纪下半叶。

藏文«于阗古史»也列举了一些于阗国的王名。据说，于阗建

国之第一个王是印度阿育王的儿子瞿萨旦那，其时适当佛灭后二百三十四年。其后，国王是 Yeula 的儿子 Vijayasambhava，他治世的第五年，即于阗建国后百六十五年，印度阿罗汉毗卢折那(Vairotchana)来到于阗，宣扬佛法。玄奘于叙述瞿萨旦那国都城南十余里之大伽蓝时，亦言此伽蓝是其国先王为来自迦湿弥罗国的阿罗汉毗卢折那(唐言遍照)所建。Vijayasambhava 王究竟生当什么时代？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于阗立国究竟始于何时。我在上文已经指出，玄奘所记及《于阗古史》都把于阗建国的传说强牵至阿育王时代(公元前 248 年顷)，不可置信。这个前题如果不能成立，那么，Vijayasambhava 王的时代亦难确定了。据斯坦因 (Stein) 和 Sten Konow 之说，藏文《于阗古史》中之 Vijaya，即 Saka 语中之 Vija，中国史籍中之于阗王室尉迟氏，即 Vija 一辞之译音。这一比拟如果不误，则势必就下面两点进行抉择：一是 Vijayasambhava 一名前面之 Vijaya 为后人捏造加上去的，因为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唐以前，于阗王名均不加尉迟一姓，而且《隋书·于阗传》明说于阗国王姓王，字卑示闭练；一是将 Vijayasambhava 王的时代推迟至唐代，因为中国史籍至两《唐书》，才说于阗王姓尉迟氏。据羽溪了谛的考证，《法显传》之王新寺，即《西域记》之娑摩若僧伽蓝，创建此伽蓝之 Vijayavirya 王，大概为公元第四世纪初期与中期在世之人(约当西晋惠帝永康以后至东晋穆帝期间)。自 Vijayavirya 王传至第三代之 Vijayajaya 王，当属第五世纪初期之人。(约当东晋安帝隆安年间)继 Vijayajaya 为王之 Vijayadharma 王，其在位当在公元 420—430 年间(约当南朝宋武帝至文帝元嘉前期)继 Vijayadharma 王之 Vijayasemha 王，当属公元第五世纪中叶之人。(约当宋文帝元嘉后期至孝武帝大明年间)继 Vijayasemha 王之 Vijayakirti 王，当属公元 470—480 年前后之人。(约当宋前废帝末年至齐武帝永明年间)[18]。羽溪氏此种年代的考定，完全忽

略了《隋书》及隋以前中国史籍的记载，也难置信。

Sten Konow在其所著《于阗研究》中，谓尉迟胜即西藏文献中之 Vijaya-Sambhava，尉迟曜则为西藏文献中之 Vijaya-bohan，亦即于阗国语中之 Viśa-vohan。唐德宗贞元初(公元 785 年)悟空自西天返国，过于阗时尚及见之[19]。此说似较可取，因其年代不致与中国史籍互相牴牾也。从贞元初上溯至武德初，相距约一百六十余年，依中国史籍所载，在尉迟曜以前，由尉迟屈密至尉迟胜，共有八个王名，一百六十余年间，经过八代王，非不可能。羽溪氏又引《宋高僧传》卷四窥基传及唐李乂撰《大唐慈恩寺法师基公碑》谓窥基的始祖为后魏平东将军尉迟说，而藏文《于阗古史》所载尉迟王室的最后一王为 Vijayakirti，Kirti 一字，在梵语由动词之现在式 Krit 加ti 而成，有"名声"之义，为汉字"说"之意译。Vijayakirti由于蠕蠕之侵犯及哌哒之征服，逃亡至东方而归依后魏，定居于今山西大同府，成为后魏之尉迟部[20]，也就是说，后魏之尉迟部是来源于于阗国尉迟氏王族。这种考证，很有问题，向达早已疑之。按"说"字，据字书有多种读法和多种解释，但未闻有解作"名声"者，(可参考《康熙字典》"说"字条)羽溪氏又谓 Vijayakīrti 为于阗 Vijaya 族最后的一个王，(约当公元五世纪后期)那时受蠕蠕的侵犯及哌哒的征服，居民灭亡，但何以两《唐书》载王姓尉迟氏及九代的王名？于此，羽溪氏不能不假定 Vijaya 王家复兴，至于如何复兴，并无佐证。尤足怪者，藏文《于阗古史》成于公元 1046 年(宋仁宗庆历六年)，为什么不记唐代于阗 Vijaya 王族复兴的事迹？这些问题，都令人难于理解。向达谓尉迟敬德一族，其先亦出于阗，按尉迟敬德原名恭，以字行，有唐李敬宗所撰《尉迟恭碑》，留传后世[21]。据云："曾祖本真，后魏中郎将冠军将军渔阳郡开国公赠中外六州诸军事，谥曰懋。"足证敬德一族，亦出自后魏尉迟部，又从何证明其出于于阗？此亦由于向氏失考之故。我们不能相信《于

阗古史》关于于阗建国的传说及 Vijaya 诸王所处的年代，已如上述，则后魏尉迟部与于阗 Vijaya 王朝间的关系，因文献不足，也很难弄得清楚。

《西域记》云："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这是指玄奘返国过于阗时在位之于阗王，此王姓名为何，没有说明。玄奘过于阗是在贞观十八年(公元 644 年)，伏阇信可能已继尉迟屈密为于阗王。

四、都城

《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不言其国大都城周若干里及其他情况，惟《魏书》和《北史》西域传于阗国条均云："所都城方八九里。"Grenard 最先考订于阗古都在今和阗县治额里齐(Ilchi)西七英里(约合 35 唐里)的 Borazan 区中的 Yotkan 村，介于玉珑哈什和哈喇哈什两河之间，后经斯坦因踏探以证其说。但据黄文弼云："姚头冈(Yotkan)在和阗县城西南约二十里。在现村落中有一大片低地，瓦砾甚多，已开垦种植，地面不见任何遗迹。据说掘下一、二米深，即有陶片出现，并出人骨甚多，陶器之颈、腹部多加兽形装饰。据本地人所言，似此地为古坟院。但斯坦因在他的《考古记》中断为古于阗国都(向达译《斯坦因考古记》39 页）证据殊嫌薄弱。"[22] 斯坦因详尽地记述 Yotkan 的地理和发掘经过，所发现的金叶碎片及其他古物虽多，但未发现任何古城的残垣断壁，而且连任何建筑物的遗迹也没有[23]。玄奘叙述于阗的著名塔寺和古迹，往往以王城为中心，说明某塔寺或某古迹位于王城的某一方向及其距离。斯坦因企图从这方面来证明国都在 Yotkan 的主张。比如他举出 Yotkan 西北半里 Eskente 小村稍西的 Somiya 公墓，认为 Somiya 一名即从玄奘所记王城西五六里的沙摩若僧伽蓝一名演变而来的。但斯坦因在这里没有发现任何塔寺的遗迹，而且在西域，同

名的地方很多，例如库车东南方渭干河支流以北有两个地方都称阿克沁，库车东南方及西南方都有一个地名三道城。可见，除非有旁证，仅靠地名音近还是不够的。至于把 Bowa-Kamlan 比拟为玄奘的地迦婆缚那伽蓝，Imam Musa Kasim 圣地比拟为玄奘所说城南十余里的瞿萨旦那王为毗卢折那所建的僧伽蓝等，更是出于臆测。所以我同意黄氏的看法，斯坦因以 Yotkan 为于阗古都所在，证据殊嫌薄弱。

黄氏主张于阗古都位于和阗县城东南约四十余里之古城遗址，此地即小库马提之下库马提，古城地名喀拉哈常，其城则名什斯比尔，译言三道墙。城依山坡，周围大约五、六里，山后有古洞四个。从古城往南约十余里，即小库马提之上库马提，地名强司雅，有石塔，周围约六十米，高半米许，为不规则的石块垒成，现已倾圮为堆阜。黄氏认为此地是古代大寺庙，疑即《法显传》的瞿摩帝大寺，梵语作“牛慧寺”，亦即《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条的赞摩寺。“赞摩”、“瞿摩”为一音之转，且方位相同，当为一地。《西域记》所谓城南十余里之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阿罗汉所建者，亦指此而言。如强司雅之废寺，即瞿摩帝大寺，则什斯比尔之古城亦即于阗之西山城。《西域记》谓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餕伽山，山峰两起，岩隒四绝，于崖谷间建一伽蓝，揆诸现在库马提周围形势，亦颇吻合㉔。

按黄氏考察和阗凡两次，第一次在 1928 年 4 月至 1929 年 10 月，其记述见于《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1—54 页，第二次在 1957 年 9 月至 1958 年 1 月，其补充记述见于同书 138 —139 页注八。依黄氏的记载，在玉珑哈什河以东，西北距阿克斯比尔约 20 里者，为大库马提，在和阗县城东南四五十里，沿玉珑哈什河西岸上下约二十余里者，为小库马提。惟据王树枏《新疆山脉图志》及谢彬《新疆游记》，则恰恰相反，称前者为小胡麻地（即库马提的异译），后者为

大胡麻地。谢氏云:“城(和阗县)南偏东四五十里有破城一，规模甚广大，土人常于其中掘得土物古器，按其方位道里，疑即唐时瞿摩寺，为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屠之所。又自破城踰玉珑哈什河，东南行六七十里，大胡麻地(即大库马提)，沙碛中崩塌处有大古洞，高可数丈，宽约半里，……城北偏东小胡麻地，前清于此采黄玉，居民达千余户，今仅数家，种地为活。其地沙碛起伏，状若游龙，一望无际，相传为古营垒，或谓即唐于阗国都。颓垣破瓦，恒露外间，有时流沙开处，城廓宛然，家具备置，且见大宗贵重品物。……东西洋人游历至此，必雇土人导往大小胡麻地（现隶洛浦)，一观古迹，藉掘古物。余闻而好奇心作，又以时间迫促，不能至大胡麻地一行。早膳毕，乃……策马往观小胡麻破城子，行十余里，至玉珑哈什河岸，睹水流甚大而势湍急，涉渡甚难，从者又言，夜水更涨，不能径渡以返城，须止宿彼岸，遂望洋而返。”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谢氏实未亲至大小胡麻地，只据当地人的陈说，但从其中也可以获得有关大小胡麻地的地理形势。在和阗县城南偏东四五十里有破城一座，位于玉珑哈什河西岸。由此往大胡麻地要先渡河，向东南行六、七十里才到，则大胡麻地实在玉珑哈什河以东，距和阗县城约百余里。又谢氏欲访小胡麻地，从和阗县城出发，据云小胡麻地在城北偏东，而且要渡玉珑哈什河，则小胡麻地位于县城东北方。依谢氏的说法，大胡麻地在南、小胡麻地在北。《新疆山脉图志》卷四铁盖列克山条云:“案铁盖列克，一作帖克里克山，在洛浦县城东南七十里，于阗县城西南四百余里，两县交界之山，山脉由南山附玉河而来，石骨嶙峋，上无树木。山下有小泉二道北流，一至兰干地，一至白石驿。山之西北一带，有沙滩名大胡麻地。大胡麻地北距洛浦县城九十里，小胡麻地在县城北三十里，中产子玉，为最上之品。”据此，则小胡麻地位于洛浦县城之北，而大胡麻地则位于洛浦县城之南，两者相距一百二十里，上述

大小胡麻地的方位，正与谢氏之说合。究竟以黄氏之说为正，抑或以王谢两氏之说为正？我认为王谢两氏都得自传闻，实未亲至其地，而黄氏则是记述自己的考察，比较可信。应该说，位于玉珑哈什河以东，阿克斯比尔东南约20里，南距洛浦县城30里的地区是大库马提（大胡麻地），位于玉珑哈什河西岸，从和阗县城东南四、五十里的旧城遗址起，往南约二十余里，直至强司雅的地区，为小库马提（小胡麻地）在这里，王、谢两氏所说的里程和方位，有些不同，王氏谓小胡麻地（原文误作大胡麻地）在铁盖列克山（位于洛浦县东南七十里）西北一带沙滩上，谢氏谓从和阗县城东南四、五十里之破城起，渡玉珑哈什河东南行六、七十里抵小胡麻地（原文误作大胡麻地）。在这些方面，我们仍应以黄氏的记述为据。

但在黄氏的记述中，也有些可议之处。《法显传》记法显在于阗国所住之寺名瞿摩帝，库马提、胡麻地都是从瞿摩帝一名因袭而来，这是对的，但梵语瞿(Go)为牡牛之义，摩帝(Mati)为粪，瞿摩帝(Gomati)犹言"牛粪"。古代印度视牛为神圣，以牛粪涂坛，有清净之义㉕。故瞿摩帝寺可称为"牛粪寺"，而黄氏作"牛慧寺"，恐误。又黄氏谓瞿摩帝寺即《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条之赞摩寺，赞摩、瞿摩为一音之转，其方位相同，当为一地。按"瞿"，《唐韵》九遇切，《集韵》、《韵会》俱遇切，并音句。"赞"，《唐韵》、《集韵》、《韵会》并则肝切，音谳。"九"、"俱"二字均属见纽，"则"字属精、照纽。"瞿"属遇韵，"赞"属翰韵，既不同组，又不同摄，"瞿""赞"二字如何能作一音之转？以言方位，《法显传》不言瞿摩帝在都城何方，亦未言距都城若干里，惟载："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一般读法，在"最先行像"后加断句符号，把"离城三四里"句归之下段，认为国王离城三四里才作四轮像车。此说难通，所以我认为"离城三四里"句归上段，意谓国王最先行像之瞿摩帝寺，离城三四里。如果这样

理解不误,法显虽未明言此寺的方向,但已指出距都城的里数。《魏书》则明言赞摩寺在城南五十里,五十里与三四里比较,相差太远。且《法显传》不言瞿摩帝寺的建设来历,而《魏书》却明说是国王为昔罗汉比卢旃所造覆盆浮屠之所。由此可见,黄氏所谓瞿摩帝寺即赞摩寺,没有什么根据。

我这样说,并不影响把什斯比尔旧城比拟为古代于阗国都城。因为这一比拟所根据的理由有二:一是小库马提旁玉珑哈什河,三面环山,河两岸沙山对峙,旧城即在西沙山脚下戈壁滩上,与《新唐书·西域传》所谓"王居西山城"合;二是旧城往南十余里之强司雅石塔,周围有大寺庙遗迹,与《西域记》"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合。玄奘虽未指出此大伽蓝的名称但他说此大伽蓝乃"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阿罗汉建也"。《魏书》于阗国传则云:"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卢旃为王所造覆盆浮图之所。"证之《宋云行纪》、《魏书》之赞摩寺即玄奘所谓城南十余里之大伽蓝,《纪》云:"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得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非皮非缯,莫能审之。"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魏书》与《西域记》所说是同一事迹,即于阗国王在城南为毗卢折那(或称毗卢旃)建造一座有覆盆浮图之赞摩寺。从古城至强司雅塔及其周围寺院遗址约十余里,与《西域记》的记载相符,又足见《魏书》作五十里之误。《水经注》河水二云:"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据此可以推知宋云所称辟支佛靴,应即《水经注》之石鞾,则

从方向、里程和佛迹来说，利刹寺似即指赞摩寺而言，但赞摩寺之又名利刹寺，于音不谐[26]。斯坦因谓赞摩寺的遗址约在今 Chalma-kazān，这一比拟，是以于阗国都城在今 Yotkan 为前提的，如果前提动摇，则此说即失所依据。

五、民族和文学语言

《西域记》谓瞿萨旦那国“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伎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音乐，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絁紬白毡。仪形有礼，风则有纪。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这是玄奘归国过于阗时所见其国人民的风俗、习尚和文字语言的大略情况。在此以前二百四十余年，法显过此国时，对此亦有所记述，除言“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之外，所记此国佛法之盛，远非玄奘时代所可比拟。

但从法显和玄奘两人的记载，都看不出此国的民族究属那一种类。按《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和《通典》卷一九二于阗国条均有如下的记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白鸟库吉对此段文字的解释云：“当时于阗人容貌，并非深目高鼻，反类华夏云云，决非指汉人之移居此地，其实应为类似汉人的西藏人混合的结果。”[27]《汉书·西域传》有婼羌国，位于阳关的西南，证之汉许慎《说文》“羌”字下的解释云：“羌，西婼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今本《说文解字》“羌”字下，无此释文，仅见于《太平御览》卷七九二四夷部十三西戎一“婼羌”条下。)其为汉代羌族所建立的国家无疑。羌族为西藏种，前已言之，但婼羌在汉代，不仅为一国，同时也为一种民族的名称。此族活动的地区甚广，从敦煌之南山一直蔓延至葱岭，在《汉书·西域传》中，举凡小宛、戎卢、渠勒、于阗、难兜诸国，都说与婼羌接，其余如

西夜、蒲犁、依耐、无雷等葱岭国家，其人民风俗都属于羌族，所以《三国志·魏志》引《魏略》云："敦煌西域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所谓月氏余种，应理解为曾经被南山小月氏统辖的羌族部落，所以仍以羌名之[28]。依此而论，此等游牧民族，最先有一部从于阗以南的南山山脉北麓，随畜逐水草以达塔里木盆地南边的绿洲，其后逐渐习于定居，而建立城廓和国家，正与其同种之在阳关西南形成一个国家的过程一样。据《西域记》所载，最早在于阗地区建城立国者为东土帝子。又据藏文《于阗国古史》所载，最早统治于阗地区者为大菩萨——中国(Rgya)之王。所谓东土帝子或大菩萨——中国之王，若依上述汉代羌族之活动地区来看，不但汉族的王者，而是羌族——西藏种人的酋豪。后来有 Galča 种人从兴都库什山区东移，先渗入葱岭诸羌氐国的居民中，继而沿着昆仑山北麓东进，以达于阗的绿洲，与羌族混杂。此种属于 Arya 种的 Galča 人之东来于阗，虽然有种种原因，但于阗屡经战祸，土著羌族大量死亡或逃归南山故地，当是重要原因之一。据《魏书》于阗国传，北魏真君中(公元 440—451 年)太武诏高凉王那击吐谷浑慕利延，慕利延惧，驱其部落渡流沙，那进军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同传载蠕蠕寇于阗，于阗王求救于北魏，又据同书哌哒传，于阗役属于哌哒。由此可知，南北朝时代，于阗地区居民减少，以致许多 Galča 人东来，互相混杂，但外貌仍保留羌种的特征，即所谓"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29] 直至现代，于阗人的体质中仍保存有西藏种的因素。英国人种学家 Joyce，根据斯坦因提供的材料，加以研究，结果认为和阗及克里雅人的体质，与 Galča 人最为类似，但和阗人的身材之低，鼻广，毛发黑，眼睛暗黑，大抵属于西藏系统的性质，在克里雅的土人中，此种性质，特别显著[30]。其实这种西藏系统的性质，来源甚古，是汉以前于阗地区羌族土著居

民的遗存。

藏文《于阗古史》云:“毗卢折那阿罗汉来到于阗，住在赞摩村的 Tsa-ma 石窟中。他成为于阗国(Li-yul)居民的精神导师,并教无知的牧民以于阗语,又创造了于阗国文字。于是 Vijasambhava 王兴建赞摩寺[31]。”若据此书，则毗卢折那阿罗汉不仅是于阗佛教的最早倡导者，而且是于阗语言文字的普及者和创造者。斯坦因在尼雅(Niya)地方发现一些古文书，是第三世纪中叶通行于阗的一种用佉卢(Khorathi)文字写 Prakrit 语言的文书，毗卢折那教给于阗牧民的可能就是这种语言文字，也就是玄奘所说“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但玄奘又说:“语异诸国”，正与《魏书》所谓“貌不甚胡”相应。可见在毗卢折那阿罗汉到于阗之前，于阗居民已有自己的语言，毗卢折那教给牧民的 Prakrit 语，并未流行。斯坦因于佉卢文书的研究中，发现既非印度语亦非伊兰语,文非实厥语，而其中所用称号名词等，乃多出于西藏语。又斯坦因于邓昙乌利克及安得悦(Endere) 所掘得的文书,初以为不可知的语言,后经霍宁研究的结果,才证明是由突厥语及蒙古语构成的单音缀的西藏语[32]。

六、宗教

毗卢折那之从印度迦湿弥罗国来到于阗，究在何时？也就是说,佛教什么时候开始传入于阗?这一问题,诸书都没有明确记载,惟《于阗古史》云:“于阗建国于佛涅槃后二三四年。建国一六五年后，于阗王 Yeula 的儿子 Vijayasambhava 在位。登位后第五年达磨(Dharm 胜法) 开始传入于阗。此王为弥勒和曼殊室利的化身。毗卢折那阿罗汉以比丘的面貌，出现于于阗，并驻锡于赞摩村之 Tsar—ma窟内。”[33] 据羽溪了谛的推算，于阗之建国，当在阿育王时代,即公元前二四二年顷,则佛教之传入此国，当为公元前七四

年之际[34]。但据刘秉钧说:"日人寺本(婉雅)著《于阗国史》一书,据斯密士(V. Smith)之佛灭年代说(西纪前四百八十七年),瞿萨旦那建于阗国之年代与本史推算,应为佛灭后之二三四年,因推定佛教传入于阗之时期当在西纪前八十三年左右。但此皆以学界所公认阿输迦王即位年代为根据而推定者,惟谓为西纪前五十六或五十七年之说,则较属可信。然而凡此算法,均以《西藏史》(藏文《于阗国古史》)为依据,倘记文不实,则此推算自亦随之谬误也。"[35]刘氏最后表示保留意见的几句话,正是说到问题的核心。我在上文已指出《于阗国古史》关于于阗建国年代上溯至阿育王时代;不可置信。范文澜说得好:"佛教神名除了释迦牟尼及迦叶、阿难等曾有其人外,其余大批名号如阿弥陀(无量寿)、文殊、普贤、弥勒、观音等,同金刚牙、金刚拳一样,全是凭虚编造。"[36]我们对于藏文《于阗国古史》这些著作,首先也要采取这种态度。例如所谓佛关于于阗建国的预言,世尊为人类幸福而留在牛角山寺中七日,Çariputra(舍利佛)、Vaiçravana(毗沙门天)两神用棒矛击湖使涸竭,阿育王弃子靠地乳成长,为毗沙门天携至于阗,成为中国(Rgya)王的第一百个鬼子等等,都属于神话性质。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某些神话传说的掩盖下,有时也会反映一定的历史事实。例如来自迦湿弥罗国的僧人毗卢折那劝国王信奉佛法,国王为他兴建赞摩寺,这种印度僧徒东来宣扬佛法的事情,在历史上,尤其是在西域诸国,都会发生,应该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但问题在于事情发生在什么时代。因为没有史书记载,只靠民间的神话传说流传下来,往往把原来的时代和事迹都改变了。

佛教初传于阗国的年代问题,迄今还不能作出结论。我们认为日人崛谦德所说,比较可取。他说:"佛教能致如斯之盛大,必经相当之年月,是以遍照(毗卢折那)传教于于阗之时代,当在第一、二世纪或其以前。第二世纪前半叶为迦腻色迦王出,印度佛教传

播于四方之时代，然则遍照传教于于阗国，或在此时[37]。"法显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从长安出发往天竺，于次年过于阗，欲观行像，停三个月。他住在瞿摩帝寺，谓国中有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他描述城西七八里之王新寺，但没有一言提及赞摩大寺。这样重要圣地，如果当时存在的话，法显当不会只字不提。足见此寺的兴建，不能早于五世纪初年。稍后，约当第五世纪初期，北凉将亡之际，凉州沙门表僧欲往罽宾礼拜佛钵，道途梗塞，遂停于于阗，对国王曰："谮摩伽蓝，有圣宝像，外国相传云，最似真相，愿得供养"，王即命工匠兴造高一丈之金簿像，其顶置真舍利而与之[38]。至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惠生赴西域求经，次年过于阗，其所记国王为比丘毗卢旃建造覆盆浮图及寺舍，已见上文。从这些记载来看，赞摩寺之兴建，当在第五世纪初期，即在法显过于阗以后，以至表僧留住于阗以前的一段时间。北凉沮渠茂虔（牧犍）为后魏所灭，事在公元439年，表僧之往于阗大概在此前几年间，则从法显过于阗之公元400年至表僧之留住于阗，其间经过三十年以上，于阗王于此时期内建造赞摩寺，非不可能。至谓赞摩寺是于阗最早兴建之寺，并追溯始建于佛教初传入于阗之时，乃后来僧徒宣染附会之说，不足为据。

于阗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很大，后汉时月支僧支娄伽谶（Lokarakṣa）汉译《道行般若经》十卷，流布汉土，至第三世纪时朱士行常以之教授子弟，觉得其中意义有不明之处，于是亲赴西域，寻求原本。三国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公元206年）起程，中途遇阻，返经于阗，寻得此经之梵本九十章，则当时于阗已有大乘教之存在。其弟子弗如檀携返洛阳，于阗人无叉罗（Mokshala）与河南居士竺法兰为之汉译，则于阗之大乘经典已流布于汉土。西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于阗沙门祇多密罗（Gitamitra 谓友）携来梵本《先谶般若》，又曾译《华严》、《方等》、《般若》等部之大乘经

典及阿含部之小乘经典。沙门支法领在于阗国求得《四分律》及《六十华严》之梵本。天竺沙门昙无谶(Dharmaraksha)亦在此国求索其所译之《大般涅槃经》后部梵本。其后北凉沮渠蒙逊(公元401—433年)之从弟京声入于阗,在瞿摩帝(Gomati)寺,从印度僧佛陀斯那(Buddhasena 觉将)习大乘及禅法,归姑臧译《禅法要解》二卷、《禅秘要治病经》二卷,后于宋孝建二年(公元455年)在扬都竹园寺及铁山定林寺所译之经律,大多数是从于阗取来的。又凉州僧慧觉、威德等八人,同赴于阗,在一大寺中习梵语,得《贤愚经》梵本,至后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由于阗还至高昌,译为十三卷。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僧法献游西域,在于阗得《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观世音忏悔除罪呪经》原本各一卷《法华经》一部及佛牙,携归汉土。齐武帝永明八年(公元490年)达摩摩提(Dharmamati 法意)于杨都瓦官寺译法献得自于阗之《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及《观世音忏悔除罪呪经》、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中印度优禅尼(Ujjayani)国之王子月婆首那(Upaiśinya 高空)遇见于阗国沙门求那跋陀(Guṇabhadra)持有《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七卷,后于陈天嘉六年(公元565年)译于江州兴业寺。此经当系求那跋陀从于阗携来者。玄奘死后,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沙门提云般若(Devapaṙjña 天智)来自于阗,于魏国东寺(后改称大周东寺)译华严部密教部之经典各二部,又《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名僧实叉难陀(Sikshānanda 学喜)从于阗带来大乘经典甚多,又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译华严部方等部秘密部经典及般若部大乘论律共十八部二十七卷[39]。

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出,自第三世纪以来,于阗国盛行大乘教,故其所流通之佛教经典,以大乘经为主,小乘教亦同时存在,但因国王崇信大乘,终不能与大乘竞争,故于阗与斫句迦两国成为西域大乘教的中心。历代名僧从于阗携带大乘经典,传入东土,有

些还自任翻译，对中国佛教之影响，至深且巨。羽溪氏曾将中国所译大乘经典中，凡可认为是于阗传入之原本，列为一表，属于华严部者共十一种一百三十四卷属于方等部者共二十种三十四卷，属于般若部者共五种五十二卷，属于法华部者一种一卷，属于涅槃部者二种二十九卷，属于大乘律部者三种三卷，属于大乘论部者二种二卷，属于秘密部者八种八卷[40]。据«法显传»所载，公元五世纪初，正值于阗国佛教极盛时期，国中有大伽蓝十四所，小寺不计，有僧数万人，多学大乘，人家门前，皆起小塔。法显所住寺即瞿摩帝大伽蓝，其王行像最先到此寺，足见其重要地位。二百四十多年后，玄奘到此国时，仅余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国王虽崇信佛法，热诚迎接，但却把玄奘安顿于城中之小乘萨婆多寺。其时于阗国所存佛教经典，亦不如以前之完备，故渡河所失，不得不遣人往屈支、疏勒访求。是则于阗国之佛教，在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已呈衰落之象矣。玄奘以后，慧超从天竺回国，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到达安西（库车），据其所撰«往五天竺国传»，谓于阗国“足寺足僧”。这只是一般的记述，不举数字，所记疏勒、安西、焉耆的佛教情况时，也用这四个字，以记述诸国佛教的一般情况，我们似不能认为至公元八世纪时，于阗国的佛教又会复兴起来。

七、瞿室𩜁伽山

«西域记»谓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𩜁伽山，义为牛角山，崖谷间建一伽蓝，崖上有大石室。瞿室𩜁伽为梵文 Gośrṅga 的音译，在若干大乘经典中称作牛头山（Gośīrṣa），如乌场国沙门那黎提挐耶舍（Narendrayasas）译之«大乘大方等日藏经»护塔品云：“复以阎浮提内，于阗国中，河水岸上，牛头山边，近河岸例，瞿摩娑罗香（Gomasālagandha）大圣人支提住处，付嘱吃利呵婆达多龙王。”实叉难陀所译«八十华严»卷四十五诸菩萨住处品中云：“疏勒国有一

住处，名牛头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于中止住。”据澄观《华严疏钞》谓集经时交通未开，将于阗误作疏勒。又支法领于于阗求得而为佛陀跋陀译出之《六十华严》卷二十九菩萨住处品云:“边夷国土有菩萨住处，名牛头山，过去诸菩萨于中住。”此边夷国或亦指于阗而言。此外，藏文《于阗国古史》亦说及此山，据云“后来此王(于阗国王 Vijayavirya) 在牛头山 (Goçìrcha) 上建造 Hgen-to-Shan 寺。”Rockhill 注谓 Hgen-to-Shan 一语，或为梵语 Goçircha 或 Goṣricha 之讹，或即中国语“牛头山”之音译，亦未可知[41]。显然，牛角不等于牛头，如果不是玄奘把牛头讹误为牛角，就是大乘经及《于阗国古史》把牛角讹误为牛头。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翻译《六十华严》之佛陀跋陀罗和翻译《八十华严》之实叉难陀都是东晋时人，而翻译《大乘方等日藏经》护塔品之那黎提拏耶舍则生当周隋之际，都在玄奘经过于阗之前。黄文弼谓《西域记》王城西南二十余里之瞿室餕伽山与现在库马提周围形势颇吻合，并云:(库马提)“由南往北约二十余里，皆属遗址区域，三面环山，河两岸沙山对峙，如牛之两角。”[42] 可见黄氏是把和阗县城东南四五十里库马提地区沿玉珑哈什河两岸的沙山当作《西域记》的瞿室餕伽山。但既然说上库马提古城遗址是于阗国都，那么瞿室餕伽山应位于古城遗址的西南二十余里处，而不应在玉珑哈什河沿岸马库提地区。斯坦因记述他从哈喇哈什河上源，沿流而下约七英里，抵达敖札特(Ujat) 村，从那里望见河对岸约一英里处有乌鲁厄特山 (Ulughat Range)支脉的陡峭山嘴，名科马利(Kohmari))，并说 M. Grenard 的考证使他相信科马利山嘴即玄奘所谓于阗佛教圣地牛角山(Mt. Gosrìnga)[43]。按和阗以南，介于哈喇哈什河与玉珑哈什河之间，有许多山头，旁哈喇哈什河东岸者为玉司马山，布伦哈山之东为卡浪古山，此山应濒玉珑哈什河西岸，卡浪古山之北为忙普伦山，亦称乐春山，又北为皮素丝山，皮素丝山之东为乌鲁山，这些山

都是昵蟒依山的支脉[44]。依方位言，斯坦因所谓科马利山，相当于《图志》的乌普阿山。1892年 Dutruil de Rhins 及 Grenard 二人在科马利山曾发现佉卢文字的梵语《法句经》，写在桦树叶上。据研究结果，认为是世界上最古的写经。斯坦因曾亲自考察此山上的石窟，窟内约40英尺深，8—10英尺高。据 Grenard 说这些写经残片是本地找宝人从石窟连同其他遗物一起发现的。这些法国旅行者说在两次考察科马利山时，找宝人送给他们的。但斯坦因不相信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地人发现时既不在场，也未指出发现的准确位置。卖给他们的人以宗教上反对的理由，阻止他们亲自到洞窟考察。斯坦因既曾亲自到过那些洞窟，使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些写本是否真的在那里发现。同样的写本残片曾在喀什噶尔出售而入于俄国人之手，很可能是那些找宝人有意把这个洞窟与他们的发现联系起来，以隐瞒其真实的发现地点[45]。

八、勃伽夷城、鼠壤坟和鹿射僧伽蓝

《西域记》谓王城西行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斯坦因以为勃伽夷城相当于今之木吉(Moji)，羽溪了谛以为相当于今之皮尔曼(Pialma) 附近之地[46]。按木吉东距和阗城三百五十余里，若再加从和阗城东南行四、五十里至小马库提古城遗址，约合四百里，较之玄奘所言里数，稍为超出。皮尔曼东距和阗城约二百里，若再加四、五十里，约共二百五十里，则较之玄奘所言里数，短少约达百里。黄文弼主张勃伽夷城位于今之裴桂牙附近，据说："裴桂牙西北约五里许徒诺克有废寺遗址，旁散布泥塑残件甚多。在废寺西北四、五里许之所罗倘不果拉麻札附近，陶片散布极广，房舍遗迹犹存，井渠巷陌，历历可辨，颓垣甚多，类似城墙遗迹，周广约十余里，可能为古城遗址。按辩机《西域记》称：'王城西行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距离约略相当。'裴桂牙'与'勃伽夷'音亦相近，可能

后者因沿于前。如此地遗址为唐之勃伽夷城，则庙基亦即瞿萨旦那王所建之伽蓝[47]。”谢彬曾至装桂牙驿北十余里的破城子，据云：“至其地见颓垣一区，周广数里，粗烧红泥窑陶碎片，极目皆是，挖掘数处，一无所获。据土人云：往时于此掘土尺余，恒见破毁铜章钱刀之属。清光宣时，欧人日人迭来掘取窑红泥佛多件，氈裹捆载而去[48]。”但谢氏认为是汉皮山国治废城。《汉书·西域传》谓于阗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又皮山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则皮山适居莎车与于阗间的中点。今和阗至装桂牙的里程与《汉书》所记约略相当，但今从装桂牙西北通莎车为四百六十余里，超过和阗至装桂牙的里程约一百里，故装桂牙从今日的里程来看，不能视为莎车与和阗间的中点，而汉皮山国的故城必须在装桂牙以西或西北，介于装桂牙与皮山县(固玛)之间。装桂牙东距和阗约300里，再加四、五十里，约合350里，正与玄奘所记三百余里之数相符。所以我认为黄氏以装桂牙西北的废城遗址当玄奘的勃伽夷城，较为可信。玉连(Julien)把勃伽夷还原为Bogaï，但瓦特斯则谓其原音可能是Bhāgya[49]。

《西域记》云：“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斯坦因以今之Kaptar—Mazar当之，这是一个圣地，以鸽群著名，有几间木屋和木栅为鸽舍，栖鸽以千数计，来往行人供以食物。据传是由一对神鸽遗传下来的后裔。那对神鸽则是从回教英雄Imam Shakir Padshah的心脏中神秘地产生出来的。他是在一次与和阗佛教徒的战争中死去。斯坦因认为此鸽舍乃用以纪念玄奘所说关于鼠群协助瞿萨旦那王战胜匈奴兵的功绩的。鼠群早已不见，而以鸽群代之[50]。谢彬称为鸽子塘，据说：“相传清乾隆时，兆文襄戡定回部，师行至此，迷失道途，得鸽引，始获出险。兆公感其异，划地种粮为之食，筑屋凿井使其栖。厥后光绪初年，董福祥率湘军进讨和阗叛回，道经此地，凿井十数，皆不得水，全军苦

之。突有鸽群飞过其前，识者以为鸽在沙漠中，非水不能活，遣人随鸽所向，果得水，军免渴溃。洎南疆大定，董以其事呈报督师左宗棠，更为之扩划地亩，种粮养之，以酬其功。”[51]据此，则鸽舍之设，另有渊源，不能必其为玄奘时代鼠壤坟的遗址。但依里程言，从小马库提至哈喇哈什河沿为四、五十里，从河沿至鸽子塘为八十余里，合计百余里，与玄奘所记王城西百五六十里，相差不多。黄氏疑帔尔曼驿北四十里之废寺遗址为鼠壤坟所在，从小库马提到帔尔曼约计二百余里，与百五六十里相差太多。玄奘谓匈奴率数十万众，侵犯于阗，史无可证。据《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条：“显祖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迦上表曰：‘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奴世奉大国，至今无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延望救援。’”又同书嚈哒国条：“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可见公元五世纪间，嚈哒和蠕蠕先后入侵于阗。玄奘所记，乃据土人传说，可能把嚈哒或蠕蠕误作匈奴。

《西域记》云：“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鹿射，高丽本作麻射。据传说，此先王即指瞿萨旦那王，王妃为东国人，是最初把蚕种传入于阗者。此传说亦见于藏文《于阗国古史》：“当 Vijayajaya 王在位时代，此王娶 Rgya（中国）王之女名 Punye—Shar 为妃，她把蚕引入于阗，先在 Ma-dza 地方繁殖，但 Rgya 宰臣在于阗王面前诡说，蚕会变成荒废土地的毒蛇，他于是下令把蚕舍烧掉。幸而王妃抢救了一部分，并秘密地养育起来。其后，她获得蚕丝，并制成衣服，携示于王，王大懊悔其前此所为。他从印度召一比丘名 Sanghasha 者，为心灵导师，以谶悔其杀蚕之罪，并建立 Po-ta-rya 和 Ma-dza 二塔及一大伽蓝[52]。”试以此段记载与玄奘的记述对照，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西域记》，窃取东国蚕种，为瞿萨旦那王的预谋，以求婚为手段，实则利用东国公主来归

而窃取蚕种，至于王妃育蚕，并无任何阻难。玄奘又详记公主窃蚕经过。但在《于阗国古史》则不然，公主从东国带来蚕种，似无阻难，反而在繁殖时其王听信东国宰臣之谗言，而将蚕舍焚毁。《西域记》谓当时瞿萨旦那，国王命使迎妇，而不言此国王之名，也不言东国公主之名，《于阗国古史》则称王名 Vijayajaya，公主名 Pu-nye-Shar。《西域记》的鹿(麻)射僧伽蓝相当于《于阗国古史》的 Ma-dza 大嗒。按此传说，在于阗国史上当有一定的真实性，即于阗蚕业传自东方国家。中国史书无公主远嫁于阗王的记载。玄奘称东国，而不称中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谓东国，是指于阗以东关内的国家，在古代中国内部纷争或割据时期，不一定是指代表中央政权的王朝。据羽溪氏的考证，Vijayajaya 王治世在公元五世纪初期，如果无误，则此故事发生于东晋末期和南北朝初期。在这一时期，关陇以西，曾先后出现过许多地方政权，如西秦乞伏氏、夏赫连氏、后凉吕氏、南凉秃发氏、北凉沮渠氏、西凉李氏等。这些政权，密迩西域，于阗王所娶东国公主，可能来自这些政权。因此，《于阗国古史》中的 Rgya, Rockhill 都译为 China，殊属可疑，以玄奘的东国译之，似较恰当。鹿射僧伽蓝，据斯坦因的考查，谓 Yotkan 东南约一英里的 Kum-i-shaidàn 圣祠，即古鹿射寺的所在地[53]。这是以 Yotkan 为于阗古都为前提而加以推断的，若以小马库提古城遗址为古都，则玄奘所谓王城东南五、六里的鹿射僧伽蓝，应在玉珑哈什河西岸小马库提范围内求之。据黄氏云，此一带上下约二十里，瓦砾遍地，鹿射僧伽蓝或即埋没在这一带的瓦砾之中。

①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1956年上海商务版，188—190页。

②The Early History of Li-yul 见 W. W.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chapter VIII, p. 230—248.

③《西域之佛教》，p. 203。

④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民29年长沙商务版138—139页。

⑤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300。

⑥The life of the Buddha, p. 234—236。

⑦柔克义(W. W. Rockhill)把这两种史料译出并编集成《于阗古史》(The Early History of Li Country [Khotan])，作为"The Life of The Buddha"一书的第八章。

⑧辛哈、班纳吉著张若达等译《印度通史》，1964年北京商务版95页。

⑨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1956年北京世界知识社版155—158页。

⑩烈维著《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160—234页。

⑪《梁书·西北诸戎传》谓以其弟君得为于阗王。按《后汉书》，君得乃莎车将，莎车王贤遣之镇守于阗者，不言其为于阗王。

⑫《旧唐书·西戎传》于阗国条云："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新唐书·西域传》屈密作屋密。

⑬《旧唐书》云："及阿史那社尔伐龟兹，其王伏阇信大惧。"按社尔伐龟兹在贞观二十年，至高宗时信来朝，拜为右卫大将军。此王立于何年，史无记载，但可决其始立于贞观二十年以前。

⑭《旧唐书》云："垂拱三年其王伏阇雄复来入朝。"

⑮《旧唐书》云："天授三年伏阇雄卒，则天封其子璥为于阗国王。"《新唐书》云："开元时(公元713—727)献马、驼、豹。"

⑯《旧唐书》云："开元十六年复册立尉迟伏师（战）为于阗王，数遣使朝贡。"

⑰《旧唐书》云："乾元三年以于阗王尉迟胜弟守左监门卫率，叶护曜为太仆员外卿，仍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以胜至德初(公元756年)领兵赴国难，因坚请留宿卫，故有是命。"

⑱《西域之佛教》，211—228页。

⑲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北京三联版7—10页。

⑳《西域之佛教》，226—228页。

㉑清王昶《金石萃编》，卷52。

㉒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3页。

㉓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3 p. 259—262。

㉔《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3—54页。

㉕足立喜六著何健民张小柳合译《法显传考证》,1931年上海商务版，44页注六。

㉖范祥雍著《洛阳伽蓝记校注》，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75—277页。

㉗《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36—137页。

㉘《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条云:(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可见西汉时大月氏,有一小部分因逃避匈奴的攻击,而入于南山羌族的居地,并统御其地诸羌，故以小月氏称之，但其部落则仍以羌族为多。此等羌族部落后来随畜逐水草，不断向西发展，直至葱岭,虽称月氏余种,亦可能混杂了月氏人但不能认为就是月氏种，而应仍以羌族为主体,故以羌称之。

㉙关于 Galča 人的东移问题，可参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30页。岑仲勉著《塔吉克噶勒察及大食三名之追溯》,见《中外史地考证》下册，1962年北京中华版395—397页。

㉚《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00页。

㉛The Life of The Buddha,p. 236。

㉜Aurel Stein: Aneient Khotan,p. 149—150。

㉝The Life of the Buaddha,p. 237。

㉞《西域之佛教》,203页。

㉟刘秉钧《于阗国之研究》,《磐石杂志》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第六章《于阗文化史》(三)宗教。

㊱《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581—582页。

㊲蝈谦德著纪彬译《于阗国考》,《禹贡半月刊》四卷一期。

㊳《名僧传》卷二十六表僧传。

㊴《西域之佛教》,219—231页,《于阗国考》。

㊵《西域之佛教》,246—255页。

㊶The Life of The Buddha,p. 238。《西域之佛教》,216—217页。

㊷《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4、138页。

㊸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p. 244。

㊹清王树枬《新疆山脉图志》。

㊺"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 246—247。

㊻同上 p. 191.《西域之佛教》,207页。

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5页。

㊽《新疆游记》,234 页。
㊾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302。
㊿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 194—196。
(51)《新疆游记》,235 页。
(52)The Life of The Buddha, p. 238—239。
(53)Ancient Khotan, vol. 1, p. 230。

从瞿萨旦那国至纳缚波故国的一段行程

《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云："王城东三百余里大荒泽中，数十顷地，绝无蘖草，其土赤黑。"据说这里就是瞿萨旦那国军队与东国军队大战败北之地。又云："战地东行三十余里，至媲摩城。"谢彬《新疆游记》谓从策勒村向东行一百九十里至克里雅城，丁谦《考证》即以此城当玄奘之媲摩城。按《西域记》言战地在媲摩城之西三十余里，则战地适在策勒村与克里雅城之间的偏东地区。媲摩，瓦特斯还原为 Bhimā，即 Durgā 女神，亦即西藏文书中所称的 Sri-Mahadevī，为于阗国所崇敬①。但 Grenard 谓相当于和阗之克里雅的唐代媲摩城一名，为西藏语 Bye-Ma 的对音，其义为沙。关于媲摩城的方位问题，丁谦《考证》说，媲摩城即今克里雅城，媲摩川即今克里雅河。斯坦因从和阗北玉珑哈什河东岸行了六天（平均每天行 50 里，共约 300 里）才找到旦当乌里克（Dandan-Ulik）的古代居民区及寺庙遗址，在其南方的沙丘地带发现有一地名 Uzun-Tati（位于和阗东北约 55 英里，约合古汉里 300 里），他认为这里就是玄奘的媲摩（Pi-Mo）城，马可波罗的培因州②。俄人 Prejevalsky 亦考定媲摩（Pi-Mo）即培因州③。黄文弼则从克里雅河西岸的于阗出发，在可拉克庄以北约 200 里处考察一古城遗址，名卡纳沁，他认为此即马哥波罗的培因州④。斯坦因和黄氏所说的地名虽不一样，但他们都提到附近有一地名 Ulugh-Ziarat，黄氏称之为吴六杂提麻札。前者说 Uzun-Tati 在 Ulugh-Ziarat 西北三英里处，后者则说卡纳沁在吴六杂提麻札东北约六里，足证两地

相去不远，可以说包括在东西约二十里的范围之内。

在《西域记》关于雕檀立佛像的传说中，提到一个古城名曷劳落迦，此城位于瞿萨旦那国北部，为大风沙所掩埋，幸而逃脱灾祸的人迁移至东边的媲摩城，则此被埋之曷劳落迦城应在媲摩城之西。斯坦因曾从克里雅城沿克里雅河往北行约50英里的 Karadong（义为黑土丘，Black hillock）考察，认为那里的遗址，相当于玄奘的曷劳落迦城，只发现一个小范围的守望站，附近没有耕地的痕迹，不能成为一个有大批居民的城镇⑤。但据黄氏在同一地点的探查（黄氏称为喀拉墩）此遗址的范围相当大⑥。按问题还不在于规模之大小，而在于斯坦因把曷劳落迦的方位完全弄错了。《西域记》谓曷劳落迦城一夜之间为雨沙所掩，只有一个雕檀立像的虔信者从预先挖成的地道中逃出，"东趋此国，止媲摩城"。我们从整节关于瞿萨旦那国的记述来看，玄奘所谓"此国"，是指瞿萨旦那国而言，此人既从曷劳落迦城向东行，止于媲摩城，则曷劳落迦城应在媲摩城之西。若依斯坦因把位于克里雅北150英里的喀拉墩（Karadong）比拟为曷劳落迦，则适得其反，即曷劳落迦位于媲摩城之东，与玄奘的记述，大相径庭。黄氏曾考察玉珑哈什河的旧河床，此旧河床从吉牙庄分出，向北偏东行，后转入沙碛，流沙开处，瓦砾遍地。后又转东向北行，瓦砾更多，最后至一土台，周约百余米，台上有房基遗址数间。此乾河一带遗址，即位于斯坦因所拟媲摩城遗址，在 Uzun-Tati 或黄氏所拟的卡纳沁以西，故曷劳落迦城，如果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话，它的遗址应从此乾河沿岸一带或其以东以北的其他乾河地区求之。因为这些地区现在虽然是沙丘弥漫，但在古代，河渠纵横，曾经有大批居民生息耕植于其间。斯坦因说这一带居民城镇村落的废弃，是由于从南山下来的诸河道迁移或固竭，但涸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风沙的侵蚀，尤其是靠近大戈壁边缘的地区，某一城镇村落，在一夜之间为风沙所掩没，非

不可能。谢彬云:“行经沙窝,最忌遇风,大风过处,流沙皆平,杳无痕迹。”斯坦因自己也从当地村民那里听到有关沙埋城镇的传说,基本内容与千余年前玄奘的记述相符。所以我同意崛谦德氏的看法,即曷劳落迦被沙埋之说,并非毫无根据,而为有某种事实作基础而加以修饰者⑦。

玄奘言,从媲摩川东行沙碛二百余里,至尼壤城,丁谦《考证》谓媲摩川即今克里雅河,尼壤城即今之尼雅回庄。瓦特斯据赫定的考证,认为今之尼雅,即玄奘之尼壤城。日人崛谦德且从语言学上来证明:“尼为梵语 ña(ni?)之译,壤为梵语 ṇyaña、jña 之译,故尼壤应为原音 Niña 之音译,今之 Niya,恰当玄奘所指尼壤之位置。在 Niya 地方所发现之佉卢文字之刻文中,据 Rapson 氏之解释,曾有 Niṅa 之地名,盖此 Niṅa 即Niña 变形,Niña 更变而为现在之地名 Niya,ña 恰有如 Nya 之发音,n 被略去,遂仅为 ya。此种变形,在 Prakrit 语中极为普遍,故可考定,Niya,今日之 Niya,即为玄奘之尼壤城。”⑧谢彬则认为尼雅为尼壤之转音,尼雅北二百余里有古麻札,麻札北百余里有破城子,当即尼壤古城⑨。按玄奘所谓“川”,不能解释为河,例如他在记述阿耆尼国时说:“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又在记述波谜罗川时说:“国境东北,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处不逾十里。……”从这两段记述来理解,玄奘所谓“川”,不是指河流本身,而是指山间有水流灌注的广大平野。因此,媲摩川不能理解为克里雅河,应该指媲摩城附近的广大平野。《慈恩传》媲摩川作媲摩城,亦是一证。《西域图志》卷二十八叶什勒库勒条云:“按媲摩川为今车尔城西境之河,则由是东行二百余里为尼壤城,当即今克尔雅城。所谓大泽,应即今叶什勒库勒。”俄人 Prejevalsky 亦主张今克里雅城,即玄奘之尼壤城⑩。

由于阗(即克里雅城)东至尼雅庄283里，再加Uzun-Tati附近东至克里雅河沿约200里，共达480里以上，里程超过玄奘所记二百余里太多。如果说今之尼雅，即玄奘之尼壤，则媲摩城不能在今之Uzun-Tati，势必须位于今之克里雅城或其以北克里雅河沿岸的某地。若以今克里雅城为玄奘之尼壤城，又嫌太近。从克里雅至尼雅的大道以北，有三个古城遗址，一个约在列克乌罗斡乾沟以北数里处，谢氏谓即古拘弥城，基址甚广，土人常于其间掘得泥佛像，铜章和绿宝石等物。一个在乙斯玉洛滚(Yesyulghun)以北二、三日程(约百余里)处，谢氏云:"涝坝房舍，基址宛然，芦苇丛中，掘地数尺，即可得水，土人有于其地掘得古物者，载籍无徵，不知为谁氏城邑，大抵汉唐时建筑也。"一个在尼雅北约四百里，城垣房基，多有存者，谢氏谓即尼壤古城，土人于其地掘得金条银镯及其他古物甚多，古物多为英人斯坦因购去，其纳官中者，有紫铜锅一口，红裤一件，靫子笼头一副，正方铜章一方，门户装饰品铜鱼四枚，铜杯一只，扣带铜钮一副，矢镞二枚，其他不知名的残铜器多件。斯坦因对尼雅北边的遗址，曾作过考察和发掘，从尼雅向北沿河岸行19英里(95古汉里)，经Nagar-Khana，12英里(60古汉里)过Dobe-Bostan，继续北行若干里，乃抵圣地Imam Jafar Sadik古坟。从此北行3英里(15古汉里)，尼雅河消失于沙中。在这里有大宅遗址，发现雕刻花纹的木椅，建筑像是衙门，获得许多木牍，封泥上刻着中国字，但有一件是婆罗谜文的。有一件木牍中载明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从佉卢文的木牍可以看出在古文书中，与贵霜王的佉卢文铭文的特点是相符的。这些王者在公元一、二世纪间统治了印度的西北部。小塔东北一英里(5古汉里)处又有古建筑遗址。由此转向西北一英里半(7.5古汉里)有住宅区的遗址，发现佉卢文木牍约达100件。这些佉卢文经证明是早期Prakrit语，而混入了一些梵文词句。但在上述遗址中，未发现过一片

纸，说明这些遗址的兴盛时代较早，是属于公元第一至三世纪的[11]。一有关 Imam Safar Sadik 圣地的传说，他率领回教徒对 Khotan(Chin-Machin)异教徒作战而在此地牺牲，以及玄奘说尼壤城是瞿萨旦那东境的关防。从这两点来看，此地直至公元十世纪下半期回教势力侵入于阗之前，应有居民。玄奘描述尼壤城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正因为是交通要冲，所以两军在此相遇也。谢氏谓即尼壤古城所在，其言可信。如果这一考证无误，则从媲摩城所在的卡纳沁或 Uzun-Tati，东至尼壤城，约计 400 里的路程，与玄奘所记二百余里相差太远。不是玄奘的记载有误，就是媲摩城的位置要往东推移。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第一，玄奘的媲摩城即后来马可波罗的培因州，业经玉尔考定于先，斯坦因证实于后，培因州位于今和阗的东与东北之间，适与斯坦因所到 Uzun-Tati 的方位相符；第二，在尼雅所发现的佉卢文牍中，有 Nina 的地名，即 Niña 的变形，由 Nina 又变而为今之 Niya，已经赫定及蝈谦德的考定，则尼壤位于今之尼雅河及其河东的沿岸地区，为无可否认之事实。所以，玄奘之二百余里，似为记录上的错误。

《西域记》云："从此(尼壤城)东行入大流沙，……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按玄奘所谓覩货逻故国，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呢？这个问题，学者的意见不一。斯坦因于 1901—1907 年间曾两次到尼雅东北约 120 英里的安得悦遗址考察，遗址自南至北有 14 英里多，最宽处有 4 英里左右，在南距第一次发掘的遗址 4 英里处，发现一批佉卢文的木牍，为公元三世纪中叶的遗物，还发现一打以上的汉文木简，又有一个档案库，遗留楔形木牍在一百件以上。据说，公元 645 年左右玄奘所到之覩货逻故国，正相当于放弃了的安得悦遗址[12]。蝈谦德说，覩货逻在尼雅东八十

余英里，应为今之安得悦(Endère)。谢彬也说："安得悦，回语有二义：一陡峻，谓河岸高而陡，难为升降；一忙迫，谓河底皆浮沙，易陷人马，须觅沙之硬处催马急渡也。……按安得悦一名安多罗，唐辨机《西域记》自尼壤城东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覩货逻，《新唐书·西域传》作故都罗，即安都罗也。"按《新唐书·西域传》覩货罗未有作故都罗者，谢氏恐有错误、但安得悦一名安多罗，其音甚近。有些学者则根本否定于阗之东有所谓覩货逻故国的存在，如丁谦说："尼壤城即今之尼雅回庄。又东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考吐火罗辖境，均在葱岭以西，距此甚远，遍检史籍，亦无吐火罗人立国于此之事，实系传闻之误。《新唐书》作故多罗，尤颠倒舛谬。核其方位道里，盖即汉精绝国境无疑。今此地有新立之堡曰车尔城。近俄人普舍瓦尔作游记云：距车尔成西十余里，土人云，古时有一城，二千年前早已沦没，即此记故城也[13]。"读此方知谢氏引《新唐书·西域传》作故多罗，乃沿丁氏之误。伯希和也说："我在我的论证中，未引证《西域记》所记和阗(于阗)罗布(纳缚波)中间城皆荒芜的覩货逻故国者，盖我以为此城从未存在，……我以为应将'吐火罗故国'的故事与曷劳落迦(Rouruka)城荒芜的故事等量齐观[14]。"白鸟库吉更从民族人种和语言方面论证玄奘所谓覩货逻故国，是出于杜撰。他为了说明此一问题，差不多用了一万五千字以上的篇幅[15]。但把他的论点概括起来，所持主要理由不外下列三点：(一)在印度发现的古大月氏所铸造的货币上，刻有大月氏王的肖像，从其骨相可以看出是属于 Turk 种的民族，塔里木盆地南边，古时为西藏种所据，此地区如果西藏种之外，尚有其他人种混合，则此种人种，必非 Turk 种，而系 Arya 种，大月氏既属于 Turk 种民族，并且与西史所称吐火罗为同一民族，则吐火罗(覩货逻)就不会移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而建立所谓覩货逻故国；(二)汉人称某国故地或故国者，并非用以指称某国人民的根

据发祥地,其实仅用以指称往昔曾用此名的国土,葱岭东方 Takla Mahan 之呼为吐火罗,史乘之中,无证可徵;(三)公元二世纪时代 Ptolemaeos 所著《地理书》记述相当于中国黄河的 Bantisos 河出西藏高原而转入北方之处,以及相当于南山山脉的 Kasia 山脉东端的 Tagaur 山脉东麓,有 Tagour 人, Bantisos 河东岸则有 Thagoura 城,此 Thagoura,即其他西史所载的 Tokhāra(吐火罗),亦即汉史所载的大月氏,其发祥地乃在甘肃河西,其都城在凉州,而不在和阗东方的 Takla Mahan 一地⑯。

关于第一点,西方学者如克拉普洛式(Kraproth)、圣马丁 Saint Martin)、黎希托芬(Richthofen)等都认为大月氏族是西藏种,惟白鸟库吉则主张大月氏为 Turk 种。白鸟氏的主要理由是根据大月氏钱币上的王像,表现为 Turk 人的骨相,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自大月氏为匈奴所逐,从河西根据地远走妫水流域,征服希腊人所建立的大夏国之后,已逐渐同化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伊兰种族之中,由原来的蒙古利亚种混入了阿利安人种的因素,因而大月氏诸王的面貌,表现为高额隆鼻,鼻梁钩曲,唇厚多须髯,即 Turk 人中最常见的骨相。其实,征服大夏以后,与本地人混杂了的大月氏人骨相,早已见于《高僧传》,据该书初集卷一康僧会传谓支谦其为人细长细瘦,眼多白而睛黄。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我赞同黎希托芬诸氏的主张,即大月氏原来是西藏种,是介于匈奴与羌氏之间的一个种族。我们的依据有三:一是《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是大月氏西走时留居南山的余部,不仅被服饮食与羌略同,而且语言亦与羌略同,也就说,湟中月氏的语言是属于西藏语系的。我们知道,民族的特徵之中,比较变化少的或比较有巨大稳固性的是民族的语言,所以近代学者要根据语言的体系来区分民族和人种的体系:二是根据《魏略》的记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

豪。”其中白马羌分布很广，后汉时湟中（指湟水流域和令居，即大通河流域一带）是白马羌最大的根据地，此外又有武都（指甘肃东南部），被称为武都塞上白马羌，又有白马羌、氂牛羌在蜀汉，可见后汉时代，出于大月氏的白马羌已成为羌人中一个大族类。如果用历史溯源的方法来区分民族和人种，我们从中国史书方面实在找不到任何资料，足以证明白马羌的祖先大月氏是 Turk 种；三是据《魏书·西域传》小月氏条云：“其先居西平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其俗以金银为货，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又可知小月氏的生活习惯亦与匈奴相类。至于白鸟氏所说：“与月氏密接而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乌孙，既已证明为 Turk 种，且其东邻国历来共信为 Turk 种的匈奴，既已证明为蒙古种，则素与匈奴划然区分的月氏之必为 Turk 种，亦自然可以推测得到的了。”按这里所谓“划然区分”，意义不很明确，显然不是指人种上的区分，因为月氏与匈奴在人种上的关系，尚有待于论证，也不是指民族生活习惯上的区分，因为月氏人的生活习惯与匈奴相类，有《魏书·西域传》为证，那么，只能说是指政治上的区分了。月氏与其东邻匈奴为敌，确是事实，可是甲民族或国家与乙民族或国家在政治上的对立，不能说甲乙两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必然是不同的人种。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对立，与人种上的区分，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同一人种的民族或国家之间互相敌对是常见的现象。如果不能确切地证明月氏在侵入大夏以前已是 Turk 种，则白鸟氏的第一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关于第二点，葱岭东方 Takla-Mahan 有过吐火罗国，在史书上虽则没有记载，但据《汉书·西域传》，大月氏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而《魏略》又谓西域南山中为诸羌所居，这些月氏余种有一部分聚居于和阗且末之间，自成村落，非不可能，但因人少力薄，只能附属于且末或和阗，故史书不为立传。玄奘经西域回国，既知月氏

与覩货逻混合成为一种族,故对土人所传月氏人曾聚居的地方,也称之为覩货逻故国。正如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遣张匡邺、高居诲出使于阗,居诲所记途程谓沙州西,直至于吾卢有仲云族,为小月氏之遗种。其首领建牙于胡卢碛,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迎晋使,俨然为一王国。又据敦煌所发现的宋人写本《西天路竟》一书(见《斯坦因劫经录》383),其所记西域路程中,介于高昌与龟兹两国之间,有月氏国。所谓月氏国,当即五代时高居诲所称的仲云族所立之国家。若然,则其辖境又向西扩展至焉耆一带矣。我们不能因五代史或宋史不为之立传,就不承认有仲云族的月氏国之存在。关于第三点,白鸟氏据希腊人Ptolemaeos的《地理书》以论证吐火罗的发祥地在河西,而不在葱岭东方之Takla-Mahan,按生当东汉桓帝早期的Ptolemaeos,并未亲自到过东方,他的《地理书》只是据马其顿商人所述,有关东方的记载,模糊不清,故历来学者对书中的地名,议论纷纷,迄今未获得一致的结论。白鸟氏本人也谓Ptolemaeos的地图,其经纬度决不如今日地图之精确⑰。有些错误,非常明显。例如印度洋四周皆为陆地环绕,又测定秦尼国都为东经一百八十度之类⑱。我们根据这样的一本古代地理书来论证所谓包泰斯河(Bautisos)为黄河,其东岸Thagoura城即月氏人的发祥地姑臧(凉州),其经纬地望如此准确,实在使人难于置信。古代希腊人把中国分为赛里斯国(Serice)和秦尼国(Sinae)。赛里斯国在西,秦尼国在东,赛里斯国四周有安尼巴山绕之。赛里斯国中有许多山,其中一山名Thagoura,有二大川,其一名Bautes(Bautisos),又有许多城,其一名Thogara(Thagoura)。Ptolemaes虽然说明赛里斯国的四至,但除西界Scytha及南界印度恒河(Ganges)东岸地之外,其东界北界都说是无名地(Terra Incognita)这一四面被安尼巴山围绕的赛里斯国究竟相当于中国何地?就很难弄清楚了。玉尔谓赛里斯国为今中国新疆境域,秦尼国即中国

本部十八省，彼从新疆三面环山以推度之，未必有任何依据。假定以新疆当之，那么，所谓 Bautes 河、Thogurus 山和 Thogara 城都在新疆境内，而不会在甘肃省的河西了。白鸟氏以 Ptolemaoes 的赛里斯相当中国及河西、河首、西域等地，而以 Sera Metropolis 为长安。如果赛里斯的疆域如此辽阔，则其东邻的秦尼国又将置之何地？环绕赛里斯国四周的安尼巴山又指何山？对于这些问题，就很难解说清楚了。所以，我们以其说玄奘的覩货逻故国出于杜撰，毋宁说玄奘的叙述，当有所据。至于覩货逻故国是否相当于安得悦遗址的问题，我认为从里程来看，很有可能，因为今代从尼雅至安得悦计程 360 里，古汉里小于今里，依一公里等于 2.558 古汉里计算，180 公里等于 460 古汉里有余，与玄奘所记从尼雅城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国，正相符合。又今代从安得悦至且末，计程 545 里，等于 690 古汉里有余，亦与玄奘所记从覩货逻故国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的里程基本相符。

折摩驮那为梵语 Chalmadana 的音译，据 V. A. Smith 说，即清代的卡墙(Cherchen)，后来学者都没有异议。此国原名且末，折摩驮那乃玄奘附会梵语的雅称。谢彬曾至城南偏西十五里处考察且末古都城废墟，据云："城基周广约二十里，城垣数段，岿然犹存，房舍基址，区划如新，每经大风，土人辄往是地寻拾古物、铜章，间有获窖镪者。……近世以还，外人来游兹土，往往于破城中掘获多数古物，皆完好可观。"俄人 Prejevalsky 亦谓距车尔成西十余里处，土人云，古时有一城，二千年前早已沦没⑲。按今且末县无城，与安得悦(覩货逻故国)相距将达 700 里，与玄奘的六百余里比较，稍为多些，若至此古城遗址，则里程约略相符。且末在汉代只有居民二百三十户，一千六百一十口，其实是一个小城镇。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 442 年)鄯善为沮渠安周所侵，其王比龙率国人半数逃至且末避难，后且末役属于鄯善。《北史·西域传》且末国条

谓西魏文帝大统八年(公元 542 年)其王兄鄯善米率众内附，此后役属于吐谷浑。隋平吐谷浑，立为郡。隋乱，复为吐谷浑所有。唐太宗贞观九年诏李靖、侯君集讨之，追至且末之西。且末屡经兵燹，故玄奘过此时，称为故国，城廓岿然，人烟断绝。又《新唐书·地理志》云:(新城)"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播仙镇，《旧唐书·郭元振传》作播仙城，则玄奘过后约三十年，此城又曾重建矣。且末城东有车尔成(卡墙)河，古称且末河，或谓即佛书所谓阿耨达水。玄奘从折摩驮那故国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

综观上述，玄奘从瞿萨旦那国至战地三百余里，战地至媲摩城三十余里，媲摩城东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从此东行入大流沙，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又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又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整个行程从表面数字合计为二千五百三十余里，其实六个里数都有"余"字，其中五个里数的"余"字假定平均为三十里，第六个里数为"千余"，假定其为一千三百里，则实际里程约共二千九百八十里。今代由和阗至婼羌县治为二千三百六十八里，古里小于今里，两者比较不会相差太多。当然，有两种情况应该估计到:一是玄奘时代的瞿萨旦那国都城，不在今之和阗县治，而纳缚波故国的都城，也不会在今之婼羌县治，但估计差数亦仅在数十里至百余里之间；二是由于南山流下来的水源逐渐减少及沙漠逐渐南移，玄奘所取路线，可能在现今驿道以北，距今驿道以北由数十里至二、三百里处，曾发现有八、九个破城子，这些破城子在古代当有商道连系起来，玄奘可能循这条古代商道，横贯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绿洲，但这些路线上的变化，对整个方向和途程，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今代由和阗至婼羌的驿程如下:

发和阗，出东门，折向南行，十里玉珑哈什河沿，五里玉珑哈什八栅，二十五里新八栅，三十里洛浦县治，其产玉之地曰大胡麻小

胡麻。县境古城甚多。发洛浦，东偏南行，十里入戈壁，二十里阿赫栏杆，四十里白石驿，二十里阿息玛拉杆，二十里乙根栏杆，洛浦于阗于此交界。二十里赫尔巴托栏杆，二十里赤拉逊，即策勒村。又向正东行，五里吉木提拉克栏杆，十里倭依达栏杆，二十五里苏披栏杆，五里固拉哈玛八栅，过固拉哈玛河仍东行，二十五里过潘拉克水，入达木沟(或作达玛沟)八栅，过达木沟水，行戈壁，三十五里子木拉提栏杆，十里罕兰沟(亦作哈浪沟)庄，向东行，微偏南，过罕兰沟水及桥，二十里雅栏杆，二十里西河里栏杆，二十里雅和栏杆，俗呼六十里店子，十里甲斯米栏杆，二十里新八栅，俗呼三十里铺，五里倭头提拉克栏杆，十五里小八栅，五里苏介提阿里克栏杆，五里于阗县治，即克里雅城。发于阗，二里出八栅，向东行，微偏北，一里克里雅河沿，三里伯什托和拉克庄，十五里入乾沟，循沟行，沟名列克乌罗干，二十五里过沟中小流，六里哈喇库木什，十里雅和普阿浑栏杆，五里威托拉克庄。向东行，微偏北，八里出庄口，入戈壁，十里升沙坡，入沙窝，十里有支路南达金厂，过此沙梁升降，最费马力，十三里沙窝尽，复行戈壁，二十四里乙斯玉洛滚，中经沙梁极多，俗呼七十二道沙梁子。东偏北行，四十里阿不拉子，二十五里过一沙沟，四十里梭梭坪，东北距尼雅河约二里，十六里尼雅乡约，十五里坎生里克庄，十二里渡尼雅河正流，二里入尼雅八栅，地名兰披(亦作兰攀，今民丰县治在其西北)庄北二百余里有古麻札，麻札北百余里，有破城子，即尼雅古城。东北行，七里出庄口，入草湖，初沿尼雅河岸行，继折贯草湖中央，十五里，道右遥见哈玛库图克(亦作喀勒马克库都克)庄，十六里升沙坡，入沙窝，十里胡桐窝子，八里沙窝尽，三里出树窝，行旷野，十三里胡桐窝子，十三里莫达雅。东北行，多偏北，十六里别列克里克，二十一里乾海子，三十八里雅通古斯(亦作牙通古孜兰干)。东北行七十里雅可托和拉克，十五里额底里什，七十里野马井子，三十五里安得

图 17　从瞿萨旦那国至纳缚波故国的行程图

悦(亦作安迪尔)兰干，过安得悦河入且末境。安得悦即《西域记》之覩货逻故国。东北行，五十八里卡玛瓦子(亦作喀马尕孜)于阗且末旧于此分界。二十余里梧桐窝子，四十六里树塘(亦作休当)，二十五里拔卡，六十五里青格里克。东北行，二十五里过能密能水(亦作喀拉米兰河)，五十七里乌斯曼巴依，二十五里塔伊拉克托多罕，三十八里阿哈巴依(亦作阿克瓦伊兰干)。东北行，十六里入沙窝，二十二里沙滩，六十二里克提莽(亦作开特买)，东偏北行，十六里喀拉斯的，八里过一古渠，二十五里坑沙洋塔克，四十一里且末县治。北偏东行，二十里白列克库尔，四十里阿哈提肯尔墩，十里斯窝塔哈，五十里塔他浪庄。东偏北行，十二里老塔他浪，八里卡墙河沿，卡墙河即且末河。渡河仍东偏北行，二里塔哈提帕尔，四十三里削库尔，四十五里沁库尔。东偏北行，四十一里阿斯湖旧驿，二十五里帕提莽尔特，三十二里克列阔勒，十二里敦的满子，十里阿哈塔子墩，东偏北行，五十里布和拉克，过此折向东行。十五里过二大沙梁，五十里雅可托和拉克(亦作牙喀托格拉克)，十里青格里克。向东行，二十里袷袢卡特，二十里乌尊恰瓦，二十五里迫勒，且末婼羌于此分界。折东偏北行，三十五里破城子，唐之弩支城也。五里瓦石峡河，渡河八里瓦石峡庄。东偏北行，五十五里五受柯多可，十五里赊里克，三十里卡拉威洛竿，二十里泾里克，东偏北行，三十八里伯什拉克，二十里塔底胡拉卡，三十五里苦罗阿斯竿，十五里新户庄，回语曰特底浪。过沙沟一，沿大河坝，即婼羌河。十五里卡克里克八栅，二里婼羌县治。罗布淖尔西北岸，有罗布、起克二庄，婼羌僻处罗布淖尔之西[20]。

①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303。

②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323。

③From Kulja Across The Tian-Shan To Lob-nor, P. 156。

④《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48 页。

⑤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 430—433。

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0—51页。

⑦蝠谦德著纪彬译《于阗国考》,《禹贡》4卷4期。

⑧同上。

⑨《新疆游记》,253页。

⑩From Kulja Across The Tian-Shan To Lob-nor, p. 156。

⑪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 339—408。

⑫《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75—76页; Sand Buried Ruins of Khotan, p. 409—422页。

⑬丁谦著《大唐西域记考证》,瞿萨旦那国条。

⑭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89页注二九。

⑮《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131—155页。

⑯同上。

⑰同上,312—313页。

⑱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辅仁大学版,第1册44—57页。

⑲From Kulja Across The Tian-Shan To Lob-nor, p. 156。

⑳《新疆游记》, 247—24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图109—110、111—112、153—154、157—158、159—160、161—162。

纳缚波故国考

一、国名

《西域记》云:“复从此(折摩驮那故国)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关于“纳缚波”一名的语源问题，学者的说法不一。瓦特斯说:“在一个时期，此国都城为扜泥，另一个重要城镇为伊循，其地有汉人居住。伊循(Isun)是鞑靼语“九”，而 nava 在梵语也为“九”，所以玄奘的纳缚波 (Na-fo-pö) 似梵语的 Na-va-bhāga①。”清陶保廉说:“又按今呼罗布，乃纳缚波之合音也，又说罗布或作洛普，乃沿用唐僧《西域记》纳缚波之音，不知何义也。”② 岑仲勉亦谓罗布祇“纳缚”两音之转变③。黄文弼云:“罗布淖尔为蒙古语，蒙古呼淖尔为海，罗布是地名，原于唐之纳缚波。英国斯坦因于一九〇七年，在密远古堡中发现藏文残纸甚多，内著录不少地名，中有名大纳布城(Castle of Great Nob)，小纳布城(Castle of Little Nob)者，纳布与玄奘之纳缚波(Na-fu-pa)译音相近，显然为中古及近古时用于罗布全区之名。按纳缚据法国伯希和说，为梵语(Sanskrit)中 Nava 之对音，犹言新也。是藏文中之纳布与梵文中之纳缚，不能谓无关系。”④ 玄奘所称之纳缚波故国，唐以前本名楼兰，后改为鄯善。清徐松云:“《水经注》，泽在楼兰国北，王治扜泥城，故彼俗谓是海为牢兰海，盖海因国得名，牢楼一声之转。《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南河自于阗东于（应作“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⑤ 蜩谦德谓“牢兰与楼兰若出于同一语源，则牢兰似为由海即湖名而得之国名”。按先有海而后有国，蜩谦德之说是也。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 77 年)遣傅介

子刺杀其王尉屠安归，立其子尉屠耆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汉为镇抚其国，遣兵屯田于伊循城。玄奘的纳缚波，即罗布(Lop，西藏文牍作 Nob)乃中古和近代用于罗布泊附近地区的总称。

二、都城的方位及其迁移问题

玄奘所到者为纳缚波故国的都城，此都城究指何处？学者意见不一。陶保廉以密阮的古城遗址当鄯善国之伊循城，《新唐书·地理志》之七屯城，以卡克里克(今婼羌县治)当汉之楼兰国都城，即玄奘的纳缚波，以瓦石峡的古城遗址当唐之弩支城⑥。沙畹以玄奘之纳缚波当汉之伊循城，《唐书》之新城。冯承钧则谓《唐书》之新城，《沙州都督府图经》作弩之，沙畹误以之为纳缚波(Navafa)。此纳缚波既为故楼兰鄯善，则其西二百里之新城似为今之巴什仕里(Vash Shahr)⑦ 谢彬以婼羌(卡克里克)西 256 里之破城子当唐弩支城，以婼羌附近之古城废墟当汉代之楼兰国都城，以密远庄东五里之古城遗址当伊循城⑧。斯坦因以磨朗古城遗址当汉代之扜泥城，即《水经注》之东古城。斯文赫定曾在古罗布泊旧址北岸发现废城，其后斯坦因亦至其地，从两人所获的木简证明其地名曰楼兰(Kroraina)⑨。但沙畹据《汉书》和《水经注》有关楼兰鄯善各城之记载，谓罗布泊北岸遗址，不能必其为楼兰故都；又云："纪元四世纪时，塔里木河南之伊循城，已为鄯善之都城，此伊循城或即在罗布泊南之扜泥⑩。"唐贾耽云："自蒲昌海(罗布泊)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⑪。"从贾耽所记，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蒲昌海南岸有三城：最东者为七屯城，亦即伊循城；其西八十里(应作一百八十里)为石城镇，即汉楼兰国都城。又西二百里为新城，亦称弩支城。按敦煌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写本有三，斯坦

因所得者，为公元883年本；伯希和所得者，有两本[12]。斯坦因本云：“鄯善之东一百八十里有屯城，即汉之伊循。”又“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地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汉立其地更名鄯善国，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又“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之弩之城。”伯希和本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鄯善质子尉屠耆为单弱，请天子，国中有伊循城，城肥美，愿遣一将屯田积谷，得依其威重。汉遣司马及吏士屯依修(循)以镇之，即此城是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又：“古屯城在屯城西北。”又：“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镇二十步，汉鄯善城见今摧坏。”又：“蒲昌海在石城镇东北三百二十里，其海周广四百里。”[13]

综观上述，可表示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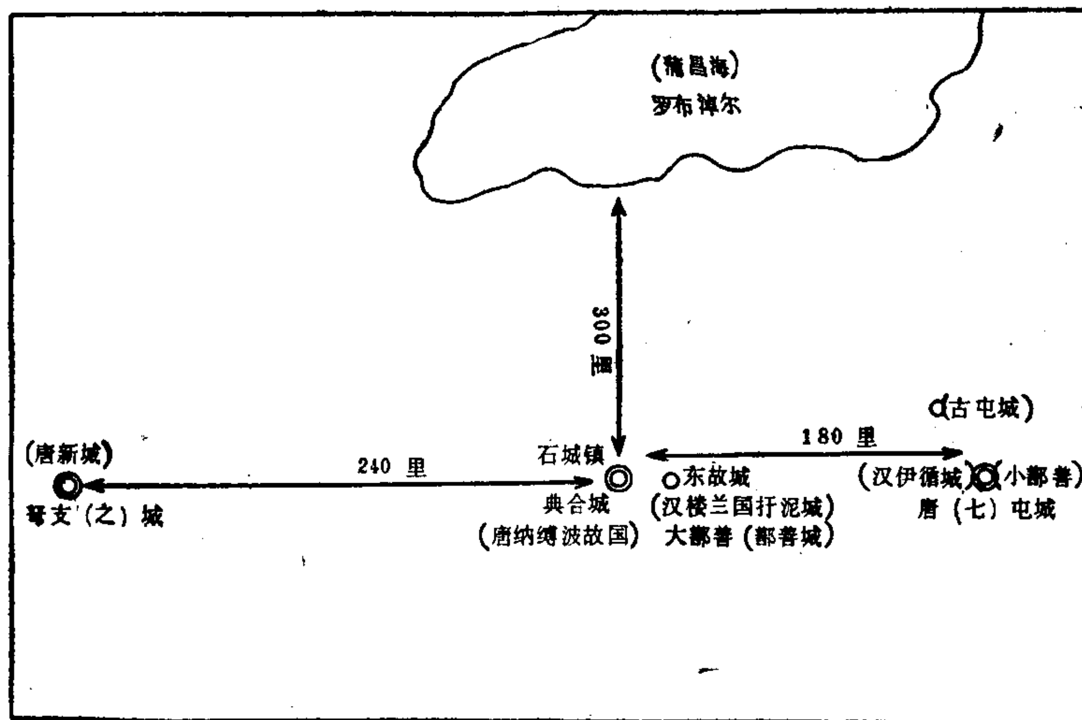


图18　纳缚波故国示意图

上图各城的方位与贾耽所述者完全一致。冯承钧以之对照斯坦因著“Intermost Asia”的附图，认为伊循城即今之弥朗(Miran)，扜泥城可当今之婼羌县治卡克里克 (Charklik)，新城可当今之巴什仕里(Vash Shahri)⑭。按汉元凤四年以后，楼兰国已改名鄯善国，国名既改，其都城是否随着迁移？这里有两种说法；一说迁移，可以伯希和为代表，他说：“据《前汉书》卷九十六上，所志此国原名楼兰，至（公元前）77年时，更名其国为鄯善，国名既改，国都必迁”⑮。一说并未迁移，可以冯承钧为代表，他说：“楼兰在前七七年时已改名鄯善，所以改的当然是国名……并未别建都城。”⑯ 两人的说法虽不同，而他们主张楼兰、鄯善国都扜泥城在罗布泊之南，则是一致的。这是我国传统的说法。1900年斯文赫定在北纬四十度四十分，东经九十度间，古罗布泊旧址北岸，发现一个古城遗址及许多魏末晋初的木简，其后斯坦因在同一地区又发现其他废址和考古材料，交德人卡尔希姆来 (Herr Karl Himly) 及孔拉特(A. Conrady)研究，二氏据写本上有 Krorain 一字，与楼兰一名读音相近，就认定此遗址即汉代的楼兰城。从此，在楼兰都城位于罗布泊南说之外，又有位于泊北之说。1910年日人橘瑞超亦至此地，并获得“西域长史李柏”二书，书上有“海头”一字。经王国维研究后认为此地作古楼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冯承钧更勾稽古籍以论证楼兰或鄯善国都城在罗布泊之南。他说：“我以为楼兰或鄯善的境界，东近阳关，南接古之婼羌，西尽巴什仕里 (Vash Shahri)，北边移民也曾到过哈密、辟展，他的都城就在现婼羌县治。”又说：“楼兰都城即是鄯善都城，其城在罗布泊南三百里。” 又说：“以前所说的，无非证明楼兰鄯善的北界很远，而他的都城好像始终在罗布泊南，不能因为在泊北发现了一座古城，便来翻案”⑰。但泊北说仍未消失。1931年黄文弼赴新疆考察，从吐鲁番转向罗布泊，发现海水已复归北方，他循海水东行，到达一个三角洲，三面

环海，一洲伸入海之中央，即在那里发现烽火台遗址，他定名为“土垠”，掘得木简多只，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及成帝元延五年(即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的年代，此为在罗布古址中所得最早之文书，距今已一千九百六十余年，而此遗址适在海北头一个三角洲的海湾中，黄氏认为不仅可以证明此地在西汉时之繁荣，而且可以证明在西汉时海水之位置。从这里南望海水无涯际，乃知为罗布泊之北端。又绕海东南行得一古烽墩，五铢钱散布极广。民23年黄氏第二次考察，从库鲁克山南行，抵孔雀河岸，沿河东行，复抵烽火台所在之“土垠”，其时海水入河故道，已无前次泛溢之患。黄氏谓欲考定楼兰鄯善都城的遗址，当有一先决问题，即时间与空间必须配合。他说：“故欲论楼兰国都，当在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以前遗址求之。两者虽同为一国，但论其都城，不可混为一谈也。”[18]从这一论点，我们就可以看出，黄氏是主张元凤四年楼兰国改名鄯善后，都城即从罗布泊北迁移至泊南。在未改国名以前，楼兰国都位于何地？黄氏说：“若楼兰国都在今何所，今尚无适当遗址可以当之，但决在北道上。”又说：“以余考之，古楼兰之扜泥城，必距余于1931年所发现之烽燧亭遗址不远，或在其西。”他举出两个理由：一是《史记·大宛传》有“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二是《水经注》叙述河水入罗布淖尔分为二道：一为南河，《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南河自于阗东于(应作“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一为北河，《注》云：“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泽。”因此他说：“按南河最后所会之河为且末河，发源于阿耨达大山，流行于且末城之北。是南河当南道，东流入泽。北河最后之河为敦薨水，即今焉耆河，发源于焉耆山，流行于焉耆之野，东径墨山国南为孔雀河，东流注泽，是北河当北道。河水流行既分南北两道，则入海处亦当为南北两海口，其所径行之城市，亦必在南北两岸可知。今按《水经注》以南河流行于鄯善之北，则

鄯善必在南河之南可知，北河流行于楼兰城南而东注泽，则楼兰城在北河之北可知。”我认为这两个理由都有可议之处：第一个理由《史记》所谓楼兰姑师临盐泽，如果解释为楼兰姑师的都城临盐泽，则西汉时姑师的都城当今吐鲁番西二十里的雅尔和屯（Yar-Khoto），亦即《汉书》车师前国的交河城，即使依黄氏所说，西汉时罗布泊位于后代所称之白龙堆，但从雅尔和屯至白龙堆，距离很远，如何得称临盐泽？所以不能据此以证楼兰都城之临盐泽；第二个理由，《水经注》现存版本流传日久，讹误滋多，经注夹杂，何者为经，何者为注，何者为注中之注，有时难于区别，即使抛开这一点不谈，我们试检阅此书关于南河北河的叙述，《注》云：“且末河（《释氏西域记》作阿耨达大水）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今塔里木河），会流连逝，通为注滨河（今孔雀河或称库鲁克河）。又说：“北河又径姑墨国南，……北河又径龟兹国南，又东左合龟兹川水。……其水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有二源，俱受西川东流，径龟兹城南，合为一水。……东川水又东南径乌垒国南，其水又东南注大河，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焉耆河），又东南流通渠犁国。又南流注于河（南河，即塔里木河），河水又东径墨山国南。河水又东径注滨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19] 按北河自流注于南河，即南北两河会流后，乃东径注滨城南，注滨城即注滨河北岸之城，试与上述北河流道相对照，正与且末河与塔里木河会流东逝，通为注滨河相合。由此可见，南北两河相会后同注于罗布泊，而黄氏南北两河各自入海，分为南北两海口之说，就不能成立。南北两河既然会合后东流，于同一海口入罗布泊，则所谓鄯善都城在南河之南，楼兰都城在北河之北，也成问题了。《注》又云：“注滨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既然称鄯善国，可知其必指元凤四年更改国名之后。所谓鄯善国北，乃指鄯善国境之北，治伊循城，从前是属于楼

兰国的辖地。《注》又云:“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治)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依上句“鄯善国北，治伊循城”的例，“扜泥城”前应有“治”字。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南北两河汇合后东流，注入罗布泊，泊在楼兰国境之北，其国王治扜泥城。从上面所举《水经注》两段记载，我们既看不出伊循城之必在盐泽之北，也看不出盐泽之必在扜泥城之南。《注》又云:“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这里具体地说明古罗布泊的位置，即在鄯善国境东北方，龙城(白龙堆)的西南方。但据《魏略·西戎传》所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有三道，其中道云:“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龙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此“故楼兰”显然是在罗布泊北，又将作何解释? 据冯承钧说:“所指必是楼兰之旧城，不是楼兰国都。”[20] 我认为冯氏此说是对的。

西汉时期，自敦煌通西域只有南北二道，据《汉书·西域传》:“自玉门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 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又同传婼羌国条云:“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又:“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是知武帝时攻劫汉使者，为当北道之冲的姑师(车师前王庭)及当南道之冲的鄯善(楼兰)。则昭帝元凤四年改楼兰国名为鄯善之后，其国都仍在南道，即盐泽(罗布泊)之南。又据《后汉书·班勇传》:“元初六年(公元 119 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逆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勇上议曰: ……旧敦煌郡

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公元 89—105 年)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疆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尚书问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为便？又置长史屯楼兰，利害云何？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公元 73 年)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龙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龙还必死。……若出屯楼兰，足以招抚其心，愚以为便。……延光二年(公元 123 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公元 124 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观此传楼兰与鄯善并举，勇以西域长史出屯楼兰，足证元凤四年改国名以后，罗布泊北仍有楼兰城，而此城在西汉宣元二帝年代已经设置，前后历一百七十余年之久，其故址应即黄氏所到达的“土垠”或其附近地区。西域长史之出屯楼兰，乃自班勇始。魏末晋初，在注滨河北岸的地方海头建一镇戍，至前凉时西域长史李柏始移驻其地。但罗布泊北的楼兰城不是楼兰的都城，只是楼兰国设于泊北的一个镇城。无论是元凤四年以前的楼兰国，或是其后的鄯善国，其国都扜泥城始终在罗布泊之南。

至于汉代楼兰国或鄯善国都扜泥城(东故城、鄯善城、大鄯善)及伊循城相当于今何地，唐代石城镇及弩支(新城)又相当于今何地？冯氏依斯坦因地图比对的今地，即扜泥城相当于今婼羌县治卡克里克，伊循城相当于今弥朗，似较可取。因为由婼羌县治东至弥朗为一百九十里，与《沙州图经》所谓“鄯善之东一百八十里有屯城，”即汉之伊循，其里程相差不多。但冯氏以斯坦因地图上之巴什仕里(Vash-shahri)相当唐代之弩支城，未言其具体里程，未必正确。我认为弩支城应取谢彬之说，即置于今瓦石峡庄西十三里之破城子。据谢氏云：“破城子周约三里，城垣房基，间有存者，胡桐

合抱，俨然村落。”[21]从破城子东至婼羌县治，计程二百三十八里，与《沙州图经》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基本相符。唐代的石城镇，即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所居之典合城，亦即玄奘所到之纳缚波。《沙州图经》谓“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镇二十步，汉鄯善城见今摧坏。”石城镇位于鄯善城（扜泥城）之西仅二十步，则从弩支（新城）东至石城镇的里程，也就是东至鄯鄯城的里程。至于《水经注》谓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东故城乃对西新城而言，唐代的石城镇，《沙州图经》只说康艳典东来居之，不言是他所创建。在他东来之前，此石城镇当已存在，可能在北魏时称之为西新城，故扜泥有东故城之称。冯氏谓“扜泥”应是伊循之误，其实不误。

三、国势、诸王、民族和宗教

在汉代西域诸国中，鄯善虽不是小国，但也只能说是中小国家，它的户口数与疏勒相近，有一千五百七十户，万四千一百口，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汉书·西域传》谓“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它一方面处于中国往西域的通道上，一方面又处于匈奴势力的威胁之下，匈奴得其地，足以堵截汉通西域的要道，窥玉门阳关之险；汉得其地，可以作为西陲的屏障，隔绝匈奴与诸羌的联系，保障与西域诸国的交通，故鄯善成为双方必争之地。鄯善王往往首鼠两端，向双方遣送质子。时而听命于汉，时而听命于匈奴。汉武帝时贰师将军击大宛，先遣军正任文引兵捕楼兰王，诣阙责问。楼兰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正反映了当日鄯善之处境，也反映了它的位置之重要。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遣平乐监傅介子往诛楼兰王安归，立其弟尉屠耆为王，改国名曰鄯善。安归似即前王遣送匈奴的质子，得先归国为王而拒不朝汉者，其在位约当武帝末至昭

帝元凤四年。继位的尉屠耆，曾在汉为质子，亲汉，汉遣兵屯田伊循以镇抚之。尉屠耆不知死于何年，从昭帝至西汉末约一百年间，其王当已数易，但王名无考。后汉光武帝建武九至二十二年(公元33—46年)间，莎车王贤强大，攻略西域诸国，鄯善王不服，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此王名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于阗王广德灭莎车，鄯善遂与于阗分有南道，小宛、精绝、戎庐、且末诸国，均为鄯善所并。自公元61年至公元73年，十余年间，鄯善成为西域强国之一。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使西域，至鄯善，计杀匈奴使者，鄯善王广降服。超威振西域凡三十一年，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归朝，在此期间，鄯善依附于汉。此后汉与西域绝，无汉吏者十余年。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长史索班屯兵伊吾，鄯善复来降。延光三年(公元124年)西域长史班勇至楼兰城，鄯善遣兵助勇收复车师前后部。此时鄯善王名尤还，为汉室外孙。自此直至后汉末九十余年间，鄯善王名无考。三国魏时，鄯善国势复振，且末、小宛、精绝及楼兰城均服属之。西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鄯善国王遣子入侍。东晋成帝咸和初，张骏使其将杨宣伐龟兹、鄯善、西域诸国并降，鄯善王元孟献美女。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鄯善王休密驮朝于苻坚，并以前秦之大兵为先锋，犯西域。冯承钧谓休密驮颇类梵语Sumitra，此言善友[22]。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法显从敦煌西行，度沙河，抵鄯善。其国似尚丰乐，国王信佛，有僧四千余人。当李暠守敦煌时期(隆安四年至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鄯善国人有八千余家，比前汉时多达五倍，足见其国之殷盛。南北朝时代鄯善屡次遣使朝献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四年(公元438年)鄯善王遣其弟素延耆入侍。次年平凉州，沮渠牧犍弟无讳走保敦煌，后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击鄯善，时在太平真君二年(公元441年)。鄯善王比龙率众拒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次年比龙惧，率兵

西奔且末。后其世子应安周，北魏遣万度归讨之，以五千骑渡流沙，入鄯善，其王真达出降。太平真君九年(公元 448 年)，北魏又遣韩牧镇之，赋役其人民，比之郡县；从此鄯善似已无国王。南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 491 年)至十一年(公元 493 年)间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高车)，道经鄯善，见其国为高车所破，人民散尽[23]。此后，其地属吐谷浑，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公元 519 年)宋云等行经鄯善时，其城已为吐谷浑一屯戍，城主为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24]。《周书·鄯善传》："大统八年(公元 542 年)其兄鄯米率众内附。"冯承钧疑此鄯米为徙居伊吾纳职等处之鄯善国人[25]。隋平吐谷浑，于其地置鄯善郡。隋乱，其城遂废。公元 866 年写本《沙州图经》云："贞观中(公元 627—649 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又云："大周天授二年(公元 691 年)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延弟地舍拨状称……。"据此，则直至七世纪末，石城镇将尚为康国人。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吐蕃陷河陇，石城播仙等镇亦随之沦没。

综观上述，我们对鄯善国历代诸王名，所知不多，只有西汉时之鄯善王安归和尉屠耆，东汉初期之鄯善王安，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之鄯善王广，二世纪上半叶之鄯善王尤还，三世纪下半叶之鄯善王元孟，四世纪下半叶之鄯善王休密驮，五世纪上半叶之鄯善王比龙和真达。自公元 448 年北魏遣韩牧镇鄯善以后，其国似即无王。鄯善国的人民如何，《汉书·鄯善国传》语焉不详，只说"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鄯善人以畜牧为业，并且像婼羌一样能造兵器。按婼羌国位于鄯善国之东南，境相接，据《汉书·婼羌传》，其人民亦以畜牧为业，不田作，仰鄯鄯且末谷。可见鄯善人虽以畜牧为业，但仍有谷供给婼羌，不过其耕作的田地，寄在别国，这与婼羌稍有不同。婼羌是属于西藏种的羌族，从

经济上相互依赖及造兵器的技术传统来看，鄯善与婼羌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故鄯善居民在西汉时代，很可能亦属于西藏种，或以西藏种人为主。《后汉书》不为鄯善立传。自公元一世纪间佛教传入新疆之后，僧徒和商人才从印度和中亚方面进入塔里木盆地。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到今婼羌县治东北 50 英里的磨朗 (Miran) 废寺遗址，发现一个丝质彩幡和两尊人像，幡上和人像旁边都写有佉卢文(Kharostri)的印度语。据斯坦因说，这些佉卢文与尼雅遗址的木牍上所写的相类似。按佉卢文是古代印度贵霜王朝(Kushana or Indo-Scythian Dynasty) 石刻所通用的字体。贵霜朝诸王在公元初三个世纪间，统治了旁遮普以及印度河西边的一些地方[26]。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公元初几个世纪间，有大批印度僧徒到鄯善宣传佛教。冯承钧说："佉卢书之盛行早于梵书，因知其地土人或在纪元前二三世纪时从印度迁来"[27]。据《法显传》："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鄯善)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惟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就是说，鄯善及其以西诸国，其人民都崇信佛法，但修习有精有粗，僧徒都学印度文字和语言，惟土著语言各不相同。可见，僧徒虽习印度文字和语言，但其人民则仍用本地的语言。鄯善人民究属何种，法显没有说明，但从他所谓"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是知其人民不是胡服，可能是指类似汉人服装的羌族。五世纪末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这是鄯善国的一大灾难，从此土著居民已彻底逃散。公元 493 年以后，鄯善为吐谷浑人所据。隋平吐谷浑，又以汉人罪犯居之。直至七世纪，鄯善来了大批属于阿利安种的康国人，于是人种上起了一大变化。玄奘从印度归国，于贞观十八年(公元 644 年)行经鄯善，康国居民或已他徙，故玄奘称之为"纳缚波故国"。谢彬云："清同治间，南疆大乱，回民避难者，多杂集蒲昌海左右，流离转徙，死伤过半，大吏劳徕安集，焚瘗莽，起屋居，……教以耕钼，行之

十年，民乃大殖。”今婼羌县居民，当即此等避难回民的后裔。谢氏又云：“罗布西北岸，有罗布、起克二庄，居民各十余家（清乾隆间共五百家，宣统时尚五六十家）皆不事耕，捕鱼以为食，组野纻以为衣，袭天鹅之毳以为裘，藉水禽之翼以为毯毯。操缠语而不喜讽经礼拜。构木编芦为窝铺，中悬鱼饺，馁不可近，而彼亦不喜近汉，近则必痘。二庄之人，互为婚嫁，亦不与他族通也。近年以来，其少壮者稍解耕牧（耕则来城近处，牧尚就地为之），而与他族交通，间能粒食，不若昔之野陋，惟生齿日减，种姓将灭。”[28]这些孤僻的食鱼居民，又不知其来历如何，既懂缠语，则与缠回或有某种关系。

四、罗布泊的迁移问题

关于罗布泊在历史上的位置是否有过迁移的问题，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明确地提出罗布泊有过迁移的理论是赫纳尔（M. G. Höerner）和陈宗器，他们曾于1930—1931年到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据说泊的位置是随着注入的河水分配而迁移，泊有时进入喀喇苦顺，有时回到原地，是一个游荡湖。但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地貌组曾到罗布泊调查，从调查结果及ERTS百分之一卫星照片的分析，已证明罗布泊在历史时期从来没有迁移过，只在湖盆内部受到最近构造运动和水文变化的影响，表现出各个时期积水轮廓的变动，并非所谓游荡湖。近年周延儒根据这些材料，分期论述罗布泊水位的变化。由秦至西汉时代，湖水充满全湖盆地的东部。东汉至北魏，由于高山冰川融量减少，整个塔里木水系缩短，只有喀喇苦顺有较多水量补给罗布泊，所以湖面大为缩小。塔里木河下游的沙河或孔雀河在罗布泊北部的雅丹塔格区已为新月形砂丘所侵占。隋唐时代，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一些，但还比不上秦和前汉，当时湖水的位置在孔雀河口附近的北部。但孔雀河东段（沙河）已干，无水补给罗布泊，因而构成北部的

深水部分㉙。周氏在论述东汉至北魏罗布泊的情况时云:“楼兰的衰落，只能用河道变干来解释。”按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居民地区，主要靠周围高山融解冰川的流水灌溉耕地,故水源盈涸,影响其城镇的盛衰至巨，但不能说是唯一的原因。如上所述，东汉至北魏，高山水源减少，湖面大为缩小，泊北的楼兰城应该是衰落荒废了，可是,据《史记》所载，并不是这样。从《后汉书·班勇传》,我们可以看出,勇不仅建议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城,而且于安帝延光三年亲自率兵屯楼兰城，该城并未因湖面大为缩小而衰落。可见,西域有些城镇,尤其是在军事交通方面比较重要的城镇,其盛衰之迹,有时也应从政治上去找原因。

①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2, p. 304—305。

②《辛卯侍行记》卷五汉阳关路卡克里克注，又卷六吐鲁番歧路罗布淖尔注。

③《中外史地考证》下册,626页。

④《罗布淖尔考古记》,32页。

⑤《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鄯善国条。

⑥《辛卯侍行记》卷五,48页。

⑦《魏略西戎传笺注》,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12页。

⑧《新疆游记》,266—271页。

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99—100页。

⑩《魏略西戎传笺注》,楼兰国注。

⑪《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道里》。

⑫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25—29页。

⑬《楼兰鄯善问题》。

⑭《魏略西戎传笺注》楼兰国注。

⑮《楼兰鄯善问题》。

⑯同上。

⑰《罗布淖尔考古记》,30页。

⑱同上。

⑲《水经注》卷二。

⑳《楼兰鄯善问题》。

㉑《新疆游记》,226 页。

㉒《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41—42 页注十一。

㉓《南齐书》，卷五九芮芮传；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44—47 页。

㉔《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惠生行记》。

㉕《鄯善事辑》,注三,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21 页。

㉖《斯坦因西域考古记》,77—90 页。

㉗《鄯善事辑》,第 1 页。

㉘《新疆游记》,268 页。

㉙《论罗布泊的迁移问题》,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 年第三期 34—40 页。

从纳缚波故国至沙州的一段行程

《西域记》叙述玄奘返国的行程，仅至纳缚波故国为止，但据《慈恩传》云："展转达于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阗使人及驼马还，有敕酬其劳，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按玄奘从纳缚波（石城镇）起程，东行经伊循（弥朗），然后展转达于唐边境，此处所谓"自境"，当指接近玉门关或阳关外的戈壁大道上，因为玄奘离开于阗时，太宗已敕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玄奘从鄯善至敦煌，横渡大戈壁，究竟走的是那一条路线？按鄯善至敦煌或敦煌至鄯善，有南北两道，北道即玉门北道，南道又分西湖路和南湖路。依今代驿程，西湖路西起婼羌县治（卡克里克），东北行七十里羊大什哈（亦作羊达什喀克），一百二十里密阮庄（弥朗），五十里咸水井子，五十里大墩，一百十里苇子泉，一百二十里高楼子，七十里火石镰子（婼羌敦煌于此交界），七十里双井，一百二十里红柳泉，八十里沙泉，八十里圪塔井，八十里臭水，四十里五颗树，七十里小阳关，七十里清水沟，七十里后坑子，七十里卜罗湖，四十里马厂，四十里𪊟泉子，七十里下西宁，四十里敦煌县城，自婼羌至此，共二十一站，一千五百一十里。南湖路亦西起婼羌县治，东北行七十里羊大什哈，一百二十里密阮。又东行一百二十里大土墩（土名乾站），七十五里双石墩，六十五里红柳沟口，八十里红柳沟卡，六十里野马沟，六十里双泉子，七十里一碗泉，九十六里聚水沟，一百二十里龙尾沟，四十里深沟，一百二十里白山泉，一百里野马泉，八十里安南坝，三十里毛坝（冰沟），七十里胡卢斯台，七十里推莫兔，七十里南湖（阳关，一名龙头山），七十里石俄卜，东北行七十里敦煌县城、由婼羌至此，

共二十一站，一千六百二十六里。以上是根据谢彬《新疆游记》，基本上与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所载阳关路相同，只有两个地方不同，即由婼羌至密阮，陶氏作一百里，谢氏亦沿其误，其实谢氏在西湖路方面谓自婼羌东行七十里羊大什哈，一百二十里密阮庄，是比较正确的，因为斯坦因从卡克里克东北至密阮约五十英里，足证其间距离决不止一百里也。此外，陶氏谓从安南坝西行八十里野马泉，西北一百里深沟，但谢氏所记，则从深沟东行一百二十里白山泉，一百里野马泉。现在野马泉与深沟之间，陶氏漏了白山泉一站。至于玉门北道，是从玉门关西行至罗布泊西南阿不旦一线，若由西向东，从阿不旦东行，九十里芦花海子，四十里黑泥海子，八十里沙堆，七十里土梁子，九十里蛇山，九十里咸水泉(陶氏少此站)，九十里野牲泉，东南七十里土山台，八十里星宇山。东北行八十里沙沟，六十里甜水泉，东行七十里新开泉，东南行六十里五颗树，东行六十里芦草沟，东南行七十里清水沟，七十里西湖(后坑)，三十里小方盘城，四十里大方盘城(汉玉门关)，四十里大泉(谢氏少此站)，五十里鱴泉，七十里东南行戈壁，渡党河至敦煌。全程共二十一站，一千四百里。如果再加上从婼羌县治东北至阿不旦二百里，则共二十二站，一千六百里。又据《西域水道记》卷三:(哈喇)"淖尔西通罗布淖尔有二道:由淖尔南者，自巴颜布喇西二百里至多布沟，又西南一百五里至呼鲁苏台，又西七百三十里至察罕齐老图，又西三百余里至乌兰托罗海，又西至噶斯淖尔东，又北至库布，又北至努奇图岭，折而西至努奇图塞沁，又西至努奇图山口凡三百余里，又西由罗布淖尔南岸至伊克噶顺，又西至巴罕噶顺为塔里木河南岸。由淖尔北者，自库库沙克沙，由苏勒河北岸至巴罕鄂罗苏台，又西当淖尔北岸苏鲁图，东距库库沙克沙百余里，又西至鄂布伦，又西至呼吐克乌苏，又西至绰呢呼吐克，又西由努奇图岭北至讷勒乌格呼吐克，又西至塔奈呼吐克，又西至罗布尔南之特们噶顺，

又西至巴罕噶顺。”按由哈喇淖尔北之一路，即《清一统舆图》北一卷所绘由敦煌西至罗布泊南最北之一路。综观上述，所谓北道，已路线不一，何况距今千余年以前，不仅站名不同，路线亦必多变化，但从总的路程方向而言，分作南北两道，千余年来，当无二致。取道南湖路者，宜于夏秋两季，因为此路沿山而行，水草丰美，惟欠修治，路颇崎岖，若在冬春，山径冰冻，气候严寒，故不宜旅行。取道西湖路及北道者宜于冬春，因为此路直穿戈壁，道途平坦，碱多水咸，草亦不茂，但到处冰冻，正可以啮冰而进。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正月还抵长安，从敦煌至长安共程三千五百七十二里，途中约需四十二天。玄奘之去敦煌，时当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初，正值冬令，故可推断，玄奘从纳缚波至敦煌，是横跨大戈壁，采取玉门北路或阳关西湖路。但玉门北路加上从婼羌东北至阿不旦二百里，共计二十二站，一千六百里，途程较长，故玄奘采取西湖一路，可能性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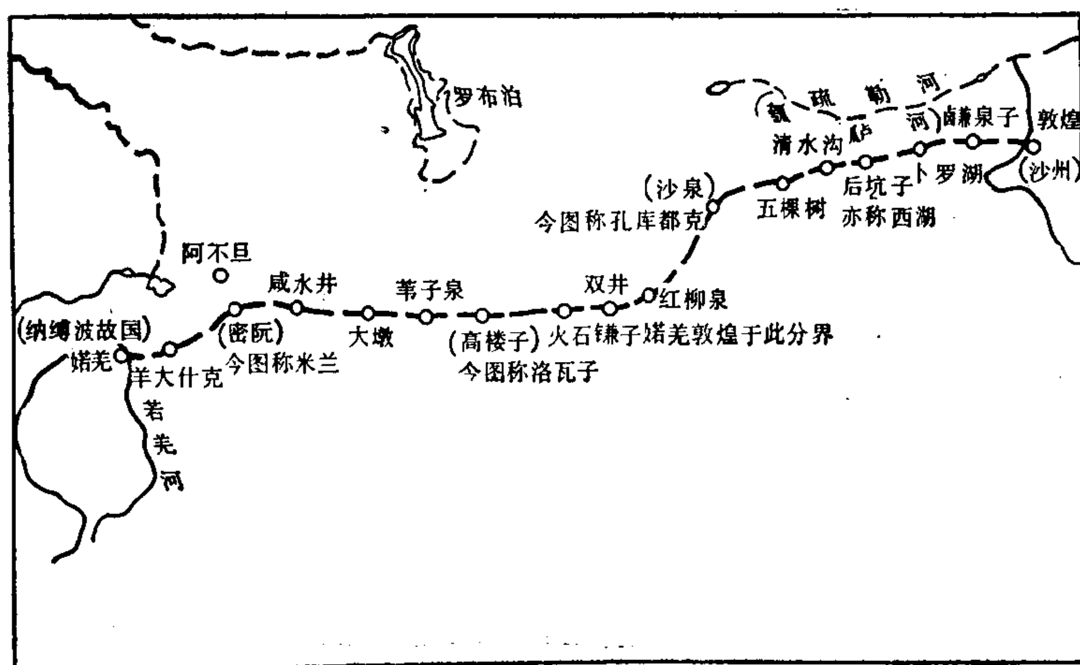


图 19　从纳缚波故国至沙州的行程图

附　录　一

《大唐西域记》的译与撰问题

现存各种版本的《大唐西域记》，其卷端下方或题“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或题“唐释玄奘译　辩机撰”，称谓虽有繁简之别，但都认为此记是玄奘所译，辩机所撰。这样的题名款式，在佛教著作中，颇为特殊，也很难理解。因为此记不是玄奘译自西域的佛教经典，即使其中有些地方涉及佛教教义和掌故，但从整部书的内容来看，主要仍然是记述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民俗和佛教圣迹等。当日玄奘亲游一百一十国，传闻二十八国，凡所闻见，随时记录。回国后奉太宗谕，才根据这些记录撰写成书。既然是这样，怎么能说是译？如果说此记是玄奘口译，辩机笔录，则笔录者不应作为撰人。例如晁氏《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子部释书类载《楞严经疏》条下云：“右唐神龙二年天竺国僧彼岸于广州译，房融笔授。”又载《会解楞严经》条下云：“右唐僧弥伽释迦译语，房融笔授。”这样的题名款式，方为合理。如果说此记是辩机根据玄奘在各国所记录的材料，编次成书，即《记赞》所谓“论次其文”，则不应作玄奘译，也不应作辩机撰。在这种情况下，其题名款式应作“玄奘撰　辩机编次”。可是，现存《西域记》却同时题译和撰。更可怪的是从北宋起，一直沿袭至清初，七八百年来没有改变，也没有人提出疑问。直至清乾隆年间，王鸣盛始对辩机撰《西域记》，提出怀疑。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九二《西域记》条下说：

旧方伎传，僧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考石刻太宗御制《圣教序》，及高宗为太子时制《述圣记》，宏福寺沙门

怀仁集王羲之书，并钱希白《南部新书》辛卷所载，与旧书略同。《玉海》第六卷云：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译，辩机撰。今佛藏有此卷，首并列二僧名。据《旧唐书》云云，则玄奘所译乃佛经。此书玄奘自撰，何译之有？辩机恶僧，岂能著书？《玉海》非是，藏本承其误耳。

又在《蛾术编》卷十二《西域记》条下说：

《西域记》十二卷，予得自释藏，每卷首题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似玄奘述之，辩机记之。窃意断无同时僧有两辩机之事，以一淄乱沙门，乃意在撰述，亦理所无。然载在正史者，不可不信，其书究系玄奘作乎？与辩机同作乎？荒虚诞幻，吾何由而知之。

陈垣著《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一文(见影印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书后附录)谓王氏责辩机淄僧，不能著书，不成理由，并举出鸠摩罗什和"三车和尚"窥基为例，以证恶僧也能著书。这确是王氏之失，但王氏对此记之译与撰提出疑问，并且说"此书玄奘自撰，何译之有"，一语中其肯綮，也不可厚非。陈氏此文为辩机的事迹，悉力勾稽，可谓辩机千载以后之知己，但他深为辩机与高阳公主通奸被戮一事惋惜，则大可不必。至于《西域记》之译与撰的问题，陈氏则说："《西域记》所以与他经论异者，他经论系照本翻译，《西域记》则玄奘自述，辩机为撰文。"又说："《西域记》之为辩机撰文，本无问题，惟未见释教目录者则易生疑问。"陈氏所肯定者为《西域记》是玄奘自述，辩机撰文。究竟题玄奘译是否正确，陈氏没有明言，但对于《西域记》题"辩机撰"，他是肯定的。其后贺昌群著《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一文(见影印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书后附录)对于这一问题，又作进一步的探讨。贺氏详引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靖迈《古今译经图记》、智昇《开元释教录》、园照《贞元释教录》、道世《法苑珠林》、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

及鉴真携往日本之《西域记》等唐释著述，以证唐代载籍皆称玄奘撰，而不称译，亦不及辩机之名。惟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列玄奘所译大小乘经论六十七部，最末为《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总称京师大慈恩寺沙门释玄奘奉诏译，然不称辩机撰。自《内典录》将《西域记》与玄奘译经并列之后，遂启后世称《西域记》为玄奘所译之端。宋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其《艺文志》既列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又列辩机撰《西域记》十二卷，一书误作二书，郑樵《通志·艺文略》复沿其误。陈骙等撰《中兴馆阁书目》载《大唐西域记》十二卷，题"贞观中玄奘译，辩机撰（见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三）。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八《西域记》条则题"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正是今本《西域记》所通用的著录款式。王应麟《玉海》、马端临《通考·经籍考》等均沿用之，《宋史·艺文志》则单题辩机撰。惟有《崇文总目》、晁氏《郡斋读书志》、程大昌《考古编》、《佛祖统纪》、《旧唐书·玄奘传》均题玄奘撰，而不及辩机之名，可见《西域记》之题玄奘译、辩机撰，实始于宋代。为什么宋代要改用这样的著录款式？贺氏谓由于宋太祖开宝四年开雕蜀板藏经，误会《内典录》之将《西域记》列于玄奘译经之末，遂误作玄奘译，又因《记赞》中有"撰斯方志"一语，遂误作辩机撰。贺氏明确地否定《西域记》之为玄奘译，并肯定其为玄奘撰，这是正确的。但辩机于《西域记》之撰述，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贺氏则举出四种可能：一、为辩机整理玄奘所得材料而成，故云"恭承志记，伦次其文"，"亲受时事，连纰前后"；二，奘师杖锡遐征，周历印度诸国十七年，所见所闻，自以外国文资料为多，故云"境路盘纡，疆埸回互，行次即书，不存编次"；三，此种材料有为奘师译授，辩机笔译者，故《记赞》有云，法师"妙穷梵学，览文如已，转音猶响"；四，由辩机缀辑其他旧闻补充者，故云"爰命庸才，撰斯方志"、"略举遗灵，粗申记注。"贺氏由是得出结论："辩机于《西域记》之成书，盖身兼当时

译经执事之笔授与缀文二种职务，书成，复经玄奘所校正者也”。

按贺氏引证的材料，绝大部分采自《记赞》，陈垣对于《记赞》，推崇备至，他说：“《大唐西域记》卷末有《记赞》一首，二千三百余言，词旨甚美。”贺氏对于《记赞》，亦颇信赖。我认为《记赞》之文，很多可疑之处：一，所谓《记赞》，当系指《西域记》的赞文。赞是文体之一种，亦称谠。据《文心雕龙·颂谠》说：“谠之义兼善恶，亦犹颂之变耳。”可见谠的内容既可以扬善，亦可以谴恶。这是在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之后，用概括简炼的词句，评论其人或事的得失。司马迁作《史记》，每一篇终，必加“太史公曰”，观其体裁，实即赞文。其后班固撰《汉书》，每一篇终，乃径题“赞曰”。范晔撰《后汉书》，则分“论”“赞”为二，而文则改作四言韵句，此赞体之又一变化。《慈恩传》每卷终既有“释慧立论曰”，又有“赞曰”，正是此体，今观所谓辩机《记赞》之文，除“绮藻经文者欤”句以上可称为赞扬释教和玄奘业绩之外，其余无异于自我表彰，殊乖赞文之体。二，全篇只说所撰为“方志”或“地志”，并未具体提及《西域记》一书之名，观敬播和于志宁两序，均明言玄奘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不免使人怀疑《记赞》所指，别为一书，可能就像道宣所撰《释迦方志》之类，而不是指《大唐西域记》而言。三，《记赞》云：“爰命庸才，撰斯方志”，辩机究竟奉谁的命令，撰作此志？如果说奉太宗之命，则据《慈恩传》和《释迦方志》都说玄奘奉太宗之命撰作《西域记》。两书作者慧立和道宣同是当时玄奘译经的助手，故他们所说，比较可信。那么，辩机怎能径称“爰命庸才，撰斯方志”，而不提及玄奘奉命撰记之事？四，《西域记》卷十二叙述玄奘归程，于折摩驮那故国后云：“复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此下即接以“推表山川……通译万里者哉”一段。从这里就引起两个疑问：一是根据玄奘叙述每个国家或故城之例，多少总有一些关于当地情况的描述，像折摩驮那故国那样荒废的地方，也说“城廓岿然，人烟断绝”，何以

对于最后的楼兰故地却无一言描述？二是从“推表山川”句起，至“通译万里者哉”句止，是玄奘概括全书的话，似系玄奘所作《西域记》后序的一部分，正与《记赞》所谓“略书梗概，备为前序”相应。

由这两个疑问，我们就有理由推想，自北宋以后流传下来的《西域记》，其卷末已有残缺。《记赞》里面还有不少文句，与玄奘的语气很相类似，例如：

1. 《西域记》卷一玄奘自作前序：“黑岭以来，莫非胡俗，虽戎人同贯，而族类群分，……同风类俗，略举条贯。”《记赞》：“至于胡戎姓氏，颇称其国，印度风化，清浊群分，略书梗概，备如前序。”

2. 《慈恩传》卷六：“丁酉法师重表曰：……凭皇灵以远征，恃国威而访道，穷遐冒险，虽厉（一作励）愚诚，纂异怀荒，实资朝化。”《记赞》：“然则冒远穷遐，实资朝化，怀奇纂异，诚赖皇灵。”

3. 《慈恩传》同卷《附进经论等表》：“但圣鉴照明，玄言冲远，玄奘学非沈秘，识谢咏通，何以仰称天规？”《记赞》：“尘黩圣鉴，讵称天规？”

4. 《慈恩传》同卷：“乙未又进表曰：‘……窃以章允之所践籍，空陈广袤，夸父之所陵厉，无述风土，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望班之右笔，饰以左言。”《记赞》：“逐日八荒，匪専夸父之力，凿空千里，徒闻博望之功。……颁左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

5. 《西域》前序：“玄化滂流，祥风遐扇，同乾坤之覆载，齐风雨之鼓润，……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声教。”《记赞》：“至德焘覆，殊俗来王，淳风遐扇，幽荒无外。”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记赞》，除颂扬释教和玄奘的业绩部分以及从“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句至“厕鹓鸿之末”句一段（可能是来自辩机所撰什么《方志》或辩机别的遗文）之外，其余文词，均属玄奘后序之言。也就是说，今本玄奘后序，只是原作后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已为后人剽割拼凑而成所谓《记赞》。此外，

《记赞》既言“撰斯方志”，已表明此书是辩机所撰，又何必再云“恭承志记，论次其文，尚书给笔札而撰录焉”，前后仅在八句之中，反复称“撰”，称“论次其文”，称“撰录”。画蛇添足，其拼凑之迹，显然可见。又《记赞》云：“二十年秋七月，绝笔杀青，文成油素，尘黩圣鉴，讵称天规？”从这几句的意思来看，辩机撰成全书之后，自己直接进奏太宗御览，这与《慈恩传》所载玄奘表进《西域记》的事实不符。凡此种种，都说明在探究《西域记》之译与撰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以《记赞》为依据。

贺氏列举辩机对于《西域记》成书所起的作用时，说有四种可能，其中第二点谓玄奘所见所闻，自以外国材料为多。既然是《西域记》，多采外国材料，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外国材料，是用梵文写的，抑或是用中文写的。察贺氏原意，似系指梵文写的材料。但据玄奘前序云：“辄随游至，举其风土，……今据闻见，于是载述。”说明玄奘在游经各国时，随时记录其所闻见。即使他的梵文学得很好，也不会用梵文记录。敬播序所谓“已详油素”，应该指玄奘随时用中文记在油绢上。第三点谓此种材料，有为玄奘译授，辩机笔记者，并举《记赞》“妙穷梵学，览文如已，转音猶响”诸语为证。其实《记赞》此数语完全是赞扬玄奘译经的精湛，不是指《西域记》的撰作。第四点谓辩机缀辑其他旧闻，加以补充。按《慈恩传》引玄奘进《西域记》表文云：“今所记述，……称为《大唐西域记》。”此段一本作“玄奘所记，微为详尽，其迂辞玮说，多从剪弃，缀为《大唐西域记》”。可见玄奘原来的笔记是比较详尽的，撰写《西域记》时，已加剪裁，那里会需要辩机来补充旧文呢？至于第一点谓辩机整理玄奘所得材料而成，还比较近于事实。所谓“恭承志记，伦次其文”，如果真是辩机所说，我们也可以看出，玄奘交给辩机的原稿，已经是《志记》，辩机不过加以编次排比而已。所谓“亲受时事，连纰前后”，是出于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原文云：“又出《西域

传》一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这正是为道宣自己所撰《大唐内典录》中《西域记》条下作注脚。道宣当时是玄奘译经的助手之一，其言可信。我们应该根据道宣这一记述，来解决《西域记》的译与撰的问题。所谓“沙门辩机，亲受时事”，似应理解为，辩机接受玄奘游历各国所记当时的事情；所谓“连纰前后”，似应理解为，把玄奘原稿的内容连贯排比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著作。如果这样的理解不误，我们就应该把现行《西域记》的著录款式改正为“唐释玄奘撰　辩机编次。”

附 录 二

中亚古国花剌子模考

一

《史记》卷一二二《大宛传》云:"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其中小国驩潜,今音kuan-chín,但欢字,安南音为 hwan,《切韵》为 xuan;潜字,朝鲜音为 chöm,广东音为 tśym,汉口音为 tśiam,《切韵》为 dz'iäm,故"驩潜"二字,汉代的读音应为 huan-tsym 或 xuan dz'iam,即相当于 hwarism 或 khwarizm。《魏书》作呼似密,《大唐西域记》作货利习弥伽,《新唐书》作火寻、过利、货利习弥和火辞弥,《元史》作花剌子模。以上都是同名异译,指今咸海以南阿姆河下游基发(Khiva)一带①。《汉书》不载"驩潜"一名,而在其《西域传》康居国条记康居国分封的五小王云:"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白鸟库吉谓《汉书》关于康居五小王的记载,非张骞所亲述,乃据汉将陈汤和都护甘延寿协攻康居东境郅支单于时所采得的资料,为后人所补入②。从《史记》不载五小王事来看,其说尚属可信,陈、甘二人协攻郅支,在元帝建昭三年(纪元前 36 年),则《汉书》关于康居五小王的资料,当即采集于是时。五小王辖地既服属于康居,而据《史记》,康居是一个游牧民族,即所谓"行国",哪么奥鞬小王国亦应如此。是又不然,据《史记·大宛传》:"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有城郭屋室。"又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异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欢潜”是大宛以西诸国之一，自亦与大宛大同俗。可见汉时的花剌子模人已是一种土著耕田，有城郭居室的定居民族，只有居统治地位的王族是游牧的康居人。《后汉书·西域传》、《三国志·魏志》引鱼豢《魏略》、《晋书·四夷传》均不载“欢潜”或“奥鞬”之名。《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均有呼似密国，据一般考订，即花剌子模的异译。《大唐西域记》卷一云："货利习弥伽国，顺缚刍河两岸，东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余里，土宜风俗，同伐地国，语言少异。”所谓“顺缚刍河两岸”，自应理解为此国疆域跨阿姆河两岸，但唐释慧立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谓货利习弥伽“国东临缚刍河”。据此，则该国位于阿姆河西岸，故比尔(S. Beal)以为《记》文的“两”字为“西”字之讹，即“顺缚刍河西岸”。但据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古代花剌子模的疆域包括阿姆河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区，遗迹分布于阿姆河东西两岸及其附近，故仍应以玄奘的记载为正。《旧唐书·西戎传》不载此国名，惟该书《突厥传》云："咄陆可汗又建庭于镞曷山西，谓为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燖、触水昆诸国皆臣之。”其中火燖一名，沙畹谓显非《新唐书·西域传》昭武九姓中之火寻国。但据《集韵》、《韵会》、《正韵》，燖，并徐心切，音寻。则“寻”“燖”二字的读音完全相同，故不可断言其非同指一国③。《新唐书·西域传》云："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戍(伐)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故地。其君治急多飏遮城。诸胡惟其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献黑盐，宝应时复入朝。”此一记载，较以前各书所记为详。急多飏遮城，张星烺谓似即阿剌伯地理家所传之敎尔贾尼亚(Djordjania)城，《元史》称之为玉龙杰赤(Urghendj)城④。岑仲勉则云："按飏，《切韵》g'iu，此名内无音可对。考唐人常用飓字译音，《往五天竺国传笺释》谓谢飓乃 Tagestan 或 Sedjistan，伯希和

谓提飓为 Diul，拔飓为 Barygaza，系用飓来对 jis、iul (=iuty(g)-az 等音，依此推之，飓当为飓之讹。多飓与 dior-diot 相对，急，«切韵» kiəp，应"吉"（«切韵» kiat）之讹音，故急多飓遮为 kath Diorjania 之对译"⑤。«新唐书» 谓火寻为康居小王奥鞬故地，白鸟库吉讥其"杜撰之极，丝毫不足据信"⑥。岑仲勉解释说："火寻与奥鞬地虽相近，然奥鞬别有 Urgenj 相当，故白鸟目«新唐书»为臆断。"按白鸟之讥评«新唐书»，不在于该书把两个相异的地方混同为一，而在于白鸟认为康居五小王的辖地应在锡尔河以北，«史记»时代，康居的本土尚未扩展至粟特方面，并引«晋书·西戎传»所载有关康居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为证。白鸟此论，亦非正确，我认为不能因为«史记»把苏薤列于宛东诸小国，就断言康居五小王的封地必在锡尔河之北，而不在其南。据«汉书·西域传»："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十五里。"又云："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东去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今以奥鞬城去都护之里数减去贵山城去都护之里数，相差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则知奥鞬城在贵山城以西二千八百七十五里，我们没有理由必置奥鞬城于锡尔河以北。又以苏薤城而论，该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与贵山城东去都护之里数相较，亦差一千七百四十五里，则知康居小王之苏薤城在贵山城以西一千七百四十五里。为什么«史记»把苏薤置于宛东小国之列？这可能是因为苏薤（即阿剌伯人所称的 kešš，今之 Sahri-Sabz)的使者随姑师、扜罙使者至汉庭献见，因而«史记»误列之于宛东诸小国中。至于«晋书»所谓康居与粟弋、伊列邻接的问题，粟弋一名已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据云："粟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其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白鸟已考证粟弋即 Sogdiana，«晋书»谓康居国王居苏薤城，此城即在 Sogdiana 地区之内。白鸟以为晋时康居的都城既移至 Sogdiana 地区，即

不能与伊列为邻，殊不知康居乃游牧民族，其王庭冬夏异地，粟弋自后汉以后即服属于康居，至晋代当亦如是。康居王以其属国粟弋境内之苏薤城为王庭之一，并无不可。但同时康居本土仍在锡尔河以北，故其国境能与伊列为邻，亦不难于理解，两者并无矛盾之处。

火寻遣使朝献中国，《新唐书·西域传》火寻国条只记两次，第一次是天宝十年，第二次是宝应年间。惟据同书《波斯传》则云："贞观后，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有司未尝参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辞弥，与波斯接，贞观十八年与摩罗游使者偕朝。"此火辞弥即火寻的异译，《唐会要》卷一〇〇火辞弥国条即录此文。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所载："天宝五载七月波斯遣使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此呼慈国也是火寻的异译。又"天宝十二载五月，火寻国遣使献紫麞皮、白生石蜜、黑盐。"又"天宝十四载三月康国副王火寻国主稍芬、曹国王设阿忽并遣使朝贡"，稍芬与上述《新唐书》所称稍施芬当是一人，据沙畹说："其人应是 Albiruni 所志継 Askayamouk 为火寻王之 Schawouschfar。"⑦总计唐代火寻国遣使来中国朝献而见于记载者，凡六次之多，即太宗贞观十八年(纪元 644)，玄宗天宝五年(纪元 746)，天宝十年(纪元 751)，天宝十二年(纪元 753)，天宝十四年(纪元 755)及代宗宝应年间(纪元 762—3)，则我国与花剌子模国之间的往来，颇为频繁。《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月支都督府内有妫水州，以羯城置，岑氏认为羯城是 Kath 之音写，即货利习弥⑧。

二

《宋史》对花剌子模没有什么记载，惟据《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记耶律大石西征云："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回回国即指花剌子模而言，《黑鞑事略》作撒里达，《元秘

史》作撒儿塔兀勒(Sur-Tayul),《蒙古源流》作萨尔塔郭勒,《元史》亦作回回国,又作西域国,其《地理志》则称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在南宋时代原是中亚一大国,其先祖名鲁斯忒吉(Nousch-Tékin),当塞而柱克(Seldjuks)突厥王朝最后之苏尔滩篾里克沙(Sultan Mélikschah)时(纪元 1073—1092,即北宋神宗熙宁五年至哲宗元祐七年),身为奴仆,未几脱籍为平民,甚见信任,累进为花剌子模知事。鲁斯忒吉卒,其子古忒拔丁谟罕默德(Coutb-ud-din Mohammed)嗣,始得花剌子模沙之称号。苏尔滩篾里克沙之子奚斤牙尔在位时,谟罕默德之子斡吉思(Atsiz)叛塞而柱克而入贡于西辽,是为花剌子模沙之第二代,亦即花剌子模世系之第三代。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纪元 1157),斡吉思之子伊鲁阿思剌(Il-Aslan)崛起于花剌子模西部,是为花剌子模世系之第四代。伊鲁阿思剌卒,子塔克黠(Tacasch)嗣,灭塞而柱克苏尔滩托开儿,占领义拉克阿郑,而受命于哈里发那昔尔(Nassir),遂称花剌子模王,是为花剌子模世系之第五代。南宋宁宗庆元六年(纪元 1200)塔克黠卒,子阿纳丁谟罕默德(Alaud-din Mohammed)嗣,占领班勒纥(今 Balkh)、也里(今 Herat)、马三德兰(Mazenderan)、起儿漫(Kermaneh)等地,遂为呼拉商(今 Khorasan)之主,是为花剌子模世系之第六代。嘉定三年(纪元 1210)攻占萨马尔干,并徙都于其地,而以玉龙杰赤为旧都。嘉定八至九年间(纪元 1215—1216)又兼并其东南方之古乌鲁地,于是花剌子模苏尔滩之国境,东北至锡尔河,东南至印度河,北至咸海、里海,西北至阿特耳佩占,西邻报达,几奄有中亚之全部,实为花剌子模王朝之全盛时期。嘉定十二年(纪元 1219)蒙古成吉思汗西征,连克西域诸城,谟罕默德节节败退。嘉定十三年(纪元 1220)谟罕默德逃入里海之一岛中病死,其第二子鄂斯拉克沙(Ozlag-schah)嗣,是为花剌子模世系之第七代。不久,鄂斯拉克沙让位于其弟札剌勒丁忙克比儿的(Djelal-ud-din

Mongou-birti)，是为花剌子模世系之第八代。理宗绍定四年（纪元 1231）札剌勒丁最后兵败逃走，为仇人所杀，花剌子模王朝于此告终⑨。

关于成吉思汗攻克花剌子模的新都萨马尔干和旧都玉龙杰赤两次战役，《元史》记载极为简略，在其卷一太祖本纪云："十六年辛巳春，帝攻下卜哈儿、薛迷儿干等城，皇子朮赤攻养吉干、八儿真等城，并下之。"又云："秋，帝攻班勒纥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等城，下之。"又卷一二〇曷思麦儿传云："帝亲征至薛迷思干，与其主札剌丁合战于月恋（原误作"亦心"二字）揭赤之地，败之。"月恋揭赤，即玉龙杰赤（Urgenj）的异译。又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云："壬午帝征回回国，其主灭里，委国而去，命速不台与只别追之，及于灰黑河，只别战不利，速不台驻军河东，戒其众人爇三炬，以张军势，其王夜遁。复命统兵万人，由不罕川必重罕城追之，凡所经历，皆无水之地。既渡川，先发千人为游骑，继以大军，昼夜兼行，比至，灭里逃入海，不月余病死。"〔按此所谓灭里（Melik）即《元秘史》之罕篾力克，而非国王，国王阿纳丁谟罕默德战败，逃入里海病死，《元史》误将此事与灭里混为一谈。〕《亲征录》亦简略，惟《蒙古秘史》（即《元秘史》）所载较详，据云："其后，成吉思合罕遣往撒儿塔兀勒（按即指花剌子模）百姓处之兀忽纳等百人使者被羁杀。成吉思合罕曰：'何可听撒儿塔兀勒百姓断我金縻绳也耶？为我兀忽纳等百人使者报仇雪冤而征撒儿塔兀勒百姓乎！"（按此为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之借口）又云："卯年（按即己卯年，成纪十四年，纪元 1219 年）出征撒儿塔兀勒百姓，越阿剌亦（哈）而往也。……遣者别为先锋，继者别之后，遣速别额台，继速别额台，遣脱忽察儿矣。遣此三人也，命经其城外去，出莎勒坛彼厢，待俺至后，夹攻之。言讫，遣之。……罕篾力克以其城被掳，惊而叛走，与札剌勒丁莎勒坛合矣。札剌勒丁莎勒坛、罕篾力克二人来迎成吉

思合罕而战。时失吉忽秃忽为成吉思合罕前部先锋，札剌勒丁莎勒坛、罕篾力克二人与失吉忽秃忽战，胜失吉忽秃忽，直追至成吉思合罕处来时，者别、速别额台、脱忽察儿三人，自札剌勒丁莎勒坛，罕篾力克二人背后进，反败为胜而屠之，俾不能往其不合儿、薛迷思加卜、兀答剌儿城相合，直追至申河而去也。以其猛投申河，使彼撒儿塔兀勒百姓多死于申河中矣。……于是成吉思合罕自巴鲁剌(盖巴鲁安之误)之里归来。遣拙赤、察阿歹、斡哥歹三子，率右手军，命渡阿梅河攻兀笼格赤城去讫。拙赤、察阿歹、斡哥歹等三子既克兀笼格赤城，三子私分城郭、百姓，未出成吉思合罕之分，故此三子归来，成吉思合罕怪拙赤、察阿歹、斡哥歹三子，不必觐者凡三日。时孛斡儿出、木合黎、失吉忽秃忽三人奏曰：俺已征服抚命之撒儿塔兀勒百姓之莎勒坛，取其城郭百姓矣。被分之兀笼格赤城，分取之诸子，皆成吉思合罕之所有也。赖天地之赞力，已如此征服撒儿塔兀勒百姓时，俺众军马正自欢腾焉，合罕奈何如此大怒也？子每已知其过而惧矣，可俟日后学之，恐子每心寒行怠欤？成吉思合罕闻奏怒霁。”⑩

清洪钧根据西书如拉施特《蒙古全史》、志费尼《西域志》、瓦萨甫《续西域志》、讷萨怖《札剌勒丁传》、阿黎毛夕耳《聚史》、阿卜而嘎锡《突厥族谱》、多桑《土耳其史》《蒙古史》等，撰成《元史译文证补》，其中记玉龙杰赤之役特详，据云：“十六年夏(太祖)避暑于塔里堪，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攻乌尔鞬赤，其时王母先去，札剌勒丁兄弟亦出奔，城民公举库马尔为首领。前锋兵至，守兵出御中伏败衄，朮赤下令军中，我父将以此地封我，毋许焚掠，遣人招降。当西域王居海岛时，使谕城民，力不能御蒙古，由民降敌纾祸，而守将兵士不愿，遂坚守。近城无石，伐木为冲车，垣堞坚厚，猝不可破。城跨阿母河(彼时阿母河尚入里海，城居河上)，为桥以通往来。遣兵断其桥，三千人往皆死，守者益胆壮。朮赤、察合台素有违言，师

不和，六阅月不克，使人告太祖于塔里堪，太祖廉得其实，改命窝阔台总诸军，乃和解两兄，并力亟攻，城破后巷战七昼夜，尽分民于军，一兵得二十四人，既而悉戮之，惟工匠妇女幼稚得免，决河水淹其城⑪。”

三

花剌子模一名，见于西方文献者，较中国为早。在古代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圣经《阿维斯塔》(Avesta)的《圣德》(Zend)篇已见此名。花剌子模写作 Quairisām。《阿维斯塔》之编集成文，虽则迟至纪元后第三世纪的萨珊王朝(Sasanid Dynasty)，但从内容的材料来看，多数学者认为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纪元前六世时的产物⑫。约当我国历史上的春秋后期，大流士一世(Darius 1，卒于纪元前 486 年)所立的贝希斯吞(Behistam)铭文中就有 Uwarazmia 一名，古代波斯都城拍赛波力斯(Persepolis)的铭文有 Uvarazmiya 一名，那克齐-伊-罗斯吞 (Nakš-i-Rustam) 铭文中也有 Uvrazmis 一名⑬。所有这些古代波斯的名称，都是指花剌子模而言。又据希腊史家鼻祖希罗多德 (Herodotus) 所著《历史》(The History of Herodotus)，记大流士一世的太守管域中，其第十六管域内有 Chorazmia 人，并列举各管域的贡赋，Chorazmia 与 Parthia、Aria、Sogdia 合共为 300 塔令特 (talents)，而建筑宫殿所用的绿松石是来自花剌子模的。大流士一世卒，子赛格赛斯 (Xerxes) 立，相继征服四邻诸国，并亲率大军，进攻希腊，其军队中有花剌子模人⑭。纪元前四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王灭波斯，花剌子模王法拉斯曼(Pharasmanes)率一千五百骑归附，自称其国与科勒希(Kolkhi)及女人国为邻。罗马地理家斯特拉波 (Strabo) 的《地理志》及白里内(Gaius Pliny the Elder)的《博物志》都说花剌子模在阿姆河下游，而花剌子模湖(Lake Khorasm)亦名阿拉尔湖(Lake

Aral),在其东北[15]。斯特拉波又云:“Attasi 人与 Chorasmia 人属于 Massagetae 及 Saka。”生当纪元 90 年左右的阿里安(Arrian),根据拖雷姆(Ptolemaeos)和阿里斯托布鲁斯 (Aristobulus) 二人的著作而撰成 “Anabasis Alexanders” 一书,其第七卷第十五章云:“Bessos 的目的,拟退至 Sogdiana,以阿姆河为屏障而御敌,在此期间,以等待 Chorasmia、Dehe、Saka、印度以及居住在 Tanais 河彼方的 Skythen 人”。与阿里安同时的库尔丘斯 (Curtius) 著有《亚历山大大王伟业史》,其第八卷第一章云:“与 Massagetae 在 Dahe 地方接界的 Chorasmia 王 Phratapherne 遣使相约,服从亚历山大大王的命令。”[16] 安息帝国 (Arsacid Empire) 前期 (开创于纪元前 248 年),花剌子模的政治地位如何,不大清楚,惟知纪元二世纪初,花剌子模曾为大月氏贵霜 (Kushan) 王朝所兼并。纪元 224 年,波斯萨珊王朝的创建者阿尔戴细尔(Ardashir)击败并杀死了安息王阿塔拔奴斯五世(Artabanus V),而成为最高统治者。他征服了许多安息管辖下的地方长官,而易之以萨珊贵族为总督。据 Al-Tabari 的记述,阿尔戴细尔并进军伊朗东部,占领了思斯坦(Sistan)、阿巴尔沙尔(Abarshahr)、谋尔夫(Merv)、巴尔赫(Balkh)和花剌子模[17]。纪元 360 年前后几十年间,萨珊王朝所辖旧贵霜的省区被游牧的 Chionites 人所侵占。纪元四世纪最后十年间,著名的首领 Kidara 兴起于巴克特里亚 (Bactria) 诸族之间,希腊著名史家 Priscus 屡次称之为 Kidarite Huns。纪元五世纪间,哌哒人又把 Kidarites 驱逐至印度的旁遮普。纪元 531—79 年间,萨珊王 Khosrau Anoshirvan 与突厥叶护联军击溃了哌哒,以阿姆河为界,河以北属于突厥,河以南属于萨珊王朝。纪年 651 年阿剌伯人已侵略了整个伊朗,并追击逃亡的萨珊王 Yazdagird III 至谋尔夫,在那里被人暗杀。次年,Ibn Āmir 征服花剌子模的波斯人。纪元 674 年阿剌伯人渡阿姆河,击败了布哈尔的统治者。纪

元681年 Ziyad 的儿子率军征服花剌子模。纪元703年呼拉珊(Khorāsān)总督 Mufaddhal 进占花剌子模。次年,库太巴 (Qutaba)兼并了阿姆河以北的土地,同时他的兄弟 Abd al-Rahman复占领了花剌子模[18]。由此可见,在阿剌伯人侵犯中亚之前,花剌子模曾服属于萨珊王朝。纪元711年赤汗(Chighen)为花剌子模王。萨曼(Sāmānides)王朝时期,花剌子模处于突厥汗与哥疾宁(Ghazna) 的 Mahmūd 之间,实际上是独立自主的。萨曼王朝结束后,花剌子模王为暴乱者所暗杀, Mahmūd 乃进占花剌子模,派 Altuntash 为总督。突厥塞尔柱克(Seljuks) 王朝征服的第一个国家是花剌子模,派 Balkategin 为其总督。他死后,继任者为鲁斯忒吉(Nouschtékin),被称为花剌子模王朝的开创者[19]。

关于花剌子模一名的含义,据白莱脱胥乃窦 (E. Bretschnaider)说是古波斯语"低地" (Low Land) 之义[20]。据亨里 (Franciś Henry)和路斯(Edward Denison Ross)说是"在东方"(Eastwards) 之义。但据阿甫基耶夫 (B. И. Авдиев) 则说 "太阳的土地" 之义, хвар 意为太阳, зем 意为土地[21], 从古代波斯人崇拜火及 Massagetae 人崇拜太阳来看,似较有道理。

四

以上已将中国文献和西方文献中有关古代花剌子模的记述,简略地加以介绍,但从这些记述中,我们还看不出花剌子模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从1928年起,苏联考古队即在阿姆河下游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的工作,至1937年规模更大,其所经地区包括克泽尔昆(Кызыл-Кум)沙漠、卡拉昆 (Kara-Kym) 沙漠和乌斯秋尔特 (Устюрт) 高原,行程超过一万五千公里,发掘的遗址在二百处以上,与现代花剌子模绿洲毗邻的沙漠地带已经成为"考古学的禁区"。(附图一)在这里发现上下四千年的遗迹,从新石器时代的末

期一直至中世纪。在克泽尔昆沙漠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大量的燧石器和骨器。在这些时期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所谓“安努文化”的古物。这种古物最初曾在阿什哈巴德附近,而后又在中亚的不同地区发现。这些古物中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以特殊几何图形的彩陶的残余,无论在材料上、形式上、艺术装饰上都是属于“安努形彩陶器”的。这种彩陶见于中亚西南部的费尔干和花剌子模。从保存下来的各种类型的陶器来判断，居住于古代花剌子模的诸部落的物质文化，在数千年间是一脉相承地发展起来的。在章巴斯-卡拉(Джанбас-Кала)第四号考古遗址上清理出许多小件的燧石工具，使我们对于已经转入定居生活的古代渔民和猎人的原始经济,有了一个鲜明的概念。尤其是建筑在木桩上,并覆以芦苇的大住宅残迹，更能说明了这一点。居住在这个大住宅里的可能是多达一百二十人的整个氏族公社。在时期较晚的遗址上，发现了青铜器。最后在纪元前一千年间的遗址上，又发现了铁器。希罗多德记述花剌子模地区的一些巨大的灌溉设施，考古队即在该地区发现古代的灌溉系统。这些水渠是在纪元前八至七世纪间修筑的。有些学者认为,如果当时没有国家的权力,进行这样大的水利工程是不可能的,建筑者可能是俘虏——奴隶,但也可能不是由于国家的权力，而是由于农业公社或联合公社的力量。在花剌子模进行发掘时,曾发现了这一时期名为“有可以居住的墙的古城”,这个居住地很像«阿维斯塔»中记载的名为“瓦拉”的居住地。这些巨大的古城占有广阔的地面(一千一百公尺长,七百公尺宽),四边有厚厚的砖墙围绕着,墙内有两个或三个长的居室,这是绵延六至七公里长的一个走廊，它们显然是供可能有几千人之多的整个部落居住的。环绕在这些“可以居住的墙”中间的空地则用来牧放牲畜,居住在这些“有可以居住的墙的古城”里的居民,从事牧畜和农业。在发掘中使人们对于具有千年紧张历史生活（公元前六世纪

至公元后六世纪)的古代花刺子模文化,获得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从纪元前四世纪至纪元后一世间,花剌子模前后处于波斯、希腊、康居、安息、大月氏等强大势力之间,时而成为附庸,时而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的地位。苏联学者把这个时期的花剌子模考古遗迹称为“康居文化”(Кангюиской Культурте),我们认为这种命名是不大妥当的,因为据《汉书·西域传》,康居王冬夏易地而居,与大月氏行国同俗,是一种游牧民族的文化,而考古实物已经证明,花剌子模人是定居民族。从早期历史,花剌子模与波斯的关系比较密切来看;毋宁说,它的文化受波斯的影响较大。即就大规模的灌溉设施而言,有的学者认为是波斯阿克梅内斯(Achaemenids)王朝的贡献[28]。

在上述章巴斯-卡拉的古城废墟上还发现堡垒和宽广的街道,城内分作两个街区,每区有屋二百间,有公共的住所,有力地证明是原始公社制度的遗迹。在城内又发现手工业,对内和对外的贸易,以及高度发展的灌溉和农业。又发现完整的陶器,是在脚踏的制陶车上做成的。又有真珠,证明当时与西伯里亚、埃及和黑海北岸的城市有贸易关系。许多赤土烧成的小雕像和陶制的浮雕成为花剌子模人的文化和宗教的特征。在卡拉卡尔帕克的土尔特库尔(Турткуль)地区发现葬羊堡(Кой-Крыл-Ган-Кала)遗址,这个堡垒有围墙、八座楼、广场、住宅和仓库。又有许多巨大的陶器,其中有一个盛酒器,上面刻着纪元前三世纪的古代花剌子模文字,这种文字具有阿拉美亚的来源,可能是制造者的名字。大月氏于纪元前二世纪从锡尔河区向南移动,推翻了巴克特里亚的希腊——马其顿的统治,就在那里安居下来,并且组成统治的基础,它的中心就在现今的塔什吉斯坦地区。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后来被称为贵什(Куш)或贵霜(Кушан)民族之王。纪元二世纪初,贵霜王迦腻色迦二世(Канишка II)扩张势力,兼并了花剌子模。在花剌子模

地区发现有些堡垒是给贵霜防军居住的。这些防军是用以监视王朝的北边，其中一个堡垒被称为吉亚乌尔-卡拉（Гяур-Кала），位于阿姆河的右岸，在其内部大厅里发现墙上有壁画和本地制造的雕像，这是一个青年的头部，戴着斯基特式的尖帽。在贵霜时代，花剌子模的乡村居民，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农民庄园的总合，每个庄园是由许多具有围墙的院子所组成。当纪元后二至三世纪间，花剌子模才从贵霜王朝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它可以从新铸造自己的银币。

在所有古城废墟中，规模最大的是托甫拉克—卡拉（Топрак-Кала）宫城，它位于卡拉尔帕克的昆喀拉德城（Кунград）的西南方，考古队花了五年的时间(1945—1950)才完成了发掘工作。宫城长达500公尺，宽350公尺，其时代大约从纪元前一世纪至纪元后六世纪。整个宫城都用坚固的砖墙围绕着，有许多直角形的塔楼和稠密的射击洞，从南至北横贯一条窄街，两旁有十至十二幢大住宅，每宅由十间四方形和直角形的房子组成。这些大住宅是给贵族和宗法大家族用的，其中也有给仆人和耕田或作坊工作的奴隶住的地方。宫城的西北隅矗立着纪元后三世纪的王宫，占了全城四分之一的面积。在王宫的山脚有庙宇和市场，用单独的大门与外界相通。王宫里面有一个大厅，被称为“王者厅”(Зал царей)。在高砌的墙垣上有许多壁龛，用透雕的栏栅分隔，龛内安放许多塑像，据说塑的是历代花剌子模王的肖像，环绕着他们的是王妃和侍者。塑像是用未经烧炼的粘土制成，并加以涂饰，面部表现显著现实主义的风格。还有一个最大的男像，几乎比真人大两倍，在立像后面的墙上有壁画，用深蓝色做背景。在壁画上有两顶帽子，与纪元后三世纪银币上两个花剌子模王的王冠相同，这样就可以证明这些塑像是花剌子模王。王冠作鹰形，在银币上是哇沙马尔(Вазамар)王所戴的。王宫的北部又发现两个大厅，墙上也有

王者的坐像，并伴着胜利的女神。另一个是“战士厅”，里面发现塑像的残片，饰着黑皮的战士，披着盔甲，并带有盾牌。在王宫的西部也发现两个大厅，一个饰着雕带，带上有鹿和鹰形怪兽等。另一个则饰着舞者，除了塑像之外，也有许多壁画的残片，几乎遍于各个房间，有的画一个美丽的竖琴弹奏者，有的画女像，有的画禽兽。在发掘中又发现许多谷物，如大麦、小麦、黍；又有果核，如杏、桃和葡萄等。还有棉、毛、丝等织物的残片。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写在皮和木片上的古代花剌子模的档案，用墨笔写成，字母与花剌子模银币上的字母相同，这些档案一直至现在还未能通读。

托甫拉克——卡拉的宫殿，据说是纪元三世纪花剌子模王的私邸，但宫城本身则是花剌子模的首都，一直经过三百五十年才迁到阿姆河岸的卡提(КЯТ＝Катн)。纪元四至五世纪间，贵霜王朝已经瓦解了，波斯萨珊王朝(纪元三世纪第一季兴起，继续存在达四百年之久)侵略中亚的西南部，以后又沿着咸海东南方来了一种游牧的民族——哌哒，或称“白匈奴”，在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很快就扩张到旧贵霜王朝的整个区域，只有花剌子模人还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并统御着阿夫里吉特(Афригид)王朝。当纪元六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时，哌哒由于来自西方和东方的侵略打击而崩溃了。南阿尔泰和七河区(Семиречья)的突厥族在那时已建立起强大的游牧国家，而伊朗人也同时毁灭了哌哒的政权，中亚已被突厥族所统治。这个时代显著的社会变动是封建制度的发展，已代替了奴隶制度。城市、乡村和住区很快地改变了，大量的城市减少了，其中许多是由于被攻击和骚扰而毁灭的。托甫拉克-卡拉在六世纪时就是这样被摧残的。由于居民的迁徙，广泛地散布用以自卫的堡垒，有力地加强了各个孤立的农业庄园的土地之间的小城寨。贵族庄园与农民住区的分别，仅仅是在面积和富丽的装饰上。1938 年至 1939 年间，考古队在贝尔库特—卡拉

(Беркут—Кала)所发现的一个大的和三个小的花园遗迹，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加强花园的建筑，大概与不断进行的战争及中央政权之衰落而不能保护自己的臣民有关，奴隶经济的危机表现在灌溉之减缩及手工业之衰落。纪元七世纪初，阿剌伯的国家形成，并开始侵略邻国，八世纪初中亚被其征服，花剌子模也同时被摧残。随着阿剌伯人的侵略，伊斯兰教也传布起来，给封建制度的发展增加了推动力，使中亚民族的文化起着显著的变化。但不久以后，中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又开始复兴了，并逐渐成长了城市的生活，产生了新的封建城市。这时花剌子模国达到最高的繁荣，它的版图包括中亚的大部分土地，这是花剌子模封建制度的发展时期。1940年考古队在卡哇特—卡拉(Кават—Кала)所发现的中世纪的死绿洲上的花园遗迹，就足以代表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23]。

五

上文已经说过，古代花剌子模的首都原在阿姆河左岸昆喀拉德(Кунград)西南方的托甫拉克—卡拉，至纪元后六世纪被摧毁后，才迁至紧靠阿姆河右岸的卡提。旧玉龙杰赤城始建于何时，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汉书·西域传》，康居五小王之一奥鞬王，即以奥鞬城为治所，所以有些学者主张此城建立于月氏时代，但谷利雅莫夫(Я. Г. Гулямов)则主张此城之建立，不早于第九世纪。按八世纪初阿剌伯人已征服了中亚，他们称旧玉龙杰赤为教尔贾尼亚(Djordjania)，则此城已存在于八世纪以前，十世纪时，它已经成为一个宏大的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与花剌子模周围的游牧民族进行活跃的贸易，并与更远的东欧、伊朗和中国有贸易往来。当时旧玉龙杰赤是在回教主马门—伊宾—谟罕默德(Mamun Ibn-Muhammed)的统治之下，纪元995年他兼并了花剌子模南部，于是此城就成为统一的花剌子模帝国的首都，其繁荣时期一直延续

至纪元 1221 年[24]。此后遭受蒙古兵的进攻而被摧毁。1224 年之后，它在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的管辖之下，又复兴起来。在金帐汗国时期，此城已失去政治上的作用，但至纪元十四世纪时，它又成为一个大的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纪元 1340 年乌兹别克汗卒后，花剌子模获得独立，旧玉龙杰赤又一次恢复为首都。不久，花剌子模的政权改变为苏菲(Суфи)的昆喀拉德王朝。纪元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以萨马尔干为中心的帖木儿向花剌子模五路进军，并毁灭了旧玉龙杰赤城，在废墟上种上了大麦。但 1391 年帖木儿又命令恢复玉龙杰赤，规模已不若前此之大，只有一条街道名卡安(Kaan)泉。由于封建国家内的动乱和游牧民族的侵犯，而逐渐趋于衰落。1505 年被赛巴尼汗(Шейьани Ханом)的围攻，遭受严重的破坏。1558 年一个莫斯科—伦敦商业经纪郑金松(Дженкинсон 的音译)经过那里时，说它只是一个起地方性作用的小城市。直至纪元十七世纪，基瓦汗(Хивинский Ханы)由于内乱而将全部居民迁至新玉龙杰赤(此城位于阿姆河之西，基瓦城的东北方，距旧玉龙杰赤 90 英里)，从此旧玉龙杰赤就彻底地衰落了。

旧玉龙杰赤城占面积 40 公顷，从西南边一直延伸到阿姆河古代河床之南几公里，现今称之为达里雅勒柯(Да-рьялько)，城的周围是耕地，曾经被巨大的墙垣环绕，其北面全是墓地，其西面有楚拉伯克汗(Тюраьек-Хан)的陵墓，她是库特路克—帖木儿(Кутlук—Тимур)的妻子。在陵墓的后面有一个大的回教寺尖塔。从木柱上的题词可以看出，是在乌兹别克金帐汗统治时期库特路克—帖木儿建造的。又有舍里发(Шерефа)族长或卓克沙(Текеша)的陵寝，据说是属于十三世纪下半叶或十二世纪的。发赫尔—爱—丁—拉兹(Фахр—Ад—Дин—Рази)的遗迹则是属于十三世纪或十二世纪初，甚或十一世纪末的。从上列遗址向南，地面散布着碎砖，据说这里就是所谓“石头堡”(塔什—卡拉 Таш-

Кала)。在此区域内发现烧砖城墙、手工业商场和商旅宿舍。又有许多磨和手工业器具、茶馆和面包作坊、铁匠的工具、澡堂和其他建筑物等。又有贫民居室和富丽堂皇的大住宅,其墙上均有壁画。每宅都有盥洗台和煮食物的火灶。有中国式的睡坑,底下通以取暖的暗渠。遗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带釉的划花瓷碗,与中国宋瓷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毗邻塔什—卡拉的东面,矗立着阿克—卡拉(Ак-Кала)堡垒,还保存些墙壁,西面有涂釉墙壁的残余,堡垒的墙垣是南北走向。城址上散布着蒙古时代的陶片,还有同一时代的铜钱。在塔什—卡拉又发现许多陶瓷器,据鉴定,依基本年代分作三组,其中属于第一组的,有大量的粗制的上釉陶器,以黄色粘土制成的上釉器皿为多,用绿、黑和蓝的彩色绘画,与十三至十四世纪制品的花彩有不少相同之点。还有用单一蓝色绘画的器皿,是摹仿中国器所用"绀青"("天青")的。属于第三组的除本地产的陶瓷器之外,又有外来的式样,主要是绀青和灰绿色的中国器皿。这就证明花剌子模与中国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延续至十六和十七世纪。在中国瓷器中发现一个大白盘,上面绘着蓝色花草画,底部正面环绕着莲花簇,在栏板上聚集着桃花的图像(象征长寿)。盘子的周围还有其他植物、菊花和叶子。盘外中心施以纤细的线条。其底部是宽大的圆脚台,保存部分的中国题词"富贵佳器"㉕。

①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民29年长沙商务印书馆版,329、399页;岑仲勉著《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版,下册301页。

②白鸟库吉著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20—21页。

③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版,34页注九。

④张星烺编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8年北京中华书局版,第四册,97页。

⑤《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上册，255—256 页。

⑥《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331 页。

⑦《西突厥史料》，266—267 页注九二。

⑧岑仲勉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 年北京中华书局版，143 页。

⑨河野元三著欧阳瑞骅译《蒙古史》，清宣统三年江南图书馆版，上卷 22—26 页；多桑著冯承钧译《蒙古史》，民 25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上册，85—92 页。

⑩道润梯步著《新译简注蒙古秘史》，1979 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版，303—335 页。关于蒙古军克服萨马尔干之役，可参考河野元三《蒙古史》上卷，33—34 页。

⑪清洪钧撰《元史译文证补》，《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卷二二《西域补传》上。

⑫《中西交通史料汇篇》，民 19 年北京辅仁大学版第四册，24—26 页；第五册，66—67 页。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erolina Pr., 1939, p. 74—84。

⑬《康居粟特考》，3 页。

⑭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N. Y. Lincoln Macveagh, 1928, BK. VII p. 378; Gavin Hambly ed.: Central Asia, N. Y. Delacorte Pr., 1969, p. 22—24。

⑮《中西交通史料汇篇》(辅仁版)第五册，66—67 页。

⑯《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298—304 页。

⑰Central Asia, p. 58。

⑱Op. cit., p. 58—65。

⑲Francis Henry (Skrine) and Edward Denison Ross: The Heart of Asia, London, Methuen, 1899, p. 60、123、136。

⑳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London Kegan Paul (民 26 年北平文殿阁书庄影印), vol. 2, p. 91。

㉑The Heart of Asia, p. 233 note 1; 阿甫基耶夫著王以铸译《古代东方史》，1956 年北京三联书店版，624 页。

㉒Central Asia, P. 22—24。

㉓《古代东方史》，573—595 页；А. Л. Монгайт: Археология В СССР, Москва, А. Н. СССР, 1955, Ctr. 258—272;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Работы Хорезмской Экспедичии 1945—1948, Москва, А. Н. СССР, 1952, Ctr. 7—24。

㉔纪元十世纪下半叶，阿剌伯地理家伊斯塔克里（Istakhri）及伊宾霍克勒（Ibn Haukal）二人皆详记花剌子模，谓其都城曰卡提（Kath），在纪浑河北岸，霍克勒述卡提之外，并有教尔贾尼亚（Djordjanieh）城，亦为要邑（即指旧玉龙杰赤城）。十二世纪初叶，阿剌伯地理家爱德里斯（Edris）则记教尔贾尼亚城为花剌子模的首都，城跨纪浑河两岸，有桥连络。纪浑河即今阿姆河，昔时此河自布哈尔西北折而西，又折而西南流，入于里海，旧玉龙杰赤城即当河之西流，为中西交通要道。明中叶后阿姆河被沙碛填塞，不折而西，乃径北流而入于咸海。此城被蒙古人摧毁后百年，裴哥罗梯（Pegolotti）的«通商指南»及拔都他（Ibn Batuta）的«游记»，皆言城已恢复原状。（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2 p. 91—92）

㉕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Работы Хорезмской Экспедичии 1949—1953, А. 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8, Стр. 467—486。

附录三

玄奘西游年表

中　历	公元	岁数	备　考
唐太宗			
贞观三年	629	34	依《法苑珠林》卷38《感通篇》述意部，玄奘首途于是年春三月。夏经高昌，冬在屈支国。
四　年	630	35	春经跋禄迦国，夏在素叶城会见西突厥可汗肆叶护，冬在迦湿弥罗国，停留二年。
五　年	631	36	秋离开迦湿弥罗国，冬抵摩揭陀国那烂陀寺。
六　年	632	37	在那烂陀寺学习，直至十年春。
十　年	636	41	春至伊烂拿国，冬开始南游。
十一年	637	42	年底还至钵伐多罗国，停留二年。
十三年	639	44	秋还那烂陀寺，停留二年。依《法苑珠林》卷九阿修罗部记玄奘自云；贞观十三年在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
十五年	641	46	正月与胜军往菩提寺观舍利，八月应鸠摩罗王之请，赴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十月至羯朱嗢祇罗国会见戒日王，十二月参加曲女城大会。

十六年	642	47	四月自钵罗耶伽起程回国，十月间至呾叉始罗国。
十七年	643	48	春经滥波国，九月间经达摩悉铁帝国，十二月至朅盘陀国。
十八年	644	49	春至瞿萨旦那国(于阗)，上表报还，停留至九月，十一月至纳缚波国，十二月初至沙州，月底至漕上。
十九年	645	50	正月回到长安。

注：(1)岁数依唐刘轲«塔铭»玄奘卒年六十九推算。

(2)年数依梁启超作若干个年头解，而非依足年算。